

目 录

谭延闿被迫下台和李仲麟等被杀的回忆·····	黄一欧(1)
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	谢慕韩(17)
一九二七年程潜由南京脱险经过·····	唐菊庵(34)
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	饶少伟(37)
一九四四年薛岳撤军湘南的打算·····	贺执圭(58)
衡阳会战中的鸡窝山战役·····	罗文浪(62)
关于南岳游干班的回忆·····	宋 涛 罗文浪(65)
西南干部训练班及突击队·····	李 昊 熊壮猷(75)
记邵阳永和金号惨案·····	徐君虎(89)
永和金号惨案的审理经过·····	汪 廉(102)
特务傅德明陷害新化学生案始末·····	李惕乾(110)
我在蒋介石的反共军事“围剿”中倡议碉堡政策的始末 ·····	戴 岳(115)
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	何汉文(125)
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	苏 民(156)
我所知道的中统·····	刘 恭(179)
军统特务在武汉制造的一件血案·····	余定华(218)
回忆蔡松坡先生创办广西陆军小学·····	唐希拏(223)
黄兴上孙中山论革命计划书(附黄一欧、李书城跋)·····	(229)
补充和订正	
关于第一次“围剿”史实的补充订正·····	李家白(237)
樊钟不是蔡松坡的母舅·····	唐希拏(240)
关于《回忆秋瑾》的订正和补充·····	三希孟(241)

正反映出谭、赵之间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也正是这个原因，赵恒惕以退为进，多次请求撤消湘军总指挥职务；谭延闿迟迟不予批准。除了正规军以外，湖南的地方部队名目繁多，各据一方，设卡征税，拥兵称雄。谭延闿以督军兼署省长名义，于九月间发表地方军编区方案，任命吴剑学、张辉瓒、谢国光、罗先闿、刘叙彝、李仲麟、陈嘉祐、蔡巨猷、田镇藩、李韞珩、林支宇、萧昌炽等为第一至十二区司令。这批人中：吴剑学于一九一六年秋谭延闿二次督湘收束军队时，由二师四旅旅长调充第一区守备司令；罗先闿所部久驻湘南，一九一六年春望云亭在零陵宣布独立时，任湘南护国军第五团团长，曾率部赴郴桂宣布独立；刘叙彝于一九二〇年春击败廖湘芸部，任五区右翼联队司令，同年七月，冯玉祥部由常德撤出后，进据常德；李仲麟是程颂公（程潜）的老部下，一九一六年随程由云南回湘招抚，任招抚使署总务处长，后任铁道守备队司令官；陈嘉祐在一九一六年夏由谭延闿转荐回湘（同时被荐回湘的还有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任护国第一师第四梯团长，汤芑铭出走后，任第二师四旅旅长，旋调三旅旅长；田镇藩原任第五区司令；李韞珩系六月十一日张敬尧火烧镇湘楼出走后，次日率湘军进入长沙的；林支宇时任警务处长，区司令职务交由副司令唐荣阳代理；萧昌炽曾任督署副官长，后任零陵县知事代理零陵镇守使，是谭延闿的亲信部属。当时，湖南军官由于出身和经历的不同，政治态度也随之各异：宋鹤庚、吴剑学、张辉瓒、陈嘉祐、唐义彬（督署参谋长）等均与赵恒惕为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同学，他们是拥谭拥赵的，特别是宋、张两人拥谭更为坚决；刘叙彝、蔡巨猷、田镇藩等人都是前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周则范的旧部，周被廖湘芸刺死后，他们反对廖湘芸，接近谭延闿，也算是谭派；廖家栋、李仲麟不属士

正反映出谭、赵之间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也正是这个原因，赵恒惕以退为进，多次请求撤消湘军总指挥职务；谭延闿迟迟不予批准。除了正规军以外，湖南的地方部队名目繁多，各据一方，设卡征税，拥兵称雄。谭延闿以督军兼署省长名义，于九月间发表地方军编区方案，任命吴剑学、张辉瓒、谢国光、罗先闿、刘叙彝、李仲麟、陈嘉祐、蔡巨猷、田镇藩、李韞珩、林支宇、萧昌炽等为第一至十二区司令。这批人中：吴剑学于一九一六年秋谭延闿二次督湘收束军队时，由二师四旅旅长调充第一区守备司令；罗先闿所部久驻湘南，一九一六年春望云亭在零陵宣布独立时，任湘南护国军第五团团长，曾率部赴郴桂宣布独立；刘叙彝于一九二〇年春击败廖湘芸部，任五区右翼联队司令，同年七月，冯玉祥部由常德撤出后，进据常德；李仲麟是程颂公（程潜）的老部下，一九一六年随程由云南回湘招抚，任招抚使署总务处长，后任铁道守备队司令官；陈嘉祐在一九一六年夏由谭延闿转荐回湘（同时被荐回湘的还有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任护国第一师第四梯团长，汤芑铭出走后，任第二师四旅旅长，旋调三旅旅长；田镇藩原任第五区司令；李韞珩系六月十一日张敬尧火烧镇湘楼出走后，次日率湘军进入长沙的；林支宇时任警务处长，区司令职务交由副司令唐荣阳代理；萧昌炽曾任督署副官长，后任零陵县知事代理零陵镇守使，是谭延闿的亲信部属。当时，湖南军官由于出身和经历的不同，政治态度也随之各异：宋鹤庚、吴剑学、张辉瓒、陈嘉祐、唐义彬（督署参谋长）等均与赵恒惕为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同学，他们是拥谭拥赵的，特别是宋、张两人拥谭更为坚决；刘叙彝、蔡巨猷、田镇藩等人都是前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周则范的旧部，周被廖湘芸刺死后，他们反对廖湘芸，接近谭延闿，也算是谭派；廖家栋、李仲麟不属士

正反映出谭、赵之间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也正是这个原因，赵恒惕以退为进，多次请求撤消湘军总指挥职务；谭延闿迟迟不予批准。除了正规军以外，湖南的地方部队名目繁多，各据一方，设卡征税，拥兵称雄。谭延闿以督军兼署省长名义，于九月间发表地方军编区方案，任命吴剑学、张辉瓒、谢国光、罗先闿、刘叙彝、李仲麟、陈嘉祐、蔡巨猷、田镇藩、李韞珩、林支宇、萧昌炽等为第一至十二区司令。这批人中：吴剑学于一九一六年秋谭延闿二次督湘收束军队时，由二师四旅旅长调充第一区守备司令；罗先闿所部久驻湘南，一九一六年春望云亭在零陵宣布独立时，任湘南护国军第五团团长，曾率部赴郴桂宣布独立；刘叙彝于一九二〇年春击败廖湘芸部，任五区右翼联队司令，同年七月，冯玉祥部由常德撤出后，进据常德；李仲麟是程颂公（程潜）的老部下，一九一六年随程由云南回湘招抚，任招抚使署总务处长，后任铁道守备队司令官；陈嘉祐在一九一六年夏由谭延闿转荐回湘（同时被荐回湘的还有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任护国第一师第四梯团长，汤芑铭出走后，任第二师四旅旅长，旋调三旅旅长；田镇藩原任第五区司令；李韞珩系六月十一日张敬尧火烧镇湘楼出走后，次日率湘军进入长沙的；林支宇时任警务处长，区司令职务交由副司令唐荣阳代理；萧昌炽曾任督署副官长，后任零陵县知事代理零陵镇守使，是谭延闿的亲信部属。当时，湖南军官由于出身和经历的不同，政治态度也随之各异：宋鹤庚、吴剑学、张辉瓒、陈嘉祐、唐义彬（督署参谋长）等均与赵恒惕为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同学，他们是拥谭拥赵的，特别是宋、张两人拥谭更为坚决；刘叙彝、蔡巨猷、田镇藩等人都是前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周则范的旧部，周被廖湘芸刺死后，他们反对廖湘芸，接近谭延闿，也算是谭派；廖家栋、李仲麟不属士

正反映出谭、赵之间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也正是这个原因，赵恒惕以退为进，多次请求撤消湘军总指挥职务；谭延闿迟迟不予批准。除了正规军以外，湖南的地方部队名目繁多，各据一方，设卡征税，拥兵称雄。谭延闿以督军兼署省长名义，于九月间发表地方军编区方案，任命吴剑学、张辉瓒、谢国光、罗先闿、刘叙彝、李仲麟、陈嘉祐、蔡巨猷、田镇藩、李韞珩、林支宇、萧昌炽等为第一至十二区司令。这批人中：吴剑学于一九一六年秋谭延闿二次督湘收束军队时，由二师四旅旅长调充第一区守备司令；罗先闿所部久驻湘南，一九一六年春望云亭在零陵宣布独立时，任湘南护国军第五团团长，曾率部赴郴桂宣布独立；刘叙彝于一九二〇年春击败廖湘芸部，任五区右翼联队司令，同年七月，冯玉祥部由常德撤出后，进据常德；李仲麟是程颂公（程潜）的老部下，一九一六年随程由云南回湘招抚，任招抚使署总务处长，后任铁道守备队司令官；陈嘉祐在一九一六年夏由谭延闿转荐回湘（同时被荐回湘的还有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任护国第一师第四梯团长，汤芑铭出走后，任第二师四旅旅长，旋调三旅旅长；田镇藩原任第五区司令；李韞珩系六月十一日张敬尧火烧镇湘楼出走后，次日率湘军进入长沙的；林支宇时任警务处长，区司令职务交由副司令唐荣阳代理；萧昌炽曾任督署副官长，后任零陵县知事代理零陵镇守使，是谭延闿的亲信部属。当时，湖南军官由于出身和经历的不同，政治态度也随之各异：宋鹤庚、吴剑学、张辉瓒、陈嘉祐、唐义彬（督署参谋长）等均与赵恒惕为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同学，他们是拥谭拥赵的，特别是宋、张两人拥谭更为坚决；刘叙彝、蔡巨猷、田镇藩等人都是前湘西护国军总司令周则范的旧部，周被廖湘芸刺死后，他们反对廖湘芸，接近谭延闿，也算是谭派；廖家栋、李仲麟不属士

官系，他们都是程颂公的旧部，可以说是程派；罗先闳出身行伍，他是无所谓的，可算是中间派。

在政治方面，谭延闿在驱张运动结束后，以“湘人救湘，湘人治湘”相标榜，主张废除督军，民选省长，实行联省自治，成立联省自治政府。他下令召开自治会议，请省议会制定全省人民宪法会议组织法，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活动，俨然马上就要“还政于民。”为了粉饰太平，表示驱张以后，励行文治，谭延闿还请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哲学家杜威，以及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等“名流学者”来湘讲学，大开“学术讲演会。”章太炎到长沙后，我曾会见数次，他书赠的几幅对联，至今还保存着。张继于清光绪年间应先君之邀，到明德学堂任教，这次算是旧地重游。蔡元培这次在长沙做过七次讲演，他在第一次的讲演中谈到近几十年湖南人发展的时期，可分三期观察：一、湘军时代，有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及同时死战立功诸人；二、维新时代，梁启超、陈宝箴、徐仁铸等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养成许多维新的人才；三、革命时代，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重要分子，湖南人最多，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后来又有蔡锷等护国反袁，恢复共和。在以后的几次讲演中，又谈过《美术的进化》、《美学的进化》、《美术与科学的关系》，等等。

当时，中山先生对于谭延闿，除了派人来争取之外，还直接打电报给他，劝他出兵广西，直捣桂系军阀后路。而徐世昌则授意范源廉以同乡关系劝告谭延闿赞助和平统一。这位八面玲珑的督军，一时举足轻重，成了南北双方争取的对象。各方面来到湖南活动的人很多。中山先生派来的人，除道腴先生外，我所接触过的，还有旧国会议员李执中、李汉丞、陈嘉会等。李执中是临澧人，过去属于中华革命党的；李汉丞系衡山人，曾任湖南高等

审判厅长；陈嘉会回湘后，住在陈嘉祐处，他在谭延闿面前活动最力。此外，柏文蔚和覃振也由中山先生派来长沙活动，柏住西区朝阳巷，覃住都正街，我和他们多次见过面。至于姚大愿、大慈兄弟回湘进行活动的情形，程子楷不止一次地对我谈过，并怂恿我和他们见面。我觉得没有必要，故未晤谈。（程与赵恒惕在日本士官六期同学，此时在赵的司令部作客卿）。

如上面谈到的，各方面的人接连来湘活动，谭延闿却胸有成竹，毫无表态。他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超然于南北政府之外，游离于粤桂之间，实际上是倾向桂系的。至于谭延闿手下的实力派领袖赵恒惕，清末即到广西工作，辛亥广西光复后，随王芝祥出来组织湘桂联军，他对广西方面一直保持好感，政治上倾向政学系。无论是谭延闿或赵恒惕，对中山先生的态度，都不是心悦诚服的。中山先生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接二连三地派人来湘活动。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考虑到，要想公开活动是比较困难的，单刀直入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另觅迂回曲折的途径。我们回到长沙后，和谭延闿虽有几次见面机会，仅止于普通应酬，不便率直进言；就我个人来说，他是世交长辈，说话时总感到有些拘束。对于赵恒惕，情况却是两样：杨丙和他是日本士官同学，又和湘军有段历史渊源（他和杨宇霆有密切关系，早年曾代表湘军到奉系军阀张作霖处联络），比较容易接近；幼甫长于应酬交际，又很健谈，他跟赵恒惕虽无深交，也常来往；我和赵恒惕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九一二年他在南京第八师任旅长时，彼此过从很密，这次在长沙又时常会面，相处甚融洽。他住在东门捷径吊楼子公馆，田凤丹时由湘西解职晋省（他与赵在日本士官同学，又系第八师老同事），住在落星田，我们几乎两三天见面一次，地

点不在赵家即在田家，经常到的还有鲁涤平、宋鹤庚、胡雨屏等，无非是打牌消遣，逢场作戏。尽管如此来往密切，有些话还是不好直率谈出，因为赵为人阴狠，拥兵自重，也以联省自治相标榜，并不乐意听中山先生的话。在此情况下，我总是从远处、大处谈起，拐弯抹角地透露出中山先生的意图，希望他顺应潮流，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我当时谈到湖南人应当团结一致，不要互相猜忌，把力量自相抵消了；不要关起门来称王称霸，而要设法打开新局面，努力向外发展；中山先生豁达大度，对湖南局面非常关心，希望湖南人做一番革命事业。并且谈到谭延闿在粤桂战争中名为保持中立，实际上是中间偏桂，这种两面敷衍的态度，终归是不会见信于双方的。如果谭不择善而从，拥护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计，赵应取而代之以，这是义不容辞的。赵恒惕对于我的这番好言劝告，表面上态度很矜持，实则已经有所动心了；否则，后来张振武团开到长沙北门外驻扎，他怎能不闻不问呢？配合正面争取，我们有时也采取旁敲侧击的办法。时有老同盟会员胡典武，是赵恒惕的小同乡，正在赵处作食客，极为赵所信任。胡典武富于正义感，有爱国热情，和我的交谊也不坏。我有时就请他通过宾主关系向赵疏通，使不便明言者得以委婉转达。平心而论，胡在这方面出力不少。此外，省议员赵子威是赵恒惕的堂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参与赵的机密，友朋间戏呼之为“威亲王”，赵的妹夫李醉吾，时任电政监督，我们有时也通过他们去影响赵恒惕。

谭、赵而外，其余的军官是比较容易说话的。如叶开鑫是赵恒惕的死党，有人说他是赵恒惕身边的“赵子龙”。他和幼甫在江南第九镇同事，又是把兄弟，和我的私交也很好，我们时常见面，无话不谈。廖家栋的第二旅调驻长沙，他是程颂公的旧部，

处事比较谨慎。幼甫同他谈过倒谭的事，他很恨谭，但不愿为倒谭的戎首，只能暗中支持倒谭运动。李仲麟是倒谭最积极的，他的司令部在醴陵，所部六营，实力雄厚。他本人时常来长沙，住在该区驻省办事处（浏正街聂云台宅，过去作过德国领事馆）。李仲麟经常和我见面，他多次对我表示过希望程颂公重回湖南，私下常骂谭延闿。和张辉瓒磨擦得厉害。我站在朋友和同乡的立场，总是劝他遇事谨慎为佳，不要太露锋芒，遭人嫉妒。他和幼甫的交谊最厚，常常向幼甫请教军事学，自称“弟子”，喊幼甫做“老师”，并将他在长沙史家巷自置的公馆让给幼甫住。幼甫婉谢了他的盛意。并劝他对张辉瓒只能貌合神离，万不可针锋相对，以免张的暗箭伤人。幼甫曾为他们奔走调停，他们都写有亲笔信言归于好，由幼甫转交。后来事实证明，这是表面文章，赵恒惕杀李仲麟等人的计划，传说就是张辉瓒拟定的。此外，我们和夏斗寅、蒋骝欧（当时任团长，是赵恒惕的亲信，有“蒋门神”之称）等的交往密切，可以谈知心话。有些地方军官，我们也相机争取。如岳临警备第一团团长王承荫是幼甫的姐夫，第二团团长陈迎祥是幼甫的同学，他们都是可以吐露真情，极力团结的对象。

由于谭延闿一意孤行，不顾大局，倒谭运动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十一月十三日，平江县城发生兵变，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被杀害，营长于应祥被推举代理司令，宣布独立。原来，江道区司令刘梦龙，也是程颂公的旧部，八月间被谭延闿下令免职，所部改编为十二区守备队，归新任区司令萧昌炽指挥，由永兴移驻平江。萧昌炽是谭延闿的心腹，守备队官兵对他极为不满，蓄意谋害。平江兵变，名为兵士闹饷，实系倒谭运动的序幕。在这前后，第三旅第五团团长张振武、第七团团长郭步高率部移驻水渡

河（张部后来又进驻长沙北门外），原驻平江的游击司令张伟民部，也移驻到长沙东乡大桥，隔省城仅三十里。山雨欲来风满楼，谭延闿知道他的一统江山坐不稳了，便于十一月十八日，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废除督军，民选省长，并请赵恒惕担任湘军总司令，同时指定廖家栋兼任省会临时戒严司令。这次会议内容，外间知道的人很少。我是从胡典武那里得到消息的。四天以后，即十一月二十二日，李仲麟、张振武、郭步高、于应祥、张智等联名发出通电，要求谭延闿去职。这个“兵谏”通电发出后，一时省会骚动，局势紧张。谭延闿看到众叛亲离，形势越来越严重，于二十三日再次召集军政负责人和各团体代表举行紧急会议，宣布即日解除军政职务，坚请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并由省议会另选临时省长。赵恒惕在会上对谭延闿的求去没有挽留的表示，只声明不就总司令，愿以师长名义维持省会治安。这个消息也是胡典武特地到我家来告诉我的。他一再通风报信，很可能出于赵恒惕的示意。

我们得到谭延闿宣布去职的消息，非常高兴。当天晚上，杨丙、幼甫、柳聘农、陈方度、李荃吾等多人聚集在我家里。大家商议一番，决定贴出湘军总司令的布告，使外间知道谭延闿已经倒台了。布告是由幼甫起草的，义正辞严，确是一篇有力的讨谭檄文。据幼甫最近回忆，布告的大意是：谭延闿以一乡愿，夤缘时会，三次督湘。如果逆取顺守，能以公正政治领袖之心为心，理宜整军节用，努力建设，团结湘人，发扬刚毅之风，以作革命前卫。乃竟植党营私，犹豫泄沓，压榨群黎，挑拨袍泽，以致马嘶人怨，舆论哗然。倘再任其柔懦自用，坐肆迁延，势将又陷湘人于浩劫。本总司令受各军拥戴，出维治安，促谭离境。湘政根本改革，责任全在后贤。大权属于省民，省长亟待民选。……

在草拟这篇布告时，大家说：对谭延闿不能骂得过分。主稿人感到很为难，不大好措词。其中“乡愿”、“夤缘”、“逆取”等字句，都经过再三推敲，寓意深刻。所谓“逆取”，指谋杀焦、陈，不作“革命前卫”，指其倾向旧桂系，反对孙中山。“马嘶人怨”，指“马嘶团”之不得人心。“柔愎自用”，是当时流传的一种众所周知的评论：吴佩孚刚愎自用，段祺瑞刚愎他用（指听任徐树铮乱搞），谭延闿柔愎自用。

布告落款只署“湘军总司令”，而未署姓名。出布告没有印信怎么办？柳聘农顺手拿了我的三妹德华（当时她在周南女校附属小学读书）的一方砚池，翻转过来刻了一颗湘军总司令的篆文大印，非常逼真。聘农刻印之后，坚持要在布告上总司令名义下署幼甫的姓名（阎鸿飞），说他在辛亥光复后当过湖南军务部长，资望相当。幼甫不以为然，说：“如果写上我的名字，那就真是光杆总司令，不好，不好！”这篇无名总司令的布告，立即分抄了几十张，连夜贴在北门一带。次日早上，围看布告的人很多，谭督军的倒台消息，立即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论中心。这是倒谭运动中一段有趣的插曲。

谭延闿去职后，赵恒惕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总司令的职务，于二十四日就职。二十五日，省议会选举林文为临时省长。二十七日，谭延闿离开长沙去上海。第二天，谭所搭轮船过岳阳城陵矶附近，与由上海载运谭妻灵柩回湘的轮船相遇，而无法停靠。谭原想等候运柩轮船到长后再走，但因形势所逼，未能如愿。他后来在上海写信给朋友，自叹“相逢不相见，存歿两难安。”据胡典武事后告我，谭到上海后，湖南当局曾送他一笔光洋十万元的重礼，可见赵恒惕的上台，是花了不少代价的。听说谭延闿在上海作寓公时期，赵恒惕还每年致送生活费两万元。虽然如此，谭

并没有忘记赵恒惕对他的打击。谭、赵之间从此矛盾日深，结下了深仇大恨。谭延闿后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官运亨通；赵恒惕在这个反动统治集团中却从没有抓到实权，这与谭延闿的睚眦必报，大有关系。

谭延闿出走后，林支宇由警务处长而升任临时省长。林虽位居省长，并不能参与赵恒惕的机密。他对赵唯命是从，而赵则大权在握，俨然是个太上省长，重大的省政措施都要秉其意旨办事。林不敢独断专行。例如，我之出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就不是由林省长决定，而是由赵总司令指派的。十二月初某天，赵恒惕托胡典武来向我致意，说石醉六请辞长沙市政厅长，拟将市政厅改为市政公所，要我担任市政公所总理。我因为赵刚刚上台不久，时局还在动荡中，推辞不愿担任，胡典武说：“赵炎公（赵恒惕号炎午）认为市政建设很重要，你在外国的时间久，见识多，出长市政，最为适宜，一定要请你帮忙。”赵恒惕和我见面时，也是这样表示。经他再三敦促，我自己考虑到借此可以在家乡做一番事业，而孙科当时也正担任广州市长，因此答应下来了。其时，市政公所每月仅有经费五千元，还不能按时领到，要拿财政厅的拨条到省河厘金局去抵借。可是，在赵恒惕的本意，却是以此为酬庸工具，来报答我帮助他赶走了谭延闿。谭延闿则因此对我怀恨甚深。一九二八年安徽省政府改组时，蔡元培、孙科等在南京行政院会议上联名提出我为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谭延闿时任行政院长，他坚持不同意，结果没有通过。会后，蔡元培派车接我去大学院谈话，他劈头就问：“你和组安先生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我说：“别的没有，只是民国九年在长沙赶走了他。”蔡先生连说，“难怪，难怪！”接着，他把开会的情况告诉了我，并叫我不要介意。

(二)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长沙城里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流血事件。被害的人多是湘军现役军官，计有六区司令李仲麟、二旅四团团长瞿维臧、第一师司令部执法官萧泽源、二旅四团团附曹广遂、前湖南政务厅长易象、烟酒专卖局局长张自雄、湖田局局长叶隆柯等人。这是一次经过缜密布置的有计划的大屠杀，惨遭牺牲的大多是拥程倒谭的人物。

这天上午，我在通泰西街私宅为回湘省亲的林镜南（长沙人，时任北京政府陆军部军衡司长）设宴洗尘，并邀彭允彝、李醉吾、杨丙和严幼甫等人作陪。李仲麟也在被邀请之列。别人都来了，他却没有到，听说回长沙金井乡间李家祠堂挂匾去了（李仲麟是农民家庭出身，青年从军，超升很快。当了司令以后，乡下人都对他另眼相看。宗族间对他更是捧得很高。李在倒谭之后，动了“衣锦还乡”的念头，趁“冬至”回乡祭祖，到祠堂上匾。他的字学黄山谷，写得甚好，也学做诗，俨然儒将风流，恭维他的人很多。因此，更助长了“踌躇满志”的情绪，平日麻痹大意，以为赵恒惕对他莫可奈何）。

当天晚上，我试打了一次电话到六区办事处询问，李仲麟自己接电话，说他下午刚进城，没有来陪客。我问他那里有人客没有，他说只有周介猷（新任警务处长）在，没有外人，要我和幼甫去谈谈。我邀幼甫同去，刚走到泰安里口叶开鑫住宅前面，卫兵问“口令”，我们回答了，再问“特别口令”，我们答的不对。卫兵正要阻拦，幼甫情急智生，说：“我们是来会叶太太的。”到了叶家一问，才知道是临时换了口令。我由叶家回到自己家里，已是十一点多钟了，想到情况有变化，要给朋友打个招呼，于是再打电

话找李仲麟。我在电话中说：“季隽兄，我们本来是来看你的，临时到叶家去了一趟，不来看你了。今晚换了特别口令，你要注意些！”他大意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怕什么！”

这天深夜五点多钟的时候（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以前），我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有人在电话中告诉我：李仲麟被杀死了（这个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我至今还猜度不出）。清早起床后，我家的厨工进来对我说：他上街去买菜，被门口站的带红布条子的枪兵拦阻住，不准通行。过后不久，哨兵就撤走了，街上没有动静。早饭前，刘重（号谦实，资兴人，旧国会议员）匆匆跑来，说在北正街碰见刘重威（邵阳人，当时在赵部任营长。一九二六年任第三师旅长，被唐生智在衡阳处决）骑马招摇过市，厉声地问他：“你在外面跑什么！”刘重胆小怕事，通过我和连士清（在美领事馆任翻译）的关系，躲进了福星门外的美国领事馆。随后又有人来告，李仲麟被杀后，头被割下来挂在多福寺（今解放路柑子园口）门口电线杆上示众，他的妻子则抱着无头尸身痛哭不止。

我听到良友惨死，为之忧心忡忡。随即打电话给夏斗寅，请他来我家一谈。夏来到以后，我问他知不知道李仲麟被杀的事，他说：“早已知道了，死了七八个，不止李秀隽一人。”他接着说，赵恒惕昨夜在他那里待了大半夜，到天亮时才回司令部去。我邀他同去见赵恒惕，他答应了。当我们走进湘军总部赵的办公室时，只有总部参谋长唐义彬、秘书长钟伯毅和首斌在座，赵恒惕靠着一张椅子在烤火，神情恍惚，默然无言。我问他：“昨夜死了这么多的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郑重其事地辩白说：“我只圈了李仲麟一个人！”我说：“李仲麟的脑壳挂在多福寺门口示众，省会之地，观瞻所系，这不大好！”他听了我的话，对夏斗寅说：“霖

炳（夏斗寅别号），你去负责收殓一下。”随手批了一张发洋五百元的条子交给夏斗寅。李仲麟被害后，就是由他照料收殓的。事后听人家说，张辉瓒拟出的黑名单上多至四五十人，我和幼甫的名字都列在其中，而没有杨丙（可能因为他们是日本士官同学）。这次屠杀，是赵恒惕根据张辉瓒拟的黑名单圈定后，交叶开鑫执行，直接指挥杀李仲麟的，为营长赵茂林，其人与李有宿怨。叶开鑫事后对幼甫说过，那次杀李仲麟等，他事前并不知道，当时奉命随即执行。可见赵恒惕对我说他只圈了李仲麟，显然是白昼撒谎，欲盖弥彰！总之，在谭派死党张辉瓒看来，这些人是拥程倒谭的罪魁祸首，势在必去；在赵恒惕眼中，李仲麟等飞扬跋扈，终是心腹之患，因此，刚刚上台一个月，就认友为敌，悍然伸出了血手。

李仲麟之死，固然是赵恒惕、张辉瓒等人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屠戮（据传事机极密，连身居临时省长的林支宇也未预闻），但他自己的麻痹大意，丧失政治警惕性，也是致死之由。记得一九三〇年冬在上海时，李午云（平江人）对我谈过：一九二〇年他在六区司令部担任参议，李仲麟回金井宗祠挂匾，他适在长沙，听到外间谣传赵恒惕将不利于李，便赶往乡间通风报信。李在半路上遇见李仲麟坐轿子进城，告以外间风声很紧；劝他莫进城去，速由榔梨、渌口绕道回醴陵，免遭毒手。李仲麟却毫不在意地说：

“赵炎午现在不敢动我的，他还在拉拢我，答应将我们的部队编师哩！”谁知“世路风波险”，就在这天深夜，李仲麟竟成了赵恒惕的刀下鬼。

十二月二十五日，赵恒惕以湘军总司令名义宣布李仲麟等罪状，说李仲麟、瞿维斌等谋乱有据，拿获正法。廖家栋于惨案发生后出走武汉，第二旅旅部及所属第四团均被解散，叶开鑫升任

二旅旅长兼省会戒严司令，他的安民布告也随即贴满街头了。至于李仲麟的部队，则被张辉瓒等就地解散。一九二一年，程颂公追念死者，作过一首《悼七士》的五言古诗：“愚者多嫉妒，庸人每残贼；忠义匪所存，利害易为惑。吾党盛秀士，夙志剪荆棘；奋起乡闾间，行义如不克。一时殉权者，岂不借其力；宵游方从容，晨起已锄殛。始知争逐际，祸福未可测。哀哉二三子，含冤痛沉抑！”有感而发，情见乎词，是那个仕途黑暗、朋党倾轧的旧社会的真实写照。

关于易象临难时写的绝命诗，仇鳌先生记的是：“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沈。救乡救国终成梦，留取他生一恨吟！”姚文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的是：“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沈。爱乡爱国都成梦，留得来生著憾林！”刊诸湖南《文史资料》第三辑时，其结句是：“□□□□未了因”。据我回忆，三者都有出入。这首当年传诵一时的绝命诗，原文是这样的：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

易象遇难后，程颂公致送遗属光洋一千元。他的次妻（易的元配）是田汉同志的舅母，现在年近九十，住北京）辛景林，为纪念丈夫殉难，在长沙李文玉金号打了一块带链子的金牌，随身佩带，牌子上就刻着这首诗。后来，辛景林曾将这块金牌拿给我们夫妇看过，故印象最深，至今犹能记及。易象号枚臣，长沙人。一九一五年秋，蔡松坡密谋起兵讨袁，我奉先君之命由美国回到日本，有所策划。其时，易正亡命东京，我们初次订交。后来他在上海办晚报，又常来往。一九二〇年被害前不久，程子楷告诉我说他来了，住在落棚桥某亲戚家。我曾去看过他一次，匆促间未及深谈，不料竟成永诀。

编者按：关于易象临难时的绝命诗，我们查阅了《曹孟其日记》（未刊稿），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条下云：“易枚臣临死尚有绝命诗一绝。或传其辞有‘爱乡爱国终成梦’之句，可谓从容极矣。‘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曹孟其，长沙人。谭延闿三次督湘时，任湖南督军署秘书。”

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 被消灭的片断回忆

谢 慕 韩

蒋介石第一次消灭第六军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革命军攻克九江、南昌，击破孙传芳的主力后，随即沿长江两岸东征：第六军第十七师杨杰部、第十九师张振武部及第二军鲁涤平部、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在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的指挥下，沿长江南岸前进，节节胜利，迅速占领南京；江左军李宗仁指挥的部队亦同时进抵安庆及津浦路南段之线。这时，蒋介石谋叛逆迹日益明显。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他徘徊观望于九江、安庆间，统率地痞流氓，包围群众团体，捣毁反对他的国民党部，甘心与人民为敌。武汉国民政府密令程潜总指挥将蒋逮捕。程以事关重大，且力不胜其任，主张商谋妥协，乃将六军军长职务交由杨杰代理，南京卫戍事宜交由贺耀组负责，自己乘专轮由南京赴汉，与武汉方面面商。蒋乘此机会，运用卑鄙手段，将贺耀组收买，得以由沪潜抵南京。先是，当蒋乘兵舰由九江到达南京时，程潜登舰欢迎，以市面秩序尚未恢复为词，请蒋暂缓登岸，直接赴沪。蒋到沪后，召开会议。程在会中力主调和，并愿赴汉劝合。会后，程即单身赴汉，劝合不成，乃潜赴采石矶，调第六军赴汉，为蒋所发觉。至此，蒋对第六军必欲剪除，并图加害于程，当即派遣其亲信徐培根（浙江人，保定军校

三期炮科生)乘兵舰急往追程,追至大通,程预察兵舰来意不善,化装隐匿火舱中。徐上船搜索。这时,第二军参谋长岳森挺身而出,对徐说:“程总指挥不在这船上,只我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事找我好了。”徐既找不到程,只好将岳带到南京复命。岳面蒋时,问何事见召,蒋回嗔作笑地解释误会,并手令发给第二军薪饷一月,将岳礼送出门,藉使第二军不疑有他变。程于徐将岳带走之后,乘船继续上驶,至秋浦,恐徐复追,便舍舟登陆,并电知驻在九江练兵的第六军参谋长唐蟒。程由秋浦登陆后,随行的有秘书唐菊庵、副官罗友松及卫士四人。是日,宿于农民家。越日,抵湖口,唐蟒已派兵及轿马来接。至是始脱险,经九江抵汉。与此同时,蒋已密令第一、第七、第十各军及独立第二师担负解散第六军和第二军的任务。其作法是:先命令第六军随同第二军渡江,追击孙、褚部队。当第六军过江完毕,又命令第十九师回师南岸。蒋已先就南岸预伏部队,等该师进入其包围圈内,即予以消灭。第十九师是由北伐前程在广东率领的攻鄂军编成的,是第六军的基本部队,所以蒋要予以彻底解散,另以陈仪的第十九军缩编为第十九师,以王泽民为师长。至于第十七师,由于师长杨杰新见信于蒋,部队得以保留,仅改派文鸿恩为师长;而以杨杰代理第六军军长。后来,蒋得知程又在武汉重新编组第六军,军、师的番号雷同,遂将南京的第六军改名为第十八军,并正式任命杨杰为军长。

当蒋在南京消灭第十九师时,第二军正与反攻南京的孙、褚等部在津浦线南段的乌衣、滁州等处对峙中,敌众我寡,请援不应。鲁涤平召开高干会议,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依据情况分析,判断政局定有重大变化。第二军即由火线突围撤出,经皖北入鄂,有生力量尚无损失,仅被缴去储存在南京的战利品计步枪八千支、

野山炮八十门、子弹数百万发。那时，我还在第二军任炮兵团长，曾派遣鲁渭平、喻镜渊、徐堃泉等分任炮兵指挥，随军出发作战。我率余部留驻韶关，担任卫戍。鲁于攻克南京时，俘获敌炮兵两个团，曾电我经江西急赴南京处理。我因卫戍责任，不能不向蒋请示。蒋要我经海道赴沪，并电其后方办事处长文素松（江西人，保定军校三期炮科生）指派永丰舰担任海运。正候运中，接谭延闿由武汉来电指示时局变化情形，嘱我经湘赴汉。我随即拨队启行，终以炮兵行动缓慢，被蒋派钱大钧师轻装追及于乐昌的唐村附近，我后卫一连被其消灭，本队已入湘境，得以脱险。此为蒋介石企图解决第二军的概况。

在南京的第六军被蒋介石解决以后，程潜在汉口重新编组第六军，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林伯渠等协助下，整理训练，很快又成为劲旅，并参加了第二次东征（讨蒋）。新第六军的师长人选：第十七师为李明灏，第十八师为张轸，第十九师为胡文斗；另有教导总队，总队长为李国良，副总队长为汤恩伯。其时，南京的第十八军（即老六军）分驻在扬州、靖江一带。程考虑到该军与自己的历史关系很深，尚有可能争取过来，遂以军委会命令派我赴扬州改编。当我到达扬州时，杨杰已于先一日带侍从副官萧道钦携军饷二十一万余元逸去（萧为第二军军校学生，这事是他告诉我的）。当杨尚未离去时，六军旧人如马崇六等力主将杨诱杀，以为背信弃义者戒。程不肯出此。我秉承程意，对杨未加追捕，即对其留军亲近，也择优安插，例如副官处长文益善，仍原级蝉联。这为以后杨再亲程铺平了道路（杨任参谋次长时，力主程任参谋总长，虽系自谋，亦含有报答之意。杨为此事，曾专赴江阴和我磋商，并表明当日心迹）。改编时，我考虑该部人枪很充实，大敌当前，过度缩编，不利作战，仅裁减陈隐骥团，余均保留，编为

三团制的一个师，另一补充团，炮、工兵各一营。团长为吴道南、文朝藉（均广东文昌人）、陶振武、邵增，炮兵营长为贾宪民，工兵营长为张刚（陶、邵、贾张均浙江人，为陈仪旧部。工兵极完整，有架桥纵列）。兵力较普通步兵师多一倍以上，因而建议编为独立第十七师，师长仍以文鸿恩充任。王泽民调军委会，陈隐骥调师部上校参议。得军委会复电同意照办，并任我为副师长，督师沿运河线北伐。至是，原被蒋介石编并的老六军又回到程潜的统驭下来了。

桂系联程倒蒋

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共、背叛革命后，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于反共虽已一致，但宁、汉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南京方面以蒋、桂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以李宗仁、黄绍雄、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拥有足以与蒋介石争雄长的武力，对于倒蒋，与武汉方面又是一致的。

是年八月间，武汉政府正式下令讨伐蒋介石，并特派程潜任东征军江右军总指挥。程奉令后，即率第六、第三十六两军，誓师出动。蒋介石为了对付武汉，乃中止北伐，把布置在津浦路与北洋军阀对峙的部队转移到江南来。那时，蒋的总参谋长李济琛在粤，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实际负责。据蒋的亲近说：蒋曾以他的对付武汉方面的军事部署的腹案就商于白。白忽以第三者的姿态说：“北洋军阀是我们一定要打倒的敌人；武汉方面是兄弟间的意气之争，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放弃一定要打倒的敌人，从事兄弟阋墙之斗，恐怕国人不会谅解吧！”蒋听了白的这番话之后，黯然而去。次日，蒋复到白处，再以试探性的口吻说：“我想趁此时休息休息。”白的回答是：“总司令如果真需要休息一下，我也赞

成；否则徒然在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至是，蒋已确定桂系是在逼宫，于是不待东征军到达，即宣布下野。这时，程的东征军总部已推进到芜湖，第六军在芜湖正面直前，第三十六军在右翼，进到宣城的湾址，闻蒋已下野，即停止前进。我随程先到南京。由于蒋已下野，程、桂之间的第一次合作遂告一段落。

桂系联谭、程倒唐

宁汉合流后，唐生智受汪精卫的指导，拥有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十七等军，势力雄厚，以武汉为中心，据有两湖和安徽地盘，与南京方面抗衡。谭（延闿）、程（潜）以蒋既下野，都劝唐与南京合作，免招桂系之忌，未为唐所接受。由于桂系的根据地是广西，此时桂系的部队已伸到京、沪一带，唐部横阻于广西与京、沪之间，成为桂系把持中枢和它的前后方联系的巨大障碍，因而企图驱唐至为迫切。桂系想利用谭、程的宿望及其所部军事力量。遂与谭、程共谋倒唐。其时，我周旋于谭、程之间，得知有人曾向谭建议：与桂合作驱唐，胜则徒利于桂，于湘有损无益（湘军自相残杀，势必削弱力量），败则将予蒋以复起的机会；不如调集第二、第六、第十四各军驻防江苏，以巩固畿辅为首要，并保持朱培德（也是不满于蒋的）在赣的实力和地位，另以李宗仁主皖，作为宁、汉之间的缓冲地带；对唐宜尽可能采取怀柔政策，必要时还可作为制蒋的外援。如果蒋要复起，势必先策动第一、第九两军；那时，合苏、皖、赣三省兵力，即可予以击溃。谭、程素不以唐势坐大为然，与桂合作驱唐已成矢在弦上之势，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西征结果，驱唐的目的虽已达到，但卒给蒋以再起的机会，并且发展到桂复联蒋倒程和蒋第二次消灭第六军。

西征出师为湘桂联军。桂军推程为总指挥，湘军担任长江以南，桂军担任长江以北，齐头并进，攻略武汉。战事进行由第六军攻击驻湾址的第三十六军开其端序，刘兴未作强烈抵抗，即向鄂南撤退；桂军第七军攻皖北，何键亦未抗拒，便向鄂北撤退。唐部由于扩编过快过大——以参加北伐前的湖南第四师为基础，一年之间，扩充为三个师的第八军，复扩充为三个军的集团军，因之，部队的质量提高远远赶不上数量的发展；在西征军的着着进逼下，军心涣散，士无斗志，纷纷向程、桂挂钩，各寻出路。其中第八军第一师是唐部的精锐，由于该师师长张国威是醴陵人，与程同乡，早已暗中接受程委为第八军军长。张师驻防粤汉路线，当其他部队由前线溃退时，张已不服从唐的调遣，按兵不动，迫使唐不得不下野。唐于宣布下野后，立即将张国威绞杀，并将部队交由号称方面军总指挥的李品仙、何键、刘兴等协商指挥，向湖南撤退，本人遁赴日本。此时，唐的部队中内部较团结并且坚决拥唐的只有刘兴的第三十六军，第三十五军何键已不可靠，甚至怀疑刘兴可能将第三十五军吞并，因迅速向常、澧撤退；李、刘两军则沿湘北逐渐南移。西征军入湘的作战方针是“剿抚兼施”。军队部署：以新附的叶开鑫第四十四军为右翼纵队，沿长岳铁路；第六军为中央纵队，沿岳阳、湘阴古大道；第十四军为左纵队，沿通城、平江大道，节节向南压迫。不意此时蒋、唐又已重新结合，蒋密令叶中途倒戈。当叶与长沙方面电话协谋时，被粗中有细的张轸所收听。张即一面调所部对右侧作勾形守势，预为之防；同时报程，急调第七军大部填补叶部空隙，配合第六军，将叶部击溃。当叶部叛变时，左纵队陈嘉祐亦令所部从前线撤退；而正在前线作战的谭道源，于奉令后，却秘而不宣，继续督师奋勇前进，将平江占领，从而威胁长沙。李、刘等既知叶部

已被解决，遂不再抵抗，退往湘西，并向程、桂表示，愿听改编。此为主攻方面概况。担任助攻的第二军，已由荆、沙进驻澧、常，未再进击。至此，西征军入湘作战即告终结。

程潜率部进入湖南以后，忙于军队的整编和地方的“善后”，不仅湖北的军政实权已为桂系所掌握，同时统驭两湖的军政机构，如两湖政治分会，两湖军分会、两湖清乡督办等，名义上虽仍由程担任，实权亦均已为桂系所窃据，伏下了桂系联蒋倒程的祸根。

桂系联蒋倒程

程是处处顾全大局的，对于湘、桂合作，推诚相见，初无二心；桂系则不然，李、白之流一向是以封建割据的广西为其根据地，企图通过广西大门的湖南来扩张势力，争霸全国。他们西征的目的是要把湖南置于他们的绝对控制之下。因为唐生智不能作他们的爪牙，所以必须驱逐之。程潜同样不能充当他们的仆从，李、白当然知道。西征之役，他们仅是利用湘军的实力，特别是利用谭、程的宿望。程、桂之间的根本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因此，在驱唐目的达到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倒程。至于李、白将程拘禁，所谓“专横跋扈，把持财政”的罪名，完全是掂拾一些枝节问题，作为借口而已。程所指挥的湘军原有谭、程两个系统，而谭、程之间存在着传统的矛盾；加以程赋性率直，平日接待部属，有时词色欠温和，因而也加深了谭系将领如鲁涤平、陈嘉祐、岳森等人对程的不满。鲁、陈都曾向我表示过：“不是畏公（谭别字畏三）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受程的指挥。”岳森也向我说过：“在大通船上，我曾为程替过死，以后见面，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不太可怪吗？”我一面力劝鲁、陈等顾全大局；另一方面也曾向程委婉陈词：“鲁军长、陈军长虽是您的部属，但现在都是独当

一面，接待要有一定的礼遇。又第六军编为甲种军，第二、第十四军编为乙种军。六军后来居上，这也是令人难于满意的。”程的答复是：“他们毫不注意自己的军队，尤其是护芳（陈嘉祐字）迷迷糊糊，自己有多少兵，多少枪，多少饷都不清楚。”谭系将领平时对程不能无间已如上述。其次，第六军内部也不是毫无问题的。当时，合新老六军及向成杰部，实力已足够三个军的规模，程不能象唐生智那样大刀阔斧地扩编，又不肯把第六军军长职务让给热中已久的唐蟒，因而第六军内部亦不够团结。正由于程所指挥的湘军内部存在着这些矛盾，使得桂军有隙可乘，敢于发动倒程。

一九二七年冬，蒋介石下野后，国内大资产阶级，特别是江浙财阀仍然是支持蒋的，因而对宁、汉合作后的南京政府，在财政上处处掣肘，甚至连饮鸩止渴的内外债都无法举办，以致浩大的军费无以支付，形势危迫，不可终日。蒋介石乘此时机，分派其所卵翼的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右派四出活动，图谋拥蒋复辟。当时，派到我处的为黄埔四期生、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谷磊（谷是1924年我任湘粤边防司令时的书记，被保送入黄埔军校的）。他凭借着旧部的关系，以“财官两美”来诱劝我列名通电拥蒋，被我严词拒绝。我电程请示应付大局的机宜。程复电：“一切与贺贵严联络，共同行动。”贺因曾协助蒋介石第一次解决第六军有功（此时，程尚未明了此情），已升任第四十军军长，驻陇海路许家集。我去信联络，未得具体答复。未几，所有津浦、陇海两路军队中团长以上的军官除我而外皆列名通电拥蒋。南京政府迫于形势，对蒋让步，蒋遂得以复职。

蒋复职后，随即赴徐州召集军事会议，第一道命令即是调何应钦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削去何的兵权（当时何任东路总指挥）。何因而不满于蒋。当桂系向蒋秘密通款时，何很关切地对我说：

“你转告程先生不要上别人的当。他们三个人（指程、李、白）联衔打的电报，已有两个人出来否认，将来一个人吃苦头，犯不着。”后来，蒋第二次解散第六军时，何也持另一种态度。

西征军对两湖善后尚未完全结束，蒋已复起，于是程与桂系高举反蒋反汪的旗帜。蒋为了应付这一局面，采用贺贵严的献策，要谭兼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被谭坚决拒绝。当天晚上，谭以语我，我力劝其接受，理由是：一来可以统一湘军，不致群龙无首；二来掌握一个较大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不致处于被动。谭答：“这正是贺贵严为蒋牵线的说法。更重要的是，我除了可受孙先生的指挥以外，不愿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挥。”我说：“您是国府主席，首先指挥蒋，蒋所指挥的是您的兼职，关系不大。”谭说：“国府主席只是执行国务会议的决议；总司令在职权上可以独断专行，发号施令。这样，所谓我指挥他是一个空名，而他指挥我就非服从不可，所以不能干。”我说：“虽然如此，但较大的问题，蒋会要商得您的同意，还不致那么专断；并且你接受了总司令的名义，可以请颂云先生担任副总司令或总指挥，负实际责任。对于团结湘军确有帮助。如果您坚决不就，蒋提出别人，那就更不好办了。”谭肯定蒋不会提出别人。我说：“如何应钦、李宗仁不都有被提出的可能吗？”谭答：“蒋、何同床异梦，蒋李之间距离更远。蒋不会提到他们。”仍坚持不愿受制于蒋的原意。

一天，李宗仁为了表彰他的龙潭战绩，举行阵亡将士追悼会，央谭书赠对联谕词，我和李侧侍谭挥笔。适王永恭（福建人，与程为日本士官同学）投刺来谒，谭要我代见。李旋辞去，谭、王直接谈些什么，我没与闻。当晚，谭写了一封长信致程（此信原存唐菊庵参事处，据唐回忆，信的内容大概：首先略谈当时国内形势，指出军队的实力不及蒋，党的势力不如汪，同时反蒋反汪

的非计，恐徒以虚言招实祸；接着建议对唐部不宜穷追猛打，为渊驱鱼，而要安辑收抚，备为己用，中有“家鸡打起团团转，野鸡打起满山飞”的譬喻语，最后还提到联桂终不可恃）。次日，谭要我赴汉一趟。当时，程、桂正在长沙举行会议。我持函面程，程阅后，对我说：“祖安坐在南京，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形。”我说：“他在中枢，接触面广，可以盱衡全局；您处于一隅，因而和他的看法不同，自所难免，现在可以交换一些意见。”谈话是在会议的空隙进行的，匆匆数语，不得要领。我想约李明灏、李隆建（字仲庄，醴陵人，其时，任湖南财政厅长）、张定（字叔丹，平江人，其时，任教育厅长）等商定共同主张，再向程建议。不料他们仍存着对谭的历史成见，都淡漠视之。我为了弥缝西征军的破裂，只好向桂系做工作。时白崇禧住在湘雅医院，通过他的参谋长王泽民会见了。他首先问南京情况，我大致谈了一些。最后，我以第三者的态度爽直地说：“西征军如能始终团结一致，蒋对你们是不可奈何的；万一不幸破裂，蒋就会一个一个地宰割，难免同归于尽。”他强调西征军会始终团结。我因何应钦的忠告，心中有数，更进一步地说：“西征军是湘、桂两个力量组成的，就存在着一个天然的虚隙，容易被人利用。”他力言无问题。对于这个带关键性的问题，我曾向程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桂系一方面要争取团结，另一方面也要提防。程答：“德龄、健生对我都很好。”表示深信不疑的襟怀。据传，长沙会议时，有人曾建议派兵包围会场，捕杀李、白，被程顿足大骂而止。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蒋介石秘密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和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在汉口召集会议，程在长沙，准备应邀赴会，左右多不赞成，程不听。会议开幕后，李请程到四楼暂时休息，随即宣布免程本兼各职，并将其拘禁的提案付表决。

桂系出席的人自然兴高采烈，一致赞成；湘系出席的人则如晴天霹雳，阵容纷乱。表决时，鲁涤平举了手，陈嘉佑弃权，非法的议案遂以绝对多数的同意通过，桂系联蒋倒程的阴谋从而得以实现。当桂系对程积不相容，酝酿倒程时，其内部曾经有人提出湘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应慎重考虑；白崇禧断然地说：“湖南人没有三个人以上的团体，可以大胆地干。”至是果如所言。

蒋介石第二次消灭第六军

程被拘禁后，我即日到南京找谭，向他报告事变的经过。谭也把蒋介石和他谈话的情形告诉了我。谭说：“当颂云被扣的那天，蒋即来我处，喜形于色地向我说：‘程颂云倒了！’我问其故，他把桂系将程拘禁的事说了一遍。我明知他们是狼狈为奸，只好说：‘中华民国的人起来了便不会倒的。’他没趣地辞去了。”我重述讨唐和不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失计，谭愕然良久，说：“这样地勾心斗角，殊非我始料所及。你去找找李协和（李烈钧字，当时任军委会常委）、杨幼鲸（杨树庄字，当时任军委会委员兼海军总司令），看看他们能否从中斡旋，早日恢复颂云的自由。”我遵照谭的指示，分别找了他们。李的答复：“此时能保存生命就是万幸，马上恢复自由是不可能的，要我向那个去说呢？”杨的答复：“大家想办法吧！请代达畏公，我一定要尽到朋友的责任。”我将交涉的结果向谭汇报，并要求谭直接电话李、白，要他们尊重国家法纪，将程释放。谭说：“那是与虎谋皮。他不遵，第二步怎么办。我料他们还不敢置程于死地。此时最重要的是第六军不要乱动，免得他们有所借口。”我问谭，军队又如何自存呢？谭说：“你再去湖南走一趟，要咏安（鲁涤平字）负责维持。”他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给鲁，信中有“谨慎不要推卸责任，放胆不要疏于戒备”等语。

我于旧历端午节前夕到达长沙，持函向鲁交涉。鲁完全接受谭的意见，向我保证：只要第六军不乱动，愿与共存亡，军饷按月由省库开支。此时第六军部队分驻平、浏、醴一带，军部驻醴陵。我即日驰赴军部。当我到达军部时，军的人事已大变动：第十七师师长李明灏已辞职，仍随军行，由团长彭亚尧升任副师长，代行师长职务；第十八师师长张轸升任副军长，仍兼师长职；第十九师师长胡文斗升代军长，以张栩东升任师长；军参谋长唐蟒已离职，缺虚悬；军参谋处长马崇六离职，调第十九师参谋长高卓东继任；军政治部主任虚悬。湖南省政府财政厅长李隆建亦随军行。他们见我去，均悲喜交集。我随即将在南京、长沙和谭、鲁等人交涉结果向他们汇报；胡文斗也将唐蟒和汪精卫联络情况，以及军队打算经赣入闽，静待时局变化的决策说明。我亟言汪文人弄兵的不可靠；且颂公在武汉时，高举反汪的旗帜，此时又跟汪走，是值得考虑的。诸将领已知非计；但先一天已令驻平、浏各部向赣边移动，电讯被破坏了，无法将部队追回。胡据情以实相告。我明知此路不通，且和我与谭、鲁所交涉的协议完全背离，只好向他们告别。他们一致要我担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随军行动。我念程缔造第六军的艰难，认为保存这点力量，还可作为恢复程的自由的讨价还价的资本，也就应允了。当日，军部正拟向萍乡进发，忽报彭亚尧不遵命令，率领他的基本团，背道而驰。军部的紧急处置是：以补充团长徐焕湘（这一团是程初到南京所收编王普的一团。徐是第六军的老人。）继任第十七师副师长，率领其余两团向彭追击，冀其复返。不料这两个团又相继叛变。事后查明：原来彭是张辉瓒旧时的司书，他率这一团人投奔张去了；另外两个团中的下级军官多是醴陵人，受张其雄（保定军校三期生，醴陵人）的勾引，投靠何键，被收编为新编第十九师。第六

军系甲种编制，各师都有三个团，加军直属炮兵一个团（团长任调），教导总队相当一个团，除第十七师外，总计尚有步枪约一万四、五千支、山野炮五十四门、机枪二百余挺，实力还超过一个乙种军。因此，我们并没有因第十七师的瓦解而变更原定计划。军行抵萍乡，当地驻军为第三军的萧希贤团，对我们假道，尚无阻滞。军部及直属部队得以安全到达宜春。各师也由铜鼓、万载向宜春集中。由我电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请其允许我军暂驻宜春，并请拨款二十万元以维军需。朱在政治上是唯谭的马首是瞻的，爱屋及乌，对于我们的请求完全应允了；但要我们派一个师移驻安福，担任地方绥靖。拨款也随即汇到。我们派了第十八师到安福驻防。

第六军开抵江西以后，主客相安，本来可以从事休整；但因内部意见纷歧，军心甚为涣散。当时，胡文斗坚持暂到闽西的原议，认为闽西关山险阻，蒋、桂都奈何不得；张轸则主张到河南；马崇六、王西原（团长）等都是云南人，则主张远征云南；而全军中的中下级军官绝大多数是醴陵籍，都想回湘依附何键；唐蟒则正在大事活动投汪。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我和胡、李、张等终日筹思，大家认为：蒋、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暂时结合，只是为了共同倒程；现在倒程目的已达，他们之间的破裂仅是时间问题，蒋还有利用我们消灭桂系的可能；并且蒋在表面上还不承认桂系拘禁程是他的指使，作为一个最高统帅，对部曲阋墙之斗，不偏袒和支持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穷追猛打，也是他应当和可能采取的态度，只要我们暂时虚与委蛇，渡过难关，前途还有可为。由于这种幻想，大家又推我和李明灏赴南京活动，企图依靠谭的关系，向蒋交涉驻防地区。还有李隆建与我们同行。我们行抵南昌，住江西大旅社。适唐蟒和傅良弼（九江市

长，原是第六军的团长）已先到。唐此时已通过龚浩（唐生智的策士）向汪精卫领得活动费四万元。据唐说：买了万把块钱的西药，是来慰问军队的。我和李认为这位老参谋长也是来共患难的，深信其无他意；至于目前彼此主张不同，将来尽可从长商谈，不难求得一致。于是我们仍按原定计划，驰往南京。不料唐于我们离开南昌后，即勾结第三军军长王均，没有取得朱培德的同意，秘密截断了我们同第六军军部之间的电讯联络。他本人则驰赴分宜，勾结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徐焕湘（徐于第十七师瓦解后调充此职）、团长蔡雄和军部特务营长黎某等发动兵变。一部叛兵黑夜冲入我和胡的卧室，对准两个床位各击十余枪。胡文斗惨烈殉职，我因出差获免。另一部叛兵冲入我和胡的卫士卧室，一顿乱枪。卫士都在睡梦中，均被击伤，无一幸免。胡系甘肃天水人，日本士官十五期生，才识敏捷，胆气过人，极为程所器重，遇难时仅二十九岁。良友云亡，真令我肺肝为摧。

后来了解，徐、蔡等之所以被唐蟒勾引叛变的原因，当第六军于一九二七年攻下南昌时，徐焕湘当步兵营长，曾抢劫江西裕民银行纸币百万元（按当时通货贬值折合硬币为三十万元），胡文斗、张轸等向程告发，主张严办。程即组织军法会审、派唐蟒为审判长。徐贿唐三万元，唐即从轻判处，撤差了事。徐由是德唐恨胡。蔡雄原是专以小忠小信、阿谀逢迎、取悦长官的能手。胡任团长时，蔡在该团当排长，被胡不次擢拔，不到一年，当上了团长。胡认为对他有厚恩，纵然责斥几句也无关系。在某次整饬军纪的训话中，当着全师官兵，将蔡罚跪，天真地以为“罚自亲起”，可收惩一儆百的效果。不料蔡竟忘恩负义，怀恨在心，蓄谋报复。因此，唐蟒便从徐、蔡入手，一一串通，酿成巨变。

张轸时驻安福，闻变，即拔队回宜春戡乱。叛徒十余人闻风

鼠窜，唐蟒也知难而退。此后，即由张轸代行军长职务。我们到达南京后，两李（李明灏、李隆建）即赴沪。我因与第六军军部的通讯已被隔绝，还不知道内部发生了如此巨变，仍向谭求援，并向蒋、何交涉。何当时正想回贵州，企图拉拢我们做他的基本力量，故对我表示很好。蒋则日约一日，均以有他事为借口，屡次改约见拒。后来派葛敬恩代见。我乘机向葛尽情揭发桂系窃据长江上游形胜之地，企图与中央对立的阴谋，并亟言政治分会制度妨碍统一，应即废除。葛竟说我有意挑拨。我知道他是蒋的代言人才，恍然大悟：蒋、桂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倒程之后，还须斩草除根；再次，消灭第六军乃是他们共同的阴谋。

一天，谭告诉我说：“益之（朱培德字）来京，我已经托付他照顾第六军。益之较有担当，可以放心。”大约一星期后，朱培德匆遽地来到谭处，说：“事情糟了！蒋已明令我负责解散第六军。命令的大意是：‘第六军军长胡文斗自北伐以来，所向有功，不料该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轸公然叛变，戕杀长官，应即从严剿办云云’。”原来蒋事先已密调金汉鼎部开往江西。金部到达九江，合第三军力量，已足够消灭第六军，遂发布这个命令。谭、朱对话时，我在座。三人反复商量，最后一致认为：“军队存在，反而于程不利；如果军队消灭，能够换取程的自由，还是值得的。于是朱表示：只好遵令执行。张率军东趋，至樟树附近，与朱的警卫旅遭遇，张采用正规战，将其击溃，旋王、金两军全部到达，分进合击。张于苦战后，始向闽边突围，到达闽境，仅残存张际泰一营，为卢兴邦所收编。其时，南京方面发表杨树庄为福建省主席。杨以第六军还有遗留问题，邀我同行，协助办理。我到福州后，在法大旅馆遇见张轸，彼此交谈，始知全盘经过，当即据情告

杨。杨表示他对程和第六军帮忙不到的歉意。长厚真挚，使我铭感。后来，还有第六军部分中下级军官由赣、闽流集到南京，蒋要我作证，发了类似遣俘的薪饷一个月。

驻在扬州、靖江一带的第六军独立第十七师，由文鸿恩充任师长，我充任副师长，已如前述。早在蒋介石复职的时候，即已将文调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以团长文朝籍升任师长；将我调任总司令部参议，遗缺原拟由总部上校参谋林蔚调充，后来考虑到施北衡原先是陈仪师的旅长，对于这个师的掌握更有把握，遂决定由施接充副师长。同时，还将团长吴道南调充琼崖警备司令。从此，隶属第六军的独立第十七师，终于变为蒋的嫡系部队。

至是，新的第六军再度被蒋介石所彻底解决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编者按：本文曾送请程潜省长审阅，程省长提出了订正和补充意见如下：

一、原稿提到：“武汉国民政府密令程潜总指挥将蒋逮捕。”程省长对此作了补充：“此项密令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料上，交由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缝在衣缝内，带到南京转给我的。”

原稿又说：杨杰曾将汉方密令献蒋告密。程省长指出，“密令系由林交我，事机极密，杨杰不得而知。”

二、原稿说：“当蒋介石乘兵舰到达南京时，杨杰登舰欢迎，初以市面秩序尚未恢复为词，请蒋暂缓登岸。”程省长指出：“当时登舰劝蒋赴沪，是我不是杨杰。”并补充说：“蒋与武汉不和，到沪后，召开会议，我在会中，力主调和，愿赴汉劝合。旋即单身赴汉，劝合不成，乃潜赴采石矶，调第六军赴汉，为蒋所发觉。至

此，蒋对第六军必欲剪除，并派徐培根追我。”

三、原稿标题是：“……桂系联程倒唐……”内容也仅叙述桂系联程情况，把谭延闿说成是超脱事外。程省长指出：谭是倒唐的主要人物，是搭桥拉纤者。

我们根据上述意见，对原稿分别作了相应的修正。

程省长还补充了当日他与谭、桂商议倒唐的经过：“当时在南京，为了商谈倒唐，李宗仁、白崇禧曾先后两次访问过我，谭延闿也访问过我两次；并且在石板桥私宅设宴，议谈此事。赴宴者仅李、白和我三人。席间，李曾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神明所不容，云云。”

一九二七年程潜由南京脱险经过

唐 菊 庵

我看了谢慕韩先生的《关于“东征”“西征”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一文，其中提到程潜先生单身赴武汉、蒋介石派徐培根急往追程的情形。我是亲历其事者，当时事实如下：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之交，国民革命军在长江以南各省迭告胜利，进达长江流域，广州国民政府随之北迁，于一九二七年元旦开始在武汉办公。这年春天，第六军军长程潜任江右军总指挥，率部沿长江南岸东下。虽雨雪载途，军行甚苦，而进展极为迅速。其时，我担任江右军总指挥部秘书，亦随军东征。江右军由芜湖方面沿江东进，在雨花台附近激战大捷后，于三月二十四日进入南京。程潜写过一首《由芜湖趋金陵》的五言古诗以纪实，其结尾四联云：“感愤令前军，疾趋雨花台；扬旌牛首山，振旆采石矶。夷兵悉歼灭，余众咸依归；七日克金陵，昭苏怨来迟。”诗中所谓“夷兵悉歼灭”，是指歼灭了张宗昌所属的白俄雇佣军几千人。

到南京后，总指挥部驻扎城内三元巷。有一天（约在四月初，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正在夫子庙闲逛，程潜的卫士萧家吉匆匆忙忙地到夫子庙找到我，他对我说：“总指挥找你，有紧要的事，赶快回去吧！”我回到总指挥部以后，才知道是程总指挥叫我跟他出差。随即由军需处送来中国银行钞票一万多元交我携带备用。我跟程同车到下关江边上船。随行人员除我以外，还有第二军参

谋长岳森、总指挥部副官罗友松(衡山人)和卫士萧家吉等(四名)。我们乘的是一只小火轮。当轮船开动后，我问程：“颂公(程潜号颂云)，我们有什么任务？”他非常严肃地答复说：“蒋介石要造反了，我们往汉口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走得这样匆促。我接着问：“我们第六军的部队怎样呢？”程潜说：“这很难说，不知道能不能逃出南京。”随即又说：“如果逃不出来，也就会牺牲的。”

当我们的小火轮上驶到大通江面时，忽然发现后面有一只兵舰在破浪猛追，不久就逼近小火轮了。兵舰上有人在高声喊话：“停船！停船！”程潜穿的是便服，他听到追来的兵舰有人喊话，心知有异，急忙躲进火舱里匿藏下来。我们则仍然站在船面上。兵舰越靠越近，有人又在喊：“程总指挥在不在船上？”我们回答：“没有在这船上！”随即，兵舰靠拢了小火轮，徐培根（他当时在蒋介石总司令部任职）具体职务已记不清了，来到船上说：“总司令请程总指挥回南京去，有紧急的事和他磋商。”当时，岳森挺身而出，回答说：“程总指挥不在这船上，只我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事找我好了。”徐培根面带怒容，左顾右盼，问这问那，与岳森纠缠了约半点钟，但未在船上进行搜查。大概徐因怕对蒋介石消不了差，便将岳森带到南京去了。

岳森被带走，徐培根的兵舰转回下驶后，我们的小火轮继续上驶。程潜也如释重负地离开火舱上来了，我向他汇报了徐培根上船盘问和岳森被带走的情况。船将近秋浦时，程对我说：“蒋介石定会再派兵舰来追的，我们即刻上岸去；否则，会有危险的。”随即令船靠岸，大家一齐登陆。这时，程潜吩咐我们把行李和现钞都丢掉，他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现在是逃难的时候，带这么多钱在身边，很危险！”我觉得这笔巨款弃之可惜，因此，只叫大家把行李丢掉，而将一万多元钞票分给同行的六个人捆在

身上。我们一行七人，沿着一条小路步行，走了十多里，天色已黄昏，借宿于秋浦县境的一个小镇的农民家里。当晚，我赶到秋浦县城，打电报给在九江的第六军参谋长唐蟒（兼九江训练处处长），告知脱险情况。第二天清早，继续徒步前进，到了湖口。这时，唐蟒派了队伍及轿马来接，当天傍晚，平安抵达九江。随身带来的现钞，由我经手，尽数交给九江经理处。后由唐蟒通知该处，发给每人一二百元不等，作为添置衣服行李之用。

我们在九江停留了两天，唐蟒向程潜汇报了部队训练情况。继而又搭轮船往汉口，随行者仍为我和罗友松以及四个卫士。到汉口后，程潜住在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家里，我也随住谭家。这时，已经出现了宁汉分裂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继续执行原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等则背叛了大革命，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与武汉方面分庭抗礼。蒋介石叫嚣要以武力统一全国，而武汉方面提出的口号是：“打倒蒋介石军事独裁！”程潜到汉后，谭延闿接待殷勤，国民党中央要人，如孙科、徐谦、林伯渠（当时国共合作，林系国民党中央委员）等，日夜来往谭公馆，密商大计。武汉反蒋空气，此时更为浓厚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

饶少伟

方先觉投敌这件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末期的衡阳战役，当时曾引起全国人民的注目。蒋介石集团为了在人民面前掩饰自己的罪责，曾竭力隐瞒事实，颠倒是非，进行欺骗。最后连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亲自出面，公开包庇，硬把一个厚颜无耻、贪生怕死的方先觉，说成是“中国军人之模范”，并给以“授勋进爵”的奖励。笔者当时任国民党暂编五十四师师长，参加衡阳战事，并且也是以方先觉为首的投降集团中四个师长之一，有责任把当时的实际情况写出来，借以保存史实。但因为笔者是薛岳系统的人，暂五十四师又是临时拨归方先觉指挥的，再加上个人地位的局限，对于蒋介石当时的整个军事措施和方先觉等的投敌活动了解不够全面，甚望熟悉情况的人士加以补充订正。

日寇南侵与蒋帮的对策

一九四四年，由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处于极不利的状态；同时，在中国敌后战场上，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严重打击，因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完全处于孤立地位。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政治、军事的崩溃，对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大举进攻的策略，继四月进攻河南之后，于五月下旬，又发动了对湖南的大举进犯，企图打通粤汉、湘桂两线，进而压迫国民党政府投降，以实现其侵占中国全部领土的

野心。

六月，日寇长驱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十九日，第四军弃守长沙。醴陵、湘乡、攸县、安仁、衡山等县，均先后陷于敌手。于是，大后方的重镇——衡阳，便完全暴露在敌人兵锋之下。

衡阳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蒋介石集团如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就应该派遣足够的兵力，以确保衡阳；同时集中优势兵力于衡阳外围，乘敌攻城受到顿挫之时，举全力在衡阳地区与敌决战。按当时敌我情况，敌势已成强弩之末，而我尚拥有数十万未用之兵，采取这一战略方针，是可操胜算的。而国民党统帅部一贯坚持的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也就是蒋介石所谓“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之下，蒋介石集团对日寇这次进攻的对策，事实说明是：避开正面，屯兵山区，借以保存实力，作为继续反共、反人民和投降日寇的资本。因此，当日寇大举南侵，直接威胁着重庆国民党政权时，蒋介石即打算放弃粤汉路，移重兵于湘西，并调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薛岳到湘西指挥，企图守住湘桂路，使自己能比较安全地“躲在峨眉山”。但薛岳坚持不肯去湘西，而主张确保湘南，屯重兵于五岭山脉，他认为这样一方面可以阻止敌人打通湘粤路；另方面可以控制湘、粤、赣边区——五岭山脉这块广大而险要的地区，免被共产党“窜扰”。在“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这一原则下，蒋介石终于同意薛岳撤兵湘南。但为了防止薛岳和余汉谋连成一气，另辟局面，又把薛岳指挥的部队——二十军、二十六军等部调往湘桂路，归其直接指挥。薛岳则指挥七十二军、七十八军、九十九军、三十七军、暂二军以及第四军残部，逐步向湘南撤退。

蒋介石集团虽然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打算守住衡阳，但衡阳为西南重镇，为了混淆视听，欺骗人民，又不得不打出要第十军“死守衡阳”的幌子。

第十军是守城的主力部队，但它在参加“常德会战”时，损失甚大，创伤未复。所辖第三师、预十师和一九〇师（该师在衡山整训时改为后调师，只有兵力约一团），加上军直属部队，共有兵力约一万五千人。暂五十四师参加“常德会战”后，调湘阴三姐桥整训，缩编为两个团；五月初，分调湘潭、零陵、衡阳等地担任飞机场的警戒任务；驻扎衡阳的部队约二千三百人，最后参加守城的兵力，只有一千三百人左右。以衡阳地区之广阔，地位之重要，而守城兵力不到一万七千人，实在是单薄的。

方先觉在“常德会战”后受到免职的处分。当日寇向湖南进攻，新任军长尚未到职，蒋介石才把他留下来“戴罪立功”。他在敌人第一次攻势后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已和委员长约好了，一旦情况紧急时，只须发出“战况甚稳”的电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即派援军前来解围。”但后来蒋介石虽然在湘桂路和衡阳外围集结了八个军（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七十九军、一百军、二十军、二十六军、六十二军、九十三军等）之众，总共兵力在十万以上，而派来解围的兵力，名为两个军，实际投入解围战斗的，第一次只有一个加强步兵营，第二次虽有一个师（五十八师），但该师在攻克离城约二十余里的鸡窝山，正准备继续攻击前进时，忽奉令后撤四十余公里。据我所知，当时日军除围城兵力外，对付我外围援军的，只有一一六师团（缺一个联队）。从数量上讲，敌人劣势，我军优势；从形势上看，敌人分散，我军集中。我军如在衡阳地区与敌决战，是可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事后了解，敌人在第二次攻势顿挫，伤亡惨重（一师团长阵亡）的情况下，原打

算撤退，以我解围不力而止。

从守城的兵力调配和解围的情况来看，都与蒋介石集团“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战略原则是一致的。他们所谓“死守衡阳”，不过是以此欺骗人民和混淆国际视听罢了。

衡阳防守战概况

蒋介石既要方先觉“死守衡阳”，方先觉自然不能不守，幸而能守住，则可大邀其功。他由重庆回到衡阳后，想方设法抓部队，以增强守城力量。凡是驻扎在衡阳或路过的部队，不管是战区的（如暂五十四师）或是友军的（如七十四军炮兵营），都被他抓在手里。但他最大的希望，是寄托于援军的前来解围。

如前所述，蒋介石和薛岳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既然以如此消极的态度对待日寇的猖狂进攻，衡阳守城将校的心情自然也是难以振奋的。他们看着前线部队纷纷溃退，莫敢恋战，而蒋介石的命令却要他们“死守衡阳”。他们对“死守”二字很讨厌。有人说：“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是置之死地必然死？”“与其说在这里‘死守’，不如说在这里‘守死’！”至于我个人，原来也没有准备参加守城的。六月十五左右，方先觉忽然转了一个命令给我，大意是：奉长官薛电话谕，着暂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率领在衡阳担任飞机场警戒任务的第一团，归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指挥。我接到这个命令，怀疑薛岳为什么没有直接下命令给我。当时薛岳正在朱亭指挥，我电话请示今后行动。接电话的是高级参谋沈久成，他请示薛岳后回答说：“长官的意思，要你相机南移”。我接到这一指示，感到很不好办：如果带着队伍向南走，方先觉岂肯放手；薛岳没有明令给我，将来追究责任，谁来承担？如果不走，又怕部队遭到损失，引起薛岳的不满。权衡个人利害得失，我决

定设法脱离方先觉的掌握，按照薛岳的意图相机南移。尽管六月二十一日我在江东岸师指挥所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聚餐时，也曾勉励他们要“忠勇杀敌”，而我的心情却是异常复杂和矛盾的。甚至在聚餐的次日，我又企图边打边走，以便脱离战场。总之，守城将领都缺乏作战的决心和信心。虽然后来战斗坚持了四十几天，但团长以上军官却无一人战死，并且还演出了集体投降的丑剧，这是无以对广大的死难同胞的。

当敌军逼近衡阳前夕，全城非战斗人员已疏散一空。方先觉且纵容一部分官兵，抢劫遗留在城内的物资，不分公家的或私人的，几乎一扫而光。六月二十二日，他不准载运物资和逃难的民船向上游开走，下令把所有船只都烧光，造成了非常凄惨和恐怖的景象。

六月二十二日，敌军逼近泉溪市。我为了达到率部脱离战场的目的，向方先觉建议：“为了迟滞敌人行动，可否由暂五十四师派兵一营前往泉溪市渡口阻击敌人？”方同意照办。当敌军到达泉溪市强渡耒河的时候，我又建议：请增派一营兵力前往支援，并要求亲临前线指挥作战。这一建议又为方所采纳。当我亲率师直属部队到达五马归槽，准备边打边走时（二十三日下午），方先觉忽送来一道命令，大意是：派一九〇师某团前往五马归槽占领阵地，阻击敌人，归暂五十四师师长饶少伟指挥。这样一来，就把我拖住了。我只得令团长陈朝章率兵两营逐步南移，自己却被迫留在衡阳。

二月二十三日，敌使用催泪性和糜烂性毒气强渡耒河（我军中毒者十余人）。我军节节抵抗，至二十五日黄昏，全部龟缩于江东岸主阵地。方先觉怕江东岸的部队突围逃走，乃变更原定计划，决定放弃江东岸既设阵地。撤守时遗弃了大批粮食资敌，仅粤汉

码头附近一个仓库储存的粮食，直到战斗末期，敌人尚未搬完。这样就大大便利了敌人的进攻，增加了守城的困难。

原来城内的兵力配备是，第三师周庆祥部占领西郊青山街、莲湖台、天马山一带阵地；预十师葛先才部占领南郊岳屏山、接龙山、五桂岭、江西会馆一带阵地。二十六日上午江东岸撤守后，暂五十四师接替了江西会馆、五桂岭一带阵地，并担任五桂岭、太子码头、铁炉门、潇湘门、泥湾河街一带沿江江防任务；一九〇师容有略部控制为总预备队。

衡阳防守战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到八月七日方先觉决定公开投敌为止，共持续了四十七天。在此期间，除外围战斗外，敌人曾发动过三次攻势：第一次攻势是六月二十六日晚至二十八日晚；第二次是七月六日前后，第三次是八月一日至七日。守城战斗中，蒋介石虽也派了空军前来助战，并空投弹药。但来的次数少，活动时间短，不能掌握制空权，当时敌空军仍得于早晨和夜晚对我军阵地和城内建筑物大肆轰炸。当他们的攻势受挫时，更疯狂地投掷燃烧弹，实行火攻，给守城部队带来了人员伤亡、物资损失和其他各方面的困难。

在残酷的战斗中，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一般都具有爱国热情。他们同仇敌忾，奋不顾身，以万颗头颅（抗战胜利后在地面检拾起来的头骨达万余颗）在这里写下了抗日战争历史中的光辉的一页。如敌人发动第二次攻势时，激战五昼夜，它使用了大量燃烧弹和各种毒气弹，在空军和炮兵密切配合下，不断向我阵地猛扑；尤以城南五桂岭制高点的争夺战为最激烈，敌人突破一个口子打进来，我军就从这里把它打出去，最后连输送兵、炊事兵都上了火线。八月七日夜，方先觉决定投敌，前线停止战斗后，敌人马上就把坚守五桂岭阵地的李营长（第三师第七团第二营

长，四川人，忘其名）抓去杀了。除广大士兵和营级以下军官流血牺牲外，还有留在城里的数百名民伕和船民，他（她）们不愿做亡国奴，希望把日本鬼子赶走，男的为我们送弹药、修工事，女的为我们缝补、洗涤。他们中间许多人也在战火中牺牲了。

第二次战斗，守军伤亡过半，市区房屋大部烧光，弹药所余无几，情况十分危急。方先觉接二连三发出乞援电报。到七月十五日前后，六十二军由湘桂路谭子山（距城约六十华里）以南地区前来解围。名为一军，实际上投入解围战斗的只有一个加强步兵营。事后了解，该营到达南郊欧家町南面（距城约八华里）高地时，敌人很恐慌，并准备撤退；继因看到前来解围的兵力不多，才改变主意，并且只抽调三个中队，就把该营打垮了。由于这支解围部队的败退，影响该军主力溃不成军。同月二十日前后，七十四军由衡宝公路前来解围，实际上只该军五十八师攻到城郊鸡窝山后，又莫名其妙地撤走了。本来敌人攻城部队只有一个师团和一个联队，两次攻势顿挫，伤亡惨重，而后续部队又未到达，我方如有比较优势的援军前来解围，战场形势对于我军是极为有利的。外援既不可靠，方先觉又消极待援，不积极配合反攻，以致坐失战机。

日寇鉴于两次攻城失利，乃从安仁方面调来十三师团之一部，从长沙方面调来五十八师团及重炮部队，以加强对衡阳的围攻。八月一日激战再起，持续到六日拂晓，敌五十八师团突破小西门附近一九〇师的阵地。突破口逐渐扩大，敌人不断涌入城内，双方在城西北进行激烈巷战。在这天战况危急时，方先觉等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说：“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利用之弹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意。来生再见。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鸣玉同

叩。鱼（六日代号）。”（方先觉发此电时，笔者正在城北前线指挥，并未参与其事，也无人和我谈及，后逃至郴州始见报载）蒋介石给方先觉等的答复是：“祝上帝保佑你们？”

方先觉由于根本缺乏抗敌卫国的思想准备，到了战况危急和个人生死关头，而蒋介石又食言自肥，解围无望的时候，便决定公开投敌了。

方先觉等投敌经过

方先觉发出“鱼电”后的第二天，即八月七日下午三时左右，周庆祥的第三师第九团在天马山阵地前竖起白旗向敌乞降。黄昏时，方先觉来电话要我到军部开会。当时，师参谋主任赖典职等劝我不要去看，他们认为此去“凶多吉少”。因为他们猜测方先觉可能要搞集体自杀。我说：“要死就死，看他们怎样办吧！”当我到中山南路第十军军部（原中央银行行址）时，军参谋长孙鸣玉及处长以上幕僚人员和周庆祥、葛先才等，均已齐集在一个防空洞内。我走进去就看到方先觉装着哭泣的样子，一面说：“我的手枪呢？”一面打开抽屉寻找，好象要自杀。其实，他的手枪早已收检起来了，尽管他连开三个抽屉，自然还是找不到手枪。正当方先觉扮演得起劲的时候，全防空洞的人，不管真假，都哭泣起来。独独周庆祥面无表情，目露凶光，并气势汹汹地问我：“情况如此严重，你的意见怎样？”我说：“我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是放弃城北，固守城南。”接着补充说：“由湘桂路上来的援军，离城只有二十来里，大炮弹已经落到城边来了，只要固守一夜，明天早晨援军就可能打进来。固守待援，并不是毫无希望的。”说到这里，他急忙截断我的话说：“现在阵地犹如一张薄纸，敌人到处可以突进来，何况伤亡甚众，士无斗志？”我此时还不知道他已在天马山竖了

白旗。仍继续说：“如固守不可能，我的第二个意见就是突围，向援军来的方向分路突围。”他气冲冲地说：“突围，突围！哪个走前面？！”又说：“这样多负伤的官兵，难道就丢了他们不管！将来谁还肯跟我们共患难？”我看他气势汹汹，没有继续和他争论，又说：“我的意见，就是这样，看你们怎样办吧。”

我和周庆祥刚说完话，容有略也来了。因为敌人是由一九〇师的阵地突进来的，他很害怕，只啼哭，不讲话。也没有人再征询他的意见。正当防空洞内充满着哭声的时候，方先觉突然拍桌大骂说：“好，就是这样干吧！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他接着就吩咐孙鸣玉：“你们赶快提条件。”并且威胁着说：“如果天亮接不上头，敌人进城来就会大肆屠杀！”我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准备投降。孙鸣玉、周庆祥、葛先才等，立即按照方先觉的指示，提出了七条投降条件，大意是：（1）要求保留第十军建制；（2）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3）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军立即停火；（5）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其余两条，已不能记忆，因当时他们写好后，只是念了一遍，印象并不深刻。

晚上十点左右，方先觉在投降谈判条件上签字盖章后，就急忙地派遣周庆祥、军部副官处长张广宽及日文翻译梁某等，拿着投降谈判条件，到五桂岭方面用喊话方式向日军指挥所联络，要求举行投降谈判。一小时后，他们张惶地回来，说：“没有联络上。”方先觉听到这句话，突然紧张起来。看时间快十二点了，于是他马上改派他们（这次还加派了容有略）向天马山方面日军指挥所联络。不到一小时，他们由天马山打来电话说：已和一一六师团前线指挥所取得联络。不一会，又来电话，说日军指挥官的答复

是：对投降表示欢迎，对提出的要求表示接受，并已通知前线部队立即停火。同时，日军指定方先觉于次日拂晓出城，到五桂岭相会；全部武器集中于南门外马路两旁。方先觉接到这个电话，紧张的心情才安定下来。他吩咐指挥所的人员，各自回去安排后事，独不肯让我走。当时我的心情沉重，有如“万箭穿心”，同时也是十分矛盾的，既不愿死心踏地跟他们叛国投敌，又缺乏一死殉国的决心和勇气。最后，我以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还是决定想办法走。经我一再要求回师部处理一下，方先觉才很勉强地答应了。但又再三叮嘱快去快回。我回到铁炉门师指挥所时，师部幕僚们齐集在一个暗室里。我将方先觉决定投敌之事告诉他们，并提出从湘江水上突围的意见。我说：“谁会游泳的就跟我走。”当时他们都默不作声。看来会游泳的人很少，对于从水上突围这一冒险行动，都不敢尝试，故无人表示愿意跟我走。在此情况下，我思想上也动摇了，想到城北沿江一带已被敌人占领，同时又没有准备，只身逃走，生命很难保全。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方先觉来电话要我即刻回军部。当我复到军部时，接洽投敌的人们也从天马山回来了。就这样，大家在防空洞内一直等到天亮。

八月八日拂晓，方先觉率领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四个师长及军参谋长孙鸣玉以下幕僚二十余人，沿着中山南路向五桂岭走去。我们到中山堂附近，日军已派人在那里等候，引导我们到了江西会馆，会见日军前线指挥官。谈话约半小时，他就派人送我们到欧家町天主堂（即仁爱中学所在地）敌六十八师团司令部。出来接见我们的是敌师团幕僚长。互道姓名后，他就把我们分做几处个别谈话，主要是查对部队番号和军师长姓名。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讲出自己部队的番号和本人的真实姓名。日军查对无误后，就把我们安顿在天主堂内一个防空洞里，举行投降

谈判。上午十时许，敌师团长率领幕僚长以下诸人至洞内与方先觉见面。洞内置木桌一张，敌师团长坐在正面，方先觉和他对面而坐，孙鸣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分别坐在方先觉的两边。狭小的防空洞内，充满着紧张的空气。敌师团长首先发言，他杀气腾腾地说：“本官以日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他拒绝了方先觉的七项投降条件，并且威胁着说：“请即时答复。”方先觉在听了翻译的话以后，低声答道：“服从这个要求。”最后敌师团长说：“贵官及各师长的生命，皇军负保障之责。”这时，方先觉等恐惧的心情才逐渐安静下来。谈判结束，敌军就把我们安置在天主堂内单独的一栋房子里住下，内外岗哨，警戒森严。

当天中午，蒋介石的大批飞机飞临衡阳上空，轮番轰炸。遗弃在城内银行公会（大西门附近）的负伤官兵一千余人全部被炸死。被敌军集中在汽车西站附近和集中在城内湖南省银行的被俘官兵一千余人，被炸死炸伤的一二百人。周庆祥等坚持投降的借口之一，就是所谓不忍丢掉这些负伤官兵，但结果却是大批负伤官兵首先蒙受了他们投降带来的灾难。事实上，方先觉等后来也只顾个人利益而进一步向敌人卑躬屈节，早把剩下来的他们所谓“共过患难”的负伤或被俘的官兵抛到脑后去了。

方先觉的投敌，决不是八月七日晚间的军部会议上偶然决定的。他是否早有此打算，我固然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事先他和周庆祥、孙鸣玉等是商量好了的。否则，依常理论，周庆祥是不敢首先竖起降旗的。其次，在所谓军部会议上，除周庆祥反对坚守和突围外，并无其他的人提出投降主张，而方先觉突然说“就是这样干吧”，他这个结论究竟从哪里得来？除了说他是“胸有成竹”以外，就再也没有办法解释了。早在七月中旬，敌人在衡阳

上空散发的诱降书说：

“能征善守的第十军诸将士：任务已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决不以敌对行为对待。皇军志在消灭美空军。”（转引自蔡汝霖《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

从方先觉要求到南京见汪精卫及答记者问的叛国谈话等情况来看，这个诱降书对他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方先觉根本缺乏抗敌卫国的思想准备，到战况危急、个人生死关头，蒋介石食言自肥，解围无望的时候，终于公开投敌了。以方先觉的阶级本质和社会出身，加上在蒋介石的指挥影响下，他的投敌是毫不足怪的。他跟蒋介石当奴才，跟汪精卫当奴才，跟日本人当奴才，原本没有什么区别，只看如何对他更为有利，便投到哪个的怀抱里去。记得在投降后的某天，方先觉曾大骂不甘当亡国奴的第三师参谋主任说：“你跟蒋介石有什么好处，跟汪主席有什么不好？”方在盛怒之下还准备把他交给日本人处置，经孙鸣玉一说，才算饶了这个“共患难”的人。

方先觉投敌后的活动片断

八月九日上午，敌军在我们住所的楼下，举行了一个类似招待会的会议。日方出席的有六十八师团师团长、幕僚长和随军记者等人，我方出席的有方先觉、孙鸣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人。会上，敌师团长和方先觉互相说了几句客套话。接着敌幕僚长即用奚落的语气向我们说：“中国有句成语：‘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又说，“人的肉体不过是个‘臭皮囊’，人生应有更高的意义。这些话，日本军人都认为是至理名言。”经过一阵沉

寂，敌记者又问道：“连美国都出来作战了，真是遗憾！大家对此有什么感想？”方先觉回答说：“我们军官学校毕业的，都听说过日本的志士头山满先生，犬养毅先生，宫崎滔天先生等援助孙文先生革命的事实。现在重庆内部，上自蒋委员长，下至青年士官，都知道日本有这样的志士，只是现在互相只看到坏的方面，为时势所迫而抗战，真是可惜，只能等待时机。”孙鸣玉说：“重庆内部也有很多人很痛心的想，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只要有保持面子进行谈判的机会。”其余的人，在会上偶尔插一两句话也是有的，但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在这种场合中，各人是可能怀着不同的心情的。当我听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的话竟出自敌人之口，内愧极深，也就没有说什么。会后，日军记者要求方先觉发表一篇书面谈话。我知道这回事，也看到方先觉和军部秘书张某在窃窃私语，边讲边写。但这篇谈话，当时在投降集团内部是没有公开的，所以知道内容的很少。

八月下旬，在敌人的授意下，方先觉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某天的上午，他和孙鸣玉、周庆祥、葛先才及军部秘书张某（这封信是他起草的）正在走廊上看这封信的时候，我和容有略也去看了一下，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大意是说投降是如何不得已，说薛岳见死不救，有意牺牲第十军，并表示自己决心参加和运，同时劝说蒋介石早日和汪精卫合作。

与此同时，部队改编的问题也在酝酿。由于当时和方先觉住在一起的，只有上校级以上的军官佐，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已被敌人分散在各处做苦役，逃跑被追回和反抗虐待的，都遭到敌人的枪杀，因此，部队一时无法编成。方先觉为了讨好新主子，曾多次请求召回第十军官兵，并请发给武器，编成部队。但一直拖到九月底，敌人才为方先觉导演了一幕改编丑剧：把第十军改编为

“先和军”(取方先觉的“先”字与伪和平军的“和”字),以方先觉任军长,孙鸣玉任参谋长;军之下设四个师,以周庆祥任第一师师长,葛先才任第二师师长,容有略任第三师师长,饶少伟任第四师师长。那天,“先和军”的主要头目都被召参加了一个仪式。届时日方派人口头通知,并引我们到离天主堂东南不到一华里的农民家中。会场布置在农家的堂屋里,设有日式矮脚桌凳,并有烟茶。日方出席的有六十八师团师团长、幕僚长等人,还有翻译及随军记者三、四人。略用烟茶后,日方即招呼我们出至前院,由记者拍照。事毕,举行会餐。我们吃了一顿敌人掠夺中国人民的鸡、鸭、鱼、肉及白兰地酒。会餐时,敌师团长和方先觉都只说了些一般宴会上的应酬话。看来举行这次仪式就是为了要借我们拍张照片。我们在回天主堂途中,方先觉看了看大家的脸色,勉强而无力地说:“来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大家都沉默不语。次日上午,敌师团部派人送来“先和军”各头目每人“任命状”一纸,战刀一把。不久,日军又派人送来中正式步枪约两百支,轻机枪十余挺及手榴弹、步机弹、圆锹、十字镐等军械器材一批。但被掳去作苦役的官兵,此时仍未召回。

方先觉接受伪命后,以为新主子有意实现他的要求,更加野心勃勃,即着手在天主堂组织“先和军”军部,成立参谋、副官、军务、军需等处。派赖典职为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李文棋为军务处长,其他各处人事安排则记不清了。伪军部成立后,即与日军开始公文往来,并由日方发给办公费和伙食费(伪中央储备银行储备券)以及“采购证”。这时城内商业已部分恢复,携带采购证可以自由进城买东西。

在伪军部成立后,天主堂日军内层岗哨撤走了,警戒比较松

一些。十月初的一个晚上，周庆祥和孙鸣玉突然越窗而逃。他们逃走后，大家怕敌人追究，牵连吃亏，情绪一度表现紧张。方先觉也稍微流露了一些不安和忧闷的情态，但没有公开谈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其他任何行动。敌人方面，除一度恢复天主堂内层岗哨外，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

“双十节”（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到了。那天，不知方先觉出自什么心情，召集了住在天主堂的所有投降人员二三十人，在天主堂的礼拜堂内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庆祝会。会场草草布置，中间只挂了孙中山先生的遗相（投降了日本人，平常照例要挂的党旗和国旗自然不能挂了），气氛显得很冷淡。到会的人也大都无精打彩。方先觉着原有军服，腰间佩带日本人发给的战刀。他在人们到齐后，才走进会场。庆祝会开始，行礼如国民党集会通常采用的仪式，但删去了“唱国歌”和“向党国旗行三鞠躬礼”两节。会上，方先觉除照例讲了一遍“双十节”的意义外，还谈到守衡阳已尽到最大努力，并把外围援军骂了一遍，说他们“见死不救”，最后归结到“参加和运”，他着重地说：“我们的前途只有一个，我们只有干下去才有前途！”这场戏剧性的所谓庆祝会就此闭了幕。

十一月初，日军把分散在各方面的原第十军官兵二三百人，暂五十四师六七十人，分别集合在欧家町附近村庄和东洲。方先觉在日军授意下，把原第十军的人编成三个步兵连，并发给日军送来的全部武器，由葛先才率领，开到衡阳东南约十五华里的东阳渡，担任警戒任务。同时派我到东洲去掌握原暂五十四师的六七十人，但未交代具体任务和发给武器。我于十一月十日前后偕同师参谋长甘印森、军需主任习启霖等（当时同住在天主堂）由日军派人送至东洲船山中学。师部官佐十来人和我同住一起。我

们住在船山中学教职员宿舍的楼上，住在楼下的是敌人派来的联络班（三四个人）。他们名为联络，实为监视。同住在船山中学的，还有参加守城的伤病官兵。我本想去看看他们，但因有敌人监视，不便前去。在伤病官兵中有原在暂五十四师特务连当排长的周德贵，由于受了敌人的虐待和过着恐怖的生活，已经变得神经错乱了。我到东洲的第二天，他还住在我的楼下。我去看他时，一见面，他就哀求我救救他，说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和他谈话以后，敌人就把他移往别处去了。据闻，原来被敌人集中关在船山中学的伤病人员有四五百人，由于敌人既不给医药，也不给饭吃，造成了极大的死亡。有些伤病人员因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勉强爬到附近菜园中去摘东瓜，当场被敌人的岗哨用刺刀刺杀。我到船山中学时，活着的只有二三十人了。这固然由于敌人的残暴，但蒋介石集团和以方先觉为首的投降集团是不能辞其罪责的。

至于由日军直接调集在东洲的暂五十四师官兵六七十人，他们在什么时候到达东洲，最初住在哪里，我全然不知。一直到十一月十五日前后，才由日本人把他们集合到船山中学一间教室里，要我和他们见面。开始因为有联络班的敌人在窗外走动，我只和他们扯了几句不相干的话；后来敌人走开了，我细看他们个个都是面黄肌瘦，衣履不全，忍不住心头一阵感伤，我说：“这次向敌人投降，责任在方先觉和我们几个师长身上，与你们无关；但连累你们受尽折磨，历尽辛苦，这是我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你们。希望大家好好保重，各奔前程！”我说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再也说不下去了。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再过几天，即十一月二十一日晚间，我就获得机会逃出了东洲。

方先觉等脱逃与蒋介石的“慰勉”

自周庆祥与孙鸣玉逃走后，我时刻在打算找机会脱离虎口。因此，一到东洲，即授意副官林权（四川人）利用“采购证”出入市区的便利，秘密和近郊老乡取联系。几天之内，即通过在江东岸火车站附近开设客栈的四川同乡，和家住泉溪市的农民袁斌、聂某（忘其名）取得联系，并商妥逃走的具体办法，约定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晚间实行。是晚，临行之前，我将敌人发给我的伪“先和军”第四师师长委任状烧毁，将战刀丢在床下。我想：逃得脱固然好，万一逃不脱，就只有拼着杀头。十时后，细雨濛濛，楼下几个敌人都已入睡。我和甘印森等驾驶一只破旧的渡船，很顺利地开到了对岸，在袁、聂两位农民兄弟的引导下，通过五马归槽，渡过耒河，到达泉溪市西北约三四里的袁斌家中。四点多钟再由袁家出发，聂某领着我们从敌人警戒线旁迅速通过，天刚亮，就到了安全地带，七点左右，到了聂家。下午，聂又和附近的九十九军谍报队取得联系，在他们的护送下到了郴州九战区长官部。我们这次之所以能够安全地越过敌人的层层警戒线，完全由于袁、聂二人的机智勇敢。他们事先侦察好了敌人的岗哨位置和沿途一切情形，同时还约了另一农民在耒河渡口准备了船只，并约定了联络方法，一切布置都周密极了。当我向他们表示感谢时，袁斌还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们拚命杀敌，老百姓是很佩服的，营救你们就和营救自己家里人一样，不必谢了。”他们的爱国热忱和光明磊落的胸襟，使我对之感愧交集。

我到郴州，见了薛岳，即将在衡阳作战和投降经过作了扼要的汇报。薛岳说：“想不到方先觉竟做出这样的事来！这事与你无关，应该由方先觉负责。”并吩咐：“你把经过实在情形用我的名义

电呈委员长。”我回到旅社，按照薛岳的意思拟了三个电文把方先觉投敌经过电告蒋介石。随后薛岳即派我为长官部中将高级参谋，上报请示，并送来法币两万元，要我搬到长官部和他住在一起。十二月，军委会来电调我为该会少将高级参谋，要我去重庆。一九四五年一月，我征得薛岳同意，绕道赣州、昆明于二月初到达重庆。当时全国慰劳总会于我到达前已将“忠勇卫国”锦旗一面，慰劳金法币五万元送到我家。不久，蒋介石在曾家岩官邸召见了。当我被引进客厅，刚一坐下，蒋介石即光着头从里间走出来，面部稍带笑容，用力注视着我，连说：“你回来得好！”同时招呼我在他的左边坐下，然后问我：“薛长官好不好？你是怎样来的？”我答复了他的问话以后即开始谈正题。由于事先有侍从室军事组长柯远芬（陆大同期同学）告诉过我：“委员长看到薛长官的电报很不高兴，靠在椅子上闷了很久。你见到委员长，说话要留心。”因此，我决定在蒋介石面前不谈投降的事，只说：“这次参加守衡阳，没有尽到职责，请求处分。”蒋介石表示安慰说：“衡阳失守，责任不在你们，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又说：“已派你为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谋，你可趁这个时候休息休息。同时陆大将官班第二期快要开学了，你是不是去受受训？”我是陆大正班毕业的，当然不愿再到将官班去受训，但当作蒋介石的面，只得答应“很好，很好”。三月初，我就上将官班去了。

周庆祥和孙鸣玉是最先到重庆的。他们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关怀和信任。除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各一枚，给生活费法币各一百万元外，周庆祥被提升为第十军副军长兼第三师师长；孙鸣玉被任为新编三十六师师长。回顾一九四三年冬，周庆祥带着第三师参加“常德会战”，当部队与日寇在德山发生激战时，他带着副师长、参谋长和几个卫士逃走了，直到敌人撤退之后，才由牛鼻

滩暂五十四师防地偷偷跑回来。对于他这种临阵脱逃的严重罪责，蒋介石并未追究。这次在衡阳首竖降旗的又是他。结果不仅没有受罚，反而升了官。而在几年之后——一九四七年，他任整编三十二师师长，率部担任胶济路西段周村及王村的守备，当人民解放军进攻该地时，他又只身逃往济南；这次蒋介石的态度可不同了，在得报后，即电令王耀武将他就地枪决（周被枪决，很多人知道。但这一具体情节是曾任王耀武部参谋长贺执圭告诉我的）。同样是临阵脱逃，前次还是公开投敌，而蒋介石的处置却前后截然不同。粗看起来，似乎有很大的矛盾，令人难于理解；仔细分析起来，也并不奇怪。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原则来看，他的赏罚还是“分明”的。蒋介石集团内部曾有人说过：“蒋介石暴则暴矣，昏则未也。”这个看法，证诸上述事实确有几分道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当我还在郴州的时候，就听说方先觉已逃出了衡阳，由芷江坐飞机到重庆去了。他为什么要逃走，是怎样逃出来的，到今天还是一个谜。一九四五年二月初，我经昆明往重庆时，某次在昆明冠生园吃茶点，看见他神气十足地带着随员走了进来。他那时已经当了青年军二〇七师师长。我因对他十分不满，故意避免和他打招呼，随即离座他去。此后再未见面。事后了解，方先觉逃回重庆后，蒋介石集团对这个降将军曾表示热烈欢迎，还由全国慰劳总会出面，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说他是“脱险归来”，誉之为“中国军人之模范”，并向他献旗、献慰劳金以示“慰勉”。旅渝江苏同乡会还帮他搞了一所小洋房。蒋介石对他更是“慰勉”备至，除在生活上优予照顾外，并颁给“青天白日”勋章，又任命他为青年军二〇七师师长。一九四五年春夏之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中全会上（一说是伪国民参政

会)，一位国民党元老（姓名记不起）提出质问，大意是：方先觉守衡阳，究竟是有功还是有过？如果投敌属实，那就不是有功而是有过。赏有功，罚有过，理所当然。如果功过是非不分，将何以取信于国人！蒋介石在休息室听到这一质问，马上出来怒气冲冲地说：刚才这番话是谁说的？这与奸匪的造谣中伤有什么区别，简直是不识大体！当场骂得这位元老啼笑皆非（这是当时听到参加会议的人来说的）。蒋介石不惜亲自出马袒护一个叛国投敌的民族罪人，是有他的“道理”的。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蒋介石在统治中国的几十年中，他的一切措施，无一不是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勾当，比起他的部下方先觉的所为，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方先觉投降集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最后逃出来的是葛先才和容有略。他们是一九四五年五月间到重庆的。我和葛先才未见过面；和容有略虽见过一两次，但当时彼此的心情都不愿重提往事，因此没有谈什么。他们都被发表为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谋。后来，他们和我都获得了蒋介石颁给的“青天白日”勋章。

我这个降将军，尽管当时自以为是被迫的，责任不在我而在方先觉，但终究无法掩盖自己的卑怯灵魂，有时仍不免受到良心的谴责。今天当我来回忆写述这一段史实的时候，使我痛切地感到阶级本质对一个人的决定作用，在衡阳战役中，我之所以终至屈节投降，是有来由的。往者不可究，来者犹可追。我深切地感到只有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老老实实在地接受改造，今后在风浪中才不致迷失方向。

（民革湖南省委员会供稿）

编者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揭露了方先觉的这篇叛国谈话。全文如下：

日记者问：无条件投降后，今后之目的如何？

方先觉答：过去醉心于抗战，对日军兵力评价过小，更恃巩固之阵地与驻渝美空军之协力，从事抗战。结果终被日军之神勇、巧妙之战术所挫折。余曾举全力而应战，虽然败北，亦无遗憾。相信余之败北，并非败于军事，而实败于正义。今日目睹汪主席治下之实况，正适合余抗战之目标，今后决定参加和平阵营，而尽力于新中国之建设。

问：对过去之抗战生活有何感想？

答：本人自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始终身为军人，为国效力。但鉴于八年来之抗战，节节后退，毫无进展，民众牺牲过大，尤其最近对“抗战救国”四字，到处发生疑问，不合本人之主旨处太多。人必择其主而事，今后必将本人之一切，献于英明之汪主席，协力新中国之进展。

问：投降和运是否军长之意见？

答：此固系本人之意见，同时亦为四师长之意见。余早有此私见，未敢轻易宣布，既而得到日军之劝告，始披沥投效决意，并无一人反对。

问：今后之方针如何？

答：余乃一介武夫，虽不能充分表白个人之意念，然日军对于敌将，如此厚待，大义凛然，大恩不当言报，苟能得到日方谅解，则将携带避难桂林之家属及部下全体，誓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问：现在重庆将校对抗战将来的观察如何？

答：因事变之长期化，故重庆将校之间，鉴于抗战之矛盾，对抗战前途亦多具同感，此虽不可明言，而举动之轻忽，则可测其八九。因抗战而生活日趋苦恼，深信已无人相信抗战救国者，只是权威监视甚严，不得不胡乱从之而听凭天命了。

问：对于汪主席之信仰如何？

答：汪主席乃我等军校时之教官，故对其事迹知之甚详，如蒙允许，欲赴南京恭谒，借以面聆和平建国方策，并负荆请罪。

问：欲睹和平地区之实况否？

答：颇欲领和平地区之现实，更欲作汉口及南京之行，如蒙许可，而有机会时，尚欲访问日本。

一九四四年薛岳撤军湘南的打算

贺 执 圭

一九四四年夏，日寇从岳阳向长沙进犯的时候（当时我任湖南全省防空司令），国民党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竟不顾守土之责，指挥所属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的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第三十集团军王陵基部的第七十二、第七十八两个军，陈沛的第三十七军，梁汉民的第九十九军，丁治盘的第二十六军（该军以后由蒋介石令调湘桂路方面去了），王瓚绪的第四十四军，张洪的暂编第二军，王甲本的第七十九军（该军以后也由蒋介石调至湘桂路去了），傅仲芬的第九十九军，张德能第四军残部，饶少伟的暂编第五十四师一个团等三十万军队，由湘北的新墙、九岭、南江，赣西的修水、铜鼓等地，沿粤汉路以东和幕阜山脉之间，一直退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汝城、桂东、桂阳、崇义一带的五岭山脉的深谷之中。薛岳这样不战而退，是完全别有用心。

当时外间风传，薛岳放弃长沙、湘东、湘中等广大地区，是同蒋介石闹“蹩扭”。事实真象，并不如此。

当薛岳放弃长沙退到衡山朱亭的时候，他为了爆破衡阳机场和要我跟随一道退往郴县等问题（当时湖南全省防空司令部遵照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命令，决定转移到芷江，不去郴县），召我前往谈话。我以本战区（指九战区）应该继续屏障陪都——重庆的门户，和他兼领湘政（当时薛岳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以及为了使部队就近得到中央的补充等等理由，向他建议：长官部以向湘西

转移为宜。薛岳听后，毫不踌躇地说：“向湘南转移的计划，已和委员长（指蒋介石）反复研究过了。今天的形势，抗日的任务只是一个方面，而防范‘共匪’的窜扰，更不容一刻忽视。过去在平江方面（指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制造平江惨案），如不是防范及时，恐湘赣边区早已成了‘共匪’出没之地。现在‘共匪’王震正乘隙企图沿湘江西岸向湘南方面钻进。长官部此次向湘南转移的计划是：一方面可以阻止敌人打通湘粤铁路，另一方面可以控制湘粤赣三省交界边区——五岭山脉这块广大而险要的地区，免被‘共匪’窜据。”谈话到此，他又重复地着重指出：“此次经向统帅部一再电商，才作出这一决定。”从薛岳这席谈话来看，不问他在放弃长沙前后，曾与蒋介石之间有何争权夺利的矛盾，但在积极反共方面，他们始终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以后蒋介石顾虑薛岳盘据湘南，另搞一个独立王国，因而先后将杨森部调到桂北，将王甲本、丁治磐两军转调湘桂路方面，归王耀武的第二十四集团军指挥，则是蒋介石集团内部狗咬狗的问题。

当薛岳退到湘南以后，对日寇占领湘粤铁路南段，他不但视若无睹，而且未敢越汝城山区一步。薛岳以前在朱亭亲口对我说的什么阻止敌人打通湘粤铁路的大言，只是一种骗人的鬼话。

一九四五年夏初（日期忘了），盘据在湘中、湘南一带的日寇，为数约在六万左右，倾巢从湘潭、湘乡、衡阳、零陵，经邵阳分路向武冈、洞口、龙潭、溆浦、新化等地进犯。其时，王耀武部第四方面军所辖的施中诚部第七十四军、韩浚部第七十三军、李天霞部第一百军，廖耀湘部新编第六军、胡璉部第十八军、丁治磐部第二十六军、以及第九十三军（军长姓名忘记了）、和暂编第六师（师长赵平）、和军统直辖的“忠义军”两个纵队，包括在芷江中美混合编成的两个空军大队，总兵力计有二十万人左右，

与日寇兵力对比，等于四比一。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直接指挥下，第四方面军的二十万兵力，除以廖耀湘的新六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安江附近地区外，其余各军在雪峰山脉东麓武冈、洞口、龙潭、溆浦至新化之线，凭借有利地形，击破了日寇夺取芷江的企图。当日寇全线攻击受挫的时候，我正陪同何应钦和其参谋长萧毅肃（时我任湖南全省防空司令，驻芷江机场附近），在芷江机场空军指挥室，研究敌情和陆空进一步的协同作战问题。正在这时，由前方返防的空军参谋报告：“由左翼经武阳向会同，右翼由龙潭以北向大江口同时向我两翼迂回之敌，受我军侧击撤退后，窜到江口龙潭等地之敌，亦发现有后移的征候。”我当时感到这样的战机难得，便向何应钦建议：“控置在安江地区的总预备队廖耀湘部新六军，似宜立即捕捉战机，分两纵队，主力向江口，一部经武阳，在空军密切协同下投入战斗，一举将敌击溃后，跟踪向邵阳方向追击。”当时萧毅肃也认为应该出击。但何应钦初则笑而不答，过了一会才缓缓地说道：“美国援助我们的武器，尚有大部分没有运来；十个青年师，有的才开始训练，有的还未装备齐全；第四方面军的第七十三第七十四和第十八三个军，还是半美装的部队；象新六军这样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国军中还只有两个；这些部队，都是我们今后反攻和建国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当前的任务，一面要准备反攻敌人，一面还要防范共产党的叛乱。去年薛岳撤到湘南去，就是为了防范共产党乘隙钻进湘南地区，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事情。不然，让共产党钻进湘粤赣三省交界的五岭山脉的大山之中，裹胁人民，搞出一个根据地，那就麻烦多了。目前在西南方面，重新调整的四个方面军，到现在为止，还在充实和整训的阶段。反攻敌人的时机，尚有待盟军在太平洋方面的胜利进展，才能作出具体的决定。此时如不考虑全

局，与敌人硬碰，万一不利，影响整个计划太大。”何应钦说的这段话，正可以证实薛岳不战而撤军湘南的别有用心；而蒋介石集团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阴谋，也就昭然若揭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衡阳会战中的鸡窝山战役

罗文浪

一九四四年春，日寇在占领长沙、湘潭和株洲后，凶锋继续南指，于六月下旬，围攻湘南重镇衡阳。当时担任衡阳防守的部队为第十军方先觉部和暂编五十四师；担任外围策应的部队有二十四集团军王耀武部（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一百四个军），另有第二十、二十六、六十二三个军；总兵力较进攻之日寇，远为强大；而且凭借既设阵地，会战具备有利条件。但因国民党军将领间互相倾轧，增援部队各保实力、观望不前，最后竟以方先觉部的溃败投敌、衡阳沦陷而告终。当时，我在王耀武集团七十四军五十八师任参谋处主任，曾参与所谓解围战斗，现就记忆所及写了出来，以反映当时真实情况。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七十四军部队，由潭宝公路之青树坪附近转到衡宝公路上、参与衡阳的解围战斗。综合当前敌我形势：围攻衡阳的敌军先后发现有第六十八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第六师团、第一〇六师团等番号；除以主力围攻衡阳外，并在衡宝公路及衡阳以南扼要据守，以阻击我军的增援部队。在七十四军当面扼守公路上鸡窝山之敌，以其轻重火器估计，尚不足一个大队。当时我军的攻击部署是以五十八师在公路上为主攻部队，五十一师在五十八师后重叠为预备队，五十七师在演陂桥以南任军右侧的掩护。

第五十八师于当年春天参加宁乡战役，损失兵力约一团，补

充未毕、战斗力在军内为较弱者；但中下级官佐和士兵，斗志颇强。奉到攻击命令后，作如下攻击部署：以一七二团附军山炮兵一连及师迫击炮营与工兵一部为主攻部队，夺取鸡窝山敌阻击据点后，相机向衡阳挺进，与守军第十军切取联络；以一七三团在主攻部队右后任侧翼掩护；以一七四团为总预备队，在一七二团后随战斗进展跟进。七月下旬某日（确实日期已不能记忆）拂晓，开始对扼守鸡窝山之敌攻击。敌军兵力甚少，除发现步兵重兵器、机关枪和平射炮外，无山野炮火力支援。他们在我军优势炮火压迫下，在山顶和山麓的坚固野战工事内顽抗不退。由拂晓激战至黄昏，使用总预备队突击，始将鸡窝山占领。是役一七二团伤亡官兵约百余名，除占领了敌据点工事，驱逐敌军向鸡窝山以东公路上撤退外，无所俘获。惟时已入夜，不能继续攻击，乃以一七二团大部在阵地彻夜，并令师谍报队便衣排由公路两侧向衡阳城郊进出，与守军联络。十一时许该排进至五里牌附近，报称已与第十军便衣队取得联络，得知衡阳守军伤亡颇大，外围据点次第丢失，困守市区，急待解围。我当时将这一情况转报军部，并召集作战、情报参谋，研究翌日的攻击计划和与守城部队联络的具体方案。至午夜一时许，接到军部副参谋长邱耀东的电话，在询问当面情况后，告我：战况发生变化，本军于拂晓前要脱离敌人，转移阵地，要我通知各部队准备，在转移时特别注意右侧的警戒，正式命令随即送达。我觉得这一变化来得突然，当即问邱，是否已发现敌人向我增援部队侧翼或后方迂回；他说不是。我又问是否衡阳城出了问题（因为当时衡阳城方面，枪炮声沉寂）？他没有直接答复，只是叫我不要多问，照命令办理好了。在解围部队付出相当代价攻占了鸡窝山高地，已经遥望衡阳，只要再前进一步，就可能与守军取得联络，这样有利的形势下，突然下令部

队后撤，真使我百思不解。次日，除留了一个营在鸡窝山以西任后卫警戒外，师主力后撤四十余公里。这样毫无动静地又停顿了三日，才奉令转到邵阳附近的黑田铺集结，所谓衡阳解围战斗，就是这样戏剧性的告一结束。现在我才明白，军部当时突然命令部队后撤，无疑是在蒋介石统帅部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指导下作出的决定。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关于南岳游干班的回忆

宋 涛 罗文浪

一九三八年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南岳建立起来。作者宋涛兼任办公厅主任，罗文浪为调班受训的学员，对于班内一般情况有所了解，爰就回忆所及缕述如次以供参考。

游干班的设立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于日寇之手以后，蒋介石在敌寇疯狂进攻和全国人民斗志昂扬的形势下，被迫暂掩其投降面目，作出积极抗战的姿态；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又在华北、华东敌后，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牵制敌军主力，使其不能继续急进。而敌军方面因在一年多的短暂时间内占得大片土地，也需要进行休整。因此，从当时全国各战区形势来看，已进入胶着状态，正是开展游击战的好时机。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为形势所迫，接受中共方面的建议，决定成立一个游击干部训练机构，调训国民党军队中现职中级军官；并商请中共提供关于游击战术、游击政工方面的教员。同年十一月，指派卅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负责于南岳组设游击干部训练班。

游干班的教职员和班以下的官佐多由汤集团幕僚人员或部队长兼任。如教导处处长马骥，总务处处长万建藩，办公厅主任宋涛都是汤总部的高级幕僚；政治部主任陈烈是汤部副军长，总队长

陈大庆是第四师师长。中共方面除副教育长叶剑英外，只有教官薛子正、边章五、李涛、吴奚如等人。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汤恩伯准备率部北上，乃增设副教育长一员，以李默庵充任。迨四月底汤离班后，李乃代教育长负全班责任。五月第一期结业后，汤集团在班的兼任教职员宋涛等都归还建制。

游击干部训练班最初称为“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汤恩伯兼主任，副主任为叶剑英。开学不久，白崇禧、陈诚均常来南岳。当时，白任军委会军训部部长，陈为政治部部长，他们都很重视游干班。后来白以军事训练机构应隶属军训部为理由，报经蒋介石批准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由蒋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改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叶剑英改任副教育长。到第一期结业后，因西北亦办有同样性质的游干班，又遂改称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因训练班设在南岳镇，外间亦简称“南岳游干班”。

白崇禧在开学后建议改名是有他的企图的。第一，将这一大批中级军官和他搭上关系，以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地位；其次，是便于与陈诚争夺游干班领导权。因为在当时陈诚也是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地位，对游干班发号施令的，加上实际负责的汤恩伯，与陈同属蒋介石的浙帮嫡系，自然厚陈薄白，一经改隶军训部直接领导，则人事组织与教育训练，白便能多所干预，汤恩伯亦不得不仰承白的意旨。

第一期组训概况

游干班最初拟定召集受训的是各军师现职营长以上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幕僚人员。在调训命令中规定部队以军为单位，选派战术修养较好有作战经验的优秀军官参加学习，结业以后，

各回原部队，开班训练连排班长下级军事干部，或以之为骨干，编组游击部队，以进入敌后，实施游击战争。因此在第一期各军选送学员时，是比较慎重的。班部决定编组各队的办法，是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成例，即学员和队长以下干部都是受训的，临时由报到人员中选派干部。在第一期的八个队中，首先编成的一二三队，队长都是现职副师长或高级幕僚，队副多为副旅长，区队长多为现职团长，而且都是黄埔军校出身期别较高的。学员均为现职营团长或中级参谋人员，只有少数广西地方行政人员，本不合调训资格，是由白崇禧批准编入的。后来，由于汤恩伯另有企图及其他原因，就没有按照原规定召集办法去遴选学员。如第四队为卅一集团军随营干训大队，学员都是由部队中抽调的下级干部，汤恩伯利用职权将其强编入班，并随班部驻在圣经学院，附带作为汤可靠而有力的警卫力量；第五队为卅一集团军的文工团（系抗战初期招收的男女青年学生）改称的；第六队则为开学后临时增设的。第六队中两个区队多为少校以上荣誉军官，据悉有多数人自负伤住院以后，感觉生活安适，虽久已伤愈，亦借故不肯出院重上前线。按照当时规定，在火线负伤，只要由师野战医院或卫生大队转入后方兵站医院或陆军医院，原部即将底缺开除，遴选补充。因此，伤员归队后，一时也难安插实缺，尤其是部队中习惯的所谓主官实缺。为适应这种特殊情况，所以将这批伤员编入游干班受训，并拟议在训练结束后，组成新的游击部队到敌后活动，既利用了这些人的作战经验，也解决了安插问题。该队的另一个区队（第三区队）为军委会政治部战地服务团第一团，曾在上海、武汉战场做过一些宣传鼓动、慰问演出等工作，大多数队员为知识青年，爱国心切，愿到敌后打游击。加上团长胡兰畦（女）又最爱出风头，看到新办了游干班，积极报请陈诚批准，以

全团编入第六队受训。第七队的成立，也是适应当时环境临时决定的。原来在开学后约一个多月，学员第一次试做群众工作，大部分军官架子未放下，加上语言不通，他们既不懂衡山土话，当地群众更不懂外地语言，故实习成绩很差。因此，在学员中普遍产生一种“游击战好打，群众工作难做”的思想。尔后在学员中间讨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有主张找翻译的，有主张用当地干部的，大多数意见则以招收当地青年加以训练为最恰当。当时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在那经济破产，知识青年惶惶无出路的时候，不到几天即招得百余男女学生和一部分粗识文字的青年。乃编成第七队，以军事教官余程万任队长。第八队为工兵学校替军校代训的第十六期工科学生，在养成教育结束后，全队调来学习游击爆破的。以上八个队，共有学员一千二百多人。

根据游干班的目的要求，在训练方面主要应该是要求学员掌握游击战争的战术，战斗的特点，和学会广泛地开展游击区的政治工作，故重点应置于游击战术和游击政工以及游击战的一些特种技术上，其他的一般军事训练，受训学员都有基础，不需重复。但由于陆续编入的各队，情况复杂，水平不一，大多数不具备基本军事知识，更没有实地战斗经验，如果重点放在学习游击战术和游击政工上，就很难理解游击战术思想和运用它。可是基本军事知识，又不能在短期内学会，若因此占去大部教育时间，则本末倒置，又失去培训游击干部的目的。因此争执颇多，很难定出一套适合全班水平的教育计划。同时专门教员有限，又不能订出两套计划分班教授。最后只得拟订一个折衷的计划：以游击战术、游击政工为主要课程，其他关于基本军事知识和特种技术，则作适当配合讲授。但事实上，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重点的游击战术，每周只占到学科时间的两次，游击政工则只占到一次，根本没有

达到预期的训练目的。

除经常的课程之外，当时常有中外人士来班讲演。如周恩来代表讲过国际形势，胡愈之先生讲过“对日本的分析”，日本共产党人鹿地亘讲过“对日本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正当国民党军事溃败，士气颓丧，投降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这些讲演，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和我们的有利条件，论证了抗战必胜的道理，大大地鼓舞了人心，增强了持久抗战的斗争意志。因此，学员们的思想意识反映在班的文艺园地上，有个时期是比较活跃和进步的。

从自觉纪律到严格纪律

在学员开始来班报到时，看到报到处一张触目的通告：“奉主任汤谕：凡报到学员，一律将头发剪光，否则不办报到手续，请各报到学员遵照办理。”当时学员们思想感到很紧张，预料到将是采用严格的管理方式。

照当时惯例，除陆军大学和陆大参谋班的学员外，一般军事学校和短期军事训练班的学员生，一律比照士兵待遇，不许蓄长发。留发与否，说明一个训练单位对学员生活、纪律上要求的不同。游干班不许学员留发，正是以对待士兵的严格要求来要求学员的。

但是，开学以后，班领导上忽然提出采取自觉纪律。其基本内容是：学员自动、自觉、自愿地参加学习和遵守班、队的一切规定。在管理方面，各队的官长起带头作用，学员有违反纪律的，不得采用简单的处分办法，强调说服教育，反对粗暴作风。这种自觉纪律，在国民党军队中，不仅从没用过，而且从没有听到过这一名词。因此大家就议论纷纷，有人猜测是中共的教官特别是叶副教育长的建议，也有理解为游击战既不同于正规战，生活纪

律、当然另有一套办法。对于这一措施，学员方面自然普遍拥护，负管理责任的队上官长也多赞成，但也有思想顽固的如第一队队长洪显成，二队队副龙韬等人表示异议，认为不合“整齐严肃”的精神。由于学员们还没有具备相当的觉悟程度，在实行这一新的办法不久，部分同学逐渐发生不守班规，如无故旷课，不假外出，非规定外宿时间外宿，例假日打牌赌钱等等。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教育计划的实施。班部对于这种偏向，没有及时进行思想教育，而洪显成等就趁机攻击，终于与第一队学员发生激烈冲突。洪向总队长以辞职相要挟，迫使改变这一进步的作法。其他负管理责任的人也多向班部提议要改变办法。班部这时就号召在学员中广泛讨论，自行拟定“成文纪律”，汇交班部审核后印发各队执行以代替自觉纪律。

成文纪律实行后，违反纪律的事，仍间有发生。在顽固派看来，则认为是军纪荡然，不可收拾。因此在李默庵代理教育长时，第一次训话就是宣布学员对上级须绝对服从，如有反抗，则依陆军惩罚令处理，并指示总队即日设置学员禁闭室。这样就完全回到了严格纪律的老路。

三青团的发展

第一期训练期间，正是国民党由中央到地方如火如荼地组织和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时候，班政治部的主要工作，一为国民党党员的审查登记和发展，一为发展三青团员。当时陈诚是以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他特别注意团组织的发展问题。在国民党军队中，官兵多是集体宣誓入党，本无所谓非党军官，游干班学员既多为中级军官，更无发展党员之必要。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党务工作的混乱，以及官兵对党籍之漠不关心，

竟有部分人虽填表几次，迄未领到党证或不知自己已否入党，因此，当时班部进行党员审查登记与发展，有些人想靠拢陈诚，愿舍党而取团，但又不了解党团隶属关系，纷纷报请解释。在一次全班大会上，陈诚曾公开解释过。他说：国民党员是老资格，革命走在团员前头，是大哥。三青团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而产生的，是兄弟。党员有义务领导团员，既是党员，可以不必入团，但自己愿意入团也不排斥。又说：国民党员的年龄一般都比较老，因此必须有新的力量补充，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对象是青年，也可以说是国民党的后备军。陈诚的这些公开讲话，并不是讲的老实话。据班政治部透露内幕：国民党中央之决议成立三青团，主要是因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怕一些青年被共产党拉去，而国民党内又不能完全容纳，就仿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办法，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共产党抗衡来收罗知识青年。事实上是基于这一原则，第五、六、七队学员之大部和一、二、三队中之一部都入了团。

国民党除用三青团组织来羁绊学员外，并从思想上加以控制。如汤恩伯常和学员（特别是对一、二、三队学员）作精神讲话，内容主要是讲党员守则、军人训词等，强调军人要服从领袖，“保国卫民”。所谓“三民主义专家”梁寒操则主讲“三民主义体系”，强调中国贫弱，只适合三民主义，不能实行共产主义等鬼话，以麻痹学员思想。

国民党的假合作真防共

由于日寇的猖狂进攻和人民的压力，迫使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再度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从全国来看，开办游干班的时候是人们认为国共合作得比较好的时候，也被人称之为“合作高潮”的时候。当时游干班中以叶剑英副教育长为首的几个中共方面派来

的教官，办事认真负责，生活刻苦朴素，特别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博得大部分学员的好感和同情。某天，叶副教育长主持一个小型会议忘记读“总理遗嘱”，会开完后，他仍叫大家起立进行补读，并向大家说明共产党人是同样尊重孙中山先生的，绝不是不愿读总理遗嘱，李涛教官有一次向学员讲授截击地点的选择问题时，有同学笑问：“当年（指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的‘围剿’）你们打国民党是这样打的吧？”李笑着说：“当年是敌我斗争，今天能共聚一堂，切磋研究，一致对外，这是很有意义的。”李的生动而诚挚的答话引起了全堂欢动，呈现一片融洽的感情。这些小事都可说明共产党人心地磊落，处处注意与国民党人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希望达到团结御侮的目的。而国民党的中下层也多数是可以团结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来的。

但是，一贯奉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顽固派汤恩伯等，口头上虽标榜“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对待中共教职员表面上装做客气和尊重，一些教育训练方面的事情，也让叶副教育长去主持，而暗地里却防范很严，将中共方面的四个教官安排单独住在一处，并暗使特务住在其附近，以监视他们的行动。其他教职员与学员都受到无形的限制，不敢与中共人员个别接近，唯恐戴上一顶红帽子。

汤恩伯不仅在课堂上对学员灌输反动理论，排斥共产主义思想，有时甚至反动原形毕露，公然进行指摘。如有一次他听过苏联顾问讲完搜索课以后，竟说“这些搜索方法都没有超出阵中勤务令的一般原则”，因而使学员中已经滋生的游击战术不能超出正规战术范畴的思想更加发展。当他听学员们学唱游击战歌，唱到“我们大家一齐来，只有游击战”时，他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歌要不得！为什么只有游击战？难道说游击战可以取得最后胜利吗？”

当时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深入敌后，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的事实已深深为全国人民所了解，获得广泛的好评。汤恩伯是处处有意贬低游击战的作用，以提高国民党正规军的身价。但是，当有人向他建议，打游击应当掌握长白山、兴安岭、太行山、仙霞山、泰山、粤闽边区这样的山地和洪泽湖、太湖、及海南岛这样的湖海地区作为游击根据地时，他又表示欣赏赞同，并大肆叫嚷“国民党部队要占领这些地区打游击”。汤恩伯的实际用意是：怕中共领导的部队在这些地区发展，所以先叫喊出来，妄图作为尔后限制中共发展的借口。

汤恩伯任教育长时，对反共多少还有所顾忌，在表面上不得不敷衍一番。到李默庵上任后，这种假合作真防共的面貌便彻底暴露出来了，他不仅以高压禁闭代替比较民主的纪律，回复法西斯教育方式，施行特务训练，他的政治部主任戴子琪，在纪念周上更公开谩骂中国共产党和诋毁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人员还是顾全大局，采取容忍的态度。除叶剑英将军在第一期结业后因故离去外，其他中共教官直到皖南事变前夕，才离开了游干班。

结 语

按原来开办游干班的目的与要求，学员结业后，应该回到部队去继续训练游击干部，扩大游击队伍，开发敌后根据地与敌人进行游击战争。但是，就我们所知道的，学员们回到部队后多任原职，或者是步步高升，直到抗战胜利，不仅没有派遣过任何人去打游击，而且没有进行过任何游击训练。据李默庵任教育长时期的工作人员谈，李默庵接手后，更远离原来国共合作开班的意图。他增加了一个党政队，学员都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

三青团干事长，专员公署主任秘书、科长等一些党团骨干和文职人员，并将第一期中途编入未结业的第七队学员编成第五队，进行特务训练，完全与其他各队隔离。游干班名义虽存在，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游干班是国共合作时期开办起来的，但由于国民党实行假合作，真防共，走的路不同，自然收不到应有的训练效果。但是由于中共方面的积极努力，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多少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增强了民族团结的意识和抗战的信心。当时的确有一部分人思想倾向共产党，有些人想找中共人员谈话而不可得。一道反革命的墙，阻碍了人们的进步和团结，在游干班也是如此。

游干班共办了五期，一九三九年下半年（第三期）迁零陵，旋迁祁阳，再迁江西漫江；一九四〇年六月，由漫江复迁回祁阳，改称西南干部训练班。其时我们已离开了游干班，以后的具体情况，有待其他亲历者叙述。

西南干部训练班及突击队

李 昊 熊壮猷

一九四〇年六月，蒋介石基于中英协议，令李默庵将“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由江西漫江迁回湖南祁阳山川塘，改称“军事委员会西南干部训练班，”以为中英双方所准备训练的突击部队训练一批干部和军士。我们当时任职其间，对有关情况，记忆犹新，因述其始末，以供参考。

（一）西南干部训练班的成立

一九四〇年初，日寇大举进侵缅甸。英国驻缅兵力单薄，除正规部队两个旅外，临时将数千英国侨商编练成军，战斗力量很弱，因而节节败退。蒋介石应英政府请求，派遣了一个军，进入缅甸。由于军队装备低劣，缅北丛林地带，交通不便，又逢雨季，粮弹补给不上，在缅北行军途中，官兵遭受疾病冻饿，死亡过半。当通过丛林地带后，英军主力已溃逃到印度边境，无法取得协同作战，我军终于退回云南。英军临时编练的侨商，则退集靠近云南的腊戍，与退印度的英军主力断绝联系。同年五月，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又与蒋介石协商。蒋不愿继续向缅甸投入正规军队，但又不愿得罪英国，特别是想骗取英国的一批军资械弹，乃指派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与丹尼达成了中英合作编练以加强营为作战单位的小部队，进入缅甸，向日寇后方进行突击战。

当中英协议达成后，蒋介石属下将领，认为这是扩大自己部队力量的好机会，纷纷活动，企图染指，李默庵就是逐鹿的一个。由于李是当时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的教育长，又由于李号称是蒋介石属下一员战将，同时，英军事代表团也认为李是中国一个打游击战的“专家”，表示同意由李担任编练任务。李默庵猎取了中英合作部队的编练和指挥权后，随得蒋介石批准，将游击干部训练班西南班，改为西南干部训练班，由漫江迁到祁阳，开始编练突击部队。

中英双方对编练和使用这支突击部队，怀着不同目的：英方是想利用中国军队与退到腊戍的英军合作，加强缅甸东部的作战力量；蒋介石则是想骗取英国的一批军资械弹，建立一支突击部队，主要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根本不想使用到缅甸地区去。因此，中英协议是建立在极不稳固的基础上的。英方知道蒋介石的意图，坚持突击部队开到缅甸境内，才肯提供军资械弹，而蒋介石及李默庵，却借口滇缅局势不稳定，坚持突击部队必须在湖南境内编练。就这些具体问题，双方争执甚烈，几乎闹成僵局。为了找到一个折衷办法，蒋介石派李默庵同丹尼到缅甸进行了实地观察，相机行事。他们在缅甸耽搁了半个月，双方同意暂时以湖南祁阳作为突击部队的编练地区，英方派一部分官兵到祁阳来，与突击队合并编练，等编练完成后，再分批开到缅甸，由英方配发军资械弹。

英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于达成协议初步解决了关于合作的具体问题后，在飞印度报命途中，坠机殒命，以后由布鲁斯继任团长，继续执行协议。双方拟定：先编成五个突击营，施以六个月训练后，即开赴缅甸作战，武器装备军用器材等，由英方供给，于部队开到腊戍时配发；经费粮食补给，则各自负担。

西南干部训练班虽然是游干班的改头换面，但由于建班的目的和性质不同，在编组和人事上也有所调整。除蒋介石仍兼班主任，李默庵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外，办公厅主任为胡琪三，政治部主任刘公武，总务处长郑洛，教务处长罗觉元，外事室主任刘隽，机要室主任李明志，情报室主任李昊。下设两个总队，第一总队长周淘漉，第二总队长刘子淑。第一总队下辖军官、军士、政工、爆破、情报等队；第二总队下辖军官、军士、政工、爆破、翻译、经理等队。各队学员和军士多系调训，也有一部分是招收培训的。

以上是西南干部训练班的初期编制。随着全班调浙江碧湖后，编制人事，有很多变更。

（二）突击营的编制装备和第一突击队的编成

干训班与英军事代表团协商，共同拟定了编练突击营的几项原则：

1. 战斗官兵由中国人员充任，爆破技术官兵，由英国官兵担任，因此，战斗人员编制，主要由中国方面决定；技术人员编制，主要由英方适应突击营、连的作战需要决定；

2. 以营为独立作战单位，以队为指挥单位（队辖几个营）。因此，要求营具有一般部队中的团的性能，要求队具有一般部队中的师的性能；

3. 必须富于机动性，具有强大火力，便于敌后作战。因此，要求官兵质量比一般部队高，武器比一般部队好，运输力量比一般部队强；

4. 武器、器材由英方供应，但在编训时，暂时使用中国装备，并必须考虑到使用英方装备时所需人员的数目。

基于以上原则，中英双方经过一再商讨，把中国方面战斗官兵的编制，初步确定如下：

1. 突击队——有正、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各一人，司令部内设有政治部、参谋室、军需室、副官室、军医室、军械室、情报室等机构，下辖五个突击营、一个战防炮营、一个通讯连、一个警卫连、一个运输连、一个卫生队、一个无线电总台；

2. 突击营——有正、副营长及政治指导员各一人，并有政工、军需、副官、军械、军医、情报等人员，下辖三至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一个迫炮连，及警卫排、通讯排、运输排、担架排、无线电台等；

3. 步兵连——有正、副连长及政治指导员各一人，辖三排，每排分三班，另外一个爆破班、一个政工班、一个运输班、一个担架班，全连官兵约有二百六十人左右；

4. 机枪连——有正、副连长及政治指导员各一人，辖三排，每排重机枪二挺，其他人员编组，大概与步兵连相同；

5. 迫炮连——有正、副连长及政治指导员各一人，辖三排，每排迫炮二门，或平射炮二门，其他人员编组，大概与步兵连相同。

一九四〇年九月，李默庵就湘鄂赣边区指挥部调拨一部分直属部队，并就当地师管区挑选了一批较好的军士，编成五个突击营，开到祁阳。担任营、连长的干部，是按一般部队中的团、营长资历挑选的，但士兵质量和数量，远不符突击部队标准。这时，八十二师罗启疆部一个旅，因人事纠纷发生变乱，该旅有一个团留衡阳未动。军事委员会取消了这个旅的番号，令西南干训班就近收编这个团。李默庵乃将已编成的五个营，缩编为三个营，另将这个团的官兵，改编为突击第四营和第五营。

在五个突击营之上，成立了第一突击队司令部，调原任第一

总队长周淘漉任司令（总队长职务由副总队长龙云骧接替），调湘鄂赣边区指挥部参谋处长胡旭旰任副司令。军委会政治部派李承恩为突击队政治部主任。突击队还成立了参谋、副官、军需、军械、军医、情报等室，并按编制成立了各直属部队，积极进行训练，等待英方官兵来祁。

李默庵对第一突击队的训练是抓得很紧的。他学了蒋介石那套练兵办法，办了一次以两周为期的军官教导团，自己任团长，办公厅主任胡琪三任副团长，各总队长任连长，各突击营长任排长，其他干部当学员，集训期间，一律按士兵待遇。经过一度集训，军官们稍稍振作，腐败习气，有所摒除。但随着部队训练的紧张，士兵逃亡很多。

关于突击部队的装备，英方满口承认全部供给。当达成协议时，英代表团长丹尼确实准备由印度转运一批好武器供突击队使用；但丹尼死后，继任的布鲁斯，远不如丹尼在英国军事上的威望，无法从英政府调运大量武器装备来华，再则当时美国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史迪威，不愿意英国在中国培植扩大军事力量，更不愿意看到英国武器通过他开辟的史迪威路运进中国来。李默庵也知道这些情况，但仍想把英方残存在滇缅边境一部分装备要到手，曾一再向英军事代表团交涉。英方始终没有答应将武器运到班部，仅在派遣约三百名英国官兵到祁阳时，带来了少量爆破器材，做做样品而已。因限于装备，各突击队编成时，远未达到原拟编制的要求，仍与一般部队没有多少差别。

（三）英军在祁阳和江西前线情况

一九四一年初，由英国詹森上校率领了英国官兵共约三百余人，分批到达祁阳西南干训班。这些官兵，除有部分穿英国军服

的外，有穿长裙的，有穿骑士服的，有穿西装的，充分说明是些乌合之众。他们纪律很坏，三五成群，随便闯入民舍及店铺，乱拿东西，调戏妇女。山川塘有一条约有三百户的小街，老百姓几乎不敢开门。西南干部训练班的眷属，住在这条小街上的不少，都吓得迁避。十天之内，报到班部的英军强奸案即有几起。李默庵为这些事，感到头痛，即与詹森等商量制止。詹森虽然答应了，但随后却通过翻译，向外事处提出了如何解决英国军士性的问题。李默庵等也曾想找些妓女去招待他们，詹森认为妓女有病，影响健康。李默庵等无法处理，即干脆拒绝了他们。为了制止这些英军到处乱闯生事，李默庵曾同意了情报室的建议，对英军托言祁阳民性强悍，且有潜伏敌匪，劝英军少出外，以保安全；另外在祁阳组织了一个情报小组，专负中英军队纪律问题的查缉，并在小街及附近地区加强了军警戒备。这样，才使那些英国官兵，稍为敛迹。

英国官兵生活要求过奢厚，除了从加尔各答转运来一些牛奶、糖果、饼干、香烟、肉食罐头外，还要由当地供应数量相当大的酒、肉、蛋、鸡等物品。初来时，祁阳县尚可应付，随后就一天比一天难办了。因此，英国官兵也一天比一天感到不适合他们的意愿，不满情绪逐渐表露出来。

英国官兵到班后，曾协助班和突击营的教育训练。他们的唯一本领就是能使用自己带来的一些爆破器材。虽然也与突击营进行过几次联合演习，但他们只是派少数人在一旁参观，提提意见；至于他们自己，从来未进行过什么训练，大家闲着没事做。后来逐渐知道他们只有极少数是正式军人，多数是侨商，还有传教师，及外文教师等，他们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不少的人，曾侨居中国很久，把中国当殖民地，看不起中国人，他们把充当翻

译的中国人，当勤杂使用。有一个姓陈的翻译员，因没有同意带一个英国兵出外游玩，竟遭到那个英国兵殴打，经班内向詹森等提出抗议，他们才道歉了事。

詹森上校到祁阳后，一再向李默庵提出将突击队调赴缅甸战地使用；英驻重庆军事代表团，也向蒋介石一再催促，因而军事委员会向班查问突击队编训情形，和是否可以作战。李默庵知道蒋介石的意图，他自己也是不愿把这些部队运用到缅甸方面去的，乃借口装备未充实以搪塞英方。英方则以部队到腊戍即可全部换发英式武器为饵，强调履行协议。李默庵不好明显违背与丹尼在缅甸的原议，只好报请军事委员会同意，由第一突击队司令周淘漉，先率第三第四第五三个突击营同英军开赴缅甸。蒋介石于此时特别召见了周淘漉，部队由副司令胡旭旰率领，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由祁阳出发。

当决定第一突击队的三个营开缅甸时，英方到达祁阳的官兵，也适应这些情况决定了编组：

1. 英军指挥部——指挥官詹森上校，指挥部内由米乐中校、谢兰少校任参谋，兰士德等人任秘书及翻译，并配属中国翻译员及一些勤杂兵；

2. 指挥部辖三个爆破技术队、一个医务所。每个技术队有官兵八十人。为了配合三个突击营，也称为第三第四第五技术队，分随突击营行动，并受营的建制（仅记得第三队队长是基尔戴维斯少校，医务所主任是白朗少校，其他已不能记忆）。

中英突击部队开到都匀后，英军在缅甸的最后基地——腊戍已被日军攻占了；缅甸战局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突击部队奉令停止前进，旋仍折返祁阳。

英军开回祁阳后，官兵表现非常不安定，他们不愿久驻祁阳。

詹森一再向李默庵要求开赴前线，作实战演习。李默庵据情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将这些英军和周淘漉率领的第三第四第五突击营，调赴湘鄂赣边区作战，编入第九战区战斗序列。一九四一年夏季，这支中英部队由祁阳开赴江西靖安邱家街。

英军到前方的虽只有二百多人，仍然要从加尔各答转运牛奶、饼干、糖果、香烟、服装、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来。由长沙到靖安的公路已破坏，全部靠人力挑运。九战区长官部特为成立突击队兵站支部（支部设在靖安九仙汤），沿浏阳、铜鼓各地设九处兵站，英军并派人沿途设库，逐段转运。开始主要是靠雇用民伕挑运，当雇用有困难时，英军则到处拉伕，沿途打伤民伕的事情，常有所闻，在浏阳且曾打死民伕一名。当时九战区兵站总监陈某，也曾带信到前方，要求向英军提出抗议；但事后除了对打死的民伕给了微不足道的抚恤外，并未作出任何的处理。九战区长官部为了进一步解决英军供应品的问题，随即成立了一个以四百个甲级壮丁编成的运输大队，专为二百多名英军服务，但还是不能解决他们供应品的及时运输，仍得靠兵站临时雇伕补充。除了对以上物资供应外，还得由兵站供应他们许多面粉、大米。此外，他们自己还常从当地采购鸡鸭鱼肉蛋等物资。因此，每到一处，引起物价飞涨。又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到民间采购，得依靠雇用的华籍勤杂作向导，这些华籍勤杂，在金钱引诱下，倚仗英军势力，不顾国体，助桀为虐，不服管束，也在民间造成许多纠纷。

（四）英军的所谓作战与撤退

当第一突击队到达邱家街后，根据英军要求，曾由第四第五两营，派出小部队到靖安前线对日军据点和交通线实施攻袭作战。英军各队派少数人同往观战。这本来也是一种演习性质的，一方

面让英军了解实战情况，以便今后研究如何配合作战；另一方面想打出一点成绩来，以树立中英官兵作战信心。部队打了两次小胜仗，自己没有损失。英军观战回来后，虽然口里说打得不错，但内心颇怀轻视。接着英军又要求自己出马，进行实战演习。乃在邱家街前线，选定一个桥头小山坡上的敌人碉堡据点，由突击部队隔着小溪占领阵地，以火力封锁敌人，掩护英军通过小桥，对敌据点施行爆破作业。连续施行几次的结果，渡桥的几个英军，都全部牺牲，攻击终告失败。因此，他们认为这样的作战，只有送死，毫无意义。随后不久，他们便提出了撤军要求。

一九四一年冬，英军奉布鲁斯命，从邱家街撤退，只留下詹森、兰士德、乔治等十余人，称为英军代表团，留驻西南干部训练班内。这一措施充分说明了英军已经不愿履行原来与中国政府达成的合组突击队的协议。按照原来的协议，詹森率领的二百多英国官兵只是第一批，还得继续调来第二批第三批官兵的，而这时连第一批二百多人也调走了。

从李默庵及詹森等透露出来的关于英军决定撤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一九四一年冬，英国本土遭受希特勒军日益强烈的攻击，只能集中力量保全英伦三岛，并听命美国及艾森豪威尔；这时“盟军”正全力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无力顾全缅甸这一地区，因而不愿把兵力及武器调运到中国来；

2. 原来计划把残存在印度的部分兵员及武器调运到中国来，但空运力量太小，欲依靠史迪威路又遭拒绝（詹森就曾明白说过，不是英国不把武器运来，而是史迪威不批准他们从史迪威公路运进来）；

3. 英国在缅甸被击溃的军队，不论是正规军或临时编练成军

的侨商，已经丧失斗志，詹森带来的官兵又普遍思家，不愿继续在中国及缅甸打仗，倚靠这些残兵败将，实无济于事；

4.英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及到祁的詹森等，也知道蒋介石及李默庵并不乐意把兵力调到缅甸战场上去。

英方虽然决定撤军，但仍留了詹森等十余人在班，其目的是想保持这点关系，以待尔后情况变化，好进行新的阴谋。这十余人后来名义上为干训班顾问。

（五）第二突击队的编成与李默庵的迁调

紧接着第一突击队五个营编成之后，即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成立第二总队，培训了许多干部及军士，作编练第二突击队之用。一九四一年四月，李默庵挑选了一批具有作战经验的荣誉士兵，并接收了一部分新兵，编成了突击第六营和第七营。六月，又由湘鄂赣边区调来了两个直属团，改编成突击第八、九、十三个营，并成立了第二突击队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派魏人鉴为第二突击队司令，李昊为副司令，赵纫为政治部主任。这个突击队从编成起，一直未与英国官兵发生直接连系，已经不是原来中英合作的突击部队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辖江浙一带部队，遭到日寇的沉重打击。顾祝同为了增强辖区军队力量，稳定江浙防务，想把西南干部训练班这支新建部队调到浙江去，李默庵则向来就是想把这支部队当作升官本钱，随时在寻找机会，正好两相情愿。五月间，李默庵就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八十八军及突击部队等，仍兼西南干部训练班教育长，继续编练突击部队。

一九四一年六月起，西南干训班及各突击队，分批调往浙江。

第一突击队（缺第一、二两营），于六月直接由江西靖安，开往浙江仙居。七月，第一总队长龙云骧，率该总队及突击第一二两营，由祁阳开浙江丽水，稍加休整，即开仙居，归入第一突击队建制。八月以后，干训班各处室，并第二突击队，均先后由祁阳开到浙江丽水。詹森上校等十余人，仍随班行动，以顾问名义，协助班内教育，原来合作的关系，根本不存在了。李默庵明知詹森等留班的用意，但仍然厚待他们，以保留着建班的这个特点，并借重他们的意见，以便向蒋介石及伪中央各机关，要求有比一般军事训练机构较好的照顾。

西南干部训练班迁到浙江后，仍然保持两个总队，而且增加了不少队别。到一九四四年，还为军官学校代训了八百多个入伍生。但在教育设施上，还是非常简陋的。

（六）第三突击队的编成及突击总队部的成立

一九四三年四月前后，伪和平军发生内哄，其中一师长李启蒙，率所部不足三个团，向第三战区长官部投诚。顾祝同将李部改为暂编十一旅，拨归李默庵整训。李启蒙原系上海一个青帮头目，既无文化，又无军事知识，探知李默庵的岳父是上海青帮首领，乃百计依附李默庵。李默庵也装出伪善面孔，把亲信干部分批插进李启蒙部队中，等到确实掌握了这个部队时，就请求长官部批准，将暂十一旅改为第三突击队，编成了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突击营。随后又把李启蒙调到第三战区长官部去，改派刘建修为第三突击队司令，戴镇球为副司令，并成立了直属部队，完全把这个部队变为已有了。这个第三突击队成立后，即留在碧湖整训，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编并到九十八军。

按原定编制人员武器，每个突击队相当于一个普通师，因此

在三个突击队之上，必须有相当于军的指挥机构。李默庵利用英顾问向重庆蒋介石提出建议，自己又向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请求，并转托人向重庆各有关军事机关进行活动，终于批准仿军部编制，成立突击总队司令部，及一些直属部队。李默庵怕被别人夺去这支基本力量，自己兼任总队司令，以班副教育长胡琪三兼副总队司令，任罗觉元为参谋长，并委任了各处长。由于武器装备不足，有的直属部队，实际上是空架子，如原来詹森答应向英驻中国代表团转请提供英式山炮二十门，及战防炮若干，以便成立山炮团，及各队战防炮营，尽管詹森的话没有兑现，李默庵还是以假当真，成立了有名无实的山炮团，向军委会备案。总队司令部悬缺，则把西南干部训练班人员列报，在业务上经费上人事上，几乎分不清西南干训班与突击总队。对于这些，上级也不查问，给李默庵以进行贪污的好机会。

（七）突击队抗日反共概况与干训班的撤销

当第一突击队开到浙江仙居后不久，即进驻天台地区，司令部率第一营驻天台，以第二、三、四、五营活动于天台嵊县间，不时以小部队对敌封锁线进行攻击。一九四二年春，于新昌黄坦村及其以西地区，苦战两昼夜，击破日寇近一个联队的进犯，并乘胜攻克新昌城外围据点一处。第一突击队，纪律较为严明，每到一处，颇得群众的好感与合作。新昌一战之后，更是大露头角，一时声名噪盛，各方面都认为是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较强的好部队，甚至新昌黄坦村的群众，不肯让突击第三营阵亡官兵的遗骸迁葬仙居公墓，他们自动筹款，就地建墓立碑，当时传为美谈。以后从敌伪军方面掳获的文件中，敌人也曾提出“唱凯部队”（当时第一突击队的代号）衣衫褴褛，但纪律严明，战斗力强，须特

别注意。

新昌之役，对当时浙东方面的战局，是有一定良好影响的，而李默庵也便借此大吹大擂，把第一突击队当作看家资本，想要始终保持已经树立起了的势力和声誉，来为他更多的扩编突击队铺平道路。因此，他以后再也不肯把突击部队用在主要挨打的方面。所以第一突击队直到在孝丰战役被歼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主要战斗，而且部队纪律也逐渐松弛，与国民党其他部队没有什么区别。

当第一突击队颇负盛誉时期，蒋介石家乡四明山地区的官僚地主反动派，却点中了第一突击队，在浙江省参议会正式提出，要第一突击队开进四明山担任“剿匪”任务。正当四明山张俊升田岫山两个挺进纵队，被新四军三五支队打得站不住脚的时候，第一突击队派了第四第五两个营，进入四明山。新四军三五支队，采取了化零为整，化整为零，声东击西等战法，使第一突击队疲于奔命。李默庵为了保存突击队实力，便调了暂编三十三师师长周淘漉（在此以前几个月，周由第一突击队司令调充暂三十三师师长，由罗觉元接任第一突击队司令）率所部的一个团，进入四明山。旋趁日寇进犯丽温时，以增援丽水为辞，把第一突击队调离了四明山。

第二突击队到浙江后，训练了几个月，即在丽水东北山区一带活动；作为三十二集团军的机动部队，一直未担任过阵地防守。

一九四五年四月，顾祝同想集中部队，一举肃清孝丰附近的新四军。他指派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李觉负指挥之责，调七十九师段霖茂部，突击总队的第一、二突击队全部，企图围攻孝丰附近新四军。但各部队都存心保全实力，互不调协，与新四军一触

即溃，第一突击队反被新四军乘夜包围，全军复没。司令胡旭旰阵亡，第三营营长熊壮猷，第五营营长陈士瀛均被俘。第二突击队及七十九师掩护第一突击队突围不果，在第一突击队被歼后，均溃逃下来了。从这次作战失败之后，李默庵、胡琪三都受到顾祝同的责难，突击部队的声誉，即一落千丈。

顾祝同乘全国整编部队机会，以孝丰战败为由，于七月间硬把三个队缩编为预三师预四师，编为第九十八军，以突击总队司令部的人员部队，改为军部人员部队，提升他的心腹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为军长，原总队副司令胡琪三为副军长。胡在军校资历高于段霖茂，不愿屈就。以后，这个部队，就在段霖茂掌握之下，对人民解放军发动内战。

随着突击部队被编并，西南干部训练班失掉存在意义，也同时奉令撤销。英顾问詹森等，也随着班的撤销，回到重庆去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记邵阳永和金号惨案

徐君虎

一九四七年五月，匪特傅德明在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孙佐齐的发纵指使下，一手造成了邵阳永和金号惨案。这一骇人听闻的“官匪”毒劫杀烧案，曾震动全国，激起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国民党政府及司法当局官官相护，对元凶孙佐齐及其他共犯，竟未作出公正的处理，只是将一名凶犯傅德明枪毙了事。当时，我任邵阳县县长，参与本案的侦查揭发。但由于事过境迁，某些情节，已难记忆，这次承聂海平先生（前邵阳市各界声援永和金号惨案委员会委员、江西旅邵同乡会负责人）与永和被害人喻让贤君帮助印证，才得草草完成此稿。不当或失实之处，尚希读者指正。

（一）

永和金号惨案主犯孙佐齐，邵阳人，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当时国民党内右派分子所组织的以反共反人民为目的的“左社”；后来又钻进蒋介石亲自领导的穷凶极恶的军统组织，继续其反革命生涯。抗日初期当湖北省政府为日寇所迫移驻恩施时，他一同流亡到这个山城，竟为反动头子陈诚所赏识，代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做了不少残害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的罪恶勾当。抗日战争胜利后，省府迁回武昌。这位既系外省人，资历又浅的代书记长难以继续下去，乃持陈诚荐信回到长沙，投见湖南省主席吴奇

伟，获得湖南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职务。他于获得伪职后物色了一群如狼似虎的班底，如玉雪非、白鸿钧等；并由王雪非介绍一个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狂嫖阔赌、挥金如土、曾干过美军总部配给科的工作，受过特务训练的傅德明做机要秘书（即特种会报秘书），走马上任，回到邵阳。于时正是蒋介石进一步镇压人民革命，摧残进步人士，濒于穷途末日的境地。他仗着上有陈诚作靠山，下有三青团分子作爪牙，疯狂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密捕、密讯、密决”的“肃奸”反动政策，以此作为升官发财的手段；更懂得必须大张“肃奸”的旗鼓，先行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使人人自危，才可以予取予求，为所欲为。因此，他们抓学生、捕老师、捉工商业者，残民以逞，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曾捏造证据，以“奸党分子”的罪名先后在新化和邵阳逮捕省立六中和武东中学学生李忍生、谢原耀、曾鸣洲等数十人，强迫招供，勒令登报自首。这类案件估计共达四十余件之多，把整个六区变成了一个黑暗、恐怖的世界。每到夜深人静之际，专署内遭到严刑拷打的青年，发出“唉呀”之声，惨不忍闻。孙等趁此择肥而噬，恣意诈索抢劫。于是，永福药号与永和金号便成为他们抢劫勒索的主要对象了。

（二）

永福药号系独资经营，资财雄厚。老板何情恒一妻两妾，只生下一个独生子何健中。健中年少多病，早已休学，平日既少交游，即外出理发洗澡也有店员跟随，恐被人引去学嫖学赌变为败家之子。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少爷。

由衡阳分设来邵的永和金号，店子门面虽然矮小，而布置颇为堂皇。一个须长数寸、长袍大褂、道貌岸然的老人陈汉章，端

坐柜房，孙等误以为是该店经理。

孙佐齐既决定从他们二人下手，便指使傅德明、王雪非伪造邹之麟从邵阳寄香港邓文钊的信和龙振湘从长沙寄何健中的信，冤诬何健中。陈汉章分负“奸党”地下工作之责。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孙佐齐派王雪非、白鸿钧（王白均为专署科长）、傅德明率枪兵十余名，如狼似虎地拥入永福药号和永和金号，将何健中、陈汉章逮捕监禁，不许接见，不许通讯。

何情恒夫妇以爱子被捕，日夜哭泣，经宴请邵阳士绅雷飏、岳森、赵恒等致函孙佐齐代为求情无效；又办了一套参茸之类的隆重礼物，专人送给孙佐齐的岳母娘李斋婆。这回总算得到了一个确切的答复：“这个案子很严重呀！专员是不要钱，承办的人非送钱不可，你要何老板先送五千万。”这个口开得太大了，何家感到有些为难。恰巧遇上一位经常往来长邵的特务分子方志坚，说有办法，由帮会大爷梁玉仁经手先后敲去了当时的伪币五百万元。三青团办的“铁报”也乘机要何认股金四百万元。可是何健中还是关在专署的牢里没有放出来。

金号的陈汉章呢，经过刑讯之后，才知道他是打首饰的技工，并非永和经理。匪特们又以为永和经理系田瑞清。乃捏造省方来电，指田为“奸党”要犯，须逮捕送省。三月二十四日孙佐齐下令派傅德明、王雪非、白鸿钧将田抓进专署。次晨，由傅德明押赴长沙，同住乐陶酒家；傅随外出，到长沙后将田锁禁房中。傅在市上吃喝一顿返寓，佯对田说：“我已到机关接头，探悉你的案情严重，凶多吉少，你对妻小有何嘱托，当代转告。”弄得田瑞清跪在傅的面前哭泣求救，傅假装同情地说：“我已同负责人谈到这个问题，但非钱莫办。你如果能筹三百两金子，当可免死。”殊不知田也是一个普通店员，系暂代经理职务，哪里能够弄到如此一

笔巨金。田当将手上一枚戒子脱下交傅，傅嫌太少，不肯收纳。恫吓千百般，纠缠两日夜，还是榨不出油水。傅恐省会旅舍私设牢房，一旦暴露，转而惹祸，只好托词将田释放。

(三)

傅德明回到邵阳，向孙佐齐等会报前情。他们深感捕人刑讯威逼诈索之法效果不大，且易出毛病，不如率性实行抢劫，可以兑现，遂定下毒劫杀烧的计划，由傅负责执行。为此，对于金店房子的内部结构、进出的道路以及店里员工的姓名人数，事前必须弄清。五月一日，傅匪以陈汉章供认该店有一暗室为词，来到金店，由经理杨振华陪同巡视店内一遍，并将员工姓名人数了解清楚；另外还派人向金店试探有多少存金，说是要买五百两金子，店里答以要买千两亦可，盖永和在长沙、衡阳都有联号，有生意时可以去电调运，并非店中有这多现金。

这时永和金号恰从衡阳解来一批现银，拟往隆回收购砂金。消息外传，说是来了大批黄金。傅匪等认为这是千载良机，不可错过。五月二日晚边即在市上买得安眠药百片。次日夜深人静，傅匪身怀毒药，配带刀枪，手持孙佐齐的手令，由专署直趋永和金号，敲门而入，将全店职工喊起来，清点了人数，便怒目张牙地说：“你们这个店子是共产党的地下机关，陈汉章业已供认。我今晚特来带你们去专署问话。如果你们不愿去专署，也可就地侦讯。但为了使你们吐露真实情形，必须先行吞服美国的‘真言丸’。看你们愿走哪条路？”说完即将安眠药片改装的“真言丸”甩到桌上。职工们想到陈汉章的遭遇；他自从被捉进专署，不许接见，不许通讯，听说经过几次酷刑拷打，已经骨瘦如柴。与其进专署那个阎王殿受活罪，倒不如吃“真言丸”在店里受讯；绝没有想

到以政府官吏而来放毒杀人纵火行劫。

傅迫使大家同意后，便各给安眠药十片令其当面吞服，惟对掌柜的饶文清另有打算，未令他服。员工服药后，渐渐头晕难支。傅令各回原房就寝，听候讯问。乃叫饶文清手提煤油灯带路，巡视各室，见中毒的人已不省人事。经过作坊时，傅顺手窃取一个铁锤，然后对饶说：“陈汉章供称共产党的秘密文件，都藏在保险柜里，你打开给我检查。”饶引他至保险柜前，从口袋里掏出锁匙，刚刚把柜子打开，傅以铁锤向饶的后脑猛击两锤，饶登时昏倒在地，复被砍杀十四刀而死。傅遂取桌布包卷柜内所存黄金，倾油放火烧屋。（案发后，专署有士兵孙复初等三人逃走；劫去金数，起赃时也有缺少。也说明是专署分赃纵逃无疑）。匪特满以为人死证销，罪行可掩。不料学徒喻让贤，服药时乘傅匪没有注意，以衣袖抹嘴，吐了七片在袖子里。他假睡在床上，听到下面门响，偷偷一望，只见饶文清满身是血，倒在地上，傅匪还未出去，火已燃起来了。他吓得不敢作声。直到救火人员赶到，天已放亮，才穿着一件单衣，从楼上跑下来，先到同丰金号，再到福昇元金店，向同行理事长喻纯报告一切。

当火光冲天，警钟狂鸣时，金店隔壁的大华药号经理以邻居起火，恐遭波及，号召全体员工，居高临下，泼水抢救。城区消防队也及时赶到施救。结果仅中栋遭焚，前后进幸告无事。

（四）

四日晨，傅德明见火光渐熄，知道情况不妙，带着手枪兵数名，急奔金店。房主聂海平、建治镇镇长吴总权已先到。喻让贤亦由福昇元折回。他正在向众人叙述目睹惨案发生的情形和傅德明要他们吃“真言丸”的经过，没有注意到傅德明已站在他的后面。

傅当即对他喝斥，并将他逮捕，说：“我要枪毙你！”当我闻警赶赴现场，途经金店后街曹婆井，正撞上傅押着喻往专署走。我听到喻大喊冤枉，就责成傅必须保障喻的生命安全，听候调查处理。我走进金店，火焰尚未全熄，大门内阶级上躺着一个死者，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即被杀死的饶文清。另一个被火烧成焦炭一团、脚手不见、剩下肚腹的尸体，即中毒后睡在中栋的学徒金海水。我踏着残余的火烬，走到后进厨房，一个中毒较轻睡在床上的大司务陈玉清正张目四望。我问他：“你店里起了火，杀死了人，你知道吗？”他吞吞吐吐地说：“傅秘书要我们吃丸子呀。”我问：“他为什么要你们吃？”他说：“不吃他的要捉人呀！我们店里的先生都吃了，我只好跟着吃。他要我张开口看吃完没有，我在舌子下面藏了两片没有吃进肚子里去……。”他一边说，一边把早先藏在口里的两片白色药片拿给我看。其余中毒的鄢占魁、鄢子和（两父子）、邓康年、杨留权多已昏迷不能讲话。我即派警护送他们去普爱医院进行急救；同时以电话告知孙佐齐：傅德明为此案要犯，应即扣押。孙反装腔作势说：“这是你们县府搞的！”我察觉到这个案子的复杂关系，马上把驻在乡下的武装调进城来维护治安，以防万一。与此同时，即着手搜集人证物证，以期迅速破案。

五月五日，我率警察局长段一诚，记录刘配熙，并邀请县参议会议长谢煜焘同赴普爱医院录取受害人的口供。他们各就所见，如实地将傅德明的犯罪行为揭露出来。当时邮电均遭专署封锁，乃托汽车司机将被害人杨留权口供带交长沙中央日报负责人段梦晖先生在该报发表，引起舆论大哗，群情激愤。邵阳各界于五月七日也集会声援（我参加了大会），成立了声援永和金号惨案委员会。同时为妥保受害人的安全，我在县府腾出一间房子将他们迁住县府。

(五)

邵阳地方一向存在着派系斗争，主要的是三青团与国民党之争，其次是中统与军统之争。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从县级机关到各乡镇；从行政、警察、司法、教育、田赋、税收以至财产保管，遇缺即争，无孔不入。各派都有自己的一批爪牙，有自己的宣传工具——报纸。自从孙佐齐当上了专员兼保安司令，团方气焰日形嚣张，大小喽啰横行城乡，无恶不作。永和惨案的发生，可以说是团方恶贯满盈的表现，也给党方提供了一个“克敌制胜”的良好机会。在邵阳各界组织的声援永和金号惨案委员会名单中，除了少数中立人士如雷飙、岳森、赵恒、谢煜焘、李泽民等外，大部分都是党方的人。滑稽的是团方的黄甲（省参议员）、贺柏青（三青团的干事）等也列名其中。他们在这一场斗争中各怀鬼胎，各有目的。党方是想借此案击败团方，把孙佐齐及其党羽搞垮并取而代之（后来果然拍出党方一个自“清共”以来血债累累的罗植乾来接替孙佐齐了）。团方的企图是：以贼喊捉贼的方法，混淆社会视听，掩饰自己的罪行；做些拉拢、疏通、侦探、离间的工作，为一干罪犯开脱，减轻罪责，万一不行，则牺牲傅德明一人，力求不牵连到孙佐齐头上去（如黄甲在声援会在长沙青年会举行的一次招待各界人士的会上便说傅德明的行为动机是受一位香港小姐的影响，以此为孙佐齐开脱，弄得到会的人喊“打”）；尽量设法保持个人已得的权位，从而为自己的派系保持一定的地盘（例如黄甲是省参议员，他不装腔作势一番，就会遭到罢免）。我自己既不属党，也不属团，与双方都有矛盾；一向的作法是：有时利用团打击党，有时利用党打击团。由于我同孙佐齐的矛盾比较更直接、更尖锐，因此在这个案件中，自然也想抓住机会，

狠狠地打他一下。

(六)

孙佐齐等自惨案发生后，外表装作镇静，实际上已慌做一团。他们狗急跳墙，不择手段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威胁、陷害等阴谋活动：①指使喽啰加强邮电检查，防止案情外传；禁止邵市报纸揭露案情；并恶毒无耻地扬言“杀人放火是共产党的惯技”。②企图提讯中毒员工，加以迫害。③令庶务孙忠瑞以“精忠会肃奸组”的名义制造恐怖气氛（邵市各界声援惨案委员会的负责人多接到“事不关己何太劳，依时知休真英豪，忠言不听防后悔，手枪炸弹助吾曹”的恐吓信）；并派便衣匪特行凶，如赵恒老先生在声援会上讲了几句正直的话，当天晚上即有持枪的匪特，闯进他的住宅，幸赵尚未归家，未蒙其害。④派科员宋受章警告中德药房不许泄露傅德明买安眠药片的事。⑤向检察官谢功预证明五月三日晚上傅德明没有外出；并于五月七日呈报省方以傅德明“因公受累”，请予保障。⑥传讯曾经被他们指为奸党分子用严刑拷打过的一些学生，要他们供认“永和金号惨案”是共产党搞的。总之，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不惜要尽一切卑鄙狠毒的手法。但是，在被害人的控诉，群众的压力下，迫使法院不得不于五月×日开庭问案。在初次传讯被害人时，孙佐齐还派了傅德明去陪审，意图威吓被害人，使之不敢如实揭发。毒劫杀烧的现行犯，居然高踞法堂，更激起了原告的悲愤和观审者的同情。立刻满堂哄动，要求把罪犯抓起来。傅德明这才由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关进牢里去了。

傅德明入狱后，仍挟持专署为护符，每次提审，总是神气十足，按照匪党的决策，一口咬定此案系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所为；

他因干“肃奸”工作而遭到报复，并在邵阳民报和铁报上刊登启事：“本人从事铲除奸匪工作，遂为奸匪所积怨，永和金店惨案，实其暗算成果。现自赴法院请求侦查，同时设法破案，为被害人雪恨，誓与奸匪奋斗到底！”孙佐齐、王雪非等也继续其阴谋活动。五月十二日午刻，王雪非为傅匪送饭，在饭中藏一纸条说：

- 1.环境不利，此案侦讯，决定请求移转管辖，解长办。
- 2.替你做了反诉书，控告六人（即指中毒的六人——虎注）为被告，以便传讯。
- 3.你要为天地父母朋友妻子而奋斗到底，丧身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忍心辜负我吗？（傅匪可能想自杀——虎注）
- 4.情形日益好转，案情不难大白，老伯要来才好，别人疑惑你身家不清白，结婚是假。（傅匪想以结婚为名，请求假释——虎注）
- 5.分呈各有关文告，已日夜赶办，明天发出，对你绝对有益，底稿明天设法给你看。
- 6.我代表你家属，出赏五百万元破案，有十数人为此奔走，颇有收获（按指冤诬喻让贤事——虎注），你要静心忍耐。
- 7.我与济清（视察郭璋的别号——虎注）拼死为你奋斗，讨米叫化都不惜，神明实鉴此心。保处实太难。佐公为此事日夜忧思，神魂颠倒，他是爱你至切，一切为案子打算，谁存心牺牲你，谁遭天杀（这几句很显明地吐露了：既是同谋共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谁也不牺牲谁——虎注），我们痛苦比你更甚，所不同的一在小牢，一在大牢而已。
- 8.你解长沙，我绝对辞职同你去，以便照拂。所有字条要焚毁，免人口实。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阴谋活动的一般。但最毒辣的是企图反噬诬害被害人喻让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福升元金号的老板喻纯，号季珊，隶籍江西，受过高等教育，为同业公会理事长。他是三青团骨干分子，以派系关系，竟昧尽天良，不惜出卖同行、同乡、同姓，认贼作父。当孙佐齐派专署军法官马图，一再传讯喻让

贤时，他一口咬定喻让贤是在惨案发生之夜，天还未亮，衣服整齐，跑到他店子里来的，想把放毒抢劫、杀人放火的全部责任栽到喻让贤头上去，并唆使其胞兄喻老大出面作证未遂。受害人以时日迁延，含冤莫白，只好乞灵于神，把邵阳地方历来怪诞离奇传说很多的“郑公千岁”迎到店里，斋戒沐浴，锣鼓喧天，朝夕祈祷，以求大显威灵，彻底破案。

(七)

把有关惨案的证据搜集起来，把事实一件件摆在群众面前，来揭穿官匪的欺骗宣传，来反击匪犯的狡赖，来证实这案子是六区专员公署有计划、有步骤的集体行动是刻不容缓的了。我为了查明安眠药片的来源，访问了几个医院没有结果，就想起市上几家西药店来了。我约了卫生院曾院长、省立中医院一个药剂师，同赴各药店调查，并查看其进出货账簿。在兄弟药房发现只有进货账，没有出货账，心颇疑之。然而该店坚不承认有卖药片给傅德明的事。继至中德药房，店主陈子庄已外出，他的妻子申云英听到我说明来意，脸色突变，开始时对所问一切都答以“不晓得”。经过再三开导，指出利害，并保证其只要据实检举，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她的头渐渐低下去了，沉默了一会，忽然说：“县长，请你老人家房里坐。”我们进入她的内房，她便抱头哭诉：“在惨案发生之前，傅德明经常来楼上照相馆和我们店里玩。五月二日晚边，傅匆匆忙忙来找我的丈夫，要买安眠药一百片，说是新化县托他买的，证件明日送来。我店里没有货，向兄弟药房分得百片交他拿去。第二日证件没有送来。第三天早晨永和金号惨案发生了，街上争相传说中毒轻点的大司务已经说出是傅德明搞的，还从口中吐出了两颗白色药片。我俩夫妇听到这个消息，受到良心上的

责备，痛苦已极，行坐不安。想自首，专署已派人来警告我们不许泄露。想隐瞒，又怕查出来了牵连进去。他（陈子庄）想远走会引起人家猜疑，看出破绽；在店里则有随时抓到牢里去的危险，只好终日躲在外面，打听消息，看看风声。我带着小孩看守店子，也是忧心巴巴地度日如年，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坏东西（指傅）真害死人呀！……”她泪如雨下地叙述着。我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提笔写了几句嘉奖她并负责保证她夫妇无罪的话，给她收存，还允许从当晚起派警驻守店前保护他们的安全；并要曾院长将谈话作成书面记录，由她自己审阅签字后，转送邵阳法院。但当时法院检察官采取的态度是官官相卫，马马虎虎。显明的例子，如在扣押傅德明后进行搜查赃物时，仅在专署傅匪房中一望，连藏有黄金的皮箱也未翻动。初次检验饶文清的尸体，后脑被傅用铁锤打的大洞也未发现。

（八）

五月二十一日晚，傅德明在省高院首席检察官汪廉审讯下，招认了制造永和惨案的经过。当晚在专署王雪非房间的皮箱内取出赃物——黄金二十六两多及珍珠、玛瑙、银元若干。为什么事情发生了这样久，赃物还未动呢？原因是：他们向金店行劫，是经过了一番调查侦察的，满以为可获巨金；行动的结果，却大失所望。且案子已经暴露，分则粥少僧多，一旦傅匪供认，势必追究赃物，不如暂时搁置。万一供认出来，则赃物藏在傅箱，足证系傅匪一人之所为。其余的人可借此开脱罪责（后来法院对孙、王、白诸匪只以“借势勒索未遂”罪判处，而为之撇开共同行劫罪，也正是以此为佐证的）。其阴险鬼诈，已达极点。当傅匪招认，赃物起出之日，邵阳报纸发行号外，全城鼎沸。向省内外各地报导

这一消息的长途电话、电报彻夜不停。惨案声援委员会及江西同乡会负责人聂海平等立即赶赴长沙，向伪省府请愿，要求迅速逮捕主犯，以洽舆情。

六月七日，邵阳地方法院第一次正式开庭审讯傅德明。消息传出，大街小巷，人山人海争看这个万恶匪徒。傅脚带铁镣，走出县府大门，见路旁有一辆人力车，便想以车代步，遭到车夫一顿痛骂而作罢。当他被押进法庭，观审的群众排山倒海，蜂拥而来，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枪毙他”的喊声与新闻记者摄影机的响声汇成了一阵正义的怒吼。南昌新闻记者访问团，以及云集邵市的各地记者不断地将采访所得，撰稿披露，更激起了长沙、南昌、京沪各地许多人民团体、工商业者、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同情，函电交驰，表示无比的愤慨。在邵外侨也写稿投刊纽约报纸。国民党官吏为匪的事实已经喧腾中外，形势所迫，曾经装聋作哑的伪湖南省政府，到这时也不得不把孙佐齐撤职交法院讯办，并先后派督导李琼、胡念榆、军法室副主任叶宰鼎和省府委员毛炳文来邵调查。他们进行活动的原则是能掩则掩，能拖则拖；对主犯孙佐齐自然还要尽量予以维护。

(九)

举世瞩目的永和金号惨案，经过两个月的侦讯和各方面的紧张活动，六月二十七日在邵阳地方法院宣判了。判决书原文是：

1.傅德明、孙佐齐、王雪非、白鸿钧、郭璋等贪污及盗匪案件 判决主文：

傅德明共同连续借势勒索未遂，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年；强劫而故意杀人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应执行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孙佐齐、王雪非共同连续借势勒索未遂，各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年。白鸿钧共同连续借势勒索未遂，处有期徒刑十年，褫

夺公权八年。郭璋被诉贪污部分无罪。

2.宋受章、孙忠瑞妨害自由一案，判决主文：宋受章因加害生命恐吓他人，处有期徒刑六月。孙忠瑞以加害生命恐吓他人，处有期徒刑六月。

3.何健中自诉郭璋妨害自由一案，判决主文：郭璋共同以加害身体恐吓他人，处有期徒刑六月，褫夺公权一年。

这一群以孙佐齐为首的官匪，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欠下了无数的血债，结果仅以傅德明一人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了案，对孙、王、白诸罪犯虽判了徒刑，只是掩人耳目的玩意。不到数月，有的保外就医，有的假释，有的复判，都一个个逍遥法外了。当时群众很愤慨，声援会也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一篇驳斥法院判决的意见书。不管你分呈伪中央、伪省府，都如石沉大海。幸事隔两年，邵阳解放，孙佐齐终于遭到人民的审判，明正典刑。

永和金号惨案的审理经过

汪 廉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晚邵阳永和金号惨案发生后，国民党湖南省高等法院邵阳第四分院随即有电报告惨案的一般情况。接着，长沙《晚晚报》也以特号大字报道了同样的消息。当时我任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我以为案子多半是一般江湖流痞惯盗干出来的，除向长沙市警察和交通部门切取联系外，并通知全市各金银首饰店，请他们在兑换金银时注意永和出品。这样仅是配合邵阳方面进行秘密侦查。我做梦也没有设想到这样的惨案竟是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手造成的。不久，纷传专署机要秘书傅德明“嫌疑重大”，又说专署科长白鸿钧、王雪非，视察郭璋，科员宋受璋，会计孙忠瑞以至白鸿钧的老婆和专署士兵都有嫌疑；后来更传说专员孙佐齐是“主谋”。街谈巷议和一些控诉的文件都把这些“秘书”、“科长”、“专员”说成是“官匪”、“强盗”、“凶手”。

随着惨案的发生，邵阳各界组织了声援永和金号惨案委员会；湖南全省金银首饰行业、省商会联合会也都成立了同样的委员会。长沙各有关团体还召集了座谈会。许多地方的江西旅外同乡会也一致声援，除电国民党政府武汉行辕、两湖监察使署等衙门请求彻查法办外，并向各地大发通电、宣言。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报纸都把这一新闻刊在最显要的地位。这时，伪参政会也在南京开会，会上有人就永和惨案问题向内政部长张厉生提出质问；有的参政员说，如果国内得不到解决，只有提交联合国人

权委员会去讨论。同时伪国大也在筹备开场，湖南的那些所谓代表，在长沙组织了一个什么联谊会，他们也说要“为民请命”，也推举代表向各方面陈述意见，说“案不办穿，湖南之耻”。有一次，那些代表中的马续常、陈介石两人在高院指手划脚，说他们要“整饬官常”。这些党棍子的所谓“整饬官常”、“为民请命”等口号，不过是作为达到他们各人的政治目的的一个幌子罢了。因为孙佐齐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在党团斗争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党方趁机抓住永和惨案这个尾巴向团方开火是必然的。但我处身局外，不知个中详情，这里只能顺便提及，以说明处理永和惨案的复杂性和当时司法当局所遭受到的压力。

真声援和假请命闹得满城风雨，舆论的责难有加无已。但邵阳方面除在形式上扣押了傅德明之外，别无其他动静。听说孙佐齐秘密来省，四出活动；建设厅长李毓九因与孙同为三青团骨干分子，想方设法串通省府委员毛炳文等企图把案子压下去，做到所谓“适可而止”。话一传出，舆论大哗。毛炳文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说他“从无‘适可而止’的主张”。官方也通过报纸为孙佐齐辟谣，说孙并未来省和没有来省的必要。当时省主席王东原外出未回，秘书长刘公武虽然派了几个人到邵阳去调查，也没有什么结果。由邵阳调查回来的胡念榆说：“不但在专署势力范围之内不好办事，即使拿到省里来办也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曾先后和刘公武及高等法院院长余觉商量，如何加强邵阳方面的力量的问题。刘主张由省方派人去坐办，但又不好明言要我去的话，因他晓得我是有顾虑的：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党团斗争的漩涡中去。其实我的顾虑还不止此，凡是了解司法界的人们，都知道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一般高级司法人员，是不亲自插手去办案子的，原因是怕办不好，自己没有面子。而我对于永和这样的案子，又有

什么把握呢？

谈到加强邵阳司法人员的力量，事实上已经派出的人不少，但受到的阻力，的确没有减轻。我已经意识到：形势逼人，职责所在，自己不去是不行了的，办不好固然没有面子，不去办又有什么面子呢？于是我决心去邵阳一趟。

动身那天（五月十八日），我刚出大门，传达室送给我一封亲启的信，说是刚才收到的。那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永和问题，是为了报仇，外人无法了解，也干涉不了，我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定要去，他们正准备炸弹来迎接我等语。信的下款是某某等二十七人同启，并有“五月十八日发”字样。信尾又附粘一张纸条，上书：“汪某知趣一点，注意子弹飞进你的脑袋！”但是，我并没有被他们吓倒，仍乘车于当日黄昏到达邵阳。

第二天早晨，高四分院院长钟馥来告诉我，说专署连夜放走了十几起共产党嫌疑案的几十个人，这次一文钱也没要。我说：

“共产党哪有多少钱来赎命呢？”据他说，在孙专员治下，谁有钱谁都有当共产党的资格。我问到傅德明是不是真的押起来了，他说：傅德明虽然押起过，但那不过是移动一下房子，敷衍外面的耳目。他上次才在法院一天，就给孙专员保出去了，以后只是在提审的时候进监狱，审后还不是由他。直到前天，他还用他那“机要秘书”的头衔到处通讯哩！我在长沙时就曾听说傅德明的被押是明押暗不押，这时才证实话不虚传。也了解到邵阳的办案人员不是不能办，而是不敢办。

我到邵阳后，头两天进行了一些侧面暗访，探探风色，并拜访了邵阳各界的代表人物，查对了一些人证物证，才决定二十一日晚提审傅德明。我进行拜访时首先碰到的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武将。我们还没有交换姓名，他劈头就说：“永和的案子绝不是傅德

明干的，实在是‘奸匪’嫁祸。我在这里很清楚……”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六区保安副司令（姓名忘记了，区保安司令由专员孙佐齐兼任）。第二天，这位副司令的话就在报上遭到猛烈的抨击。当我会见邵阳县长徐君虎时，他向我介绍了案子的一般情况和侦查的线索，并表示要办个水落石出。最后，我去找和我在湖北有一度同事关系的孙佐齐。谈到傅德明的案子时，他说：“现在人已在押，并且牵涉到我头上……我在处事方面确也有些疏忽，但总感到傅德明不会这么坏。果真如此，那还了得！你来的正好，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把案子搞清楚的。”在我传讯永和员工时，发现他们个个都是憔悴不堪并带有严重恐惧的神色。我问毒药究竟是谁给吃的？他们一个瞧着一个互使眼色，吞吞吐吐地不敢直说。其中有个叫鄢子和的店员四处张望一下然后问我：“大人如能保障我们的生命，我才敢说。”我肯定地表示负责后，他才涕泪纵横地将傅德明犯案情况说出来。其实，这情况他们已不止一次供称过了的，这次看到我是个新来的人摸不到底细，所以表现得非常疑惧。在我侦查访问的时候，傅德明在狱中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历诉他的冤枉，叫我不要受人蒙蔽。

五月二十日晚，我开始审讯工作了。除被害人等在查对证据时，已经不拘形式地问过一些外，当时是传讯王雪非、宋绥章和专署一个名叫杨钧的士兵，及中德药房的主妇申云英。参加审讯的是地检处首席检察官谢功预和一个纪录。审讯的主要目的是查对证据。经过的曲折不多，除王雪非还在狡辩外，其他的人态度算是老实的。

二十一日晚八时提审傅德明。审讯的地点，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监狱里面预先布置的两间房子里，不但没有摆设公案，连纪录也没有要。审讯的人员只有我和谢功预，及邵阳地方法院院长

陈振球。我们相约饱餐一顿，因一进狱房，不到案子办穿，即准备通宵达旦不休息。这是过去采用过的一种审讯方式，我们把它叫作“疲劳审讯”。在试行过程中，尽量争取速战速决，如果不行，便准备来它一个疲劳轰炸。

傅德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浙江嘉善人，二十八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他的父亲叫傅晋山，是一个小公务员，单单生下这么一个儿子，而且是三代单传。因此，虽然家境不怎么好，对傅德明却视如掌珠，早就养成一种娇生惯养的坏习气。傅最初在一个国民党军事机关当电务员，旋入军委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受训，毕业后仍在军事机关和交通部门干过科员、干事、汽车队长一类的差事。他来邵阳专署是因同王雪非在战干团的同学关系，由王介绍给孙佐齐的。孙派他作特种会报秘书。据傅德明供称，抗日时期，当日寇快打到桂林时候，他在桂林碰上一个名叫曾静薇的华侨小姐。当时难民塞途，搭不到车。傅利用汽车队长职权，把曾的全家送到独山，因而得与曾静薇订婚。抗日胜利后，曾南归香港，傅转徙邵阳，两地相思，急求团聚。因为结婚需钱，才出此下策云云。今天分析起来，这自然是不足信的。

当我把傅德明提出来的时候，陈院长和谢首席是避在另室暗地里配合工作的。傅一进来，看到一个陌生的人在单独接待他，脸上有些惊异的神色。我首先来了一些闲谈，慢慢地才把话头引到惨案上来。起初他仍企图狡赖，经过许多周折，直到夜深才被迫承认了。他将毒劫杀烧等犯罪情况一一供认不讳。我们当即检查他的衣服，还发现三处血迹。最后他供认在永和抢劫的金银藏在专署王雪非房里，并说明放在一叠三口皮箱的最下一口黑皮箱里。我要谢功预接过傅德明交出的皮箱钥匙，看看时间虽已三点，仍决定连夜起赃。我即电话通知各党政机关团体负责人到法

院集合。徐君虎先到，他随即派建治镇镇长吴总权同谢功预到专署将赃物起出，并请永和经理杨振华当面点数包封。孙佐齐迫不得已也只好签字。赃物起到法院即当众开拆，实际不过黄金二十余两，其他现洋珠宝也为数不多（这与当时报纸登载的数目是不符的，也是傅德明等预想不到而大失所望的），比即发交杨振华出据领回。

次晨，邵阳各报发出号外，全城的人都奔相告语：“赃物是在专员公署起出来的啦！”那中毒复活的鄢子和曾送给我一张长长的大白纸，上书：“细看官家真面目，专署原来是匪窝”，说是从专署墙壁上起下来的。邵阳各界并举行集会，讨论对这样的官府如何一致声讨，并约我去讲话。实际上我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并没出多少力气，主要还是广大群众的有力声援和邵阳有关人士辛勤奔走的结果。

大约是五月二十二日，我由沅陵探投一个电报给王东原（他在沅陵一带视察）指出孙佐齐应负的责任，请他处置。听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也因某些人所进行的狗咬狗的活动，不得不决定停止孙佐齐的党权，交湖南监委会查明议处。傅德明在上海的父亲也给法院及他的儿子寄来两封长达数千字的信，力求追究余党，以平民愤。王东原这才下令将孙撤职，并派省府委员毛炳文把他解送法院关起来。不久，全部人犯经判决：傅德明处死刑，孙佐齐、王雪非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白鸿钧及宋绶章、孙忠瑞等分别处有期徒刑十年、五年或六个月。事情至此总算告了一个段落。但邵阳群众的愤怒并没有因此平息，说永和受害太惨，起码也得一命偿一命，损失的全部财产及死者家属的抚恤，要孙佐齐完全负责。原来孙佐齐虽为发纵指使的主犯，但他直到案子快要揭晓时，才在报上刊登启事，表示用人失察，听候处分。群众说他是置身事

外，企图逃避罪责，表示非常愤慨。及见邵阳地方法院检察处第一次起诉书对孙佐齐犯罪部分不置一词，虽然我督飭邵阳司法人员继续侦查，仍只以贪污未遂罪起诉判处徒刑十二年，因而群众的怒潮更不可遏。邵阳各界声援惨案委员会乃以驳复邵阳地方法院检察处起诉书为名，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文告。其中有云：

“当本案未发生之前，本年三月二十日，傅德明、王雪非伪造信件诬陷永和金号店员陈汉章及永福药号少东何键中为奸匪，由孙佐齐发布命令逮捕监禁。旋探悉永和金号经理为田瑞清，孙佐齐复与白鸿钧、傅德明三人讨论（见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二侦讯笔录王雪非口供）改造省府电报，指田为好匪要犯，由孙佐齐手令：①迅即诱捕；②其余人犯一律拘捕；③财产会同镇公所、商会清理等语。并派傅德明于三月二十四日夜間前往该店将田瑞清捕获，随于翌日派傅德明押解进省，禁押于长沙乐陶旅馆，由傅德明施用威吓手段，向田瑞清勒索黄金三百两，终以田瑞清无金交付，乃饰词逮捕错误，予以释放。孙佐齐派傅德明解田回省，既无解文，及傅德明释田而归，又不索阅回批或收据。是孙佐齐与傅德明、王雪非、白鸿钧等朋比为奸，做成圈套以鱼肉市民灼然可见。迨本案发生后，孙佐齐始则代傅德明证明是晚在署并未外出，借图掩饰；继则坚执本案应归专署会同保安司令部主办，以谋回护。法院初次侦讯时，欲将傅德明收押，则由孙佐齐保回。及傅德明入狱后，孙复设计诱使省立六中自首学生李松柏等，供认永和惨案系奸党所为，以图嫁祸于人。两次呈报省府：一则因傅德明经办特种案件，卓著劳绩，请予保障。一则请予以军人身份移转管辖。是孙佐齐与傅德明等始因共谋勒索不遂，而后进一步演出施毒劫财杀人放火之空前巨案。其前之勒索与后之劫杀原系一贯行为，而孙佐齐实居发纵指使之地。乃主办检察官于第一次起诉书，对王雪非仅以贪污未遂起诉；而对孙佐齐犯罪部分不置一词，迨见舆论攻击及湖南高等法院检察官令飭继续侦查，而后由检察官陈善以贪污未遂罪起诉，完全撇开于傅德明所犯盗匪之外。不惟无以纾被害人之愤，抑且不足以服傅德明之心。”

从以上这一段义正辞严的指摘看来，我在内心里也的确感到

对孙佐齐是办得太轻，如果把孙佐齐在邵阳的罪行一案连一案处理，他实在是死有余辜的。但当时司法方面作出这样不够公正的处理，其原因之一是受到外界的压力，其次是拘泥于六法观点，认为永和惨案孙佐齐并没有亲自动手，不能罗织为罪。就我个人来说，所受到的外界压力也相当大，如建设厅长李毓九在一次省府集会当中要我慎重处理，陈诚也写信给我要求法外原情，从轻发落。同时，我也了解到邵阳方面一些人士主要只是想把孙佐齐赶走就算了。因此，我虽然未接受李毓九和陈诚等的意见，实际上我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我自己面子过得去就行了。当时我认为这样复杂的案子，能够揭发出来已算不错了，我已经尽到了检察官应尽的职责；至于邵阳地方法院如何判决，我大可不必多去过问，群众也不会来指责我的，我又何必那样认真呢。后来除傅德明真的枪毙了外，孙佐齐提起上诉，原判十二年徒刑居然撤销了。旧社会的所谓“官常”就是如此。

在傅德明就刑之前，报上登载过两万美金赎夫命的消息。说傅的未婚妻曾静薇准备以两万美金为傅德明买命。当时也的确有人（记不起是谁）问过我是否可以用钱赎罪。我叫他去找王东原。详情究竟如何，我不知道，反正傅德明还是被枪毙了，这里只是顺便提及罢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特务傅德明陷害新化学生案始末

李 惕 乾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湖南省第六区专员孙佐齐指使特务傅德明制造的邵阳永和金号惨案，曾震动全国。但一般人尚少有知道永和惨案发生前不久，傅还曾恶毒地制造过陷害省立六中（设在邵阳）学生（其中有新化籍学生）的冤狱。我当时任新化县长，参与其事。爰就亲历纪述如后。

一九四六年冬，蒋介石公然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相应地加强了蒋管区的特务措施，命令各省、市、县成立所谓党政军警联合会报（简称特种会报），以防范共产党的活动。邵阳为湖南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由专署及邵阳县政府成立了特种会报。专员孙佐齐为当然主席，任命军统特务傅德明为会报专任秘书。傅充当特种会报秘书后，在专员孙佐齐的发纵指使和纵容之下，除了制造永和金号的大惨案以外，在此之前，还干过一系列敲诈勒索、残害人民的罪恶勾当。迫害六中学生不过是这许多案子中的一件。

当时，邵阳专署想夺取省立六中校长的位置。该校校长张干资格很老，是当时教育厅长王凤喈的老师，自恃后援可靠，往往不听专署指挥。专署乃托词电请撤换。教育厅暗示张干辞职，张坚决不肯。孙佐齐与傅德明乃阴谋陷害，企图给张干戴顶红帽子。于是，对六中学生的诬害案便由傅德明一手制造出来了（关于孙、傅要陷害学生借图嫁祸张干的原因，是事后由张的族人告诉

我的)。

一九四七年一月(春节前五六天),傅德明持专署命令来到新化,要我协助他办理一宗“重要案件”。他向我说:省立六中有些学生是共产党,其中有几个重要分子是新化县人,现值寒假,都已回家,要我帮他进行逮捕。我问他有什么证据。他说:“专署已有很多材料,武汉行辕也有令查办”。他并从口袋里拿出一迭文件样的东西在我面前幌了一下,但不让我看,我也不便要看。他又拿出省立六中的学生名册和通讯录,指出高中一年级学生李忍生是首要分子。通讯录上载明李忍生家住新化渡溪乡(离城约二十里)。我觉得案情重大,需要慎重考虑,当答以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新化也成立了特种会报,我是会报的当然主席。按国民党政府规定,这类案件应由特种会报处理,因而需要与参加会报的人商量;但以春节期间,许多人告假回乡,不可能召开特种会报会议,乃邀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张翼文、警察局长袁鹤和特种会报秘书谢骥良等来商。他们都主张积极协助傅德明办理。

第二天,傅德明再来,出示一封由邵阳投寄李忍生的父亲李端佑的挂号信(封面写明由新化某商号转交),说是从新化邮局检查得来的。本来,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已停止检查邮电。因此,他并解释说,他是通过特殊关系才得到邮局文局长(已忘其名)同意检查的,因为文局长也是做这种工作的(意指文也是一个特务)。他抽出那信与我同读。全信不过二三百字,钢笔正楷书写,看来只是一封朋友问候的普通信,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傅德明也装模作样地“细看”这封信,忽然说,他看出了毛病。他指出信上字里行间,夹写着一些小的字体,把那些显然较小的字联系起来读,竟然可以成文。大意是:日前约定事,请极力进行;现已决定不日集中前往老河口会齐,再行北上,行期

确定，另有通知等语。傅德明认为发现了极大的“秘密”，显得十分得意。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案件，也不懂秘密通讯技术，因而更不能分辨真伪，也就相信了他所发现的“证据”。他要我马上行动。我商之县党部书记长张翼文，他也极力主张立即将李忍生父子逮捕。于是由张翼文选派他的亲信萧楚屏带两个武装警察陪同傅德明带来的三个特务星夜驰往渡溪乡，将李忍生及其父亲李端佑和哥哥李和生一并捕到县政府分室看守。傅德明当夜亲自密讯。第二天，我也参加了审讯。李忍生开始不肯承认，经傅德明叫他们父子兄弟对面，并出示其在邮局检查得来的“密信”，使李忍生的父兄也不得不相信这个“铁证”而痛责李忍生。傅乘间又威胁李忍生说：“如果你不承认，就要把你父子三人解送武汉、南京！”李忍生似无以自白，就索纸笔写了一篇后来才知道是虚构的供词。其中承认他在邵阳与共产党刘某联络，开过几次秘密会，商量过组织青年，领用枪支，准备暗杀国民党要人，再行北上参加新四军；并说明参加他们这个组织的共有十三人，都是省立六中的同学，除他自己外，写出了其余十二人的姓名。傅德明拿出省立六中同学录对照，知道其中有八九人是新化人。于是，他要我即时派人分途下乡，按各人家庭住址进行逮捕，并嘱随解邵阳。他自己带着随从先行返邵，沿途拘捕三人逐自带往邵阳，并连电催解其他数人。我命令警察局去拘捕的五个人，其中李某一人不在家，余四人拘来，连同李忍生都看守在县政府（李忍生的父兄在李屈招后随即释放）。他们开始都不承认参加李忍生所说的活动，经令李忍生面质，李不反供，并劝说他们承认算了。除谢原耀一人坚决否认外，其余三人都写了同样的自白。张翼文曾要求将谢原耀交给他们审讯，意在用刑逼供，我拒绝了。

我当时对傅德明所造证据既不辨真假，加以李忍生又自供不

讳，故对案情深信不疑。但认为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不懂世故，而且并无犯罪的具体行动，颇有心为之开脱，以为他们能坦白承认，问题大概较易解决；对于谢原耀坚不承认，我且担心他将来要吃大亏。因迫于上令，不能擅自作主，春节过后，只得将他们送往邵阳。临行前日，我和他们作了一次长谈，并当面写了一封长信由李忍生带去交给专员孙佐齐，大意是说他们都是天真青年，一时失误，请迅即从宽处理，让他们即时复学。随后，我又拍了电报给孙佐齐催请释放。闻学生家长也曾托人奔走援救。过了半个月，看到报载李忍生等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自白，除新化被捕的八人及邵阳、武冈被捕的四人外，连新化没有捕到的李某也列名在内。案结后，李忍生回到新化见我。因家庭困难不能复学，由我安置在新化简易师范读书。

一九四七年五月，邵阳永和金号惨案爆发，傅德明入狱，因而新化迫害学生一案也被揭发。李忍生跑来见我，哭诉冤枉。我才知道此案完全出于孙佐齐、傅德明一手虚构陷害。原来，李忍生他们根本没有与共产党人有过联系，傅德明来新化逮捕他们以前，就在邵阳伪造密信邮寄新化，到新化后，去邮局取来，作为陷害李忍生等的唯一“证据”。当李忍生被捕到县政府的那天晚上，傅德明独自进行密讯时，曾用手枪威逼李忍生承认参加共产党活动，并出示一张共犯名单。李忍生看出连他自己共有十六七人，都是六中的同学，他当时坚不承认。第二天看到他的父兄也被捕了（他们是同时在两处被捕的），在威胁之下，又怕连累父兄，才不得不顺着傅德明的意思写出一篇自白。他不能完全记忆傅德明所造名单的全部姓名，所以只写了十三个人。这些经过，我当时被傅德明蒙在鼓里。李端佑也对傅德明的伪造密信深信不疑，所以责令李忍生供认。李平白受诬，无以自白，又深恐连累

父兄，只得诬服。他的父亲颇信我之为人，再三叮咛李忍生听我的话，一定可以救他出险，他也就依靠我替他开脱。以后相处几天，虽然也谈得很好，但他始终不敢向我反供。而我呢，以为他们事实上既然已经做“错”了，不如照实陈述，以求得从宽发落。因此，我总是劝慰他们，要他们尽管照实陈述，答应尽力帮助开脱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李忍生为求得早些结案，不仅自己不反供，并且劝说其他的人写出同样的自白。据说，谢原耀后来在邵阳还是被迫承认了。我明白真相之后，支持李忍生到邵阳去控诉，我也随即写信向邵阳地方法院陈述经过，证实傅德明的罪行，并承担自己的责任。孙、傅阴谋陷害六中校长，不料目的未达，已因另案先后入狱了。

我在蒋介石的反共军事“围剿” 中倡议碉堡政策的始末

戴 岳

一九二九年夏，蒋介石在解决了武汉方面第四集团军桂系部队之后，湘鄂赣三省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得到了暂时的稳定局面，于是，又发动了对红军的“围剿”。这时，我任国民党陆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旅长兼鄂南绥靖主任，奉命率部由咸宁调往赣北武宁、修水等县防堵红军，并兼任浔湖军警督察处长，负责维护九江、湖口一带的水陆交通线，旅部驻九江。当时鄂赣边只有红军一个小的部队，与我旅驻修、武地区的黄锺团间有小规模接触。

编者按：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蒋介石在其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围剿”中实行碉堡政策的作用时指出：“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的军事原则（九）产生的过程。”

（注九）“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地是指蒋介石匪帮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

本文为作者就他在蒋介石的反共军事“围剿”中倡议碉堡政策的始末所写的一个简要回忆。

九江则只有少数共产党员从事地下活动，还没有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我对当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不很了然，脑子里模糊地认为红军力量很弱，只能打打游击战，至与国民党军队正式交锋，则是不堪一击的。

是年冬，我旅又奉调赴赣东北“进剿”方志敏领导的红军独立团。

早于一九二七年，赣东的弋阳、横峰两县就已在以方志敏、邵式平为首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揭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到一九二九年，以这两个县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心，整个赣东北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曾先后挫败了王均第七师韦杵旅和谭道源第五十师成光耀旅的多次进攻，在余江、贵谿、弋阳、横峰、上饶、德兴、乐平、万年等县间约四十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红军也由原来的几个连扩大为千多人的独立团。红军主力和革命根据地虽僻处贵谿、弋阳、横峰和乐平之间的周坊、漆工镇等地，武器装备也很差，但他们在革命的基本群众的支持下，充分发挥了革命游击战的各种特点和优点，给国民党进攻部队造成很大的困难，使国民党反动派的迭次围剿都归失败。我在进驻赣东北之后，对这些情况逐步有所了解时，原认为红军不堪一击的想法也开始有点动摇了。

一九二九年冬，我参加了鲁涤平在南昌召开的全省清剿会议。会上，有些人从单纯军事观点着眼，认为红军处于绝对劣势，主张积极“进剿”。但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在赣兵力有限，红军在兵员、武器装备、战斗训练等方面虽居劣势，但在整个江西省，红军力量正在普遍地发展，因而主张应以防为主，相机逐步“进剿”。第九师师长金汉鼎在会上也持同样的见解；他并提到清政府在云南、贵州等地镇压土著民族的反抗时，土著民族曾依靠建碉守卡

的办法予清军以重大打击，后来清军也是采用这个办法，最后征服了土著民族的顽强抵抗。因而主张对红军的进剿也可仿效这个办法，借以巩固“进剿”部队的阵地，并进而逐步缩小苏区，最后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金汉鼎的这番议论，颇引起出席会议人员的重视。会后，江西省政府军事办公厅主任谢慕韩与我谈及“清剿”问题，也谈到清政府在湘西镇压苗族时，苗族人民也曾利用碉卡对抗清军，后来傅鼎反过来也采用建碉守卡、步步为营的办法打败了苗族人民的反抗，他认为金汉鼎的意见可以采用。他们这些议论，使我回忆起一九二三年我参加援粤战役时的一段亲身经历：那年冬天，方本仁、邓如琢响应陈炯明围攻广州的反革命叛乱，由赣南出动攻占粤北南雄、始兴，进逼韶关。建国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奉孙中山先生命率军援粤，攻打方、邓。我随军过水南，见沿途居民多聚居碉堡内，拥枪自卫。我们向他们购买食物时，他们用藤篮传递钱物，坚不肯开门出碉，过往军队都感到无可如何。吴剑学的部队当时过小北江也曾遇到同样情况：吴部士兵强令居民出碉交易，最后弄到双方开枪射击，吴军受到不小损失，终未买到一点食物。一九二六年我在粤北进剿土匪黄细苟部时，黄部也利用碉堡、木栅防御，阻我军接近。碉堡的作用，竟有如此之大。这些回忆给我很大的启发：过去王均、谭道源部之所以受挫于红军，重要原因之一是兵力有限，而红军则凭借与革命群众的紧密联系，声东击西，神出鬼没，致王、谭部队处处被动，疲于奔命，终至劳而无功。现在这份苦差事又落到我头上来了，我旅实际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对于清剿赣东北十三个县的红军的任务，实在难以胜任。如于红军主力活动地区实行建碉守卡，将可对重要据点和交通要道作有效的控制，从而使有限的兵力得以灵活运用，打破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是我在鲁涤平召开的“清剿”会议结束后对建碉问题的一些最初考虑。

金汉鼎在会议上提出建碉的意见，当时虽曾引起很多人的重视，认为不失为有效办法；但大家感到在部队调动频繁的情况下，在时间、人力、物力等方面问题颇多，困难甚大，因而多不愿贸然实行；会议对此也未作出明确决定。鲁涤平当时曾就此事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但也未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尽管这样，我自己还是决意先在赣东一试。

紧接着这次会议之后，一九三〇年春，我到贵谿督率所部及各县警察队发起对红军的进攻，由余江、贵谿、弋阳、德兴、乐平、万年等县对红军实行包围。我旅由弋阳进攻的一〇三团周兰芝营行抵弋阳城北二十余里的芳墩时，突然遭遇红军大部来攻。红军来势凶猛，激战半日，周营伤亡颇重，几不能支。适该团第三营闻讯赶到，同时一〇四团有两个营由乐平、德兴出击，攻占了周坊、漆工镇等重要据点，红军乃全部经横峰由弋阳、上饶之间向闽边崇安转移。我部虽攻占了苏区、赶走了红军主力部队，但苏区群众实行空室清野，使我部粮食供应感到极大困难；欲进行追击搜索，又苦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任何帮助，耳目失灵，根本找不到红军目标，我只得将部队撤回原防。随即召集团营长会商今后“清剿”办法，决定实行建碉：在苏区外围选择冲要地点修筑碉堡，以求先立住脚跟，再步步为营，向前推进，逐步缩紧对苏区的包围，缩小苏区；同时加强反共的政治攻势，以削弱红军同群众的联系，召回外逃居民予以组织，厉行清乡，再行设法对红军进行围攻。

我首先派一〇三团第三营进驻贵谿之夏家岭。因该地邻近苏区，位当冲要，令该营选择适当位置，建筑碉堡。兴工之前，我偕同主任参谋练光枢亲赴该地踏勘，绘图立说，指示建筑方法。

碉堡系一丈四尺见方，计三层，用红石砌成（碉堡就建在红石山上），四面开有枪眼，并有侧防设备。碉堡四周环筑矮墙，也开有枪眼。墙内搭盖棚厂，作附近居民集中住宿之用。碉堡内有充分的粮食柴水储备。修建工程费时近一月始完成。碉堡建成后，我令以一排人驻守（有时只留兵一班）。因碉堡所在地势较高，四周开展，本身结构也很牢固，红军曾多次围攻，均以无法接近而撤围退去。其后，我令余江、弋阳两县照样广建碉堡，也同样对攻守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经过这次实施，我进一步加强了对碉堡政策的信心。

这年十二月，十八师奉令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一昼夜间，我旅与王捷俊旅及师直属部队一万人全归复没，张辉瓒本人被俘，我自己则仅以身免。我以漏网之鱼，得庆生还，息影南昌，本不应存非分之想，但终有些不甘寂寞，妄图再起。时蒋介石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正在筹划第二次“围剿”，以孙连仲部各师初次入赣，情况不熟悉，特示意鲁涤平，叫我写点对红军作战的经验，以供新入赣部队参考。我当即抓住这个机会，花了两天的时间，采用问答方式写成题为《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的意见书（以下简称为《意见书》），替何应钦出谋献策。

这个《意见书》共五部分、二十八条：（一）一般问题的论述，主要是我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无时不以“剿共”为急务，各地军队也无日不在进行“清剿”，但何以红军至今仍未被消灭、反而日益壮大这一问题的解答；（二）我对苏区情况及共产党和红军组织动员群众的方式方法的所谓“知己知彼”的介绍；（三）“清剿”红军的方法；（四）“进剿”部队应注意的事项；（五）苏区收复后的善后办法。其内容，除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进行恶毒诬蔑毁谤的一般反共滥调之外，有一部分也反映出严酷的现实迫使我

不能不改变前此对红军的估计。如当试图解答红军“何以至今未被肃清，反而愈肆猖獗”的问题时，我不能不说是由于“县长不得力而贪污，警察纪律不好，到处扰民，地方豪劣剥削压迫，使人民受冤受屈，发生反感，以致挺而走险”，以及“农村经济破产，手工工人失业，人民生计困难，以致贫民从者日众。”我当时不能不承认同国民党军队交锋的对手，既非历史上的“流寇”可比，也非一般的封建军阀部队可比，而是同广大工农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战略战术极为高明巧妙的武装力量。当谈到革命根据地共产党的领导、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时，我不能不承认其联系之紧密有如铜墙铁壁，致国民党“围剿”部队进入苏区时有如置身“敌国”。由于这种种原因，在战略上本来处于强者地位的国民党进剿部队反而在每一个战役中变成了弱者，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剿”反而变成了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围歼了。因此，我感到国民党军队必须放弃过去依仗自己的各种优势轻视红军的思想，改变为重视红军，采用不同于一般军事原则的新的战略战术，在战略上取攻势，在战术上取守势。我在《意见书》中谈到“进剿”红军的办法时，提出不能单靠军事取胜，必须党、政、军、民通力合作，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加强协作，共同发挥战斗力；必须建立和加强地方团队武装，紧密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以减轻正规部队的负担；必须厉行清乡、以彻底破坏工农革命组织，孤立红军；国民党“进剿”部队应分为堵击部队和追击部队两种，分区进行“清剿”以及严密封锁苏区等政策措施。

除上述各点之外，我在《意见书》中还强调提出了碉堡政策的重要作用。什么叫做碉堡政策呢？我在《意见书》中写道：“凡重要的地点，不能不驻兵，而又无多兵可分派，就选择一个良好的地势，用石砌成碉堡，使少数兵守之；并督率附近各村组织联村自卫，

使良民或反共的民众得到相当的保障，坚决的反共。”关于碉堡政策的作用，我认为主要是“能以少数的兵力保守一方，使红军不能击破，并能以少数的部队击溃多数的红军，同时可以阻绝红军的交通和活动，逐渐把苏区缩小”。我倡议碉堡政策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解决当时国民党“进剿”部队兵力有限而红军的活动日益扩大的矛盾，使国民党“进剿”部队的有限兵力得以灵活运用，将过去需要重兵死守的据点变成便于机动“进剿”的活点，以静制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严密封锁苏区，加强对红军的包围进攻，以达到逐步缩小苏区、最后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目的。当时，我认为这样一来，在蒋介石的反共军事“围剿”中成为一大问题的消极防御与积极进攻的矛盾也可得到解决，因为实行碉堡政策，在消极方面，可以有效地巩固白区，国民党“进剿”部队也可借此保全自己的实力，稳定士气；积极方面，可以有效地封锁苏区，逐步缩小苏区。因此，我把碉堡政策作为实施反共的新军事原则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把这份意见书送给何应钦，果然得到了他的赏识。他看了这个《意见书》之后，认为我这个人还有可用之处，除拨给我两千名新兵，委我以第四挺进军指挥的名义（后改为独立第三十六旅）率部开往赣东，担负堵截红军的任务外，同时将这《意见书》印成小册子，大量发给在赣部队的各级官佐。他在给这小册子写的序言中说：“此书乃戴旅长岳本其平日‘剿匪’清乡之经验汇集而成，知己知彼，洞中窍要，可作‘剿匪’部队之参考。我党政军各界同志，允宜人手一册，细心研究，应时运用，于‘剿匪’前途，当大有裨益。”何应钦当日对我的反共献策所作的这番推荐，今天已成了我个人历史罪恶的见证；但在当时，他这番表扬却使我感到踌躇满志，因为它是对我几年的“汗马功劳”的一个鉴定，也正是

凭着这个鉴定，我在龙冈惨败后不甘寂寞的妄念才得到暂时的满足。今日兴念及此，实感到无限的愧恨。

一九三一年夏，我又带着新成立的部队（独立第三十六旅）重回赣东北。这时，赣东北的红军有了更大的发展，革命根据地也更加扩大了；而我旅又全属新兵，亟待整训。因此，我于部队开抵贵谿、弋阳后，即将主要力量放在整训部队和保卫信江流域各城镇的安全方面（驻上饶、弋阳的徐庭瑶第四师所属汤恩伯旅也归我指挥）。这期间，我部与红军虽不时有小规模接触，但就整个来说，我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根本无力谈到进剿。在防守方面唯一的办法，是积极施行碉堡政策，令驻军及辖区各县府大事修筑碉堡。不到一年的时间，信江北岸，碉堡林立，大者可容数百人，小的也可住三四十人。初时邻县仿效，继而闽、浙诸省亦陆续推行。浙江省保安处在与我防区邻近的江山、常山、开化等县，派专员日夜督工赶修，建立的碉堡最多。时我旅鲁渭平团在高石建碉，遇到红军围攻，我派朱声应营前往增援（时碉堡尚未建成），中途遇红军截击，因红军消息灵通，预伏以待，致遭受牺牲不小。事后我深责朱营不沿信江北岸借夏家岭碉堡掩护，致有此失。是年五月，朱德总司令领导的中央红军一部越抚州到金谿附近与方、邵红十军取联系时，余江、贵谿诸县异常震恐。我时在贵谿，守兵仅一排，所恃者贵谿县城四周建有碉堡。万一红军来攻，我可依靠这点有限兵力据碉顽抗，并临时组织壮丁队日夜登城巡防，以虚张声势。我表面装做很镇静，实则无日不在惊惶恐慌中。

国民党军队入赣“围剿”，初以为红军不过“乌合之众”，人少枪杂，弹药缺乏，训练也差，不堪一击；自唐云山旅复灭于吉水，张辉瓒师被歼于龙冈，孙连仲各师惨败于赣南，五千人、一万人

以至几万人都被吃掉，至此始承认红军力量强大，战术巧妙，乃一反过去之盲目轻敌而畏之如虎，不敢与红军交锋。我记得当第十八师被歼时，孙连仲所部增援入赣，见了十八师被缴械的官兵，多加以嘲笑，说：“你们送了一万枝枪，连收条都没有得到！”后来，孙连仲五个师被歼，他部官兵见到孙部被释放回来的官兵也讥讽地问：“你们送了几万枝枪，是否得到了收条？”从此以后，国民党部队一谈到“围剿”，无不谈虎色变。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他们多图建碉自固（我所写的那个小册子，在第二次“围剿”时随孙连仲部的被歼落入红军手中，红军领导方面曾逐条予以批驳。有人将批驳原件送给我看过。原件为油印本，批驳文字印的红色。当时有人对我说：红军的批驳不是强辞夺理，而是义正辞严。我虽未置可否，但内心颇以为然。所惜对原件内容已不能记忆了）。

随着碉堡政策的被蒋介石广泛推行，湘、鄂、赣、浙、闽各省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更是不顾人民死活，派工派捐，遍筑碉堡，并辅以公路政策（即广修公路，将碉堡连贯起来，形成密网），妄图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布下天罗地网。不少国民党军政官员，为了逞狠称能，在碉堡的修建上也是花样竞出。如一九三二年我旅被调往浙江衢州担任警备任务时，为了防堵红军进入浙境，我除令各县在原有基础上大事增建碉堡之外，又在接近赣东北地区的开化县白沙关采用兵工政策修建一个可容千人的大碉堡，以为长久驻防之计。这个计划因规模过大，工程未半，我又被调往江西，才中途停顿下来。

在国民党部队中还出现过互争建碉首功的丑事。一九三三年我由福建泰宁到江西吉安，曾在李云杰第二十六军军部小住几天。某日，我与随员吴曼（系第四十六师军法处长。这时我已任第四十六师师长。）同李云杰及其参谋长黄启东等一起闲谈，吴曼大谈

我在赣东推行碉堡政策的成效，黄听了颇不以为然，谓建碉是李军长创始的，他在湘、鄂、赣各省建立了不少的碉堡，目前在吉安就筑了三十多个，至于建立木栅则是你们师长的特长云云。吴曼欲与之争辩，经我示之以目，他才没有说话。我说：“李军长是学工兵的，建筑防御工事是其专长，他每次作战，辄先示之以弱，诱敌来攻，他自己则利用地形，建筑碉堡，借以加强力量，故每能以较小的牺牲获致胜利，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经我这样一说，这场丑表功的争论才得平息。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沅陵任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有一次陈诚由恩施到沅陵，见到我时，对我说：“你的碉堡政策对‘剿共’起过很大的作用。第五次‘围剿’时，我们就是凭着这个碉堡政策，加上公路政策而取得胜利的。”他还说：“碉堡政策不但对‘剿共’起过很大的作用，现在对抗战也很有用。”陈诚这番议论颇能反映当时参加反共战争的国民党将领对碉堡政策的估价。这班反共将军们都是不可救药的唯武器论者，过去曾依仗自己的武器优势而轻视红军，这种优势论破产之后，又崇拜起碉堡来了。

不可否认，在一定时期内，国民党反动派确曾利用碉堡政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凭着他们暂时持有的军事优势，对红军和整个革命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暂时的困难。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碉堡并不是什么有效的法宝，它丝毫挽救不了蒋介石匪帮崩溃的命运；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终于突破了国民党的成千上万个碉堡的重重封锁，胜利地实现了长征，从而开拓了全国革命的新局面。这是当初乞灵于碉堡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根本没有料到的。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

何 汉 文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人民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统治和剥削，发动了英勇的武装起义。从二月二十八日继续到三月十六日，起义的范围及于全省各县、市，最后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血腥屠杀所镇压下去。当起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采取镇压与欺骗的两手作法，一方面调遣大军赴台镇压（关于当时蒋政府对起义者进行军事镇压的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载有何聘儒先生所撰《蒋军镇压台湾人民纪实》一文有较详实的叙述），同时还先后派遣白崇禧、蒋经国赴台“宣慰”，并由监察院派监察委员何汉文赴台会同台湾监察使杨亮功“彻查”此次事件。当时，蒋介石派白崇禧去台湾，名为“宣慰”，其真实目的是布置对台湾人民进一步的镇压。派蒋经国去台的目的，是因为他和当时台湾的进步分子谢雪红等有留苏同学的关系，企图凭此对谢等进行个人拉拢。但是，他在台湾只呆了几天就走了，个人拉拢活动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至于派我去台，也不过是蒋介石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和当时台湾局势的严重，叫我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会同杨亮功到全省“巡察”一番，“彻查”这次事件发生的行政责任，借此掩盖蒋政府的残酷统治对激起事变的直接责任，欺骗台湾人民，收拾人心而已。

我是三月二十二日由上海坐飞机到台湾的。当时，各地的起义斗争已被蒋军镇压下去了，我没有看到起义者的实际斗争情况。

我到台湾后，为了“彻查”事变真相，曾到全省各县、市与各有关方面作过一些接触，对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及其经过情形曾有较全面的了解，现追记其梗概如后。

蒋介石为什么派陈仪统治台湾

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夺取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迫不及待地在全国沦陷区划为十五个受降区，派出军政大员，分赴各地进行“受降”和“接收”工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当时，台、澎是在美军控制之下，国民党反动政府即倚仗美帝国主义的庇护，将它们单独划为一个“受降区”，任命陈仪为“受降”主官，委以台湾、澎湖的“受降”和“接收”大权。陈仪于八月二十九日赴台“受降”后，随即着手“接收”台湾的工作。不久，蒋介石又根据陈仪的建议，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任命他为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于是，陈仪便成了台湾的主宰者。

日本帝国主义在其统治台湾五十年的后一阶段，为了把台湾作为南进的据点，对台湾的工业、电力、农业、水利、交通、港湾等曾积极经营，并已具有相当的建设规模。同时，台湾的经济资源，如大米、蔗糖、樟脑、烧碱等出产都极为丰富。所以，当日本投降后，内地的官僚资本立即把台湾当作一块肥肉，竞图攫取；国民党内各派系间想乘机抢夺“接收”台湾这一美差的则更是大有人在。但是，蒋介石却把这分差事派给了陈仪。其中原因，主要是：一、蒋介石和陈仪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对陈仪的军事学识、行政才干和思想作风一向契重，陈仪在历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福建省政府主席、陆大教育长和陆大代校长等职期

间，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二、陈仪留日多年，对日本各方面的情况较为熟悉，在他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期间，还曾去台湾考察过，对台湾情况也有较多的了解；三、陈仪统治福建多年，有一个较齐全的统治班底，和福建统治集团中的部分人士有较密切的联系，而台湾人民，除高山族外，绝大多数都是原籍闽南漳州、厦门、泉州一带的人，这些对陈仪的统治台湾都属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因为他在蒋介石心目中具有以上一些优越条件，所以蒋介石早在一九四三年开罗会议决定了台湾的归属后，为了准备将来接管台湾，特在重庆中训团内举办了一个台湾干部训练班，即以陈仪兼班主任，由他挑选了一批福建、广东籍的官员和厦门大学、集美学校的青年学生入班受训；他们就是后来跟陈仪到台湾搞“接收”工作的主要力量。所以，蒋介石之选派陈仪为台湾的“受降”主官、台湾“接收”的主持者和台湾行政长官，可以说是早在两年以前便已经内定了的。

蒋介石为了使新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独占的“禁脔”和反动统治的一块新基地，他在派遣陈仪去台湾时，曾规定了两项统治台湾的基本政策：第一，为防止台湾人民的反抗，实行政治建制的特殊化和政治、军事的绝对独裁统治；第二，为使台湾不受内地经济崩溃危机的影响，以保证四大家族在这块新基地上的恣意榨取，实行台湾经济建制的特殊化，实施统制经济和与内地隔离的政策。陈仪“接收”台湾以后的一切行政措施，都是完全秉承着蒋介石这种基本政策的指示进行的。所以，当我和杨亮功在台湾“检查”他的治台措施的得失时，他很傲慢地对我们说：“人家攻击我在台湾不该实行政治建制和经济建制的特殊化，其实这是主席（按：指蒋介石）交代我的两项根本政策，非如此，不足以安定这块新回祖国的领土，不能防止它免于国内时

局动荡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假使不是断然这样作，恐怕台湾早已成为东北第二，不止是今天这一点小乱子了。”

变相的总督——台湾行政长官

台湾在清代本为我国的一个行省，自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后，日本统治者为适应其殖民统治的需要，其统治台湾的政治体制一直采用总督制度；其台湾总督总揽台湾地区的军政大权，是具有无上威权的主宰者，对台湾人民操有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光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对台湾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也全部承袭了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的方式来“君临”台湾人民。以此，台湾虽名义上被列在一般行省之列，在政治体制上却连内地行省通行的委员会制都不采用，而实行赤裸裸的法西斯个人独裁体制——行政长官公署制，设置行政长官；规定行政长官“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布署令，并得制定台湾省单行法规”，“必要时得设专管机关或委员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第二、第三条）。同时设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由行政长官兼任警备总司令。这样，台湾全省的军政大权尽操于蒋介石政权的代理人陈仪一人之手，长官公署以下的全部统治机构，也大都承袭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总督府的规模，台湾人民又陷于完全无权的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五十年，由其历任总督发布的法令共达五千多种；但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其所颁布的单行法令、规章之繁多更超过了日本殖民统治年代。不但是法令纷繁至极，而且许多法令是朝令夕改，使台湾人民经常处于无所适从和动辄得咎的威胁中。

由于行政长官公署的组织机构及其活动方式完全承袭了日本殖民统治时代总督府的一套，加上陈仪个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

专断独裁作风，在台湾人民看来，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台湾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与过去日本殖民者实一般无二；而陈仪手下爪牙的贪污狠毒也与日本殖民统治时不相上下。当时在台北学校中流行的一首诗说：“总督威风受不了，长官凶焰更难当。除去豺狼来虎豹，脱离地狱跳火坑。颠沛未曾忘祖国，流离何处找中央？哀哀千万倒悬子，何日云开见太阳！”这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暴统治的痛恨。

行政长官的爪牙和台籍人员

陈仪奉派去“接收”和统治台湾，是以他前所统治福建的老班底和台湾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作他的基本队伍的；其中，他统治福建时期的老班底尤被倚为长官公署的核心骨干。如秘书长葛敬恩、夏涛声，人事室主任张国键、民政处长周一鹗、教育处长赵乃传、财政处长张延哲、农林处长赵连芳、工业处长包可永、交通处长徐学禹(先)、严家淦(后)、警务处长胡福相、粮食局长吴长涛、专卖局长伍维钧(先)、陈鹤声(后)、贸易公司总经理于百溪等都是陈仪的老班底人物，他们都是由陈仪培养提拔而为他亲信倚重的爪牙。他们到台湾后，分据长官公署各要津，把各部门的工作搞得乌烟瘴气，陈仪对他们还是多方曲护，深信不疑。据说，在二二八事变爆发后，陈仪了解到一些其部下平日贪污狠毒、激成事变的事实以后，在召集长官公署各主管会议席上痛哭流涕地说：“主席把台湾交给我，而你们平日瞒上欺下，把局面搞成这样糟，你们如何对得起我！更如何对得起主席！”这话至少反映出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台湾人民予取予夺的凶残狠毒，一经败露之后，连陈仪自己也大为吃惊。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长官公署的顾问沈铭训（号仲九）。他是陈仪的内兄，为人富于机谋，一向受到陈仪

的尊重和信任。陈仪统治台湾的一切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措施，大都出于他的幕后策划设计。当时陈仪发布一个“台湾建设五年计划”，就是由沈主稿制定的。所以，陈仪在台湾弄到这样一个下场，固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残暴统治和搜刮所引起，而沈铭训种种倒行逆施的策划，以辅佐陈仪去百般迎合蒋介石的意旨，也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台湾的一切重要公职完全由日本人所霸占。光复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名义上使台湾人参加了政权，据陈仪说：“按一九四六年十月统计，全省四万四千四百多公职人员中，有台籍人员三万八千二百多名。但实际上，台籍公职人员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委任和雇员级的低级职员，简任和荐任级的中、高级职务几乎全为国民党反动政府从内地派出的官员所垄断。十七个县、市长，除台北市长为台籍黄朝琴之外，其余都是蒋介石派出的内地人担任。并且，在担任低级公职的台籍人员中，还有许多是蒋介石政府别有用心地选用的日本人冒充的（详下）。在薪给待遇方面，蒋介石政府对台籍人员与内地人员间也采取歧视政策，对台籍人员都是以台币为工资标准，而对派出的内地人员，除了给予安家费和各种照顾补贴之外，还另给以实物或法币的工资补贴。因此，即使属于同一级的公职人员，也因台籍与外省籍的不同，其待遇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些被派赴台工作的外省人，在工作能力和作风方面，又大多是贪污无能。他们去台湾，大都原就抱着极浓厚的升官发财的心情和目的，加以他们多数对台湾人民以征服者自居，到了台湾后，处处摆出“赏穿黄马褂”的身份，鄙视台湾人民。他们也同蒋介石一个腔说：“台湾人没有政治人才”，“台湾人受了日本五十年的奴化教育，要收到重新教育的效果，至少得经二十年的‘训政’才行。”因此，在他们与台籍公职人员

之间，已无形中形成了一条对立不和的鸿沟，进而在一般台湾群众中也逐渐产生了对一切外省人的普遍怀疑、不满、甚而仇视的心理，以致“你们中国人，我们台湾人”这类话也逐渐成了各界群众中流行的口语。

陈仪为了迎合蒋介石使台湾特殊化的意旨，甚至不择手段地幻想利用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残余力量，以加强他的统治爪牙。他在“接收”台湾以后，以处理日本俘虏为名，设立日俘管理处，由周梦麟任处长（周原为陈任福建省主席时的平和县县长）。据周说：当时陈曾秘密留下许多日本人，冒充台籍，被分别安置在警务、工矿企业和地方行政等工作岗位上；这班日本人无论在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方面，陈仪认为均具有“驾轻就熟”的优点，因而也被他引为统治台湾的有力爪牙。这类被安置在各项公职中的冒称台籍的日本人，全省共有万人以上。其次，在日本投降以后，由海南岛和南洋各地日军中集中的台籍官兵共有四万多人，他们大都深中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毒素，陈仪竟也同样不择手段地想利用他们作为他统治台湾的驯服工具，当他们被遣返回台后，都被分派各县、市，担任基层工作。陈仪的这种措施，结果是搬了石头打自己的脚。这两种人被陈仪安排到各地方工作后，逐渐和过去各地方的“皇民奉公会”、“台湾青少年团”、“台湾产业奉公会”、“奉公壮年团”、“实践推进队”等反动、黑帮组织分子^①自然地串通一气，在台东、花莲、台中、彰化各地结成反动的秘密组织，利用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残暴统治的正当不满情绪，把持地方，压迫善良的人民，利用台湾局势，大肆宣传“皇军比中央军好”、“总督比长官好”、“皇军顶多在十年以后将再回台湾”等以挑拨台湾人民与祖国的关系，主张“台湾独立”、“台湾托管”，和受美帝国主义豢养的政治僵尸廖文毅卖国集团相呼应，下压人

民，上欺政府。他们在二二八起义爆发后，一开始就别有用心地想利用机会，扩大势力，在起义中兴起一股极端反动的逆流，把台湾局势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便引进美帝国主义的干涉，进而实现他们使台湾脱离祖国的罪恶阴谋。美帝国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早已乘台湾处于“真空”状态的有利时机，从各方面安上了它的侵略据点，这些乘机复活的黑帮反动分子正是它楔入其侵略势力的理想工具；因此，美帝国主义设置在台湾的各种侵略组织机构也无不和他们搭上密切的关系。从台湾的美国领事馆和美帝各种驻台机构到廖文毅的“台湾民族独立党”——台籍日人——日军台籍军人——地方反动黑帮分子之间构成一条黑线。而这条黑线的后半部分又得到蒋介石反动政府和陈仪的庇护，所以，他们在台湾各地更可以肆无忌惮地活动。

“接收财物，不接收人心”

陈仪到台湾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以“接收”之名，大肆劫搜台湾人民的财物。他除在各县市成立“接收委员会”接管日本在台湾的一切政治、经济、军警、文教卫生和交通等部门的行政事业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将日本殖民者榨取台湾人民血汗所长期经营起来的工矿、农林、商业企业和一切基本建设全部劫搜过来。过去日本在台湾农林方面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都是公有，工、商、交通、电力企业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系公营和几家日本大垄断资本所控制。现在，这一大宗资产，全由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和长官公署分赃垄断。当时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台湾全省的电力、钢铁、煤炭、重要矿产、水泥、糖业、造纸等大企业组织十大公司垄断经营；在一九四六年中，单以糖、煤两项而论，资源委员会就用一、三〇〇元一吨的最低价格掠取了台煤四千万吨，完全

无偿地掠夺了台糖十五万吨。其他农林、水利、交通企业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则归长官公署所占有。陈仪还在各县、市设立“日产处理委员会”，将全部日产都归长官公署处理标卖。这个组织在各地更是无恶不作，许多属于台湾人民私人的产业也被它不分皂白地没收处理；反之，许多真正的日产却又在它和地方恶势力串通下，变成了个人私产。在处理日产时，名义上是公开标卖，实际上却是由内地官僚资本家和长官公署以下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伙同私下分赃。因为当时大陆上的政治局势正逐渐紧张，许多官僚资本已经感到内地的不安全，及“接收”台湾之后，都视台湾为乐土。因此。这时台湾各地的许多大企业、大商店、大厂房、大住宅都被有实力背景而能在标卖中直接插手的人，以极便宜的价格抢买去了。有些手长的，甚至还买到整街、整町若干栋铺店住宅，连房屋内的生产设备、生活用品都归他们所占有。许多在标卖中无法直接插手的人，便辗转请托，以黄金美钞高价购买，为将来退步之准备。记得我由上海动身去台之前，便有几个中小银行资本家托我设法替他们在台湾购买房产。在二二八前，所有各重要城市的日产就这样被抢购光了。原来抢购得多的人，转手之间，除掉自己已在台湾有了阔绰的房产之外，还获得千百倍的暴利。许多国民党的军政头目赤手空拳到台湾，很快变成了阔人。如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以CC关系到台不久，便在台北市买到了最阔绰的住宅，家里汽车、电气冰箱、钢琴等都很齐全。据他说，他还替内地的许多朋友买了好几栋房子。国民党的官员们为了抢夺这种“接收”财，相互间发生许多纠葛、控告。据杨亮功告诉我，当时台湾监察使署收到的检举控诉案件，就以接收日产、标卖日产、勾结贪污舞弊和人民产业被官方抢夺的案件最多。台湾人民不但眼看着这班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官员把许多由他

们自己的血汗所创造的劳动果实劫掠去了，而且这帮官员只顾抢夺生财、房产，使许多工厂、商店停业关门，使台湾人民普遍陷于失业。许多被买下的住宅空置不用，而本地人民却大闹房荒，房租房价飞涨。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台北各地人民曾为此联合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但一直被置之不理。

经济特殊化下的重重灾难

日本殖民者为加强对台湾的经济掠夺，从一八九七年起在台湾实行食盐、樟脑、烟草、酒精、酒类、石油、火柴、鸦片、度量衡等十种物资的专卖制度。其专卖收入占台湾地方预算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台湾人民在这种专卖政策的沉重压榨下，生活痛苦不堪。光复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竟悍然全部承袭了日本殖民者这一套残酷的掠夺制度。除鸦片因蒋政府仍挂着“禁烟”招牌未列入专卖和食盐归财政部管辖外，上述各项物资均列入专卖范围。对比较重要的物资如烟、酒、樟脑等更于专卖之外，设立工厂、公司以垄断原料收购和加工制造。全省各地的专卖人员、缉私人员和经济警察，自省专卖局长陈鹤声以下，更是借此贪污勒索、舞弊营私，无恶不作。他们对于大的官吏、军人的包庇走私，都是坐地分赃，不闻不问；对于一般小商贩则处处与之为难，弄得许多人家破人亡。

陈仪为了实行全面的统制经济政策，更于专卖制度之外，设立贸易公司以垄断全省主要工农业产品的购、销和输出。他一方面利用台币的特殊化和与内地出进口的签证办法以限制外省工商业者和台湾的往来，同时用不兑现的台币尽量以低价搜括粮食和各种农产品，以致造成粮食的严重减产。大米原为台湾的特产，一九三四年台米生产达九千八百多万石，到一九四六年却减产为

六千二百多万石。这个数字原也够当时全省六百多万人口的供应需要。由于贸易局将台米大量运售上海、南京一带，加上本省奸商大户乘机大量囤积，以致造成台湾严重的粮荒。在一九四七年初，台湾米价已涨到十三、四元一斤，其后在上海黄金风潮的影响下，米价突跳至三十多元一斤。许多人民只好吃洋芋，形成半饥饿状态。因此，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下旬，台北市出现了“台湾民众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的活动。这个组织在元宵节散发传单说：“决定于三日之后，率领民众，实行抢米，并制裁囤积魁首，以申正义。特先警告三点：一、自即日起，限囤户以囤粮出售；二、米价最高不得超过二十元；三、奸商应以孽财捐献，救济饿死者的遗孤及失业民众。”由此可见，因贸易局和奸商造成的粮荒已经到了逼成民变的危险状态。

台币的特殊化也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加予台湾人民的重大灾难。台湾经济、金融制度的特殊化，对豪门资本在台湾的活动形成一些障碍，宋子文对此早就不满，借令中央银行利用调整币值比率的机会强使台币和法币同样迅速贬值。中央银行最初故意将台币比价压低，规定法币比台币为十比一，为豪门资本大量套取台币制造机会。及一九四六年九月初，当内地金钞波动时，台湾方面请求调整比率。这时，中行又改变花样，将比率故意提高为四十比一，到九月底才又调整为三十五比一，而当时市场实际比率只有二十七、八比一。于是许多人就利用裁定汇兑互相买卖的方法套取暴利。如当时从台湾汇一千万元台币到上海，照国民党政政府官价规定，可得法币三亿五千万万元，只须再将汇票转卖给台湾的进口商人，利用市场汇率二十八比一计，便可赚得台币二百五十万元。由于台币不断下跌、金钞上涨，台湾物价也跟着不断波动。台湾财政当局起初只好采取严格限制汇兑的办法，对普通

人的汇兑多方挑剔，甚至不准汇兑，以致内地职工的家属几个月领不到生活津贴，一般商人也因此亏蚀。及一九四七年一月底，因上海金钞波动更大，对台湾金融市场造成更大威胁，于是台湾银行只好宣布停止内地公务员和商业汇兑。当时，严家淦奔走于南京上海间，请求调整汇率，并拟以台湾土产向中央、中国两行抵押贷款，但扼于宋子文的故意为难，无结果而归。因此，台湾物价，在上海金潮的卷袭下，不断上涨，使全台人民的生活陷于更大的困难。

由热烈欢迎到怨声载道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五十年中，台湾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和解放，先后曾兴起过十二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②，直到日本投降前夕，在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召集的“志别式”会上，还演出了流血斗争^③。这些都表现了台湾同胞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因此，当台湾重回到祖国的怀抱时，台湾人民也都认为从此真由被压迫被奴役的深重灾难中解放了出来。所以，当最初代表中国去台“受降”“接收”的人员到达台湾时，广大的台湾人民也都怀着深厚的爱国热情欢迎他们的来临。但是，经过蒋政府残暴统治的事实教训，台湾人民原来的美好希望迅速变为失望、不满。蒋政府官员在“接收”中对台湾人民如狼似虎的搜刮和掠夺，使他们愤怒地喊出“中央来的官员只接收财物、不接收人心！”随着蒋政权反动本质的更全面暴露，这种失望、不满情绪也迅速发展为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深刻仇恨；在群众中，这种仇恨思想还变相反映为对外省人的普遍怀疑和对立的情绪。在一九四六年冬，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在一篇台湾通信中，叙述了一位台湾大学教授对他的谈话说：“你们美国为什么对日本人那样宽大，而对我们台湾人却这样残酷呢？你们对日本只丢了两个原子弹，对我们却放下

了一个比千百个原子弹还厉害的蒋介石政府！”当时在台湾群众中，还广泛流行“宁愿遭到日本鬼子的杀，不愿受内地人欺压！”和“陈仪是大虫、内地人是蝗虫、日本人是臭虫、台湾人是可怜虫！”等一类愤激痛心的话。

在台湾人民怨声载道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对台湾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反而变本加厉。当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台湾光复一周年紀念时，蒋介石亲自赴台给陈仪装面子，陈仪为了讨好其主子，特拨两亿元台币的特别费，大肆铺张欢迎。蒋介石在欢迎会上对陈仪在台湾的“治绩”竭力赞扬，对台湾人民不但没有半句慰问的话，反而杀气腾腾地警告他们“防止奸党挑拨，以全力支持中央完成戡乱救国之宏业。”跟着，蒋政府资源委员会提出在一九四七年内要台湾供应十五万吨无偿的台糖，三千万至四千万吨台煤和五十万吨大米等任务，加紧对台湾经济资源的掠夺，而蒋政府中央对台湾经济因上海黄金风潮的严重影响所造成的重大困难却置之不理。加以光复后侨居外国的台胞国籍问题因蒋介石政府的不关心和外交上的无能，致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任令他们在光复后反而成了无国籍的人。凡此种种，无不加深台湾人民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失望和痛恨。自蒋介石亲自到台湾对陈仪给以鼓励之后，陈仪也更极力迎合蒋介石的意旨，进一步加强对台湾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他一方面规定内地人进出台湾，除公务员外，一律须持有通行证明和离境证明，借此防止当时日趋严重的内地政治动荡对台湾的影响，同时对台湾各界人士的言论自由、政治活动进行横暴迫害。如台湾省参议员蒋渭川在报上著文，批评长官公署某些措施失当，竟遭拘押，经他写悔过书后始予释放。当发见“台湾民众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的传单后，陈仪不但不采取措施以平抑米价，反令军警以“奸党煽动”的罪名滥施逮捕。

在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是痛恨刺骨的情势下，这种种倒行逆施，更无异火上加油。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利害矛盾以及日本殖民残余势力的伺机活动等种种因素交织一起、互相影响，国民党反动派在台湾的统治危机已早呈一触即发之势。

二二八起义的导火线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为了搜查违反专卖规定的私货，出动满载全副武装的查缉员、经济警察的卡车，巡逻全市。车经台北市延平北路（即旧太平町）天马茶房附近，遇见一贩卖私烟^④的老太婆林迈江。经济警察除当将香烟没收外，更恣意逞凶，将她打得头破血流，还要带局依“法”处罚，虽经林苦苦哀求，他们仍不肯就此放手。群众对这些一贯欺压人民的经济警察早已恨入骨髓。因此，这事当即激起过往观众的公愤，将他们团团包围，与之论理。这班平日骄恶惯了的员警竟向包围群众开枪示威，当场打死小贩陈文溪，另重伤二人。群众睹此，更加愤激，继续将查缉员警包围不放。附近宪警闻讯赶到，见事态严重，为了庇护查缉人员，当将杀人凶手查缉员傅学通带往宪兵队，对愈集愈多的群众进行武力弹压驱散。当有少数由海南岛遣返的台籍军人利用群众愤激情绪，乘机鼓噪，焚毁缉私卡车，率领群众包围宪兵队，要求将杀人凶犯交由群众自行处理，双方对峙，彻夜不散。

二月二十八日晨，有人在延平路一带向过往群众演讲，宣布昨晚流血惨案的真相，群众愈集愈多，议论纷纷，愤激情绪更加高涨。当由台人王民宁（传系台北警备司令部的总务处长）指挥在新公园集合，率赴长官公署请愿。沿途群众汇合益多，队伍抵长官公署时，群众已达数千人。他们高呼“打倒专卖局”、“惩办

屠杀良民的经济警察”等口号。长官公署对群众的惩凶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并当将王民宁扣押，增加门卫，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请愿久无结果，群众情绪更加高涨，高呼“打倒长官公署”、“打倒陈仪”等口号，冲入长官公署大门。陈仪紧急调集大队军警，图以武力驱散群众。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十余人，伤者无数。

这场流血惨案发生后，全市人民闻讯惊震，群起公愤，学校教师、学生、商人自动罢教、罢学、罢市、游行示威，并随即掀起了群众性的武装起义斗争。起义群众开始暴力行动，烧专卖分局，捣毁新台百货公司、台湾银行、正中书局、外省人的职工宿舍和商店，包围长官公署、省专卖局、省贸易公司、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中航公司和无线电台等机关，烧毁政府机关的汽车，抢夺军警的武器；长官公署还几次受到群众的包围冲击。至此，全城陷入军警与群众的全面冲突中，到处喊杀声震天，枪声不绝。这时，许多反动黑帮分子也都乘机混入群众队伍，别有用心地高喊“打支那猪”、“打阿山”、“打豚军”一类口号，煽动群众殴打外省人。一日之间，全市人民被军警屠杀者三百余人，受伤千人以上，军警和公务人员也有死伤，其中外省人死伤达千人以上。

经过一天的流血斗争，因为军警掌握有绝对的武装优势，起义群众在市中心区的斗争被暂时镇压下去了，但他们占领了广播电台，立即利用广播电台向全省人民报导国民党反动政府军警屠杀人民和台北市人民被迫兴起起义斗争的详情，展开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群众起义斗争的宣传。同时，许多起义市民、学生纷纷转入郊区和附近各县、市，深入扩大起义的宣传动员。这些地方的群众也迅速投入起义斗争，收缴军警枪枝、夺取交通工具、

破坏电线、殴打外省人。这时，台北市变成了一座陷于起义群众斗争怒潮包围中的死城。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的武装起义的怒涛迅速席卷台湾全省。

全省各县、市的起义斗争

基隆市：基隆市因距台北很近，二十八日台北有许多参加起义斗争的人于当日下午前往基隆联络，立即获得基隆市群众的响应。起义者纷纷占领市政府各机关、港口码头、车站。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开始出动军警、武装弹压，起义群众当将军警包围缴械，并进而袭击要塞司令部。这时，全市军警宪兵均集中退守要塞，凭借工事，以猛烈火力反击起义群众的连续袭击，使群众受到很大伤亡。

台北县：台北县治在板桥，去台北十公里。二十八日在省参议员林日高领导下发动起义，捣毁公务人员宿舍，焚烧供应局板桥仓库，空军站宜兰仓库，收缴罗东、苏澳、宜兰等地军警的武器，设立起义军司令部于宜兰招待所，指挥全县的武装起义活动。

新竹县：县治在桃园，去台北二十公里。县长朱文伯在二十八日下午去台北，被群众殴打，逃匿不敢回县。三月一日早晨，有青年学生三十多人由台北来桃园，与当地人民联系，发动起义。晚上开始攻击县政府、警察局，及各机关，一部分军警公务人员都在警务处的警车掩护之下逃往台北，未逃出的都被集中拘禁。同时，起义群众把开往台北增援的二十一军一个团的军车截留，将副团长扣押起来。全县都在起义者控制之下。

新竹市：三月一日，群众在城隍庙附近集会，发动起义，焚毁专卖分局、地方法院、市府官舍，包围市政府、警察局，公务

人员逃走星散。

台中市：三月二日上午，起义者以宪政促进会名义在台中戏院召开起义大会，由谢雪红担任大会主席，向群众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反动专政，组成包括各党派的民主统一战线、组织联合政府。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随即占领市政府、市党部、空军第三机械厂、后勤部供应分站、第六被服厂、警察局、专卖局、广播电台等重要机关；开放军公粮仓库，配售食米。组织时局处理委员会，指挥起义行动；同时成立台湾自治军台中指挥部，组织武装部队，由吴振武担任指挥官，领导起义斗争的军事行动，起义者用武力解决了蒋军驻台中的六个宪兵队、俘虏官兵三百多人，空军第三机械厂官兵五百余人。警察百余人都被迫缴械投降；各机关的公务人员都集中拘留。这样，全市都为起义者所控制。由于台中的起义比较有领导、有组织，并有具体的斗争纲领，所以彰化、员林、大甲的武装群众，和埔里一带的高山族人都纷纷来台中集合，因此台中成了一个起义的重心。

彰化市：三月一日下午，市民在火车站集合发动起义，袭击市政府，包围警察局，迫令缴械，警察顽强抵抗，直到三日上午台中的起义武装部队赶来援助，将警枪全部缴械，起义者才控制全市，与台中联合一致行动。

台中县：三月二日下午，在台中市起义影响之下开始起义，占领县政府，枪毙警察局长，收缴警察枪枝，释放狱犯，接管各机关，全县大部分地区为起义群众所控制。

嘉义市：三月二日下午，台中起义人民数十人乘火车来市，在车站附近向群众讲演宣传，号召起义。旋即开始行动，占领市政府，控制交通电讯，广播电台。市长孙志俊逃匿宪兵队。三日，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三青团嘉义分团书记陈志复为主

任委员，接管各机关。将外省公务员一千四百余人，集中拘禁。组织台湾民主联军，成立作战司令部，由陈志复兼任司令。以武装夺取军械库，进攻蒋军第二十军独立团第一营，该营溃窜红毛碑，所部第三连全部向起义军投降。旋与宪兵队汇合，窜守飞机场，顽强抗拒。嘉义全市除了飞机场一隅外都在起义军控制之下。

台南市：三月二日夜间开始起义，包围警察局，缴取枪枝。四日上午，继续迫缴保安队、被服厂、第三监狱的全部枪械弹药。拘捕外省公务人员，接管市政府以下各机关。

台南县：三月二日夜间发动起义，围攻平六、虎尾、东石三区署，同时以武装占领北门、新营、新化等区署，夺取县警枪枝。盐水、磨豆两糖厂工人都起来响应拘捕厂中外省人员。三日上午，接管县政府各机关。

高雄市：三月二日上午，本市人民开始起义。下午附近许多起义群众进入市区，与市民会合，捣毁警察局及盐埕派出所，缴取武器，占据市政府，成立处理委员会，组织台湾自治军，由涂光明担任总指挥，围缴寿山蒋军枪械，占领105后勤医院，集中拘禁外省公务人员七百余人。全市机关工厂，码头港口大部为起义群众所控制。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集中市区内外蒋军残余武力，凭借要塞，因守顽抗，不肯投降，并不时袭击市区起义人民，肆行杀戮。涂光明率领义民万余人包围要塞司令部，勒令缴械。彭孟緝极其狡恶，初则虚与起义人民谈判，及闻蒋军援军将到，乃实行疯狂反扑，往返冲杀，起义群众伤亡最为惨重。

高雄县：县治设凤山，距高雄市仅十公里。三月二日，与高雄市同时发动起义，占领县政府，包围警察局，缴取警察武器，组织处理委员会。三日，进围二十一军独立团部及所属炮兵连、运输连、卫生队，迫令缴械。彭孟緝闻讯，派遣部队来县，对义

民大肆屠杀，蒋军随同援兵逃窜高雄。凤山县城及岡山、恒春、东港、潮州诸区署都为起义军所占领。他们还派遣了一部分起义军向台中、台南各地进攻，协助各地起义人民。

屏东市：三月四日群众在庄迎领导下发动起义，占领市政府，市长龚履端被扣押，旋逃匿宪兵队。起义军乃包围警察局，缴取警察武器，进攻宪兵队及当地驻军，迫令缴械。同时屏东市制糖公司工人全体响应，投入斗争，收缴厂警武器，拘捕外省人员。下午，成立处理委员会，由市参议会副议长叶秋木主持。成立治安本部，集中武器组织治安保卫队，分别接管全市各机关工厂。五日，设立作战指挥部于省立女子中学，向宪兵队实行武装袭击，死伤很大。下午，附近山地高山族来市协助作战，宪兵队不支，窜守城郊飞机场，继续顽强抵抗。全市除了飞机场一隅外都在起义军控制下。

台东县：三月三日夜間市民开始起义，袭击县田粮处仓库，开仓将粮食分给人民。四日，围缴宪警、驻军及飞机场武器，控制电台、交通工具，接管县政府各机关及各区署，组织处理委员会，全县均为义民所控制。

花莲县：三月四日，由省参议员兼三青团干事马有岳领导，在花岗山召开群众大会，提出对台湾善后十二项要求，组织处理委员会，接管县政府以下各机关。成立青年大同盟，以许锡谦为总司令，围缴县中宪警枪械，武装起义军队。同时海南岛归台青年组织“白虎队”，地方浪人组织“金狮队”。殴打外省人，提出“台湾实行独立”，“打支那猪”等口号，情形颇为复杂。

澎湖县：自三月三日以后，县中青年学生组织“青年自治同盟”。同时县参议会与各界起来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进行宣传讲演。因该县为海岛，与省内隔绝，反动的武装军事压力太

大，所以没有发生武装起义行动。

高山族：高山兄弟民族为台湾原住土著，分为泰耶尔、齐阿、不奴、耶美萨特、拔湾、阿美、萨锡多等七个部族。据一九四二年调查，共有159,594人。分布于台湾中央山脉地带。性情强悍。在日本统治时期，因反抗压迫，曾有一九三〇年的雾社事件，一九三一年的毕斯屯事件，一九三二年的大关山事件，一九三三年的逢坂事件，先后爆发大规模的流血斗争。陈仪统治台湾以后，对于高山兄弟民族采取歧视压迫政策，因此引起高山族人的仇恨，一九四六年冬，在台中埔里一带曾发生杀害政府职员，抢夺粮食的事情。二二八起义的火焰烧起以后，在台中埔里一带，屏东附近雾头山、大武山一带的高山族人都纷纷集合起来进入城区，响应起义。各地高山族人以平日和外间很隔阂，得信较迟，等到他们起来，各地的起义火焰已被镇压下去了，所以除了在台中县、台北县、台东县、高雄县等地毆杀了一些公务人员外，没有来得及汇合成为起义巨流。据台中县长刘存忠说：“在阿里大山附近，日本曾藏有大批军火，当时尚未运出，这些地方是高山族区，他们因为不知道有这批军火，台中的起义人民也不知道。在起义中这批军火如果落到人民手中，台湾的起义便不会这样迅速被蒋军镇压下去了。”

陈仪的应变手法——由欺骗缓和到军事屠杀

二月二十八日早上枪杀请愿群众的惨案发生以后，陈仪马上宣布全省紧急戒严，准备实行进一步的残酷镇压。但是因为这一天台北的人民已经掀起了群众性的武装起义斗争，基隆、新竹、台北等县市群众已经起来响应，而台北市的蒋军实力薄弱，各县市的驻军，又因各地人民正在纷纷准备起义，无法调动集中。

陈仪只好改变策略，一方面暗中向蒋介石告急乞援，部署镇压，一面暂时采取缓和的姿态，来应付起义群众。他在三月一日下午向全省广播，宣布政府对起义群众的行动采取“宽大政策”，要求人民迅速恢复秩序，并允许自当晚十二时起解除紧急戒严；为了迷惑群众，他还指定省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参政员林献堂，省参议员蒋渭川、黄添灯，台北市长黄朝琴等和长官公署民政处长周一鹗、农林处长赵连芳、工矿处长包可永、警务处长胡福相、法制室主任任显群等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群众方面已从国民党政府一年多来残暴统治的事实教训中看出了陈仪的两手阴谋的实质，并不因为他这种手法而放松起义。台北市各大专学校中等学校青年学生举行大会，组织学生军，号召全省各县市，积极发动起义；同时揭露处理委员会只是一个政府的御用工具，不能代表民意，要求由工会、商会、学生、市民及台湾政治建设协会五方面选出代表参加，当即提出各方代表名单。陈仪在群众怒潮之下，只好于二日下午再度广播，表示承认处理委员会容纳各方代表。但是他又暗地唆使长官公署的人都退出处理委员会，企图拆台。可是处理委员会并没有因此泄气，并且进一步运用它作为指挥起义工作的机构，于三月三日上午在中山堂举行第一次会议，决议成立忠义服务队，作为人民自卫组织，要求政府撤退市内的巡逻军警和哨兵。成立治安联合办事处。这时还很快出现了台湾学生自治同盟、台湾自治青年同盟、台湾学生联盟、兴台同志会、海南归台者同盟、警政革新同盟、若樱敢死队等持有各种不同政治主张和目的的组织纷纷展开活动。到三月四日，全省各县市都已经先后相继起义。处理委员会已成了全省起义活动的领导中心，通知各县市参议会都组织各县市处理委员会，推派代表来省，共筹善后大计。同时制定台湾省二二八事件

处理委员会组织大纲，于常委会下设政务局，处理局，分总务、治安、交通、粮食、财务、调查、交涉、计划等组；推派代表黄添灯等四十多人向陈仪提出改革台湾政治的各项要求。陈仪这时看到处理委员会虽然成了全省人民起义活动的中心，但是它的内部分子复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所以他又使出进一步的阴谋诡计，继续向处理委员会表示“宽和”，要他们尽量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与政府共同“协商”，借此争取时间，等待蒋军的援救。处理委员会没有了解他的意图，于三月六日电蒋介石提出五项要求：1.重用台湾人，省府处长以上及各机关负责人由台籍人员担任；2.各级法院院长及首席检察官尽先用台籍人员；3.日产处理委员会必须考虑人民正当利益；4.请速派大员来台处理本案；5.勿用武力弹压，以免事态扩大。同时处理委员会汇集各方意见，向陈仪提出对目前处理和根本善后的三十四条要求^⑤。关于目前的处理意见，要点是：

1.政府在本省各地的武装部队，应自动下令暂时解除武装。武器交由各地处委会及宪兵队共同保管，以免继续发生流血冲突事件。

2.政府部队解除武装后，地方治安由民众组织与宪兵及非武装之警察共同负责维持。

3.中央不调兵来台镇压。

4.在事件解决以前，政府的一切措施须与处理委员会洽商进行。

5.立即惩办一切贪官污吏，撤换外省籍不称职人员。

6.立即释放事变中被捕的一切人员。

7.不追究事变的责任者。

8.优恤死伤人民。

9. 惩办事变的凶手。

关于根本善后方面的：

1. 台湾防务由台湾征兵担任，中央不派兵来台驻防。

2. 在内战终止以前，除以守卫台湾为目的之外，绝对不得在台湾征兵，以免台湾陷入内战漩涡。

3. 驻本省的陆海空军军官由台湾人担任。

4. 撤销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

5. 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以便实行国父建国大纲之理想。

6. 撤销长官公署，成立省政府。

7. 县市长于本年六月前实行民选，同时改选县市参议会。

8. 废止民意机关候选人核定办法。

9. 省处长及单位主管官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

10. 外省籍与台籍公务员一律待遇平等。

11. 撤销专卖局，生活必需品实施配给制度。

12. 撤销贸易局。

13. 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

14. 设置民选之公营事业监察委员会，日产处理应委任省政府全权处理，各接收工矿企业应设管理委员会，委员过半数由本省人充任。

15. 合理调整台币和法币的比值。

16. 废除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制。

17. 无偿送与中央的十五万吨糖，应照价偿还台湾。今后不得再以无偿方式征取台湾物资。

18. 禁止政治性的逮捕。

19.除警察得依法拘捕人民外，任何机关人员不得逮捕人民，宪兵除军队之人犯外，不得逮捕人犯。

20.即刻废止人民团体组织条例。

21.保障集会、结社、出版、罢工自由。

22.废止新闻杂志发行登记检查。

23.撤销宣传委员会。

24.释放战犯及汉奸嫌疑犯。

25.保障高山族同胞的政治经济地位及权利。

在提出的各项要求中，据说在最初还有人别有用心地提出“台湾实行独立”，“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的要求，也一并提出，旋又由处理委员会声明取消。

陈仪当知道蒋介石的增援部队快要到来时，就很快丢开了“宽大”的假面具，首先对处理委员会所提出上述要求断然拒绝，并说处理委员会“分子复杂”，下令解散，随即宣布全省再度紧急戒严。为了防止新闻界揭露其残酷镇压的事实，先后将《人民导报》、《中外日报》、《大明报》、《重建日报》、《民报》、《大公报》台北航空版等六家报馆加上“有异己分子挑拨政府与人民间之感情”，“深中日本毒化之遗毒”的罪名，予以查封，并逮捕《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重建日报》社长苏泰皆，《中外日报》社长林忠贤，《大明报》经理艾瑞生、主笔王孚国等。上海《商报》、《大公报》的驻台记者鲍世杰等也遭到扣押。对台湾和内地的电讯、通信都加以严格检查。他采取这种种封锁新闻的办法，使全国人民听不到台湾同胞反抗蒋政权残暴统治的正义呼声，无从了解他们武装起义的真相。

三月八日上午，宪兵第四团的两营宪兵由福建运到基隆。当时基隆港口已被义民占领，基隆要塞司令部乘机以兵力内外夹攻，

掩护登陆。当即开往台北，开始军事镇压。当晚和第二天，蒋军第二十一军的两个师也陆续由上海赶来台湾，和当地的军警配合行动，向全省起义群众进行疯狂屠杀。

这场屠杀一直继续到三月中以后才逐渐停止。据陈仪当时对我说：“在这次事变中死亡的，共计有三千人左右，其中除了四百多人是军警，八百多人是公职人员外，本地人民死者约一千八百人。”^⑥其实他这个统计数字，除了军警和外省籍公职人员的死亡数字大致可靠外，对本地人民的死亡数字，是缩小了很多的，被杀害的人民实际远在这个数字之上。当时被屠杀得最惨的是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嘉义、屏东等处，据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对我说：“从三月二日到十三日，高雄市在武装暴动中被击毙的‘暴民’，初步估计，大约在两千五百人以上。”据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说：“基隆大约死了一千人左右。”台中、嘉义的起义人民和军警战斗了三天，据台中市长黄克立、嘉义市长陈东生的报告，单在市区域郊收埋的尸首，在台中有八百多具，嘉义有七百多具。台北市除了二月二十八日一昼夜间被屠杀的人民有三百多人外，以后每天陆续都有死亡。八日蒋军赶到后，陈仪对各学校的教员、学生实行大捕杀，在八、九两日中被枪决的就有四五十人。据杨亮功和台湾监察使署人员的调查估计，台北市民死亡在五百人以上。屏东市民因为和宪兵队几天的战斗，据市长龚履端的报告，市民共计死了四五百人。此外各县市在武装起义斗争中，死亡大都在百数以上。在军事大屠杀以后，接着由党、政、军、宪、警联合实行全面大搜捕，加以秘密杀害，这样被杀害的人民当不下千数。在搜捕高潮中，因为各地方的监狱容纳不下，又怕劫狱，越狱而被送到火烧岛去的，据说有一千多人。在起义斗争中受伤的人数，更是无法统计，因为当时受伤的人，为了怕被军警发现

逮捕，大都是忍痛藏在家里，不敢出来，也不敢就医。甚至重伤倒在路上的人，家人邻舍，恐遭连累，不敢抬救，以至在军警清除尸首血迹时，就惨遭活埋了。在台中有人告诉我，事变平息以后，在街道要冲地方，许多人家是全家人死尽，绝了人烟。所以总计台湾同胞在这次起义中死亡的，最少有七八千人，连同受伤的，估计当在一万人以上。

蒋介石的两手作法——明施“宽大”、暗加镇压

二二八起义开始爆发时，陈仪以为问题不大，所以在他最初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由于市民与经济警察之误会，发生冲突，虽有少数奸徒，乘机滋事，致有死伤，旋即平息。”到三月二号，他看到群众起义斗争已如火燎原，卷袭全省，才慌了手脚，把事变的酿成说是由于“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间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氛”。^⑦当时正值蒋介石向东北、华北各地发动大规模的内战，被人民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情势紧张，无军可调的时候，但是为了抢救这块肥肉，除了立刻抽调二十一军的两师军队和驻福建的一个宪兵团，限期开赴台湾，执行军事镇压外，接着特派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指挥军事，决心以军事力量镇压到底。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杀气腾腾地说：“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调往南洋一带作战之台胞，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借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惑，造成暴动，并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此种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之范围。而且日昨又有袭击机关，抢夺武器等不法行动，相继发生，故中央已决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蒋介石虽然这样露骨地叫嚣要对台湾人民实行武力镇压，但是白崇禧到底比较乖巧，他怀着鬼胎，不敢马上

去台湾，一直等到蒋军在台湾各地的军事镇压已经初步得手，才于三月十七日以“宣慰”的名义飞往台湾。他到台湾巡视各地，知道一些事变真相后，他知道台湾人民的公开反抗虽是暂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如果单纯继续采取血腥镇压的办法，不但将逼起全台湾人民继续进行顽强的反抗，而且会使这块可供蒋政府大量榨取的土地，遭到严重破坏。加以廖文毅一帮汉奸和日寇余孽，都正在驻台北美国总领事馆的包庇下，想乘机把事情扩大，引进美帝国主义出面干涉，来扮演“台湾独立”、“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的把戏。当时台北的美领馆已经公开成为这帮家伙隐藏集合、发号施令的托庇所。三月三日，有称为台湾大学学生代表的几个人到美领馆请求援助，说：“台湾人民因为不堪中国人的压迫，因此有这次的独立运动发生。要求给以正义声援，借给枪械”。美国的报刊也乘机大肆宣传，如《生活杂志》登载爱金生一篇台湾通讯说：“台湾人亟于求得独立，接受美国的保护。”因此，当时美国借口护侨，把许多军舰都集中到基隆、高雄附近，陆战队准备随时登陆。当时美帝国主义想把台湾乘机从蒋帮手中抢过去的阴谋，已经成了公开的事实。在这种情势之下，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采取暗加镇压，明施“宽大”的两手政策。经蒋介石批准，由白崇禧以国防部长的名义，于三月十五日向台湾人民广播，并于十七日发布国防部宣字第一号布告，宣布对台湾善后措施的四项办法，即：

一、调整地方政治制度，改长官公署为省政府。县市长实行民选，日期由长官公署决定，各处民选三人，由省府圈定一人。

二、改正经济政策：划分公营民营工业范围，缩小公营事业范围。长官公署现行经济制度及一般行政与中央相抵触者加以修正或废止。

三、调整地方人事：主席不兼警备总司令。各厅处长尽先任用本省人。本省籍公职员与外省人待遇一律平等。

四、恢复地方秩序：结束处理委员会及临时类似不合法之组织。参与此次事变或与此次事变有关人员，除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

在四项善后措施公布的同时，还宣布解除全省紧急戒严令，停止军事镇压。又以牺牲陈仪的手法，由国民政府对陈仪明令撤职查办。这一着处理，在蒋介石算是唱一出“挥泪斩马谡”，在陈仪自己也是没有料想到的下场。所以在南京对他撤职查办的命令发布后，台中《和平日报》的台北版首先发表陈仪撤职查办的消息，他在气愤之下，把《和平日报》查封^⑧。撤职查办令发表后，陈在和我见面时对我说：“我是为了成全中央，做了牺牲者！”又说：“我在台湾的重要措施，都是秉承上面的意思办事，现在要改弦更张，也未必能把台湾搞好！”言下颇为傲然自得。陈仪虽撤了职，他的重要帮手严家淦等，都一直在台湾得到蒋介石的重用。陈仪去后，台湾省主席的继任人选虽然 CC、黄埔各方面都群起逐鹿，结果还是由政学系的魏道明来接任，表面设施换了一些招牌，实际措施都是“萧规曹随”，并无更改。四项措施虽然允许省主席不兼全省警备总司令，但是不久换上镇压起义最凶残的彭孟緝为台湾省警备司令。军事镇压表面宣告停止，而蒋军无限期驻扎台湾，执行镇压。并且实行用党政军宪警联合进行暗中逮捕杀害的办法。所以蒋介石之撤换陈仪，在当时完全是迫于情势，不得不牺牲他。对于台湾人民的镇压，并没有因此丝毫放松。

在蒋介石对统治台湾的新手法拿出来以后，我和杨亮功为了配合这一套手法，对已经撤职查办的陈仪放出一通马后炮，公布我们对起义经过和陈仪治台失当情形的调查报告，对陈仪提出弹

劾案。在巡视各县市时，召集当地一些人士，宣示“中央德意”，以爱国的大义“慰勉”一番。同时接受一些人民的控诉，惩办了几个贪官污吏，来帮助蒋政府欺骗台胞，巩固对于台湾的反动统治。我们回到南京以后，在向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情形时，还当面向他提出一个“关于台湾善后问题建议书”。在建议书里重要的几点是：第一、台湾是一个已经建设得很好，物资又很丰富的省份，中央应该先行恢复其战时创伤，再行运用其资力，不宜杀鸡取卵，征求过切。所以主张取消专卖制度，改善贸易制度，清查敌产接收，调整台币与法币比值，停止对台粮食、糖、煤等物资的征取、扶植民营企业，缩小公营土地，实行授田制度等。第二、设法调和台湾人与内地人的感情。主张所有外省籍与台籍公职人员一律待遇平等，对内地与台湾的公职员实行交流调动，多选送台湾青年入内地各省市学校求学，撤除在台省不称职的外省籍公职员，肃清贪污，发还误作敌产没收的台民资产等。第三、防止外人势力在台湾的侵入间离。主张清洗日本在台湾的残余势力，征召台籍日军官兵入伍，分散编入各部队，注意美国夺取台湾的阴谋，加强台民爱国教育等项。记得当时蒋介石看了我们的建议以后，在谈话中对于建议中“注意美国夺取台湾的阴谋”一点，表示很不痛快，他说：“在这次事变中，美国朋友还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不相信他，恐怕会要影响中美亲善的。”对其他各项建议，他似乎对于“征召台籍日军官兵入伍”一点特别注意，他详细向我们问：“台湾人原先在日本军队里一共有多少人？他们在事变中是不是都附和共产党？”在听了我们说：“有四五万台籍日军，他们的思想问题不是附和共产党，而是受日本军阀灌输的毒素很深。”他表示很满意，一连来了几个“呵呵！”果然不久就有几万曾经在日军中当过官兵的台湾青年被征召到蒋军中去当内战炮

灰。

台湾人民英勇的二二八起义，便在蒋介石这种明施“宽大”，暗加镇压的两手镇压之下，暂时平息下去了。十五年来，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继续盘据台湾，对台湾同胞进行变本加厉的血腥统治和压榨，台胞的痛苦和怨恨当已十倍于二二八时。他们一定会踏着先烈的血，举起人民的义旗，消灭他们的敌人，回到祖国的怀抱。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① 这些团体都是日本在大战期间，为了加强对台湾人民的统治，在青年学生、工商界及农民中以发扬“战时国民运动”精神为幌子，以反动黑帮分子为骨干而成立的。

② 台湾人民的十二次反日斗争是：一、一八九五年林大北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二、一八九六年刘德杓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三、一八九八年陈发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四、一九〇一年詹阿瑞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五、一九〇七年蔡清淋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六、一九一二年刘乾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七、一九一二年黄朝领导的革命运动；八、一九一二年陈阿发领导的革命运动；九、一九一三年罗福星领导的革命运动；十、一九一三年张火炉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十一、一九一四年罗阿头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十二、一九一五年余清芳领导的武装反日斗争。

③ 日本投降时，台湾总督安藤利吉集中驻台日军，于准备遣散台籍官兵前，在台北集合日、台籍尉级以上军官，举行志别式。在宴会上，台、日籍军官分两边列坐。台人饮劣等米酒，日人饮上等清酒，引起台人愤怒，当场提出抗议：“日本人在台湾压迫了我们五十年，今天你们投降。我们是战胜国的主人，还对我们采用这种歧视对待，我们绝不能继续忍受！”纷纷用酒瓶掷击对席日人，演成短兵相接的流血斗争，双方死伤二十余人。

④ 当时台湾的私烟来源，大都为内地籍军人官吏由上海福州等处大批私运入境，由经纪人包买售与小商贩。小商贩在层层剥削下，所得利润极微，而查缉时受累被罚者也都是他们。

⑤ 要求的内容当时各方传述不同，有说是三十四条、有说是四十二条。因为这些要求不同集中在一次提出的，因此对要求的内容和条数都有不同的说法。

⑥ 据他后来发表的正式报告说，军警死亡四四〇人，公职人员及起义群众死亡一八六〇人，总计死亡二三〇〇人，比对我说的死亡数字更有缩小。

⑦ 这两个电报是我在动身去台前在国民政府文官处调阅有关案卷时看到的，本文所引系电报大意。

⑧ 在陈仪统治台湾时期，为了钳制舆论，除在长官公署设立宣传委员会，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检查控制，发布歪曲事实并替他个人吹捧的新闻报导外，还由党政军系统办了台北《新生报》、台中《和平日报》、台南《中华日报》，作为官方宣传工具。《和平日报》为军方所办。事变发生后，台北报纸多为陈仪所封闭，《和平日报》即乘机办了一个台北版。平日军方与陈仪因争权夺利，常有齟齬，所以在得知陈将倒台时，即首先刊布一些使他难堪的消息。

新桂系与CC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

苏 民

新桂系统治安徽，从抗战初期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开始，以后经过廖磊、李品仙、夏威三任，直到解放前夕张义纯任主席为止，历时十二三年，恶贯满盈，擢发难数。其中以李品仙任职的时间最长，从抗战中期到胜利以后，为时将近九年，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亦最多。李原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防鄂北。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廖磊病故后，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的一再要挟下，派李品仙接充安徽省主席，兼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军事方面，亦继廖磊为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后来调升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从此，新桂系继续保持了在安徽的地盘。李品仙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更加忠实地贯彻执行蒋介石和李、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变本加厉地在安徽实行最黑暗、最残酷的统治。当时，安徽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水深火热，非可言喻。

在新桂系统治安徽时期，与CC的关系，在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方面，是没有矛盾的。但在其他方面，由于互相争权夺利，彼此矛盾重重，斗争最为激烈。双方明枪暗箭，无所不用其极。我和新桂系及CC都有历史渊源，一贯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反动政治关系。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李品仙任内，我担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和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并先后兼任省粮政局局长、省府秘书长等职务。在新桂系与CC的斗争过程中，我最初是脚

踏两边船，以和事老的态度，排难解纷，幻想双方合作妥协，相安无事；最后看到形势不对，又与 CC 决裂，倒向新桂系一边。现就记忆所及，将新桂系与 CC 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略述如下，以存史实。

一、从廖磊时期说起

廖磊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时，我还没有到安徽。关于新桂系与 CC 在安徽斗争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由于替李品仙在重庆担任国民党十一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处长，间接地也知道一些梗概。当时，双方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在对国共合作问题上，彼此意见也大有分歧。以方治（教育厅长）、刘真如（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为首的安徽 CC 分子，站在坚决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公开辱骂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摧残压迫抗日的进步力量。而廖磊、陈良佐（民政厅长）等一部分新桂系分子，则表面上赞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和当时主张抗日的人士接近，另一部分新桂系高级将领如张淦、徐启明、张义纯等则主张积极反共，排挤进步势力。在此情况下，CC 分子纷纷向蒋介石及二陈（陈果夫、陈立夫）控诉廖磊庇护共产党，打击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而积极反共的新桂系高级将领亦向李、白告状，弄得蒋介石对廖啧有烦言，李、白也埋三怨四地责备他不应袒护共产党。廖磊本来患有高血压，加上受了各方面的刺激，竟至一病不起，死于立煌（今金寨县，当时安徽省政府驻此）。这些情况，在李品仙主皖新命发表后，陈果夫就找我去谈过，他对廖磊的作法极为不满，希望我说服李品仙，到安徽后，要设法扭转那种“混乱”的局面。我接受了他的意见，表示愿意效力。

二、李品仙等在重庆和 CC 的勾搭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李品仙奉到新命以后，偕同杨绩荪（湖南人，十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特别党部书记长）由老河口防次去重庆，住了十多天。我和杨绩荪是老朋友，同属于新桂系外江派。关于怎样对待安徽 CC 和共产党，到安徽后的施政方针和人事安排等等问题，应如何向李品仙出谋献策，我们事先交换了意见，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然后和李品仙就安徽问题谈了几次话，并进行了有关活动。

首先，从谈话中看出，李品仙对安徽 CC 骨干分子方治等和新桂系的冲突，是非常不满的，他责备 CC 不和廖磊合作。李品仙说：

“安徽敌伪‘奸匪’环伺，情况很险恶，而地方派别分歧，大家勾心斗角，不能团结一致对外。特别是方治、刘真如这班家伙，专门和我们捣蛋，闹得乌烟瘴气，结果替共产党造机会，真是不识时务，可恶得很！”他希望我先和二陈谈谈，大家要开诚布公地合作才好。我对他说：“大家要合作是对的。今天安徽的政权在我们手里，人家没有不和我们合作的道理。我认为多求友，少树敌，化敌为友，这是搞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因此，无论哪一派系，只要他们肯服从领导，就要一视同仁，少予更动。”接着又说：

“我想他们过去闹的目的，无非是要多争几个位置。如果今后在人事方面放松一点，党政各部门多安插他们几个人，就会相安无事。何况我们有枪杆子作后盾，老蒋还要利用我们抗日，无论这班人如何争夺，也争不到主席（指李品仙）头上来。只要不把大门关得太紧，问题自然会少的。”最后，我和杨绩荪都说：象廖燕农（廖磊别号）那样搞法，纠纷只会一天天扩大，这是自讨苦吃，而且会引起老蒋对我们的怀疑，既非团体（指新桂系）之福，

对鹤公（李品仙号鹤龄）个人的政治前途，也是极不利的。李品仙听了我们这番话，似乎有所感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有些对的，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你们晓得，老白是讨厌 CC 的，对三青团还好一点，我们这样干，他未必会完全同意。”我看他的态度犹豫不决，便抓住他和白崇禧之间的矛盾^①，一针见血地对他说：

“鹤公在团体中的处境，我们是理解的。廖燕农不死，主席轮不到你头上，今天既然要你来干，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你个人打算，一方面要依靠团体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搞好个人和老蒋的关系，政治上才有发展的希望。象这样重大的问题，你认为对的意见，应向德（李宗仁号德邻）、健（白崇禧号健生）两公多说几句话，要据理力争，不要一味地唯唯诺诺。”他听了以后，默然久之，没有表示具体意见。

其次，谈到如何对待安徽共产党的问题，李品仙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是异常鲜明和坚决的。他说：“共产党口里和我们讲合作抗日，实际上是天天制造摩擦，得寸进尺，破坏统一和抗战。他

^① 李品仙和廖磊，原系唐生智先生的旧属。自西征之役唐失败后，原八军、三十六军残部，由南京政府改编，归四集团军李、白指挥，李品仙任十二路军总指挥，廖磊任三十六军军长，随同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北上作战，解决张宗昌、褚玉璞各部，这是他们投向新桂系的开始。廖在新桂系中，忠实效命，深为白崇禧所信任；李和白则貌合神离，彼此有矛盾，而和李宗仁却很接近。先是，一九二九年新桂系在武汉失败后，唐生智奉蒋命为五路军总指挥，北上重长旧部，其时，白崇禧处境艰危，廖尽力维护，使其逃出平津，转往香港，而李对白则态度模棱，引起白的不满。因此，廖回广西后，选长军旅操有实权，而李则屈居闲职，不为白所重视。一九三二年，李任南宁军校校长，不久即被白排挤，降调龙州边防对汛督办。李负气不就，愤而离桂去港，后经李宗仁亲往劝慰，始勉允就职。后来总部参谋长叶琪坠马而死，以李继其遗缺；直到抗战初期，始调任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其不见信于白，于此可见一斑。

们的野心不小，终久是我们的心腹之患。廖燕农只会带兵，不懂政治，应付不了那个复杂的局面，结果把他气死了。我们到安徽后，要特别注意他们的活动，加以严密防制，不能象燕农那样，上他们的当。”我说：“我看共产党也不是那么可怕，并没有三头六臂。他们在江西失败以后，变到今天这样壮大，老实说，一半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十多年来，国民党的政治实在是糟透了，‘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我们应该反躬自问。”又说：“你比廖燕农高明，我和绩荪都希望你到安徽后，首先要整饬吏治，肃清贪污，严明赏罚，树立廉洁的政治风尚；同时，要注意培养人才，多用本地人，少用广西人，这样才能挽回人心，争取广大群众为我们所用。总之，单靠军事防剿，决非根本办法，我们一定要在政治方面做出成绩，来同共产党赛跑。”他当时表示同意我的这些看法。

关于到安徽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李品仙最初告诉我：省府方面，原打算除章乃器辞职，财政厅须补人外，其余秘书长朱佛定、民政厅长陈良佐、建设厅长蔡灏、皖南行署主任戴戟，都调整一下；后来，李、白指示，财厅由杨忆祖接充，其余暂时都不要动，委员方面可以补充几个。我知道这些人除戴戟外，其余都是新桂系，动也动不了，因此，没有表示意见。我接着问：教育厅方治怎么办？刘真如调什么职务？我和绩荪搞什么？他说：“你和绩荪在省府或党部都可以，要再和老白商量一下，才能决定；方治的问题，要和二陈谈谈，如果要留下去，暂时也不动；刘真如，初步考虑，让他做省府委员。”关于省党部方面的安排，他没有具体谈，只表示将在原有基础上加两三个人，等待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商量以后再说。

随后，我去南温泉见了陈果夫，委婉地传达了李品仙的意见，着重谈到今后合作的问题。陈对我说：“李主席这些意见很好。过

去廖主席实在搞得太糟了，只要他们不再排挤打击中央派去的同志，大家一定可以和衷共济的”。又说：“方治、刘真如，他们都是爱护党国的好同志，希孔（方治别号）不过性情暴躁一点，你们多多帮助他，可以搞好关系的。你到安徽去，要特别注意加强党政联系工作，不要再闹意见。”我答复他：“愿意效力，但是李主席有些事情，自己不能完全作主，要请示李、白，我能否完成任务，没有十分把握。”

后来，我陪同李品仙去看了二陈几次，他们就对待共产党和人事安排等等问题，大体上交换了一下意见，从表面上看，谈得颇为融洽。李并要求陈果夫选派几个文字好、能力强的政治学校毕业生去安徽工作，陈欣然答应了。不久就介绍周天固（江苏人）担任李的随从秘书，为他撰拟讲稿和速记工作，以后又由我和中央政校毕业生通讯处主任周异斌协商，邀约蒋慎良、周方、萧继宗（均为湖南人）等去安徽担任党政工作，他们都是二陈主办的党校或政校的“高材生”，在安徽工作过程中，为安徽 CC 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

关于党政人事安排的问题，李品仙和李、白及其他有关方面最后商定以后，又找我和杨绩荪谈了一次，并将名单交给杨代拟签呈。我看了一下，内定我为省政府委员兼省党部书记长，杨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其余和以前谈的没有多大变动，只加万昌言、张义纯为省府委员。杨绩荪看到自己没有当上省府委员，很不高兴，由此更加倾向 CC。看了名单以后，我当时没有表示意见，回来一想，他要我当书记长，这明明是利用我来对付 CC 的，二陈对李品仙拿掉刘真如的主任委员，已经有些不痛快，现在又要拿走书记长这张王牌，会使他们更加恼火。我如果勉强干了，将来会搞得两面不讨好。随即我又去见李品仙力辞，并建议要陈果

夫推荐一人担任。他坚决不肯。于是，我就去找陈果夫和组织部长朱家骅，表示不愿担任，他们都很同意。因此，后来国民党中常会开会时，只通过我为执行委员，而以原任委员卓衡之（CC）为书记长。李品仙非常诧异，几次问我，我没有告诉他这段釜底抽薪的经过。

大约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上旬，省府和省党部局部改组的名单公布以后，蒋介石在重庆曾家岩“官邸”召见了我和万昌言。见面的时候，蒋问了我们的年龄、籍贯、学历、经历和现在工作情况，接着就谈了一套“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老调，勉励我们坚定信心，协助李品仙搞好安徽的党政工作。这次见面的时间很短，只谈了十多分钟。

过了两三天，我忽然又接到“侍从室”的通知，蒋介石约我去谈话。这次见面，只有他和我及一个担任记录的秘书在座。见面时，他的态度比上次客气多了，叫我坐下来谈。他首先问：“李主席在这里的事，都办好了吗？甚么时候可到安徽去？”我将所知的情况，答复了他。接着他又说：“我对李主席说过，安徽是我们抗日游击的重要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情况很复杂，‘奸匪’活动很厉害，要严加防范，不可放松。你们到了那边，无论党政军各部门的同志，大家都要以党国为重，化除私见，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又说：“你过去工作的情况，果夫先生告诉了我，做得很好，这次到安徽去，一定要帮助李主席把内部团结搞好，不许再闹纠纷。关于那边的情况，可以直接给我来电报告。”我把我对李品仙说的那些加强团结和今后施政措施的意见，扼要地向他陈述了一遍，并表示一定遵照他的“指示”，尽力完成任务。最后，他忽然问我：“你为什么不愿干书记长？”我说：

“能力不够，对办地方党务，缺乏经验，怕搞不好。”他说：“当委

员也是一样，可以做党务工作。”辞出时，他面嘱侍从秘书交我一个专约“苏密”电本，要我用这个密电本，直接和他通报。隔两天，又要陈果夫送来两千元旅费的支票，并说以后有甚么需要，可以来电报。经过蒋、陈这一番拉拢之后，我就进一步地靠拢了CC，更加积极地为促进他们和新桂系的合作而效力。

现在看来，新桂系的李品仙和CC二陈之间，虽然经过我一系列的拉拢活动，并没有达到所谓“合作”的预期效果，不过是在反共反人民一致性的基础上，彼此取得了一些谅解，化除了一部分成见，建立了表面上的联系，为李品仙到安徽初期和CC相安一时的妥协局面铺平了道路。但是双方争夺权利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无法解决，这是非我初料所及的。

李品仙初到安徽时，党政方面主要人事安排如下表：

一、省政府

主席	李品仙（新桂系）
委员兼秘书长	朱佛定（新桂系外江派）
委员兼民政厅长	陈良佐（新桂系）李到任后不久，陈即辞职，改派韦永成（新桂系）继任。
委员兼财政厅长	杨忆祖（新桂系外江派）
委员兼建设厅长	蔡 灏（新桂系）
委员兼教育厅长	方 治（CC）
委员	刘真如（CC）
	万昌言（三青团、接近张治中）
	张义纯（新桂系外江派）
	苏 民（新桂系外江派、接近CC）
委员兼皖南行署主任	戴 戟 李到任后不久，戴辞职，改派黄绍耿（新桂系）继任。

二、省党部

主任委员 李品仙

委员兼书记长 卓衡之 (CC)

委员 范春阳 (CC)

宋振矩 (兼皖南办事处主任。接近CC和何应钦)

陈 铁 (接近张厉生)

程中一 (改组派)

张一寒 (接近朱家骅、于右任)

方宏孝 (朱家骅系、接近军统)

王述曾 (朱家骅系)

翟 纯 (接近张厉生)

杨绩荪 (新桂系外江派, 倾向CC)

苏 民

以上是李品仙到安徽初期, 党政两方面, 人事安排的基本情况, 后来陆续有所调整。从当时配备的名单看, 省府方面, 新桂系分子占绝大多数, 真正的CC只有方治、刘真如两人, 加上苏民接近CC也还是极少数。三青团分子仅有万昌言一人。万系安徽巢县人, 日本留学生, 曾任南京中央军校自然科学总教官多年, 他和张治中先生有同乡和同事的关系, 此次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 系张所推荐。新桂系中原任民政厅长陈良佐, 在李到任后不久, 即被排挤去职, 改以韦永成继任。韦系广西少壮派重要骨干, 深为李宗仁所信任; 到安徽后, 又和蒋介石的侄女蒋华秀结婚, 更挟裙带关系以自重, 大权独揽, 飞扬跋扈, 气焰不可一世。在用人行政方面, 李品仙也要让他三分。其余的新桂系如朱佛定、黄绍耿、杨忆祖等, 都是唯他的马首是瞻, 谁也不敢得罪这位“皇

亲国戚”。

省党部方面，CC和接近CC的分子占绝大多数。此外，还有调统室主任李仁甫（江苏铜山人，安徽中统特务头子），皖报社社长王枬（安徽人，CC分子）等都在省党部范围之内。新桂系方面，只有李品仙、杨绩荪、苏民三人，占极少数。杨绩荪和苏民，跟随李品仙工作多年，虽为李所倚重，但都未取得李、白的信任，算不得新桂系的嫡派。杨与二陈，原来没有甚么关系，在重庆时，因苏民的拉拢，才倾向CC。到安徽后，他们两人都尽力维护CC，和方治、刘真如、卓衡之的关系搞得很好，而与韦永成等形成尖锐的对立，互相攻讦。当时，有所谓以苏、杨为首的“湘派”之称。

三、相安一时和明争暗斗

李品仙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初到达安徽立煌接事。在就职那天的讲话中，他首先分析了安徽当前的形势，接着提出了“党政军一元化，以党统政，以政制军，以军事的推行，掩护和促进党政工作的开展。”和“澄清吏治，行新政，用新人，建设新安徽”等等一套反动的施政纲领，并特别强调“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领导之下，破除私见，加强团结，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就职以后，为了与CC配合一致，彻底打击共产党和进步势力，马上改组了省动员委员会，该会宣传部长狄超白（共产党员）、组织部长竺某（共产党员）和省府秘书陈超琼（共产党员、兼任动委会职务）等都被撤换，离开立煌；何德润所领导的广西学生军亦被逼走。

与此同时，李品仙为了表示他有决心“肃清贪污，树立廉洁政治风尚”，假惺惺地把立煌县长苏挹清、霍山县长黎炳松和六安

县长谭摩宁三人，拘押讯办。这三个人都是广西干部，据说均有贪污和私运桐油走私的罪行（谭因左倾，还有共产党的嫌疑）。押了不久，他们就被广西军队的一排枪兵劫走，李品仙也没有再加追问了。后来又以共产党嫌疑罪名把亳县县长俞肇兴扣押法办。所有这些措施，使 CC 分子方治等大为称快，都说李的作风究竟比廖磊不同，“有魄力，干得好”，打电报给蒋介石、陈果夫表扬他的“政绩”。我也电报蒋、陈等为他捧场。蒋介石听了很高兴，曾来电嘉奖，说李品仙“莅任数月，治绩斐然，殊堪嘉赏”。陈果夫也来电表扬。

当时，一部分广西干部则对李的这些作法深为愤慨，密报李、白，控诉李品仙“勾结 CC，纵容湖南干部，打击广西干部”，有些人还到立煌香山寺廖磊墓前哭灵，以致李、白都来电诘责，使李品仙感到非常棘手。从此，他对 CC 的态度，有所转变，表面上虽然仍旧保持妥协，骨子里则更加戒备，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同时，对我和杨缵荪亦极力避免谈及有关对付 CC 的问题。

省府方面，李品仙、韦永成等对人事抓得很紧，每次调整县长，事先都是由他们和几个广西亲信干部密商，尽先录用新桂系爪牙；其次，以少数名额，安置省、县参议会、三青团、军统和其他各方面倾向新桂系的人员；但决不轻易让 CC 分子插足。例如刘真如、卓衡之几次力保的 CC 分子武斌，李、韦等始终是敷衍应付，口惠而实不至，拖了大半年，还是由我和杨缵荪力争，才把他派到黟县去。后来如蒋慎良、汪毅等出任县长，也不知费了多少唇舌。而与军统有关的人，如游铨、李宣、刘文潮等，都很快的先后做了桐城、立煌等县县长。我质问过李品仙：“为什么军统和三青团的人都可以用，而对党部的人，这样苛刻？”他答复得很干脆：“他们不想争夺政权！”至于省府委员、厅长和专员，则

抓得更紧，CC分子除非由上面硬派下来，否则休想置啄。

对于省立学校校长的任用，同样抓得很紧。方治所签派的人，提到省府常会上，经常和新桂系分子发生争吵，有时搞得面红耳赤，下不了台。有关教育经费的问题，也每每引起争执，彼此喋喋不休。

在省党部内部，新桂系和CC的矛盾也是很深刻的。新桂系对付CC是采取“消极防制，积极渗透”的手法。李品仙为了防制书记长卓衡之专权和侦察CC分子的活动情况，首先派广西亲信干部黎民兴为省党部秘书，以后又派安徽反CC分子郑汉、陈天任等担任科长。凡是通过驻会委员同意，由卓衡之签派的县党部书记长，有时经黎民兴暗中对李一说，就改换了别人担任；纵有我和杨绩荪力争，亦无多大效果。大家对他都表示不满，卓衡之尤为痛恨。李对郑、陈两人的信任，也是言听计从，仅次于黎民兴而已。

李品仙为了加强反动统治，贯彻所谓“党政军一元”化的方针，在到皖的初期，就组织了一个党政军总办公厅，集中核处有关党政军各方面的重要文件。办公厅设主任一人，由丘国珍（青年党）担任。下分政务、党务、军事、机要等组，各设组长一人。政务组长由省府秘书长朱佛定兼任，后因朱、丘之间有矛盾，改以万昌言接替。党务组长，根据组织系统和工作需要，本应由省党部书记长兼任，但是李品仙为了防制CC打入这个最高幕僚机构，不派卓衡之，而以杨绩荪担任。后来杨调机要组长，又派我接充。我推辞不就，并请改派卓继任，李还是不肯。卓衡之受此委屈，有苦难言，除偶尔对我们发发牢骚外，也无可奈何。

可是，另一方面，关于迫害革命青年的罪恶活动，李品仙对卓衡之等CC分子，却是异常信任，赋予全权的。如在一九四〇

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省党部在立煌洪家湾设置一个“特训处”，李派卓衡之和调统室主任李仁甫等负责主持，对被捕的革命青年进行“软化”和迫害屠杀的罪恶勾当。这个处经常关了几十人，有时多至百余人，终日遭受着威逼利诱和严刑拷讯的磨折。凡是坚定不屈的，往往被他们在黑夜里拖到后面山上活埋杀害。象这些惨绝人寰的黑幕，除这班特务和李品仙清楚外，其他委员都很少知道。有些案件，甚至李品仙事先也不知道，就由特务们一手干了，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李也不加追问，乐得由他们负责。这里充分说明，新桂系和CC之间，尽管争权夺利，矛盾很多，而在反共反人民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文化和新闻事业方面，省党部办了一个《皖报》，原系由省党部前任委员王枬任社长，内部人事全系由CC掌握，经费由省府补助一部分。韦永成到安徽后，为了对抗CC和充实个人政治资本，准备将来做“安徽省主席”的接班人，单独创办了一个《大别山日报》，同时组织“中原出版社”，由萧大鏞负责，发行《中原文化》、《中原月刊》等杂志，标榜“进步”，和省党部办的《皖报》及《春秋》半月刊等报刊，唇枪舌剑，相互攻讦不休。后来，新桂系为了进一步掌握《皖报》这个反动宣传工具，将王枬逼走，改派杨绩荪为社长，经费全部由省府负担。当时，CC对此，虽有些愤愤不平，然因CC分子周朴心仍留任总编辑，且杨亦倾向CC，未使矛盾扩大。

由于新桂系和CC在各方面的矛盾日益加深，在一九四〇年五、六月间发生了方治住宅被搜查的事件。某日深夜，立煌警备司令杨创奇（广西人）派一连长带同部分士兵，借查户口为名，闯进方治的住宅，穿堂入室，翻箱倒篋，其势汹汹。方治的老母从梦中惊醒，以为是土匪抢劫，吓得从床上滚倒在地，跌伤了腿和

腰部，当时，方治大为震怒，厉声责骂为甚么要搜查他的住宅。他们答称：“不晓得是厅长的公馆。”同时，方还严词质问过李品仙，李多方道歉，并辩白事先确不知道。方仍余怒未息。第二天早晨，李又要我去方家，代为解释误会，并慰问方母。我去之前，一再诘问李，搜查方宅是否他的主使，他坚决否认，并说：“这班家伙胡闹，不识大体，真伤透了脑筋。请你对希孔婉为解释，不要误会。”方治和我见面时，开口就骂李品仙“混蛋”，说：“他要赶我走，打电报请‘总裁’（蒋介石）撤我的职好了，何必要这种流氓手段，我方某也不是好惹的”。经我反复劝解，他还是怒气冲冲，并怪我明知故昧，有意为李辩护。

事后，我从各方面了解，一说是李品仙授意杨创奇去方家捉赌（方嗜好麻将，经常邀人在家聚赌），故意吓吓他，给他难堪；一说是李的弟弟李品和与杨创奇等密谋干的，李品仙事先并不知道。究竟真相如何，无从搞清。

新桂系和CC经过这次“兵戎相见”的斗争以后，表面合作的局面，划开了一道深刻的裂痕，矛盾更加激化了。当时，各县贪污案件，层见迭出，李品仙、韦永成等上下勾结，包庇纵容，不加惩办，致使CC分子有所借口，对新桂系进行攻击报复。方治每与人言谈，对皖政辄加诋毁，极力主张“皖人治皖”。并传闻方曾密电二陈，建议以刘和鼎为省主席。李品仙闻悉，乃去电李、白，指责方为挟嫌诬陷，破坏团结，破坏抗战，要求转报国民党中央撤换方治。蒋介石得报后，先嘱“侍从室”陈布雷传达他的意旨，电方斥责，并嘱其向李解释误会，言归于好。方将电示我，多方辩白。我将情况转告李品仙并劝其不要过为已甚。不久，蒋又直接电李品仙查询真相。李为敷衍方的面子，继续保持妥协的局面，乃又电报重庆替方解脱。白崇禧闻悉其情，对在座的凌孟

南说：“鹤龄以前要撤换方治，现在又来电替他解释，出尔反尔，真是糊涂！”当时我也电告陈果夫，为方缓颊，诡称方并未倡“皖人治皖”之说，李前电所云，系属传闻之误，请其转报蒋介石，免予置议。此后，蒋也就没有再来电追问了。一场风波，虽告平息，而裂痕终于无法弥补，形势所逼，方治不得已于十二月辞职离皖。从此，相安一时的假合作局面，乃如昙花一现，宣告基本结束，转入了另一个阶段，即有时激烈，有时和缓，起伏不定的“明争暗斗”阶段。

新桂系赶走方治之后，气焰更加嚣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他们一面积极拉拢争取和扶植参议会、三青团、军统等各方面的亲桂系或者同情桂系的分子，充实新桂系的外围力量，支持他们的反动政权；一面加紧人事的控制，排除异己，不许 CC 打入。而在 CC 方面，由于方治离皖，领导顿失重心；刘真如软弱无力，遇事迁就退让，加以内部又不团结，以致在新桂系强大压力之下，屡战屡败，处于极端劣势地位。在这几年当中，双方矛盾和斗争的事实很多，难以一一记述。略举较重大的几件事如下：

教育厅长位置，从来是 CC 誓死必争的重要据点，决不轻易让他人夺去的。方治在皖酝酿辞职时，听说在重庆的 CC 分子邵华、陈访先等均想染指，钻营不遗余力，陈立夫亦大力支持他们。李品仙闻讯，乃先发制人，急电行政院、教育部，力保万昌言继任，并电请白崇禧从旁促成。其时，二陈等鉴于安徽 CC 和新桂系之争，创痕未复，力图挽回残局，未便坚决拒绝，故勉予同意。万系三青团肉干，最初依赖张治中的助力，得任安徽省府委员，后来，经李品仙极力争取，接近新桂系。因此，他不费吹嘘之力，从 CC 手里夺取了这块“肥肉”。以后万辞职时，又有一番幕后争夺，结果由韦永成在重庆大学教授中，搬出一个朱家驊门下的汪

少伦来接替，使 CC 嫡系人物，又落了一场空。

皖南方面，因大江阻隔，敌伪封锁，省府鞭长莫及，故在屯溪设置行署就近统治。该地在军事上属三战区顾祝同管辖，依照规定，行署应受战区党政委员会的指导。自黄绍耿接替行署主任以后，与三战区争权夺利，不断发生磨擦，矛盾日深。顾指责黄贪污无能，不听指挥，要求省府撤换；黄亦不肯卖账，势成水火。李品仙乃于一九四一年秋间，派我南渡视察，并赴上饶（三战区长官部驻地）见顾，意在解释误会，缓和矛盾，保全黄的地位。卓衡之因绕道皖南赴渝述职，随我同行。

我们过江之初，外间纷纷谣传我将出长行署。其实，当时我并无此打算。迨到屯溪后，皖南人士咸称黄绍耿贪污腐化，劣绩多端，怨声载道。党部办事处主任宋振矩和卓衡之，认为黄势在必去，并极力怂恿我争取这一位置；第三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赵棣华（CC 重要骨干分子）亦专诚来访，互通声气。当时，我虽认为势不可能，但亦默契其事。抵上饶后，顾及其左右，多对黄不满，势非撤换不可，卓衡之乃乘机联系汪宝暄（CC 分子，三战区党政委员会委员）等在顾前极力主张撤换黄绍耿，并推荐我继任。顾表示首肯，乃分电重庆有关当局和李、白、李品仙等保荐。我和卓并电请陈果夫促成。事后闻悉，白崇禧、李品仙等，均已同意，并由省府电达行政院在案；后因韦永成在渝一再向白进言反对，将原电抽回，另保三青团骨干分子、陈诚系的安徽人张宗良继任，而改派我为省粮政局长。

这一幕争夺皖南行署主任的丑剧，从表面上看，是新桂系和三战区之间的争权夺利，实质上又反映了新桂系与 CC 及新桂系内部的矛盾。

刘真如担任省干训团教育长后，其处境的困难，与卓衡之完

全一样，处处受到新桂系的控制，一筹莫展。该团处长以下干部，均系由李品仙委派其亲信人员担任，刘无法运用，孤掌难鸣。后于一九四二年被调任安徽学院虚有其名的院长，遗缺由张宗良接充。因此，新桂系又从CC手里夺取了一个重要位置。

方治到重庆以后，据说蒋介石和二陈对其不能耐心坚守工作岗位，保全CC实力，深为愤懑，方恐受蒋斥责，一年多不敢和蒋见面，长期郁郁不乐。但对反桂李斗争，则雄心犹在，暗中仍积极进行活动。时值一九四二年冬季，新桂系一向自夸为“金城汤池”的大别山核心根据地——立煌，被日寇以几千兵力，乘虚窜入，沦陷达十日之久，烧杀掠夺，损失奇重，后又自行退去。当时，安徽人士莫不同声愤慨，对新桂系军事政治的腐败无能，多所责难。方治、邵华等乘此机会，利用旅渝皖籍青年学生，掀起了第一次公开的反李运动，请愿游行，发传单，贴标语“反对新桂系军阀李品仙”，要求撤换惩办。其时，李正由皖南视察后来重庆，面对上述情况，狼狈不堪，无法应付，羞愤之余，匆匆溜回立煌。这次反李运动，虽然没有把李品仙打倒，而新桂系“消极抗日”的丑恶面貌，和在安徽统治的黑幕，却被暴露无遗，信誉扫地，所受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

CC所主办的党校、政校毕业生，在安徽担任党务和行政科秘以上职务的，原有二十人左右。如吴璜祥、徐君佩、吴邦护、许钱依、周方、周天固、萧继宗、蒋慎良、谢大烈、朱兴良、魏寿永、莫寒竹、吴文源、李光铎、杨甲等，他们最初和新桂系相处，尚无多大问题。安徽政校毕业生通讯处成立时，还由政校聘请李品仙为指导员，借以加强联系。在新桂系和CC的关系破裂以后，这些人亦被新桂系视为眼中钉。除了被新桂系拉过去的个别的人以外，多数受到排挤打击，或离开安徽，或被调动工作。如

吴塘祥、许钱侏、周方、萧继宗、谢大烈等，都因不安于位，先后辞职。周天固以担任李品仙随从秘书之故，尤为广西干部所嫉视，认为他是 CC 的坐探，千方百计地打击他，逼使他于一九四三年改任安徽学院工作。

新桂系与 CC 在省党部方面，仍是和从前一样，明争暗斗，矛盾重重。首先，卓衡之以斗争失败，于一九四一年辞去书记长职务，空缺由中央组织部指派杨绩荪代理。一九四二年又改派魏寿永兼任。魏虽系老牌 CC，但反动才能不如卓的老练，勾心斗角，远非老奸巨猾的李品仙、韦永成的对手，干了一年多就垮了。魏寿永于一九四三年秋间辞职后，由曹敏接替书记长。嗣后，委员翟纯病故，魏寿永、张一寒、黄肇祥等他调，中央组织部又改派李仁甫（CC）、王枬（CC）、程朱溪（CC）、黄同仇（新桂系）等为委员。曹敏系朱家骅系分子，接近军统，CC 色彩不太浓厚，且有政客手腕，善于逢迎，李、韦等对之，不似对卓、魏的嫉视，但仍然控制很严，致曹亦不安于位，于一九四五年辞去书记长兼职，仍由杨绩荪代理。总之，CC 分子虽然不断遭受打击，节节败退，但中央组织部的大门，也和新桂系一样，关得很紧，不轻易让新桂系闯进，“非我族类”，来者必拒。当卓衡之、魏寿永辞去书记长职务时，李品仙曾一再保荐杨绩荪继任，均未获准，仅允派其代理。中间有委员出缺时，又几次请派张岳灵（广西人）、李品和、汪幼平（安徽人）等为委员，亦均被拒绝。这就是 CC 还击新桂系唯一的办法，而使新桂系感到无可奈何的。

四、斗争白热化，李品仙垮台

抗战胜利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新桂系与 CC 在安徽的矛盾和斗争，逐步发展，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新阶段。这时，

CC 由防御转为反攻。首先一炮，把省党部主任委员夺了过去，刘真如卷土重来，登上了这个“宝座”，安徽 CC 大将范春阳接任书记长，原有委员绝大部分仍旧留任，惟有杨绩荪被摈斥，免去了委员职务。杨和我都非常气愤，认为 CC 太不够朋友。我们质问刘真如，为甚么这样干？他含糊其词，推说是中央组织部决定的。我又打电报问陈果夫，亦无明确的答复。我们意识到这是 CC 准备大举进攻，山雨欲来的信号，从此，杨就完全倒向新桂系一边，不复为 CC 卖力，我也提高了警惕，看风使舵，不象以前那样“忠心耿耿”于 CC 了。

这时，省府人事，亦陆续有所调整。民政厅长韦永成早已声名狼籍，特别是在胜利后，他利用接收蚌埠的机会，大发其接收财，群言啧啧，无法继续恋栈，终于被迫辞职，调秘书长黄同仇接充其职务；秘书长遗缺，派苏民兼任。嗣后，财政厅长桂竞秋辞职，由财政部派卜孟九（CC）继任；卜辞以后，又改派杨中明接替。教育厅长汪少伦因竞选立委辞职，遗缺由翟桓（朱家骅系）继任。建设厅长储应时辞职，由刘貽燕继任；刘辞后，由李品仙保荐三青团主任张宗良接替，并陆续推荐林中奇（新桂系）、张威遐（新桂系）、陈子英、杨绩荪等为省府委员。

大约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起，CC 方面，方治、邵华等在南京、上海，就开始酝酿反李运动，而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之间，斗争最为尖锐，逐渐形成高潮。其时，在南京的安徽人士，不断向国民党中央请愿，要求撤惩李品仙，并结队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声讨李品仙。同时在报纸上公开揭发新桂系在安徽统治的种种罪恶，使新桂系的臭名远扬，全国上下，莫不知晓。新桂系头子李、白和李品仙等，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安徽反动政权，日夜焦思，筹商对策，上下动员，内外配合，全力以赴，和

CC 及其他反桂反李的安徽人士，进行坚决的斗争。

省外方面，首先在南京设立办事机构，担负搜集情报，联络报社、通讯社及其他有关方面，争取支援，并在沪、宁的安徽人士中进行拉拢分化的工作。最初派安徽人夏馥棠、陈子英等为省府驻京代表，负责主持；后来又改派萧洁宇（新桂系外江派、湖南人）为代表兼驻京办事处长，夏、陈仍从旁协助。又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加派其他人员去京联络活动。当时动员的人很多，如参议员陈献南，和专员汪幼平等，都曾奔走京沪和合肥之间，为新桂系效劳。他们都由李品仙面授机宜，采取封官许愿，帮助竞选立监委员、国大代表，和馈赠金钱礼物等等方法来争取同情和助力，对抗反李运动。他们的这些活动，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如配合省内的活动，组织在南京的安徽人士，通电上书拥李，利用反CC分子混入反李运动中刺探消息，收毁反李传单标语等工作，都收到了相当的效果。在这方面，当时在南京国防部担任参谋的王正材（安徽人），帮助萧洁宇出力不少。

南京党政高级人员和安徽元老，如吴忠信、许世英、张治中、杨虎等，则多系由李、白和李品仙等亲自出马进行联系。例如，为了争取杨虎的支持（因杨曾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勾搭进行反李），李品仙曾利用自己和杨的旧谊亲往上海拜访拉拢；杨亦优礼接待，并组织一部分安徽同乡，举行欢宴。李在上海逗留期间，与杨花天酒地，相处甚欢。当时，杨以举办某种事业缺少经费为词，要求李品仙捐助，李慨然承诺。事后萧洁宇告诉我，李派他送了杨一笔巨款，几亿元（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从此，杨即未积极参加反李。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张治中回巢县原籍探望亲友。李先期闻讯，对我说：“张文白在老蒋面前说话有力量，这次回来，我们

要好好招待，说话要特别谨慎，还要暗中注意防止对我们不满的人和他接近，不使他有坏的印象”。张先生到合肥时，党政军各界曾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李品仙在会上致词欢迎，对张恭维备至，大捧特捧；张先生讲话时，相应地也说了一套表扬李品仙“政绩”的好话，在当时动荡的局势中，为新桂系帮了大忙。

李品仙除尽力争取安徽元老支持外，还多方拉拢其他方面的力量，引为己助。

各报馆通讯社，通过萧洁宇等的收买拉拢，一般很少登载反李宣传材料，有时亦仅简单地披露一点反李运动的新闻。只有《救国日报》常常有意识地全文发表反李运动的新闻稿件，经过萧多次和该报社长龚德柏商谈，允予津贴补助，终以龚索价太高，李又吝而不与，未能达成协议。孙慕迦（复兴社骨干）所主办的南京《中国日报》，也不肯为新桂系卖力，使李品仙非常恼火。孙原系由我介绍认识李品仙的，在抗战期间，彼此关系很好，胜利后，李利用劫收敌伪的印刷机器，交孙在南京办报。该报经费，大部分由李负担，并派胡行健（新桂系外江派、湖南人）为经理，协助孙工作。反李运动发生时，李一再嘱其登载宣扬新桂系在皖“政绩”和驳斥对方的文字。孙认为这样做，新桂系的色彩太浓厚，影响报纸销路，没有完全接受李的意见。李大为不满，以后就停止了该报的津贴。

省内方面，首先进一步加强反动领导，调整和巩固核心组织，集中力量，打击 CC，并和京沪一带的反李运动相对抗。多年以来，新桂系在安徽除大力培养干训生作为自己的基干外，并利用地方派系矛盾，在各界中上层人士中，积极进行争取友军和扶植力量的工作，已经奠定了初步基础。如以江彤侯、陶若存为正副议长的省参议会和合肥、安庆等县大部分县参议会以及三青团

主任张宗良等，基本上都能和新桂系互相呼应，配合一致，成为维护新桂系反动政权的有力工具。在反李运动发生后，李品仙为了应付当前斗争的紧张局势，一面调整省府内部人事，如上所述，并利用我和杨绩荪与 CC 之间产生的矛盾，以秘书长为钓饵，使我上钩，完全倒向桂系一边，为他们卖力（CC 攻击新桂系材料中，连带也攻击了我，这也是我脱离 CC 关系的主要原因）。同时，把各机关的亲信干部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安徽省公务员业余进修会”，以黄同仇、黄绍耿、林中奇、陈子英、杨绩荪、苏民等为核心，又把省县参议会、三青团以及其他机关团体中倾向新桂系的安徽中上层人物，组成“安徽建设研究会”，以陶若存、张宗良、程中一（曾任专员及省参议会秘书长）、朱子帆（省参议会秘书长）、汪幼平、常恒芳、储应时、汪少伦、范苑声（专员）等为核心，郑汉任秘书。这两个组织，在李品仙直接领导之下，密切配合，分途进行拥李活动。有时分别秘密集会，有时在李品仙家里举行联席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为汇报情况，研究对策，布置工作。如在一九四七年春季，省参议会在合肥开会，各县参议会议长亦多来到。由建设研究会及进修会的分子出面，策动他们单独或联合打电报到国民党中央拥李，并组织安徽邻近南京各县的各界人士赴京请愿。在这两年当中，由于运用这两个组织的力量，抗拒了 CC 和反李运动的强大攻势，使省内没有受到省外的波及，支持了李品仙，得以苟延残喘。特别是在办理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的选举中，新桂系由于建设研究会的力量，配合各县政府，把持操纵选举，威逼利诱，严重地打击了 CC 分子，使他们纷纷落选，从这里面发展了一大批同情新桂系的生力军。如立委中的朱子帆、王丹岑、汪少伦、徐君佩、奚伦、陈紫枫、徐中猷、刘启瑞、端木杰、陈铁、夏馥棠、汪新民、李荫五、黄梦飞、马景常等，多

系同情新桂系的人物或中间分子。而 CC 方面，只有邵华、余凌云等极少数的人。范春阳原来参加桐城区立委竞选，因遭到新桂系和研究会的打击而失败。国大代表中，同情和支持新桂系的人更占多数，如陈献南、陈天仁、范苑声、李荫生、张一寒、俞荫生、丁澄芳等，这些代表，对维护新桂系政权和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安徽的地方巨绅如江彤侯、常恒芳、王葆斋、高铁军、金慰农之流，李品仙一贯对他们争取笼络，因而大都倾向新桂系或采取中间立场，未卷入反李运动的漩涡。特别是江彤侯，因任省参议会会议长的关系，为新桂系帮忙很大。

省党部方面，刘真如、范春阳等原与方治、邵华等内外配合，暗中进行反李。迨后，刘于一九四七年病死，陈访先（CC）继任，仍以范为书记长，不久，党团合并，以张宗良为副主任委员，并派卜孟九、范任（省社会处长）及原任三青团干事夏赓英等为委员。陈、范虽与方、邵暗通声气，但因党团之间有矛盾，不能为所欲为。加之，李品仙对陈亦尽力敷衍应付，特提拔其亲信程朱溪为十区行政专员，因此，这时期的省党部，没有露骨表示反李。

综上所述，新桂系李品仙等，为了对抗 CC 和安徽人士反李运动，已竭尽压迫拉拢分化的能事。但其结果，不过是在波涛汹涌的反桂反李浪潮中，作一时的垂死挣扎，毕竟无法挽回他的失败命运，终以千夫所指，弄得焦头烂额，于一九四八年八月，被迫辞职下台，由新桂系另一个反动头子夏威接任主席。以暴易暴，安徽人民仍然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新桂系和 CC 及其他方面在安徽的斗争，仍在继续向前发展，直到解放。此时作者已经离开安徽，具体情况如何，也就无从叙述了。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我所知道的中统

刘 恭

中统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主要特务组织之一；它的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笔者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曾在中统局局本部任职，对这个罪恶机构的内部组织情况及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了解一部分。现就个人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扼要写出。但笔者所知有限，要把这个罪恶组织成立后十多年中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揭发出来，则有待熟知其内幕者共同追忆。

从党务调查科到中统局

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初，陈立夫在上海、南京招揽了一批流氓和革命叛徒，从事政治阴谋和破坏活动。后来蒋介石就以这批流氓和叛徒为基础，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成立党务调查科（后又扩充改组为党务调查处）。一九三一年初，又在南昌“剿匪总部”（后改称为“南昌行营”）设置了一个谍报科，最初由邓文仪负责领导其活动；不久，蒋介石把这个特务组织拨给戴笠指挥。到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蒋介石将他的特务组织合并，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机关，由陈立夫、陈焯（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厅长）分任正、副局长。局以下分设第一、第二、第三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第三处成立较晚，处长初由少将秘书丁默邨担任，后改由金斌担任。三处之上设有

局本部，徐恩曾和戴笠的人都有。这时，第一处设在南京瞻园路132号，它就是中统的前身。一九三八年初，中统还有过这样一个名称：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徐恩曾是这个组的中将组长。一九三八年三月，蒋介石对其特务组织实行改组，分别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军统以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中统以国民党中央执会秘书长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实际上，军统和中统都是副局长负责。原来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专管邮电检查，曾改称为特检处）的业务曾一度划归军委会办公厅，后再拨归军统。

中统初迁到重庆时设在九道门兴华小学内，后设在两路口川东师范。

中统局的组织有以下几个部门：

局长室：总揽全局重要事务，设主任秘书一人和秘书若干人。

人事科：主管有关人事登记、卷册档案的保管和发给证件等纯事务性工作；人事实权在局长室，所谓纪律制裁、特种违纪、内部案件的审理也归局长室临时指定专人负责处理。

专员室：担任设计、联络和临时分派的其他工作；也有个别专员安置在其他部门；专员级别弹性较大，有的仅次于局长的级别，有的相当于组长、科长的级别；人数无定额，最多时达三十余人。

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牒和总务，下设五个科室，分管其业务；译电室有个时期也归这个组管，后改隶局长室。

第二组：主管党派，以反共为其中心工作，其他党派和进步团体也被列为其工作对象；对反动帮会、宗教团体，盗匪扒窃集团及日伪汉奸的工作亦由这个组负责；下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四科，分担上述各项工作。

第三组：主管训练、组织、与其他机关的联系及外事工作；初设四科，后缩并为三科。

经济调查处：专管对日伪和解放区的经济调查。

交通处：主管全国的中统电台、电讯器材、通讯及沦陷区和解放区的秘密交通。交通处的特务几乎自成一个独立系统，留驻在处里的人不多，分布在省、市的人员数目很大，尤其是外围和雇用的爪牙更多，特务交通组织是利用反动帮会、盗窃集团、封建把头和汉奸流痞等所建立的一个大黑帮。这个处在活动中，和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的中统大特务季源溥密切联系，配合进行工作。交通部在西南公路、铁路系统的黄色工会大都归季所掌握，黄色工会的爪牙们则为中统的特务活动出力。

研究室：专司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的策略、理论和史料的研究。它是与各处组平行的一个机构，配合第二组，负责研究反动政治技术和收买叛徒的工作，并指导各省市调查室执行中统的工作方针，解答工作中的疑难。

统计处：这是中统在抗战初期筹备了很久的一个单位；其主要任务是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办法与军委会侍从室第三处相配合，对国民党党内外（特别是与反动派相对立的）的重要人物，搜集资料制成档案和卡片，以备蒋介石查询。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由于人力不够，这个处始终只有一个空架子，没有作多少实际工作。

实验区：即重庆实验区。中统拿它作为地方特务活动的示范，使各省、市调查室从这里吸取经验、推而广之。它的地位相当于各省、市的调查室，但其人员比省、市调查室多，而且着重于行动工作，凡逮捕、拘押、刑讯、组织流氓打手搞政治破坏等一套罪恶活动，均由中统局本部直接指挥实验区执行。实验区在重庆市区、南岸、江北和市郊几个重要乡镇都设有秘密机关。

省、市调查室之外，还有一些由局本部直接指挥的中统机关，例如：交通部调查统计室（季源溥负责）、财政部盐务调查工作组（顾建中负责）、海外部工作组（初由陈宗周、后由谭永昌负责）、司法官训练班工作组（洪兰友负责）、内政部县长训练班工作组（李永懋负责）、外交部公务员联谊会（张道行负责）、中国文化服务社工作组（刘百闵负责）、教育部工作组（温麟负责）……等等。

中统对下级行文或发电初用“程恭”这一代名，后用“盛励”，两个代名均由徐恩曾用毛笔写刻签章盖用。

中统的组织庞大，人数众多，除军、警、宪这些军事部门基

本上没有中统的“蚯蚓”（他们用这个名词称呼打入各个部门不露身份的特务分子）之外，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各院部会到各省、市政府以至县以下政府机关都有他们的踪迹。但是，正式经过一定手续加入中统组织的并不是全部。根据1941年中统人事科统计的数字，计：局本部488名（女21人）；实验区137名（女6人）；各省、市、县9,655名（内女性人数记不起了）；各部队2,000名（记得是两千多一点）；民众团体300名（约三百余）；外围骨干690名（确数记不清）。

人事科长孙翼谋对笔者说过：“我们局里大概有一万三千多正式的调查工作人员。”他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为徐恩曾办移交给叶秀峰的时候，与笔者所记得的一九四一年年终考绩表报数字大致相符。这就是说，从徐恩曾手里交给叶秀峰的中统特务总数至少是13,270名。

中统的人事制度和人事管理情况不同于国民党一般机关，也不同于军统。它在军委会调查统计局那段时间，全局人事是照军事机关编制的。其时，徐恩曾是一个少将处长，他以下都是校、尉之类的职级。到军委会第六部第四组那段时期，中统人员还是保持军事编制，并且大部分都升了级。到重庆后，有一段时间，只发生活费，因为在改组成立中统之后，已经成了国民党的党务机关，所以发给特务们的月费叫生活费。后来蒋介石以手令指定中统的编制完全纳入中央党部的编制。于是中统各级人员的生活费也比照中央党部同级人员支給。由于中统内相当于科长以上的老特务人数很多，故在中央党部的编制之外，中统又以调查员的名义安置了一批人。这些人分布于各处、组、科和各省、市，起码月支生活费一百一十元。也有相当于局本部组、处长级的（如广西调查室主任蒋静一和粤汉湘桂铁路局督导员徐政都是相当于组、

处长级的老特务，在局本部的名义还是调查员)。中统的经费开支，除规定的编制外，超过部分是从中央党部特别费项下支付的。

为了不使一些老特务集中在中统局内并便利工作的开展，CC高级会议决定利用关系把这批人分布到一些公开机关里去，当然仍旧是替特务机关服务。如中统特务顾建中打入的盐务部门，季源溥打入的交通部门，濮孟九和王思诚打入的粮政部门，洪兰友主持的司法官训练所，李士珍主持的短期警官训练班，刘百冈主持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包括各省、市的分社），正中书局（包括各地分店）、财政和税务部门以及CC把持的中国农民银行都曾安插了一批中统特务。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中统又派了一些人到高等学校和国立中学担任“训导”或“训育”等工作。中统特务到了公开机关，往往被人视为一般CC分子，实际上他们仍与当地中统机关（调查室）取得联系，进行特务活动，有的还直接向中统局本部汇报。中统组织对他们也常常发布指示。有的特务在外面工作了许久，中统又把他们调回局本部，如在正中书局搞了很长一个时期的朱元懋（江苏人），在叶秀峰接任中统局长以后，又调他回局本部当秘书。

局本部的特务随身所带证件有两种，一种叫调查证，一种叫职员证。试用人员和雇用人员以及临时调用人员这两种证件都没有。发给调查证的多半是常有外勤任务或对外联系较多的人；也还有一种不成文的制度，就是较高级的特务可以领用调查证，一般特务只能领用职员证。职员证只证明持证人的身份。调查证上除载明持证人的姓名、年龄、职别以证明持证人身份之外，另一页还载有“希军警宪机关予以工作上的协助”和“准随身携带自卫手枪一支、子弹一百发”之类的条文。所以，特务们凭着这件满天飞的“派司”在蒋介石反动政权管辖范围内可以横冲直撞，

胡作非为。

中统特务转到别的公开机关去做官时，有件事情很伤脑筋，那就是国民党政府的一套所谓铨叙制度。特务们在特务机关混了多年，根本没有什么“资历”，报到铨叙部门往往不能通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徐恩曾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中统的这批喽啰们一起报到中央党部，得到蒋介石的批准，用“从事党务工作”的年资，参加中央党部的“党务人员甄审”，每人发一张甄审证书。拿了这张东西再送到铨叙部去办铨叙手续，便可变成政府的正式官员。

还有一些特务以伪装“学者”做了官的。如徐恩曾的亲戚穆超，他以平日东抄西凑的一本什么著作送去审查，搞到了一个荐任一级；其实，他并不是学者，而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统特务。特务中有些老粗看了眼红，发牢骚说：“多写几个字就官高些、钱多些，我们不会写的就捞不到。……”徐恩曾针对着这些情形，在一次纪念周上说：“我们干的事业是无名英雄的事业，不为发财，不为升官。升官发财的人谁不靠我们？如果我们同他们一样，只想升官发财，又有谁来替我们做保卫政权的工作？总裁说过：‘我们的主要力量，一是军事，二是政治，三是经济’，我们担负的是政治工作的核心工作。谁看不起这工作，就是看不起自己。谁要是想争官做，就不配在我们这个团体里呆下去。……”结果，并不如徐恩曾所希望的，许多特务并不爱这“无名英雄的事业”，他们都象饿狗一样，只想多抢多吃，甚至徐恩曾自己也不例外。尽管徐口里说得漂亮，实际上他是一头最贪婪的饿狗。中统专员刘不同（后来作了伪立法委员）就对徐恩曾的话放了一炮，他叫嚷着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明明是乌鸦，插上花毛也不会变成凤凰。我是当婊子的，不要起贞节牌坊；说我们不想要几个钱，那孔祥熙也可以

称为孔夫子大圣人了！……”刘不同素来是一个以卖粗出名的家伙。他在躲警报时，常常站在防空洞口发牢骚，引起许多小特务思想上的共鸣。因此，徐恩曾非常讨厌他，在徐还没有垮台之前，就把他搞出中统去了。

中统外调公开工作人员与中统的组织关系问题，这里有必要再加以说明。本来中统特务和军统特务一样，在正式加入组织时，必须服从一条原则：以特务工作终其身，不得中途自行脱离。中统特务在外调公开工作以后，一般还是同组织保持联系，但也有例外。曾有少数特务擅自脱离中统而没有受到纪律制裁。原因是中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徐恩曾突然垮台，叶秀峰接任局长，尽量安置他自己的亲信，对于旧人的去留，没有严格加以拘束。如第一组情报科长张国栋到了内政部，第二组组长王思诚到了粮食部，主任秘书濮孟九到了安徽省财政厅，秘书张兆翔到了重庆市田粮处，第三组组长谢永存到了新疆省党部。这说明中统在人事上随着头目的更换也不免有所变易，这和国民党其他机关有相同之处；所不同者，大部分职业特务基本上没有更动。这也说明，地位较高、办法较多、不以中统活动为唯一政治基础的人，仍可各自东西、各奔前程，所谓组织纪律，对这般特务是不发生约束力的。

中统的一些主要头目和骨干

中统的主要头目和骨干，就其来源而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路：（一）蒋介石、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嫡系（江浙系，多为CC骨干分子）。中统首恶曾任中统副局长的徐恩曾就是陈氏兄弟的表亲。接替徐职的叶秀峰是和陈立夫同时留美的，也是CC高级会议的分子。中统重要分子张道藩和做过中统挂名局长、后来脱离CC另

树一帜的朱家骅也都是出身于这一系统。其余中上层的骨干出自这一系统的还有不少。(二)蒋介石在“四、一二”叛变后收买的革命叛徒。如红九军的大叛徒何畏(后改名何云),红二十六军的叛徒杜衡和陈建中等都在中统做了许多策划和直接作恶的工作。(三)国民党中央党校(后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再改为政治大学)毕业生经CC选送到中统来的。后来被提拔担任组、处长的如谢永存和始终跟在陈立夫身边的温麟这些人都属于这个范围。(四)从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生中吸收的分子,如王思诚、张志鹏、齐耀荣等是。(五)通过CC组织在各大学毕业生中选用的,如项本善、张兆翔、牛传钦等是。(六)从反动帮会、政治集团中物色的,如陈庆斋、庆深庵(即庆玄)以及原来在国家主义派、改组派中干特务的一些人。(七)中统自办训练班培训出来的。(八)私人介绍试用合格成为正式特务的,如张治中介绍的童世纲、朱家骅介绍的胡祥林、刘建绪介绍的邓绂等。

现对中统一些主要头目和骨干本身的情况,就笔者所知,略述如下。

徐恩曾号可均,浙江人,南洋大学(后改为交通大学)毕业,曾留美学电机工程。他家里本来有个老婆,但在抗战前就和留俄学生中的一个女叛徒费侠(湖北黄陂人)扯上了。由于家里的老婆闹得很凶,直到一九三七年还没有和费正式结婚。后来他的爪牙帮他把离婚条件谈好,才和费同居。他和费侠的关系不止于普通的男女关系,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原因。通过这个女叛徒,徐恩曾拉上了另外一些留俄的败类如西门宗华等和托派匪徒叶青等替蒋介石反动政权效劳。费侠表面上不参与徐的“公事”,实际上她对徐恩曾的罪恶活动是一个幕后参谋。这个特务头子表面上象个儒雅书生,低声说话,满面笑容,在他的行止举动上找不到一点

张牙舞爪的样子，其实他是一个最凶狠毒辣的狡恶之徒。从他某次对邹韬奋先生采取的一套就可以看出他的真面目。那次邹被邀到中统局谈话，谈话地点在局长室外面的会客室（笔者适在里间看文件）。与邹谈话的除了徐本人之外，还有潘公展（CC骨干分子、国民党中宣部长）在座。邹和徐是交通大学的老同学，原来他们就熟悉。徐对邹说：“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这年头谁满意现状呢？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我只希望你帮点小忙，这是你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希望你不要替共产党说话。这个要求总不算过分吧？”邹以锐利的眼光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看着徐，很爽直地回答说：“办不到。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我应该有这个自由。今天承你同潘部长在这里约见，我没有别的希望，也希望你们帮点小忙，做到或做不到在于你们，我希望你们允许我有这个自由。”当他们两个人正在交锋时，潘公展似乎想插上几句，徐没有等潘插嘴，马上就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拥护你有自由——不骂国民党的自由。好不好？老朋友，在这里吃吃便饭吧，快中午了。”邹起身告辞走了。徐回头对潘公展说：“这种书呆子不要正面打击他，你们只在表面上敷衍敷衍他好了，等我来收拾他。”徐恩曾就是这样一个人阴险毒辣的家伙。

徐对部属很少发脾气骂人，对叛徒们尤其特别“客气”。这是他的笼络手段。他可以把一个犯了纪律的特务从监禁中提出来，经过个别谈话就给恢复自由而不加惩处；但是暗中仍派人加以监视，直到这个人死心塌地作他的鹰犬为止。大叛徒何畏从红军叛离过来，徐把他安置在中统局内居住，除了生活上优予照顾外，还把何的妻儿也接来同住。徐本人还不时到何处问寒问暖，表示关心。何对徐真的感激涕零，拼命为之卖力。与此同时，徐又吩

附杨为（也是一个留俄的叛徒）同何接近，谈论一些理论问题；暗地里却又要第二组组长王思诚派人专门注意何、杨的行动，每天向局长室提出有关他们言行的书面汇报。徐对何畏布置的这种暗中察看，持续到两年之久。

徐为人鄙吝，视钱如命。他利用中统的特殊地位和他的职权，大做其不花本钱的生意。号称“组织”（即中统）经营的企业名目繁多；许多民营工厂和轮船、汽车公司都有他的干股。由于他利欲薰心，胃口越做越大，加以同军统的明争暗斗，经常磨擦，以致中印缅甸国境线上走私的案子终于暴露，被戴笠抓到证据，向蒋介石告状，迫使他垮台。垮台之后，他索性以私人资本大作其投机生意，先后搞过贸易运输，办过农场，开过打捞公司。这些事情在徐的罪恶史上远不及他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之重，而且大都是在他垮台之后搞的，故不拟多所叙述。

下面再介绍中统的一些骨干分子。

中统局局长室的主任秘书，初为濮孟九。此人曾留学德国，从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起，就投身于特务工作。在中统里面，他专作内勤工作，很少参加对外活动。濮调走之后，接替他的是朱家骅系的刘次箫，为一山东籍的老幕僚，年近六十。因他是朱系人物，在中统内无实权，类似客卿。

第一组组长梁辅丞，原系改组派分子，在抗战初期颇为徐恩曾所赏识，一时成为中统的要人。他是半路参加中统的，一般特务视他为外人，而他自己却以徐恩曾的亲信自居。最后他还是被排挤出去了。

在梁辅丞被排挤出中统之后，继任第一组组长的是张国栋。他是广西人，日本留学生，面型身材颇象一日本人；加以他的老婆也象日本人，在日本呆的时间很久，夫妇之间谈话也用日语，

被人视为一对怪物。他对徐恩曾是绝对服从，对特务工作十分卖力，所以在中统里面站得稳，干得久。徐垮台之后，他还被CC调到内政部当司长。

第一组的骨干分子还有项本善。他是安徽人，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学校时就是CC分子。他在中统主管全国情报系统有五年之久，地位仅次于张国栋，为徐恩曾的亲信之一。他是一个独身汉，平时不爱多说话，整天守在办公室，开会研究问题时颇能提出一些办法。虽然徐恩曾信任他，重视他，可是他却对中统的工作感到厌倦。在一九四〇年夏天，他同徐恩曾闹翻了。徐对他没有使用纪律，一再挽留他，他仍坚持要走。徐非常恼火，结果还是放他走了。这是徐恩曾垮台之前众叛亲离的突出事件之一。

项本善之离开中统是被别人挖走的。事实经过是这样：

陈诚把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抓到手之后，一心想建立起他自己的全套体系，其中有一个部门是搞特务设计的，名为调查处，以他的亲戚郭骥（又叫郭外川）为首，急于凑成一个班底。项本善是郭骥在中央大学时同系同班的同学，交情颇厚。郭在陈诚面前推荐了项。陈认为项是一个情报工作专家，在中统的历史久，能力强，同时得知他不愿留在中统，所以一拉就扯上了。项担任了三青团中央的调查处筹备工作后，揽了一批人马，几个月就树立了规模，颇得陈诚的欢心。当时陈诚还是六战区司令长官，常驻湖北，项也得经常往来于重庆湖北之间。他后来在赴鄂途中翻车身死。

项本善的助手陈积中（广东人）、主持资料工作的陈文昭（女、中共叛徒）也是第一组的骨干分子。

第二组组长王思诚，四川江津人，黄埔军校出身，与濮孟九

同时参加中央党部调查科，逐渐成了徐恩曾的亲信，是一个作恶多端的大特务。他所主持的第二组是中统局的重要部门。

第三组组长先后为高骊和谢永存。高骊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由CC送往意大利留学，学过法西斯一套理论和特务工作，是中统的少壮派人物；正同项本善一样，被徐恩曾视为后起之“秀”；也同项本善一样不安于中统，通过陈果夫的关系被调到CC所控制的别的部门去了。谢永存是国民党中央党校毕业的，为陈果夫的得意门生，在抗战前的军统第一处时代（时徐恩曾任第一处处长）就在该处训练科（科长为王立亭）工作。他是徐恩曾的亲信。

经济调查处处长李超英，浙江人，曾留学英国，属朱家骅系。

交通处处长徐白光，广东梅县人。他在中统的地位同濮孟九、王思诚等一样，属于骨干分子一级。

研究室主任杨为（又名杨拔一）江苏人，是一个留俄的革命叛徒。他被徐恩曾视为所谓精通马列主义的“专家”，认为他对共产党的政策、理论，特别是对中共的组织工作和政治保卫工作“内行”，深为倚重。张国焘、何畏等叛徒投蒋之初，中统曾派专人同他们谈话，共同研究对付中共的策略问题，杨为就每次谈话作出纪录、整理分析，送交徐恩曾转蒋介石过目。在国民参政会时期，蒋介石对中统在“政治战线”上的“功绩”曾两次传令嘉奖，其中杨为的“功绩”占有很重的分量。这个叛徒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在中统内朝朝暮暮处心积虑于他的“事业”，却开口闭口说这是“徐先生领导有方”和“前辈先生的成绩”。因此，中统一般头目对他信任很深，并多引为心腹。他自命为“苏俄通”，张冲以后就算他对共产党的理论和实际懂得最多。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俄文书刊，上衣口袋里经常插着一份《真理报》，口里衔着一个

烟斗，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专家”“学者”模样。一般特务也多尊他为“杨老师”。由于他是中统的“苏俄专家”，后来被派往新疆主持特务工作（第二组组长谢永存被派为新疆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不久谢因飞机失事被摔死了）。

中统的人事科一直是孙翼谋负责。孙是江苏人。

重庆实验区从筹备成立起，即由陈庆斋负责。陈是江苏人，为一帮会流氓出身、专搞行动工作的老特务。由于他本人具有凶残狠毒的特性和他所掌握着一批如狼似虎的爪牙，所以从徐恩曾在南京开始主持中统起，中经叶秀峰，直到大陆接近全部解放止，他始终领着他那个行动工作的班子在重庆地区从事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并且作了中统西南区的总负责人。

中统罪恶活动的一斑

中统的罪恶活动擢发难数，笔者所知有限，兹仅就亲见亲闻的事实列举一斑。

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手法是一贯的。远在抗战初期，他表面上喊着“国共合作”，暗地里却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办法”是蒋介石交由徐恩曾草拟的。执笔人是谢永存，濮孟九也参加了工作。徐恩曾自己审定了初稿，同陈立夫一道送交陈布雷，经蒋介石“指示”之后，又作了一些修改。这个“办法”搞出来之后，作为绝密文件以“中秘”（中央秘书处）代电发给国民党各级党部执行，同时发给行政院系统和军事系统的各级组织，一直下达到县一级。这个“办法”的基本精神，特务们曾作了一个确切的注解：即“背向日本，面向边区”；就是要日本帝国主义者当作朋友，把中国人民当作敌人，坚决向解放区人民及蒋区爱国人民进攻，包围封锁敌后解放区，镇压蒋区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之前，中统奉蒋介石的命令，指示敌后特务与敌伪勾结，一致对付新四军。代表陈立夫和徐恩曾上海和日寇暗通声气的就是丁默邨和吴开先。这两个老牌中统特务，表面投降附逆，实际是充当蒋汪合作的拉线人。丁默邨原是CC要角，同重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统范围内，自徐恩曾以下，许多老特务都是丁的朋友。通过丁默邨，中统和日本特务机关早已挂上了钩。中统译电室收到上海的密电，由译电室主任送给徐恩曾亲译。这个密电卷宗为绿色封皮，分类号是“0042”，因为上海敌伪特务机关是极斯非尔路76号，中统译电室把76作为“7×6”，变为42号。

一九四〇年，蒋介石就已着手布置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交给中统的任务之一是派遣高级特务进入沦陷区，直接和敌伪接头。同时，敌伪也派了人过来。中统派去的是专员邓纫，以浙江金华为前站。随后敌伪秘密派吴开先到了重庆。邓纫到了上海之后，见了日特首脑柴山中将、影佐少将、冈田大佐和金山大佐，旋即回到浙江，展开罪恶活动。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部队第四十师、五十二师、六十二师、六十三师、一四四师、新七师等进犯新四军的时候，日寇侵略部队马上配合行动，封锁长江，完全是事先通过双方特务勾结布置的。邓纫在浙江经常以密电（密码是“滔密”）与中统保持联系。后来，这个特务的汇报忽然中断了。经过中统浙江调查室的调查，才知道是被日本特务杀掉了；原因是邓在敌后建立地下武装，拉扯汪伪特务，使之暗中接受中统的指挥，所以不容于日寇而被消灭。

吴开先从上海秘密到重庆，首先见到徐恩曾，没有等徐问到邓纫的事，他就作了一番解释，说是出于误会，并极力保证他一定为“组织”尽忠效劳，还说重庆方面有什么需要，只要是他可

以办到的，决不推脱。于是徐带他见了陈立夫，随后张道藩又同他一道在南温泉会见了陈果夫。当吴开先到牛角沱朱家骅私宅去找朱的那一天，朱事先曾以电话通知办公室称病，并嘱咐其随从季副官不接见宾客，以免别人打扰他与吴的密谈。朱接见吴时，笔者也在座，我到时，他们已谈过约两小时了。大概是下午四点左右，朱以“午后茶点”招待这个汉奸客人。吴谈到敌伪区的经济情况，特别提到军统的“地下人员”大发其财的故事，自命为“学者”的朱家骅，这时也听得眉飞色舞，不禁说出“大有可为”的话。

蒋介石为了贯彻他的“反共灭共”的狂妄企图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原则，曾经写了一个手令交给徐恩曾一个任务，内容大致是：就国民党党员中挑选忠实可靠的分子，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调查网，替中央做耳目，提供情报材料，以供惩治奸邪、肃清贪污的参考；要中统局拟具办法呈阅。徐恩曾奉命后，召集少数高级人员（包括谢永存、王思诚和几个专员）开了一个会，指定谢永存等负责起草。草稿完成后，徐和陈果夫、陈立夫提经C C高级会议修改补充，再送蒋介石核准。根据这个“办法”，中统就开始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特务外围组织。首先，在重庆各中央行政机关、部队、学校、工商界开展建立调查网的工作。建网工作是由中统一手包办的。凡被吸收加入调查网的分子需要介绍人两人（限于中统特务），要填写详细申请登记表四张，每张都贴上本人半身照片一张，经调查网的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始予接收。接收后，每人发给“调查手册”一份，上载有蒋介石的“手令”一道，内容大意是：“党员调查网工作是维护国法党纪的工作，忠实党员有责任对党的调查工作效力，务使社会风气尚礼义、知廉耻……”这一套滥调。调查网分子拿着这个“手令”，把它当作蒋介石对他下的

命令，他们进行工作就是执行“总裁”的命令。为了指挥调查网的活动，中统还特别设了一个办公室。这个专门办公室和调查网分子的通讯联系办法是：办公室用“许清”的代号，通讯处是重庆邮政信箱第91号，调查网分子则用自己的号码代替署名。从一九四〇年夏到年底，单在重庆市就收罗了共约三千人，其中文官简任、武官少将以上的高级官员占十分之一，一般行政人员占十分之六，学校教职员和学生占十分之二，其他十分之一。调查网汇报的材料中，以检举贪污渎职的为最多，约占百分之八十；揭露汉奸嫌疑的占百分之十二；诬人为共产党或共党嫌疑的不到百分之十，并且多是挟嫌陷害或是捕风捉影的。徐恩曾感到对蒋介石不好报账，很不满意，并且有点泄气。在一次调查网办公室开会时，他说：“这个工作费时很久，动员人力很大，结果是调查了自己，出了自己的丑。做共产党的工作确不容易！我们究竟还要不要继续搞下去？如何改进？希望大家发表意见。”随后，各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点：这个办法往往给通讯者以挟嫌诬告的机会，搞坏了中统的“名誉”；通讯者中间已发现招摇撞骗的事件不少，再让他们搞下去，毛病愈多，愈背不起；其他派系集团已发现中统在利用这个办法挖它们的墙脚，痛恨之余，在蒋介石面前说话的大有人在（以孔祥熙说得最多）；各省、市、县的中统组织已经有了一套外围组织，这次建立调查网的命令下去，等于在原有的喽啰身上加个新名义。综合大家的意见，都是倾向于不继续搞下去。徐恩曾也顾虑后果严重，决定把调查网从中统推出去。他先在CC高级会议上同陈果夫、陈立夫谈了自己的意见，取得他们的同意，再向蒋介石建议把这个“网”交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去搞，改调查网为监察网。蒋同意了。后来朱家骅在闲谈中说道：“空网交给冷衙门，总比给老头子（蒋介石）看破

好!”

与搞调查网同时，中统还奉命办了一个经济检查人员训练班。它的任务是在调查蒋管区内经济方面的营私舞弊和贪污渎职及非法经营工商业的黑幕。据徐恩曾说，蒋介石之所以要搞这一手，是由于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蒋管区内的通货膨胀、法币贬值日趋恶化，特别是违法的公务员与奸商勾结，造成金融市场的严重混乱，必须迅速抑制这股逆流，以免动摇根本。其实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四大家族的疯狂掠夺，官僚资本的无法无天。蒋介石的反动政权本身就是代表四大家族的利益的，所谓经济检查，当然不会触动它们自己一根毫毛，只会使那些中小工商业者变成特务们敲诈勒索的对象。

这个训练班一次招训了好几百人(多是失业失学青年)，由中统请了外面一些人讲解法令规章，中统特务们则担任“训导”，进行反动的政治思想教育。因为时间短，没有可能把他们完全当作中统的特务来训练。训练完毕后，以这批人成立了一个经济检查队，名义上隶属于行政院，实际还是由中统领导。这个队虽只搞了半年左右就撤消了，可是已干下了无数扰民的罪行。结束之后，大部分队员都被遣散了，其中约有二十人左右被中统吸收当了正式特务，大都安插在经济调查处。

徐恩曾这一次搞经济检查虽没有搞出什么名堂，但他却从这次活动中了解到一些他以前不大清楚的事情，例如敌伪汉奸通过重庆的官僚奸商大规模从沦陷区向蒋区走私的情况，使特务头子都不免感到吃惊。其中许多人是蒋政府中央各院部的高级官员，有CC分子，也有军统分子，他们和南京汪伪政府的重要角色勾通的。这是他从经济方面摸出的一条黑线。这条黑线和政治方面蒋汪勾通那条线是一致的。

在中统经济调查处的业务中，也贯串着勾通敌伪、反共反人民这条极端反动的政治路线。这个单位着重于调查敌伪区的经济动态，进行分析研究、按时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汇报。其中大部分材料是中统电台收来的电报，一部分来自汉奸提供的情报，有的取自日本报刊。中统和汉奸在经济方面的勾结，美其名曰“物资调节的研究与设计”，实际上是蒋帮和汉奸共同搞生意经。经济调查处还通过陈果夫同中国农民银行的关系，拉了很多生意，为C C集团发卖国财大开门路。在敌伪区由蒋特和汪特合作成立了一些商行公司，大作其投机买卖，特别是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邻近沦陷区地区的银行都通过这条特殊路线引来大批生意。

除此以外，中统对于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和解放区的经济动态情报的搜集也不遗余力，经济调查处设有专科主管其事。

在中统的特务活动中，交通处与各部门都起着配合作用。交通处在沦陷区的活动，主要是依靠汉奸的支持。中统要派什么人到沦陷区去，交通处就给他布置站口，介绍接头的人，取得敌伪方面的合法证件通过关卡，并且在发生问题时为之设法解决。中统专员邓绂由重庆去浙江，不仅由交通处负责沿途护送，到了浙江之后还利用交通处的关系掩护他的活动。对于解放区，交通处则难以施其伎俩。有一次徐白光在星期汇报上向徐恩曾说：“解放区的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内线难建立，化装有危险，进得去，出不来！”这是真话，也是事实。但是，中统决不会因此就停止对解放区的阴谋活动。据我所知，有这样一件事：叶秀峰看中了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的一个福建学生杨博清，他叫这个走狗伪装为一个“纯洁”“爱国”青年，于一九三八年混进延安。事前也是由交通处替他布置了沿途关系，使他顺利到达目的地，混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此人后来由抗大出来，又回到重庆从事特务活动。交

通处的魔爪，遍布各省市，所有重要交通线上都有它的人。这些人经常带私货、贩毒品。徐白光自然发了大财，经济调查处处长李超英也分到了不少的油水。

中统中专搞反共的第二组集中了徐恩曾认为是其基本队伍的要角，如王大镗、吴若萍、沈哲臣、杜衡、章志仁、何畏、陈建中等一批革命叛徒、帮会头目和流氓恶棍。徐恩曾提出的“以组织对组织”的策略，是以第二组为中心来执行的。

为了训练特务、提高其反共本领，第二组组织特务们搞业务学习，要特务们阅读马列主义书刊，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问题。当所谓业务学习进行“演习”时，吴若萍（托派匪徒）装扮为共产党领导人，就某一个问题以共产党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一番分析判断，有时还来一套鼓动宣传；参加演习的特务们则在旁边评点。说这一点不象、那一点走了样；反复演习，一直要搞到以伪乱真的程度才罢休。更恶毒的是他们常常研究共产党内思想不稳的分子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加深其动摇并最后把他拉过来的办法和步骤。第二组的特务们自认为在这方面有一套，中统的头目也常以此作自我吹嘘。有一次，陈立夫对笔者说：“戴雨农（戴笠）欢喜蛮干，他们的情报人员往往摆出一副吃人的样子。如果可以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那么情报工作技术还有啥用场？”陈是在一个特务训练班讲授“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之后随便谈到这个问题的。从这几句话里可以看出这个CC头子对军统的不满，认为它的工作不合要求，而自诩中统要比它高明。中统在这方面的反革命政治技术确实比军统更来得恶毒。

中统在文化出版界的特务活动也是由第二组负责的。它与刘百闵负责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叶溯中负责的正中书局以及中央政治学校部分自命为反共策士的冒牌学者串通一气，印行过大量宣

传反共反革命的小册子，以达到捏造事实、诬蔑共产党、迷惑群众、麻醉青年的目的。其中发行最多的有《延安归来》、《陕北见闻》……等。这些小册子的作者往往以“无党无派的中间人士”的面孔出现，印行时不用正中书局的名义而随便印个什么出版社，如独立出版社之类的名字。除了这类廉价的小册子之外，他们也出版过厚本书，如苏共叛徒克拉夫琴科的《我选择了自由》这本书，内容经过第二组一再修改，翻印了一万册以上。

中统对于进步青年的迫害，是在第二组的指挥下由重庆实验区的行动工作队和CC集团中专管职业学生反动团体的特务分子王星舟等合作进行的。通常的作法是：首先利用青年学生中的败类，成立一些公开和半公开的外围组织，然后吸收其中思想极端反动、个人名利欲极强、道德品质堕落的分子组成核心，同特务机关配合行动。以重庆为例，CC在沙坪坝和磁器口一带的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在中央大学（这是因为抗战以前中大在南京时期就有反动组织的深厚基础）。CC在中央大学的半公开反动团体就有三个：生路社、民锋社、自强社。这三个团体都是由王星舟领导的。以中央大学为中心，王星舟于抗战初期在重庆大学和四川教育学院等校发展反动组织，收罗特务学生谢岷、崔尧、谭永昌、赵剑豪等约二十余人，并成立了一个沙磁区联社。它和中统重庆实验区的沙磁站经常保持联系，配合进行工作。这两个组织在中统第二组的指挥下，对进步学生的动态进行侦察监视，并制成各种纪录材料和黑名单，供上级特务机关参考。一九四〇年中央大学学生冯秀藻的失踪，就是中统重庆实验区根据王星舟的黑名单逮捕的。

中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特务机关，主要为省、市调查室。其罪恶活动的性质自然是和局本部完全一样，活动方式则适应各地

方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笔者对于各地中统特务的罪恶活动情况不可能全部了解。这里只就个人比较熟悉的几个地区的例子，扼要加以举述。

贵州省调查室（简称黔室）的业务曾被中统局本部评为第一等。究竟它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呢？就笔者所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黔室主持人程惕予（又名程铁如、程迪庐）是一个“四一二”事变后投效蒋介石的革命叛徒，长于组织工作。抗战期间，他在贵州替中统的工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他用就地取材的办法培训了一批干部。二、黔室对组织纪律要求比较严格，在贵阳及安顺、镇远等重要据点活动的特务很少发生敲榨勒索的事，以此而博得地方豪绅巨室的赞扬。三、它注重特务的学习和小组生活、以此作为训练特务的主要方式；对于各项专案均于事后进行讲评、总结检查；特务活动的方式方法比较灵活、不拘陈套。陈立夫到贵州视察回来，曾在局本部说：“共产党的方法也可以用，用来替我们办事，交关好。”四、中统从黔室调了一批人到局本部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较高，纪律性和工作能力较强，颇为徐恩曾所赏识。徐恩曾还将其中一个叫向贤书的特务破格提升为重庆实验区某一部分的领导人。五、张道藩是贵州人，他将他在贵州的一些根子都交给黔室使用，这给了黔室一个更好的作恶条件。同时，谷正伦、谷正鼎，谷正纲在贵州的地方势力也被中统拉拢利用，处处帮助中统而敌视军统（因为军统不卖账，偶然还同他们闹小摩擦）。六、黔室对拉拢和利用苗族上层分子的工作曾下了一番功夫，它曾同天主教帝国主义分子法国神甫合作，在贵州石门坎地区做了一次持续将近三年的调查工作，写了长达十多万字的专案材料，并诱骗苗族上层中的实力派（有武装的豪绅）参加了中统的外围组织。

中统为了加强铁路交通线和有关省区的特务机关的联系和协作，特在粤汉、湘桂两路和广东、广西、湖南省的调查室之外设立了一个“湘粤桂联组”。广东省调查室负责人余俊贤、广东蒋静一、湖南韩中石、粤汉路调查室负责人田纯玉（湘桂路也有调查室，听蒋静一指挥）都是这个“联组”的成员。徐政（又名徐子政）则以督导专员的身份奔走曲江、耒阳、衡阳和桂林，担任联络督导的事。这个“联组”作恶最多的是行动队长伍岳和他的那一群武装土匪。他们经常在粤汉路北段骚扰抢劫、姿意捕杀，地方居民恨之入骨。田纯玉则着力在粤汉路拉拢工贼，控制黄色工会，布置铁路上的特务工作；他还和伍岳及粤汉路警务处长史铭（军统特务）勾结一气，用种种卑鄙手段搞钱。

湖南调查室负责人韩中石及其喽啰们工作表现的特点是忙于狗咬狗的党团摩擦。中统局本部对这一点很不满意，因为这样一来使CC在薛岳统治下的湖南无所施展，处处受牵制、受打击。其次，韩中石到重庆向中统局本部述职时，徐恩曾指着他骂：“张荫梧是一个摩擦专家，是一个共产党所讨厌的摩擦专家；你这个摩擦专家是对内的，是一个生是非、造障碍的傻瓜！”经过这次批评，湖南调查室才改变了一下作风，虽然同三青团仍旧势不两立，但和军统在反共工作上已开始合作了，例如当时担任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的萧×（CC分子）曾与军统负责人苏业光（又名苏一戈，新化人）勾结，破坏茶陵、攸县一带的中共地下组织，搜捕中共党员。

中统在华北地区的工作是与CC头子之一的张厉生密切联系并在他的支持下开展的。张后来不见信于CC，但他和朱家骅不一样，没有把自己的喽啰抓在手里和CC唱对台戏；张的小组织中许多得力分子后来都转入了中统，如在第二组工作的牛传钦等；

原来留在华北地区的分子也有不少变成中统的骨干，如解放后被破获法办的董化昌（“天津铁路潜伏破坏总队”天津第一大队直属分组长），王书华（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学运组特务头子，解放前曾大批逮捕进步学生、破坏学生运动），支彭英、支永佑、吕广仁、沈振启、李树声、王富春、吴镇屏等（解放后均潜伏在北京邮政总局）都是由张厉生集团中转过来的而由中统的平室和津室所豢养布置的。

以王秀春为首的安徽省调查室虽然以很大的力量同以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为首的桂系军阀周旋，同时还得支配力量对付以徐君佩为首的三青团（中统老特务濮孟九在安徽当财政厅厅长，成为王秀春的得力助手）。可是，在防止和镇压共产党的活动这个共同目标下，他们还是团结一致的。王秀春在省级特种汇报会议上的讲话，曾被叶秀峰引用刊载于内部刊物中，认为是“处于极不利的环境下，始终能够坚持原则、化除成见、一致对付共同敌人”的范例。

中统的几种内部训练工作

中统对于培养爪牙、训练新特务的工作一向很重视。这工作除由第三组掌握外，徐恩曾还就专员中指定专人协助办理。

远在抗日战争之前，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时期，处内即设有训练科专司其事。那时期的训练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内容为：（一）政治训练：全体特务都要受这种训练。训练主要采取读书会的方式。除孙中山的著作和戴季陶、周佛海等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列为必读书之外，陈立夫的《唯生论》和蒋介石关于“新生活运动”的一套讲演也都被搬了出来，让特务们学习。同时中统还办了一个名叫“群力”的刊物，尽量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一个党”等一套法西斯理论，每期都载有诽谤苏联和共产党的文字，还经常刊登革命叛徒们写的共产党“内幕”和“忏悔录”之类的文字。这个刊物到抗日战争开始后就停刊了。(二)技术训练：训练科编有《情报业务概要》一书(五十多万字的一厚本)，它的内容杂乱：从特务工作理论(多从外国间谍书籍和中国兵书上抄袭来的)、蒋介石的法西斯言论，一直到化装术、射击术、驾驶术、摄影术以及跟踪钉梢之类的特工技术都包括在内。此外还编了许多这方面的小册子。关于各党派的实况则编印不定期刊物性质的报导手册。新吸收进来的特务分子，三个月试用期内没有事做，就专看这一类书；并且有专人与之作个别谈话，询问研习心得，解答疑难问题，算是训练中的教学。其中实用技术，只限于对担任行动工作的特务进行传授，对搞内勤和政治工作及伏案办公的人则任其自学。

南京沦陷，国民党政府经武汉退到重庆。这段时间，中统的训练工作无形停顿。抗日战争中期，中统改组完成以后，才又逐步地从各种普通训练班中物色并吸收一批新特务分子，施以正规的全面的训练。

中统从别的训练班选拔、培训特务是从三青团江北青年训练班开始的。

在长江下游和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沦陷于日寇以来，许多青年都不愿在日寇统治下做顺民，离开家乡，奔到后方，抱着爱国热忱，只想参加一些战时工作、或学点什么东西，其中大批的人辗转流亡到了重庆，多数身无分文，衣食无着。三青团利用这个机会，在重庆市江北治平中学开设了一个青年招待所，收容的青年男女最多时达千人左右。这个招待所免费供应食宿，还由三青团按各人的学历专长介绍工作。后来根据蒋介石的批示，由国

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拟具办法，将这个招待所改成训练班。三青团中央团部和重庆支团部派了一批中央军校特训班的学员来担任这个班的大队和中队长。不久，中统便通过中央训练委员会把魔爪伸到这个训练班来了，先后就一个大队（五个中队）中吸收了大约三十多人，施以特务训练，试用三个月，变成了中统的特务。其中有大、中学生、小职员、小学教员和溃散部队的青年军官。这是中统在重庆开办训练班的开端。这种从别的公开训练班中物色一些人、经过专门训练、变成中统自己的爪牙的办法，中统以后还继续采用。这也是 CC 惯常采用的方式。至于蒋介石底下的其他集团，包括军统在内，一般都不采用这个办法。它们往往一开始就招进大批的人，然后再来甄别。军统曾经办过许多训练班以为招进来就可以训练，训练完了就是自己的人，结果是许多人中途退学或者逃跑，以致经常发生把招进来的学员拘押、长期监禁的事件。CC 与 中统则以不采取这个办法自诩为“高明。”

这里附带提及陈立夫在 CC 高级会议上谈到有关训练工作的几句话。他说：“我们办训练班，训练干部，要重质不重量、宁少毋滥。我们不能用那种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以为就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到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一百个猪八戒。”陈立夫这几句话，成了 CC 核心组织培训骨干分子的原则。

CC 的外围组织很多，但其中的核心分子为数有限。CC 对这班人抓得很紧，对他们的大小官职始终以组织力量加以维护。表面看来声势浩大的 CC，实际上在每个部门往往只有几个核心分子在那里起拉线的作用；其余号称 CC 的人物，多数是摸不到风，探不到底的。CC 在搞外围组织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法。例如，1935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会员人数

达九千七百多人（会址在四象桥，经常住会办公的只有一个专任职员王鉴藩，王系金陵大学学生、CC骨干分子，后跟洪兰友当秘书）。CC对这个九千多人的外围组织，有意识地让一些非CC或反CC的分子参加，借以冲淡CC的色彩，骨子里还是由CC操纵着，把它作为一个收罗文化界的爪牙和奴才的棚子。这是一种作法。又如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个组织，象CC的这类政治渣滓本来是插足不进的。中国的工程师在旧社会有地位的对CC并不卖账，一般都不屑充当CC的走卒。可是，陈立夫、徐恩曾、叶秀峰等由于他们自己曾在国内外学过工程，与其中一些人同学关系，加以在蒋介石反动政府中占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利用这些条件，结果还是把中国工程师学会这块地盘拿到了手。CC不使自己在幕前露面，以免影响社会观感，暗中仍通过这个组织积极拉拢一些二三等货色，以扩大CC在工程技术界的势力。这又是一种作法。据中统研究室主任杨为对笔者谈：中统打入并掌握各种社会组织和训练班、从中吸收新分子、然后加以训练和使用的各种方式方法，归纳言之，约有三种：一曰“挖根移植”，就是从其他党派、主要是把中共的叛徒中具有一定技术水平，乃至具有半技之长的货色，挖来移植在中统的特种毒质土壤里，加以培育，使为中统服务。二曰“鸭卵鸡孵”，就是原来已经成为CC分子的大专学校的学生，让他们在那里学习，学成之后，等于鸡婆孵出了小鸭，一旦羽毛丰满，自然游入中统水塘。中统中的“少壮派”知识分子出身的中上层特务分子大都是这样来的。三曰“换骨夺胎”，即利用已有的公开机关、团体和企业，用其意而不袭其词，取其实而不究其本，抓住其中的少数或个别的有作用的人物，把他们拉过来，施以组织训练，先使用物质诱惑，进而施以纪律约束，使为中统工作，并且始终让他们隐蔽在原有的壳子下面，以延续其内

线生命；例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等金融机关和邮电税务部门以及文化新闻事业单位的居要津的人中都有暗藏的中统特务分子。

中统还训练了一批海外情报工作人员。

蒋介石在抗战初期逃经武汉时，于武昌珞珈山成立了一个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以桂永清为教育长。蒋介石退缩到四川，战干团一团也跟着入川，继续训练。学员中有许多是抗战开始时从国外回到祖国想参加抗战工作的华侨，而以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越南、缅甸等地的青年居多。徐恩曾久欲在华侨中培植和发展中统势力，这时就和桂永清商洽在战干一团的华侨学员中插手的问题。桂永清派了一个名叫罗剑雄的华侨教官（新加坡的土生华侨，战干团的上校教官）到中统联系。后来，中统根据桂永清交的名册挑选了约一排人，包括罗剑雄在内，从战干团正式调到中统，施以海外情报工作训练。其中较露头角，后来成为中统正式特务的，有方博之（泰国）、古秉文（印尼）、陈锦江（婆罗州）、卜哑夫（印尼）、张介夫（马来亚）、刁林（新加坡）等人。

与海外报情工作人员的训练同时，中统还办了一个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中央青干班）。它是中统在重庆所办的训练班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名义上，它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办的，实际是中统办的。班址最初设在四川綦江石角镇，后来又迁到重庆，设在中统局本部。班主任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副主任是徐恩曾。教官和训导人员全是中统特务。

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训练班？原来蒋介石为了实施“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想从重庆送一批人到华北去。他打着一个如意算盘，要求这批被送去的人，每个人能抓一个县；所以他命令中央党

部把这一批派去的人作为县党部书记长安排使用，即以书记长的名义来掩护他们的特务活动。这批人的训练工作、指定由中统负责；他们在下面的工作也归中统指挥。蒋介石指定桂永清在战干团精选一个中队的人交中统开班训练；中队长为战干团随来的少校中队长黄光朔。训练是采用组织训练、技术与情报业务同时施教的方针，重点灌输军事与政治的实用知识，培养独立作战的能力，以达到适应领导工作的要求为目的。训练内容是：（一）军事训练。在这方面改变了国民党一般训练的老一套形式，不把学员当入伍生对待，不搞操场上的“术科”和课堂上的老“学科”，将军事课程综合为一门“军事讲话”，着重军事组织、指挥、侦察、策反工作、军事地理、武器使用、军需供应、兵种调度、游击战术等科目。叛徒何畏担任主要教官。（二）党派工作。着重讲共产党的情况。叛徒吴若萍担任教官。（三）三民主义。以中统第二组和研究室合编的《三民主义讲义》为教材，内容多是一些反共的理论，中统第二组王大钰担任教官。（四）敌后经济调查。内容是对解放区及临近解放区的经济破坏工作；从封锁物资、套购商品、吸收金银、贩运毒品、印制伪钞，一直到散布谣言刺激物价、勾结奸商囤积居奇种种盗匪行动。李超英担任教官。（五）宣传工作。以诋毁马列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唯一目的；以陈立夫所写的一篇“宣传工作刍议”作为纲领，加上一些捏造的材料和中统的实际工作经验进行讲授。在宣传的方式方法上，强调多摆事实（当然是捏造和歪曲事实），少发空论；避免过分的自吹自擂和对对方的正面谩骂；尽可能扮成中立的姿态出现，采取“客观”的新闻报导笔法；“小骂大帮忙”的办法可以采用，但要掌握分寸；宣传者要注意所处环境，考虑力量对比，发表适合于当时当地和个人身分的言论，免使自己陷于不利境地，要善于利用现有的阵地；千

方百计打入地方努力所办的报纸；要善于就地取材、大力培养地方干部等等。这门课也是由王大镗担任的。（六）政治学概论，内容除贩卖西方资产阶级的一般政治理论之外，主要是讲法西斯的理论，还以十五、六世纪意大利马克维里的权术政治学说、结合纳粹统治的所谓政治技术向学员们灌输权术思想。这门课程由刘伯谦担任讲授。除了上述几门主要课程之外，还有“业务实习”（由陈庆斋主持），“小组学习”和“集体活动”。

训练班由石角镇迁往重庆之前，徐恩曾亲自到班对学员们作了一下午的讲话。他告诉学员们结业后将派到华北去干什么工作，宣布中统和他们的关系，同时还介绍了华北地区的情况。第二天，徐又邀集全体官佐开了一个业务汇报和研究学员思想情况的会。在会上，他了解到当学员们知道将被派往敌后或到非蒋区去工作时，多数人心存疑惧，个别的人还打算请长假。针对这一情况，他说：“专搞业务讲习和技术训练，把学员训练成为情报专家，都坐在后方吹牛皮，有啥用处？忽视精神教育，什么训练都办不好；完全靠纪律，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训练班迁到局里面去后，要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当青干班迁到重庆后，几乎天天都有“精神讲话”。担任这种讲话的人有陈立夫、张道藩、叶秀峰、叶青等和中统内部的一些高级特务。其中陈立夫的讲话曾对学员们起过不小的迷惑作用。陈伪装亲切，用“自己人”说“知心话”的语气，诱骗了不少的人充当他的忠实走卒。他有一次在讲话中间休息时，随便和听讲的人“谈心”，他说：“我同你们谈话的意思，你们应该体会得到，这样坦率的态度，在别人的任何公开讲演中都不会有的。”他还说到：“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范围内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是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我陈立夫包下

来！”（陈边说边拍胸）这类话，使许多没有经验不识骗局的新特务为之动容。

青干班全体学员结业后，都按原定计划分派了工作。出发不久，各组的情况都不妙，有的送了命，有的逃了回来，有的不知下落；剩下的，一部分留在中统当职业特务，一部分通过许文梁，投到朱家骅底下当小官吏去了。

中统的海外工作

国民党的海外工作，也是贯彻着勾结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这一反动卖国方针的。中统在重庆训练海外情报人员的训练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控制侨领使其不被共产党利用（以陈嘉庚趋向进步为例）”、“如何适应当地环境发展中统的外围组织”这一类问题的对策教育。至于涉及国防性质的材料和有关某一地区的各方面的资料，中统局本部从来就没有注意搜集。过去中统在南京时，从参谋本部搞到的一点所谓国际谍报材料，也是贫乏得可怜。号称蒋介石反动统治下的主要特务机关之一的中统，对海外情报工作根本就没有象样的基础。专搞国民党海外党务的中央海外部所掌握的一点材料，也只是关于富商侨领的动态和有关共产党活动的书信和报告之类的东西；关于外国的政情、商情和科学技术情报，根本没有，军事情报则更谈不到。有一次，徐恩曾请于斌吃饭，谈到需要了解华侨中亲日派的活动的情况时，于斌答应供给一些参考材料；后来得到了一份长达六十四页的打印文件，其内容不仅是中统过去所不知、中央海外部所没有，连外交部情报司也从未掌握这样详细具体而又及时的材料。于斌的秘书潘朝英（兼办益世报）后来在闲谈中对笔者说：“我们过去对于搜集情报，并未特别注意，只是为了教会事业，稍为了解一点各方面的情况。如果

我们真要打听什么，比任何机关都方便些，因为我们的教友遍天下，而且他们对神职人员百分之百地忠诚守密；不过我们不是搞这个的。”笔者曾将潘所谈的话告知徐恩曾，徐说：“他们必须搞情报工作，没有这个，他们就不能保产保业，更不能作世界范围的发展。但是他们处处隐蔽，把宗教摆在前面，这样作是对的。我们有些工作人员，自己什么都不懂，事体办不好，还要装出一付高明的样子，把人家当猪彘。他们天主教的人是不会这么低能的！”中统特务头子对天主教间谍头子及其爪牙的这个看法，可谓一语中的。

谈到间谍头子于斌，涉及中统的海外情报工作，需要略述他与中统的关系。于斌毕业于意大利罗马耶禾利阿学院，回国后，凭借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关系，逐步爬到南京区主教和总主教的地位。美蒋匪特在天主教中的组织，多数是在他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他撮合比利时籍神甫雷鸣远和雷震远与军统联系，就是一个例子。1938年夏天，于斌介绍雷鸣远会见了蒋介石和戴笠，不久雷即参加了军统组织，在华北成立“华北战地督导团”，搞特务武装活动。于斌与中统的关系，是在重庆进入具体化的。于斌早在抗日战争前，在南京就已和徐恩曾交上了朋友。在重庆，徐恩曾派中统第三组组长高骞和于斌联系（高与于有留意同学的关系），其主要任务即是交换情报。于供应中统一些它所需要的情报，高也把中统所搞到的一些有关天主教的材料交给于斌。中统贵州调查室与天主教合作进行苗族调查工作，也是得到于斌协助的。

中统在海外侨胞中进行特务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这个公开的党务机关；它依靠海外部里面的CC分子做基本队伍。萧吉珊（陈果夫陈立夫的走狗）当海外部长时，CC在海

外部比较得势，中统即乘机使一批特务分子打入海外部。海外部的处长李朴生、科长刘翼凌等都是以中立姿态出现而暗中听中统指挥，替中统在国外扎根子；海外部的中统分子陈宗周奔走于两个机关之间，担任联络工作很久；科长白昭义是CC分子，也处处为中统尽力效劳。就笔者所知，中统在美洲地区，先后拉上了所谓侨领谭赞（芝加哥）、邝炳舜（旧金山），邝瑶普（沙格里曼托）、聂龙瀚（加拿大）、李泮林（加利福尼亚）等人，为中统争夺华侨团体、扩大外围力量。李泮林曾在美国采购了两千多万元伪法币的无线电器材，运到重庆，以“加州华职业青年联合会”名义赠给中统。邝炳舜与陈立夫经常通信，还送过一份“金山大埠（包括旧金山、欧克兰和白克莱三市）左倾分子名单”，将华侨和留学生中的进步人士统统列上；蒋政府的外交部根据这个名单令旧金山总领事黄朝琴与美国政府联系，对他们进行迫害；有的华侨被迫回国，有的留学生被吊销护照而不得不离开美国。

一九四〇年，中统以归国华侨训练班为掩护，对马来亚的华侨进行的迫害，是中统迫害华侨的许多罪行中的一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新加坡、马来亚一带的华侨在珍珠港事变以前，不断展开救亡运动，支援祖国。英帝国主义为了讨好日本帝国主义，诬指救亡运动为共产党所煽动，并指大批橡胶工人、小手工业者和商店雇工为共产党分子，加以拘捕，先后被捕的达一千三百多人。蒋介石政府对英帝国主义的这一行动是完全赞成的。通过外交接触之后，英国当局将拘捕的华侨驱逐出境，蒋政府则欢迎他们回国。蒋介石把处理这批回国华侨的事交给中统办理，而由中央海外部公开出面，开办一个归国华侨训练班。

中统派第二组特务沈哲臣（广东潮州人）到香港和中央海外部港澳总支部合办迎接这批侨胞的事；同时，香港政府也派了专

人与重庆派来的人合作。中央海外部派刘翼凌为训练班主任；班内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以中统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出来的特务充当。

训练班的目的，根据中央党部秘书处录送中常会给中统的指示，要求“在精神教育的原则下，使其接受三民主义的要求，明了抗战建国之主旨，遵循总裁训示，服从国家法纪，不为异党所煽惑，不致自堕为莠民；训练甄别，同时进行，务期于半年内交地方政府分别安置，化整为零，毋使久延时日，以免聚众生事。……”训练内容，主要是：（一）军事训练：把受训的人当作入伍新兵，施以徒手教练，借此将侨胞们置于军事管理之下。（二）政治教育：由各中队长和指导员（中统侨特）排好课程（总裁言论之类）天天讲授；有时由刘翼凌和就近我的几个省党部的党棍子作“精神讲话。”这类政治教育无非是用谎言欺骗、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歪曲共产党的真相这一套手段，企图从思想上俘虏这些初回祖国的侨胞充当反动派的工具。除此以外，还以小组学习的形式给他们补习一点文化（因为这批华侨多系土生，绝大多数是文盲）。

这个训练班设在广东乐昌北乡。房屋大部分是临时盖的棚屋，设备极为简陋。生长在这个乡的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曾对人说：“中央在我家乡办了一个华侨训练班，地方父老说是一个难民收容所。”

参加受训的华侨共千多人，经过甄别审查，没有发见一个够得上称为“共产党”嫌疑分子的人；中统对此很不满意。局本部由广东中统电台转给班本部一个电报，内有“外交部转来英国通知文件所附统计数字，指明共产党嫌疑分子占百分之七十五。其中犯破坏扰乱罪者居多，何以竟无一人？务须深入调查，不得怠

忽，……”等语，显然含有斥责的意思。当沈哲臣在香港接完了最后一批华侨，到达乐昌训练班之后，他根据中统侨特方博之提出的“班里有马来亚共产党负责人梁球和女共产党员邢玉华在暗中活动”的谎报，向中统局本部报告；局本部指令会同广东调查室研究。他们把这两个人拘押起来，经过残酷的刑讯，两个人都没有讲出一点什么来，也找不到半点证据。继之，又由班部将他们押交乐昌县政府转九战区长官部，予以百般折磨。终以证据不足，只得释放了事。训练班也在这时结束了。在整个训练过程中，中统特务对无辜侨胞施以残酷的精神迫害和肉体虐待，这不过是特务机关的海外工作的一个实例而已。

朱家骅与中统

朱家骅同中统的关系，有必要在这里作一简要的叙述。朱同中统的关系不同于贺贵严（他以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军统局长）同军统的关系。贺的军统局长是挂名的，朱的中统局长则不能看作仅仅是挂名而已。朱家骅原是CC圈子里面的人，但是他在CC中与二陈的关系又不是一般的隶属关系。朱以与戴季陶的个人关系而得宠于蒋介石，同时又借与CC的系系以巩固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朱原属浙江系官僚集团的一分子，与蒋介石和二陈有着“血缘”关系，加以二陈也有意拉他，想利用他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为CC出点力。朱眼看CC发展很快，在抗战前那段时期，声势相当浩大，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几乎完全被它操纵，基于互相利用的需要，逐渐倾向CC。朱在任交通部长期间，张道藩当次长，CC有什么要求，通过张向朱提出，十之八九是有求必应。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政府逃到武汉，陈立夫任大本营第六部部长，朱家骅还是紧紧地与陈靠拢。CC高级干部有时在第六部集

会商议重要问题，朱也被邀参加。陈果夫、陈立夫对朱招呼，口口声声叫“骝先”（朱的别号），可见其关系之密切。蒋介石丢掉武汉、逃到四川以后，国民党内部各派勾心斗角的形势起了变化，非CC各派联合起来反对CC，CC有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特别是当陈诚抓到三青团中央领导权之后，复兴社与之合力对付CC；加上四大家族中的孔、宋两家，为着经济利益与财经部门的人事争夺，对CC相当痛恨；蒋介石也嫌CC过于嚣张，有意稍加压抑；CC的气势因而迅速下降。可是作为CC核心的中统却一直保持稳定，并且继续有所发展，在整个动荡不宁的反动派统治圈子里，中统始终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朱家骅看准了这一点，便想在中统里面扎根子，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增添若干本钱。因此，当蒋介石决定要他以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统局长时，他就毫不推让地接受了。在CC这一方面，以为朱同自己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中，有许多地方可以利用朱去起缓冲作用，也就乐于接受他担任这个职务，并且不把他当作仅仅挂名的局长看待。

朱家骅在当了中统局长后，也居然以当家作主的态度对待这个新职务，安插了一些自己的人，有个时期还干涉人事调派并过问具体工作。中统原任主任秘书濮孟九外调，朱马上以中央秘书的名义推荐了刘次箫接替。专员室薪级较高的专员中，朱派的人占了一半以上。对训练工作，朱也要插手。徐恩曾对朱的这种作法，自有他们的对策。在刘次箫当了主任秘书之后，一些重要文件，都不经过他的手；重要工作问题，也由各组、处秉承徐的意旨直接处理，使他摸不到风。当第三组的经济调查科从组里分出、扩大为经济调查处时，徐提出以原任科长柳靖宇（江西萍乡人，交通大学毕业，徐的亲信）升任处长，朱不同意，发表他

自己的人李超英为处长，将柳安排为处内的一个科长。徐对此大为不满，于是把许多亲信骨干，还找了一些有关系的新进分子如局长室秘书张兆翔（广东大埔人）的妻子赵泽薰（贵州人、金陵大学毕业）等一起安插到经济调查处去，当的当秘书，当的当科长，在下面掌握实权，使得李超英空悬在上，处处受挟制，不能有所作为，屡次向朱诉苦，还弄到一度提出辞职。这样一来，朱、徐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不过当时尚未公开暴露），朱与 CC 的关系也随之转趋恶化，终于导致以后的决裂。

徐恩曾对朱家骅的态度是以二陈对朱的态度为转移的。本来二陈曾把朱看作 CC 的中坚分子，徐在中统对朱也相当尊重。中统有个“星期汇报”制度，每个星期二上午在局长室召开一次，出席的是各组处的头目、科长和担任具体工作的专员也列席。这个汇报会照例由徐恩曾主持。但每次都邀朱参加，有时还请他讲一讲话。这说明朱在任局长的初期，并没有被完全当作外人看待。后来朱被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吴铁城接任秘书长。这时朱同 CC 和中统的关系已愈搞愈坏，连组织部也变成了中统的对头，朱对中统的事情就不大过问，徐恩曾也就完全把他撇在一边了。

朱家骅在国民党的地位步步上升，得助于他与 CC 合作之处颇多。可是他自认为有自己的一套本钱。朱曾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在南京中央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当过校长，当过教育部长，主持过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董事会，在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自己的一批喽啰，加上戴季陶在蒋介石面前替他撑腰，因此不愿长期依附于 CC 的旗门下，而野心勃勃地想开创一个独立的局面，终于和 CC 分了家。他的这个情况有点与张厉生相象，但是两人所处的环境和具备的条件不同，朱的基础比张扎实一些。张脱离 CC 之后，只能孑然一身投靠陈诚；朱则尚能自立门户，同 CC 分

庭抗礼。

朱家骅手下的主要骨干，如甘家馨、王启江、陆翰芹、杨公达、沙孟海等都是从他自己过去管辖的范围（大学、交通部、浙江省政府、留欧特别是留德同学会）内物色培植的。但是，其中下级干部（这是他的基本力量）多数还是在中统训练的学员中挖去的。因此，把朱系看作是 CC 的一个分支，也未尝不可。朱在与 CC 合作和担任中统局长中，实际上已经捞到了不少好处。

自从 CC 看出了朱并不和他们真心一致，而且时刻在设法争夺自己的地盘那个时候起，徐恩曾就干脆以朱为敌，把朱安插在中统的人逐渐排挤出去。当徐把朱的人排挤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自己也因案从中统头子的座位上倒下来了。等到叶秀峰接任中统局长时，中统范围里就根本没有朱系的人，甚至连亲朱系的人也没有了。

朱家骅同 CC 及中统决裂后，自成一系，在蒋介石的反动圈子里，以各省、市党部和一些特别党部（如铁路、公路）为基础，向学术、教育界开拓地盘，并与三青团携手，尽力拉拢黄埔系军人，勾结江浙财阀，意图取代 CC 过去的地位。但由于朱的根基不深，基层力量有限，三青团视之为客卿，陈诚对之缺乏信任，军人认为他不可靠，财阀嫌他是个穷书生，加上 CC 对他进行全面包围打击，蒋记朝廷风雨飘摇、面临总崩溃这种种因素，使得朱的这个派系有如昙花一现，瞬即凋零。到一九四八年的时候，朱本人只能龟缩在教育部内，小心应付，无可施展。他本人在逃离大陆之前，消极悲观，伤感万分。

中统的垂死挣扎

中统从徐恩曾转到叶秀峰手上，本质上自无变化，所不同

者，是它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烂、崩溃而日趋衰亡而已。

叶秀峰接长中统于抗战后期，那时还看不出这个特务机构会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走上末路。但是，抗战胜利不久，叶秀峰从徐恩曾手上接过来的、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一些组处长级骨干分子已开始溜跑；有的利用过去的人事关系和别的机关搭上关系而另有所就；有的凭借自己的特务权势早在原籍捞得了相当的地位，当上了地方官或从事企业活动；只有大部分中下级特务别无门路可走的还留在中统里面。到一九四八年，特务们已经预感到了蒋政权行将崩溃，继续留在中统，前途凶多吉少，因而多想早为脱身之计，于是，由个别开溜发展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如由叶秀峰一手培植起来的杨博清在叶逃往台湾之前，即拟利用他是福建人、有些华侨关系而远走印度尼西亚去谋生；中统外围组织民锋社的骨干分子龚祖燧、何绍宗、周云汉等人则蜷缩在上海，怕去找叶秀峰，私下计议如何脱身；叶秀峰安置在四川当县长的亲信胡铸坊（浙江淳安人）不肯留在四川，擅自出走，叶亦无法制止。所谓组织纪律，到这时已荡然无存，五年前中统用以约束其喽啰的软硬办法都不起作用了。

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时期中统已放松了它的罪恶活动，恰恰相反，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日益接近死亡，中统的罪恶活动也更加猖狂起来。一九四六年二月重庆较场口事件中捣乱会场的刘野樵和许多流氓打手，都是中统重庆试验区所精心布置的，同月出现在重庆街头的反苏游行和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的罪行也是中统局本部直接组织的。当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公开叫喊“戡乱”、青年学生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时，在整个蒋管区内，中统对学生的迫害，比抗战以前和抗战时期更为厉害，它与三青团、宪兵、警察紧密配合，大肆搜捕进步学生，千方百计

地破坏学生民主运动。与此同时，叶秀峰对过去曾为中统利用的帮会、土匪也更加大抓乱抓；中统通过地方特务组织，直接联络他们，帮助他们活动，如湘西的中统特务陈通焕在会同一带拉帮会关系，组织反动武装；吴学尧在沅陵也搞过这一套。

尽管中统妄图以变本加厉的罪恶活动来挽救蒋政权和它本身的复亡，结果是加速其灭亡的过程。一九四八年以后，随着蒋政权的日趋崩溃，中统内部的叛离现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年秋天，笔者在上海遇见 CC 头子之一的洪兰友，他对这种叛离现象的激增，不胜感慨之至，苦笑着对我说：“趋炎附势，人之常情；看样子，如果共产党说不杀人的话，我们中统的朋友十有八九会输诚自请，望门投止。”同年十二月，笔者离开南京之前，曾赴赤壁路七号朱家骅宅，与之长谈。在我泛谈了一些有关解放区的传闻之后，他喟然长叹地说：“你所说的都是事实，不只苏北、鲁南是这样，所有共产党占领区都是这样。他们的工作作得好，老百姓都跟他们跑。这些我都知道。我看老头子（指蒋介石）也不是全不知道，他就是不肯认输。戴先生（季陶）和老头子谈过，但也无济于事。我们这些人都上了年纪，不中用了，钻牛角尖钻到底算了！”正谈话间，朱的侍从副官传有客来会，朱回说：“今天上午不会客，说不在家好了。”笔者继续和他谈天，一同吃过午饭后才告辞。临别他与笔者握手时说：“到湖南替我向颂云先生致意，我们不易再会了！”这些中统首恶们谈话中流露出来的绝望情绪，正反映出这个罪恶组织的灭亡景象。

中统从一九三八年成立到一九四八年开始逃迁台湾，在中国大陆作恶整整十年。牛鬼蛇神的反动渣滓，吸吮人血的特务匪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后，已从中国大陆上迅速地被清除了；所留下来的，是亿万人民对它的憎恨和它的遗臭万年的血腥史迹。

军统特务在武汉制造的一件血案

余定华

最近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看到沈醉写的有关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几篇文章，使我回想起三十年前在武汉和戴笠共事几月，并按照他的指示制造血案的一段史实。现在把它写述出来，使大家更清楚地看出特务分子的狰狞面目。

一九三二年夏，蒋介石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以后，随即调集九十个师五十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攻。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他自己坐镇汉口，调兵遣将，积极展开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攻。

这时，蒋介石的法西斯组织“复兴社”已经秘密成立，戴笠担任复兴社特务处长，在南京鸡鹅巷设立办公处。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法西斯统治，在蒋介石未到汉口以前，本已派了复兴社特务骨干周伟龙到汉口布置特务工作。当蒋介石坐镇汉口以后，戴笠也亲自来到汉口策划布置，在豫鄂皖“剿总”司令部内秘密成立了一个名为警卫组的特务组织。

这个警卫组，由戴笠兼任组长，邱开基任副组长，组内主要骨干有王兆槐、何鸿（广西人，在黄埔六期骑兵科和戴笠同队同学）、汪某（浙江人，忘其名）和我共四人。我们都是经过戴笠和他的心腹谋士唐纵从南京物色来的，于一九三二年夏到达汉口。戴笠本人住在汉口旧俄租界东方饭店，其余的人，带些警卫勤杂

人员，分别住在汉口旧德租界汉中胡同和旧日租界长清里的两幢洋房里。这两处地点对外是不公开的，我们的行动也绝对保守秘密。同在一地干特务的周伟龙，每天玩在一起，也不知道警卫组的所在地。由于这两幢房屋建筑非常坚固，窗户装有铁条，因此，既是秘密监狱，也是临时刑场。

警卫组成立后，戴笠经常往来于南京、汉口、杭州间（他当时兼任杭州警官学校教育长），邱开基则没有离开过汉口。警卫组的工作，由戴笠亲自布置；戴不在汉口时，就由邱开基负责。我们这几个人，公开的职务都是豫鄂皖“剿总”司令部上校参谋，薪饷也按一般上校待遇发给。因工作需要而特别花了钱，可以据实报销。警卫组的具体活动，一是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当时蒋介石住在汉口怡和村杨森花园，总部则设在银行公会，他每天由怡和村乘汽车到“剿总”去，都由警卫组指挥武装宪兵和便衣武装宪兵沿途警戒），一是镇压共产党和异己分子。警卫组初成立时，就灭绝天良地暗杀了三条人命。事实如下：

原来，李济深和蒋介石有矛盾。蒋介石成立豫鄂皖“剿总”以后，千方百计拉拢李济深，饵以“剿总”副总司令，并特许其设立副总司令部于蚌埠。这时，跟随李济深去蚌埠的有刘广（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秦湘溥（四川人，黄埔第二期毕业）、曾致远（一名曾致祖，湖南人，黄埔第四期毕业）等三人。他们都是反蒋拥李的，和李关系很深。到蚌埠后，李济深委派他们为副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并报汉口总司令部有案。随即又派他们到汉口担任联络工作。刘广等一行三人，在一九三二年夏秋之交到达汉口，寓大智旅社，并携带了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部发给的护照，以证明身份。蒋介石得知刘广等人到汉口后，认为是李济深派来捣乱的，下令戴笠秘密逮捕。

当时，戴笠和邱开基、王兆槐等坐一辆汽车驰赴大智旅社，伪称奉总司令（蒋介石）命，接他们去面询安徽方面的情况。刘广深信不疑，随即一同上车，离开了旅社。结果，戴笠吩咐将刘广、曾致远二人送到汉中胡同，将秦湘溥送到长清里，分别秘密囚禁，不让外间知道。至此，刘广等始知身陷囹圄，然而还没有想到会遭杀身之祸。

刘广等被捕后不久，一天，戴笠和邱开基在东方饭店召集我们秘密开会，商量暗杀步骤。会上，戴笠指示我们将刘、曾、秦三人秘密处死，地点即利用警卫组租住的房屋。我当时问戴笠：“在城市居民房屋内进行暗杀，如果枪声一响，惊动了左邻右舍怎么办？”戴笠没有开口答复，他用双手作钳形加于颈际，示意将这三个人掐死，不必用枪打。记得是九月某天，邱开基对我说：“雨衣（戴笠别号）今天去南京，临走时交代赶快解决他们三个。”他接着说：“今晚先解决刘广，把他弄到郊外去枪毙。”这时，我想到这是残酷暗杀的开始，也是考验我们的开端，而被杀的竟是黄埔同学，心里有些恐惧，但又无可奈何，因为自己已经干了这门职业。

当天傍晚，天气阴沉，细雨濛濛。邱开基、王兆槐、何鸿和我共四个人，将刘广从汉中胡同押到江汉关附近。押走时，刘广没有上镣，也没有用绳绑，而由我们前后左右挟持着步行。刘广穿的军便服，我们穿的便服，每人暗带一支小号白郎宁自卫手枪。我们在江汉关江边雇了一只划子，将刘广押到船上。刘广面色紧张，问到哪里去？邱开基扳起铁青面孔对他狞笑说：“为了解决误会，请到对河不远的地方对证一下材料，就可以释放你。”邱开基吩咐把船开到徐家棚。那位船老板看了我们几个人非常疑惑，两个眼睛总是盯着我们，大概是由于我们初干这样的勾当而情绪特别紧

张的原故。夜色苍茫中，船到徐家棚，我们停船上岸，顺着堤埂往下游走。这时，天已黑暗，四顾无人，刘广边走边问：“究竟到哪里去？”邱开基没有答话，却回过头来对我说：“可以了吧！”我听到他发出了杀人的暗号，随即掏出手枪，对准刘广射去。刘广应声倒地，接着每人都打了几枪。因为小手枪的杀伤力不强，刘广倒在水丛里呻吟挣扎，并发出垂死的声音说：“你们太残忍了！”接着我们又集中火力向他扫射。回到住所时，已经是深夜了。邱开基说：“刘广的尸体摆在江边，如果被人发觉，报上一公布，杀的是副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这就不得了！”次日清晨，天还没有大亮，我们穿着军服，佩上上校领章，一齐去到江边，看见刘广的尸体满身血迹，浸在水丛里。邱开基即在徐家棚买了一口棺材，雇人收殓，埋在附近堤埂上。并且找到一块木牌，写上“故友萧雨生之墓”七个字，旁边随便署了几个假姓名，借此埋尸灭迹。

我们干掉了刘广以后，又在一个深夜里，在汉中胡同用麻绳将曾致远勒死，把尸体盛在一只大木箱里，塞进百多斤生铁，运到徐家棚轮渡码头附近沉尸江底。这幕箱尸案也是在黑夜里偷偷进行的。最后剩下关在长清里的秦湘溥，我们强迫他吞服大量的安眠药片。当他还在呻吟时，又用电灯线捆在他的身上，使他触电速死。秦湘溥死后，是用棺木公开埋葬的。

当这三个人陆续被暗杀掉以后，我的思想非常混乱，发生了很大的波动。留乎去乎？何去何从？几乎时刻在脑子里作斗争。特别是想到今天杀死的、勒死的毒死的都是黄埔同学，现役军人，这样自相残杀，到底为的是什么？今天我可以杀人，明天人不可以杀我吗！何况在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中，我和鄧悌最接近，因此，引起贺衷寒、邓文仪、潘佑强等人的恶感；这时鄧悌已被排挤掉，快要出国了，而贺衷寒官居豫鄂皖“剿总”政训处长，

喧赫一时，炙手可热，一旦发生了问题，随时可以对我进行暗害。我想到这里，真是不寒而慄，感到前路茫茫。后来何鸿不知什么原因，戴笠突然对他冷淡起来，甚至不顾情面地恶言斥责。何鸿遭此打击，非常气愤，他和我密商脱身之计，极力怂恿我到广西去参加新桂系，另谋出路。我们密商既定，徐图出走。某次，与何鸿秘密破获一宗私贩吗啡毒品的案件，得贿两千元。有了这笔旅费，我们就由汉口逃往广西，从此作了新桂系的帮凶。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回忆蔡松坡先生创办广西陆军小学

唐希朴

蔡松坡先生，湖南邵阳人，家住武冈山门，生于一八八二年（清光绪八年），幼年家境贫寒，全靠父亲做手工，母亲磨豆腐，以维持生活。他的天分很高，读书很发奋。一八九五年，他才十四岁，文学就相当好，他的父亲护送他往邵阳应考，受到提学使江标的赏识，补县学生。同县先进学者樊锥（号春渠，拔贡），热心提倡新学，领导好些门生去日本留学，顽固分子骂他是“怪物”。樊对松坡先生尤为器重，视之如己子，愿亲自教育，期成大器，并负担他的生活费用。松坡先生感激樊先生的殷勤培养，奉之如父，一八九八年，樊先生带他到长沙，考取时务学堂，他又见重于梁启超。后来，他得去日本学陆军，纯系梁启超的提携。

一九〇四年，松坡先生在日本士官学堂毕业后，回籍省亲；一九〇五年春，任湖南武备学堂及附设兵目学堂的教官。他愤恨清廷腐败，国家衰弱，列强有瓜分之议，势甚危急，救国之心很切，革命情绪异常激昂，不久即被当局辞退。其时，广西正需要军事人才，巡抚李经羲奏调他到广西开办随营学堂，只办一期就停办了。一九〇六年冬，改任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所有教职员除提调（主办总务）楼守愚（进士出身，候补知府）系由抚署派充外，其余均由松坡先生物色延聘：呈请委任雷飙为监督兼兵学教员，唐瀚为国文教员，余栋臣为历史教员，粟培塹为地理教员，马孝笃为数学教员，刘子平为日文教员兼教图画，理化和法文（法

国人)教员,已忘其姓名,杨穆、罗质、何卫林为学长。一九〇七年三月,筹备就绪,正式开学。这些教职员大多是由松坡先生认真选择的,才学兼优,富有革命思想,都热心教学,循循善诱,深得同学们的爱戴。在向来文化落后的广西,有不少的学生初入学堂的时候,文理欠通顺,由于老师们的热心教育,进步很快,不到一年,就有好些学生能作长篇论文。松坡先生很高兴。一九〇七年冬,开办第二期,松坡先生选择教员更认真,以何鹏翔为兵学教员,何锡伯为国文教员,陈子藻为数学教员,岳卓如为历史教员,黄某为地理教员,朱沛安为英文教员,周则范、萧昌炽、陈时为学长;其余法文、理化、图画等课,仍由第一期的教员蝉联。阵容更整齐。他们在第一期的影响下,教学都很热心,惟恐落后,形成了良好的学风。

松坡先生为人正直,办事认真,绝不瞻徇私人情面。下述事例足以说明:一八九六年,我父和唐安儒在山门合办造纸厂,深知松坡先生的父亲侍母很孝,家虽贫寒,甘旨之奉不缺,每晚必先母亲床上把被盖睡暖,为乡人所称道;我父不时送钱接济。后来,松坡先生到了广西,知我父对于造纸有经验,于一九〇八年,邀我父去广西兴安县六峒,主办新法造纸厂(松坡先生借公款创办的)。不幸,我父到达六峒后,只有三个月,即感染瘴气去世。我叔唐巖曾和松坡先生同在樊锥先生门下读书,是老同学,松坡先生创办广西陆小时,我正在湖南游学预备科读书。因为游学预备科突于一九〇七年春停办,我取得叔父的同意,拟进广西陆小,由湘赴桂,在途中耽搁了十多天,因而误了陆小的考期,曾请求附学,松坡先生不徇如上所述的世交私情,告我以限于部章,不能通融。等到第二期我才考入广西陆小。

松坡先生任广西陆小总办时,只有二十六岁,处理事务却很

精明老练，没有时下的官僚作风。他认为陆小学生是有希望的青年，是将来编练新军的骨干。因此，他以全副精力要把陆小办好，不仅着重灌输新思想，为革命打好思想基础，就是对于一些事务性的问题，也毫不马虎，都是亲自处理。首先碰到的是校址问题。他认为这是搞好教学和增进学生健康的关键。由于陆小匆促开办，因陋就简地暂时利用桂林南门外老巡防营的兵舍作为校址。该处房屋破败不堪，虽经修缮，仍不适用；并且离河太远，用水困难；特别是往后每年将要添招新生一班，原有房屋更不够用，必须另选适当地点，从新建筑。为此，松坡先生亲自踏看多处，最后选定文昌门外、桂林名胜之一的象鼻山的右前方，漓江右岸一大块荒地。该处有许多古树，风景极佳，饮水和游泳都很方便，最合理想，经取得巡抚张鸣岐的同意，决定把陆小迁来此地。松坡先生亲自规划，督工兴建，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即告落成。房屋结构很好，不仅适用，并且美观，在当日的桂林，算是富丽堂皇，首屈一指的建筑。

松坡先生对于学生生活，非常关心，时常亲到厨房，检查膳食；并要教职员与学生同在食堂用膳，借以加强师生之间的联系。膳食是由公家供给的，就当地的一般生活水平来说，算是较高的。学生的服装也是由公家供给。松坡先生对于经办服装的人员，监督极严。服装的质量很好，夏天是黄卡机制服，冬天是厚呢制服，还有皮靴、布鞋、棉衣、棉裤、内衣以至被褥、床单、枕头等，一应俱全。当时，陆小学生显得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服装整齐、纪律严肃、颇为社会人士所欣羨。

为了增进学生的体质，松坡先生公余之暇，辄亲率学生练习器械体操。松坡先生自己爱好器械操，技术很好，虽然离开学生生活已久，但操作并不生疏，依然能打大车轮，同学们看到总办

这样热心带头练习，受到很大的鼓舞，更加努力操练。每逢夏季，松坡先生率领同学游泳，并要教职员参加。由于他在日本时，喜欢游泳，技术也很好，能作长距离的游泳，并能在水下潜伏较长的时间，同学们都非常敬佩，颂扬“我们总办真是文武双全，无一不精。”就当日的社会风习说，以总办之尊，而能带头练体操，习游泳，确属难能可贵。

松坡先生生平沉默寡言，注重实干，不尚空谈。在他的影响之下，当日陆小的教职员一般都崇尚质实，很少夸夸其谈的。例如，作为他的得力助手的雷颢就是一个不会多说，而能脚踏实地、埋头硬干、勤谨奉公的典型。松坡先生在陆小，很少集合学生讲话。我记得一九〇九年秋，他由南宁回校，集合全体学生在操场举行阅兵式。我们以为他离校已有一年之久，定有许多话说；可是，他在巡视一遍之后，只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仔细看到了你们身体很强壮，精神很饱满，我很喜欢。你们今后还要继续好好锻炼身体，听老师的话，努力学习，期望个个都能升学，都成为优秀的军事人才，我就更高兴啦！”他所讲的虽只寥寥几句，但热爱同学之心，溢于言表，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〇九年秋，清廷特派总兵张怀芝前来陆小检阅，认为成绩很好，表扬了一番，给予同学和教职员以很大的鼓舞。松坡先生利用了这种有利条件，更多方提高大家的积极性，因而同学进步更快。是年冬，第一期同学毕业，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考试成绩为各省之冠；后来，每次期考也总是广西陆小同学杨瑞麟名列第一。张鸣岐觉得陆小为广西增光不小，对于松坡先生更加倚重，所有广西一切军事，大都交由松坡先生主办。当时松坡先生所兼的职务有：广西陆地测量学校总办、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兵备处会办、参谋处会办、干部学堂总办、讲武堂总办、新军标

统、学兵营营长等要职。一九〇八年冬，张鸣岐打算把新军一标扩充为一混成旅，需要大批中下级军官，松坡先生请派士官学生王孝缜前往北京，邀来陈之骥、李书城、尹昌衡、赵恒惕、孔庚、雷寿荣、高霁、李俊、覃蔭钦、种鼎荃等大批士官生，同时，还邀来保定陆军速成学生冷遹、耿毅、何遂、刘建藩、吕公望、唐锡五、贺斌、杨卓、姜飞等多人。他们都是刚由学堂毕业，其中有些是同盟会会员，都是抱有革命热情来广西的。后来，在分配工作上，留学生的地位比较高些，内地学生很有意见。其时，松坡先生正在南宁练新军，兼办讲武堂。张鸣岐对于人事安排，感觉为难，遂催请松坡先生回桂林处理。松坡先生回桂林后，察觉新来的人员，意气太盛，锋芒太露，徒然招致猜忌，将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事业，因而有意识地与他们疏远一些，想把他们的气焰压抑一下，以免发生危险；而何遂等误以为松坡先生有意袒护士官同学；还有一些人嫉妒松坡先生兼职太多，早想伺机进攻，适逢干部学堂举行甄别考试，开除了一些成绩较差的学生，而被开除的学生又多数是广西人，于是何某等遂借此大肆诬蔑，指摘松坡先生袒护同乡（湖南学生成绩较好，很少淘汰），排挤本省人，煽动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堂的学生同时罢课，并策动广西谘议局提出弹劾。其实，自一九〇八年秋以后，松坡先生在南宁的时间较多，干部学堂是由监督李书城负责。对于松坡先生的责难显系诬蔑。这时，张鸣岐已经调升两广总督，广西巡抚由藩台魏景桐护理。魏为人谨小慎微，惟恐事态扩大，加之他是邵阳人，更害怕别人说他袒护同乡，因而不敢主持正义，竟准松坡先生辞职。时云南正在扩充新军，总督李经羲前在广西巡抚任内，深知松坡先生才学兼优，曾电调来桂开办随营学堂，并筹办新军，以成绩卓著深为李所倚畀；至是，立即奏请任命松坡先生为驻滇第十九镇

第三十七协统领。松坡先生遂于一九一一年春，离桂赴滇。

松坡先生操守清廉。自一九〇五年起，他在广西开办随营学堂、陆军小学堂、测绘学堂、干部学堂、讲武堂，统率新军第一标、学兵营等，前后有六年之久，动用公款，为数甚巨，他丝毫不苟。平时自奉极俭，家里伙食每日只用几角钱。离桂时，仅有书籍和被包各一担。

以上就我回忆所及，略述松坡先生创办广西陆军小学的片断见闻，难免错误和挂漏，尚望友好加以指正。松坡先生离桂以后，功业显赫，国人皆知，我不赘述。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黄兴上孙中山论革命计划书

一九一〇年四月在香港发

中山先生鉴：三月十四号之电及二十八号之详函，均前后收到。各同志读之，有此极大希望，靡不欢跃之至。兹委任状已办妥，同日由邮挂号寄上，乞查察施行为是。再将弟与伯先兄之意见略陈之，以备采择焉。

(一)先生与军人所拟之方略，与此间所已运动得手之情形略有不同。弟与伯先意，以为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此次新军之败，解散者虽有一标及炮二营工棚四营之多，然二标及三标之一营，皆未变动。现虽有议移高州之说，恐一时尚不能实行。而巡防队兵卒之表同情于此次正反者甚众，现总督水陆提（按：疑脱“督”字）皆以巡防队为可靠，闻往招湘人约千人（可断定多会党，运动必易，以湘人运动尤易）。北江一带，约数百人，将来专③为省防之用。李准原有之亲兵队，约千余人（内同志甚多）。总共巡防计有三千之谱。若此兵数，一能运动，则外无反对者。其方法俟大款得手，先刺杀李准一人，使其部下将校，自相混乱变更（因皆李私人，多不得兵心，若易统领，则必更换其管带哨弁等，而兵卒之心更离矣）；于此变更之时，广用金钱（兵卒皆不丰足，负债者甚多。益以嫖赌，其势更岌岌），不一月可悉收其众。前次之失，立可恢复。省城一得，兵众械足、无事不可为。至广西一隅，同志之在陆军者，约数十人（李书城、孙楚、杨源瀚等均在此），以刻尚未招兵训练，无可假手。至秋期则兵数想亦可招足。此方面不必顾虑自能联合也。外会党一面，

刻虽清乡，其人众稍为所慑，然兵去则聚、自成常例，至时亦可号召之。前所运动之基础，固未摧坏，再扩张之，自易易也。总之，广东之事，视款为难易，以普通一般之军队，多贪鄙嗜利，况有义字以激发之，富贵功名唾手可得，何乐而不为此；此弟与伯先兄观察广东巡防军队之心理，而可以断定者也。故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边远虽起易败（以我不能交通而获得交通故），省会一得必成，事大相悬，不可不择（此次新军之败，乃在例外）。倘先生与军人已决议择一地点，为训练兵卒、接收器械之处，亦不难图之而为省城之外援。现广州湾已查得一地（此李应生与甄吉亭到该处查获者），可向法人批租。其地为旧公园，目下有一法人垦之不利，该处之公使堂欲弃之，价不过三千余金。又有房屋多间（有一大洋楼），另给千余元均可得。又李应生亦有地在该处，伊祖父给之，使其自营者，亦可为之开辟。又张静皆兄亦有意至该处垦地，如一得款，可由李、张、甄等出名至该处领地，藏数千人，势亦不难。且新军中之高州人，散归者颇能团结一气，不为少馁。其该处之来联盟者，日进无已（前新军中之头目为之主盟，巡防、会党皆有）。若二标移往该处，则势更好（闻五月间其在茂名化州之营房可起）。此处可决定为之，一便于接械；二便于出西江，扼上游（南宁）之冲，收服巡防各队，略定西省南服，将来其有助于省军必大也。郭人漳处，自弟出后，弟曾通信一次，乃言王德润事，未见其复。今袁督之子，与伊至交，且兼有戚谊，若与商约，恐必举发其阴谋，惟有至时降服之，否亦杀之不足惜。至其所部之众，其新军一营，驻广州者为伯先旧部，今正闻广州之事，已跃跃欲试。余一营为湖南老营，多不满意于伊。他则皆巡防耳，一朝有变，反侧随之，无他虑也。然弟当试以他术，嗜利之徒，或能可动，亦未可知，然总以不告以秘密为是。

(一)联络他省之军队及会党，此最宜注意者。今满洲之马杰及渤海之海贼，去岁萱野返日，已带有二三人来，均有势力者。伊等只要求费用，即可活动，至少可集合三五千之众，扰乱满洲方面，趋近杀虎口、张家口一带（口外无兵，可随意越过），以惊撼北京，此最为出奇者也。势虽不成，牵掣北清之兵力有余。又北清之新军，同志在其间者亦不少。前岁西挪拉氏之变，伊等欲乘机运动，虽无大效力，然种子已播，兹更图之，亦不难也。长江一带之会党，久已倾心于吾党，一有号召，至可助其威焰；尤以浙江一部为可用，王金发君等可得主动之。至三江之陆军，其将校半多同志，今岁闻伯先兄在粤举事，皆有握拳透爪之势，若事前与之联络，择其缜密者为之枢纽。势不难与两粤并。湖北之陆军虽腐败，然开通者亦不少。去岁有孙武（湖北人）者竭力运动，闻成绩亦好。湘中之新军，虽不及万人，然有数同志为管带、队官等；又督练公所及参谋等多同志，人较他处亦不弱。云南同志亦多得力，其经营有不俟他处彼亦为之之势。此次巨款若成，择其紧要，辨其缓急以图之，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而吾党散漫之态亦从而精神活动，可无疑也。

(一)军人拟聘武员及各种技师前来预备充组织及教练之用，此事弟等思之颇有难处。无论难得地点，即有地点（譬如已得广州湾言），恐集合多人，耳目众多，流言四起，外人或不注意，满吏则必为之枕席不安也。况多数外人来此，尤易招目，此事可否婉曲商之，云吾党初期之预备，须稍宽以时日，然后招聘人员（俟初期预备完全，由此间报告后，然后招聘，方为妥当）。在伊等视之，以为此等事必非速速可成，而吾等于稍宽之时日中，得完全成功，出伊意外，想伊亦不见忌，必乐为我用也。我等于事起后，伊等之来，自是有益。此两无妨害之事，伊亦必允从。否则伊来，如事前败坏或

放逐之类，皆于大局有关，且于教练实际上断不能施行。此种情形，想先生亦知之深矣。

(一)组织总机关之人材，弟意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一有款，弟拟去日本招求已归内地之同志(有胆识者)，来日会议后，分遣担任赴内地运动各事。其智识卓绝，或不能回内地者，则留驻日本，或招来港中，为组织总机关之人员。但目今不能详举其人名。以近二三年来，未与共办一事，而为外间浮言所中者居多。必须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以感之，彼方见信，如孙少侯君其人也。杨笃生君在英专志科学，有款，先生必要之归。此人思想缜密，有类精卫，文采人品亦如之，美材也。蔡子民君在德，此人虽无阔达之度，而办事精细有余，亦难多得。吴稚晖君甚属人望，惟偏于理想，若办事稍低减其手腕，自亦当行出色。他如在东山西之景定成君，湖北之黄运甓君，四川之李肇甫，湖南之左仲远、龚超(已出狱)、张百筠(三君皆有才，可办事，惟宜一方面)、刘揆一、宋教仁，山东之商启子、丁惟汾，陕西之于右任，江苏之章梓等，皆能办事。此不过举其一二。至其能在内地实行运动者，亦不乏人，想可招之使来。若我辈能虚怀咨商，不存意见，人未有不乐与共事者也。赵伯先兄于军事甚踊跃担任，此次款项若成，可委广东发难之军事于伊，命弟为之参谋，以补其短，庶于事有济。伯兄刻虽不能入内地，以军界多属望于伊，为之自亦易易。若能得一次大会议，分担责任，各尽其才，事无不成矣。

以上所述意见，弟与伯先兄相同，可作两人函视也。

弟自去腊来港，省事败后，郁郁居此，一筹莫展。二月十八与展兄伯先同赴新加坡、欲运动小款，以接济港中目前之危困。适先生此函至，毅生兄电弟等返港。弟与伯先兄先后返港，展兄

稍留，少得款后，亦当归也。现港中穷乏已极，势将不支。先生处如可筹得二三十元电来，以解眉急，尤为盼切。

再要者，该军人及资家，如不能运动，此刻想先生处已得实答，此委任状亦不必给之。以其中人名与省分不同者多，倘后日发见，必传为笑柄也。至要，至要。又弟在新加（按：此处脱“坡”字）时，宫崎由日来电，约弟来港相晤。及弟来港，伊偕儿玉右二来。此人与寺内正毅有关系，大约日政府见满洲交涉，无大进步，而清军队之表同情于吾党者日多，或一旦吾党势力可成，伊既无要求于满政府，而又不愿好于吾党，两无所据。又恐他国与吾党密近，将来排斥己国于东亚，殊难立足。有此隐情，故宫崎乘间运动长谷川大将名好道者，由长谷川将宫崎所铺张吾党之势力介绍于寺内。故寺内密派儿玉与宫崎来调查吾党势力，不过证实宫崎之前言耳。在港不过一礼拜，弟稍夸张出之，略言法美国民皆表同情，或能怂恿之，亦未可知也。精卫兄事，详毅、实两兄函。不另。手此，即请

筹安

弟黄兴顿首

四月初五日

此为先君克强先生于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三日（农历庚戌年四月初五）致中山先生之书也。是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先君蛰居香港时所作。当时新军发难，事败垂成，先君仍力主广东应由省会下手，积极策划再度举事。次年广州黄花岗之役的大体规划，可以从这封信中约略窥见，它是有关黄花岗之役的一份重要历史资料。

此信系据我所保存的影印本录出。原件为于右任题签，后面

附有张人杰、谭延闿、胡汉民、张继、林森、居正等人的跋文。其中居跋开头谈到曾省三保存此信的经过说：

“曾子省三服务于吾党本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事务所。此事务所自民国五年起，继续租住至民国十七年止，积存党中重要文件盈篋盈笥，尝命以时整理，分别弃置。与其事者，每检得总理手书及要人函札，争存之以以为宝。曾子省三独无所得。一日，于故纸篓中再检，忽得一封书，启而视之，乃即今所庄严得诸名家题赞不置之克强黄先生手书也。”

据我所知，事实略有出入。一九二八年，李翊东在上海告我：有先君庚戌年四月致中山先生的一封长信，原为中山先生长期收藏于环龙路四十四号办公室抽屉中，作故人之纪念。一九二五年三月，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曾省三时为事务所秘书，于清理先生遗物时检出自存，外间鲜有知者（李翊东号西屏，湖北黄冈人，当年与曾同为环龙路事务所秘书，故知之甚念）。我托西屏向曾致意，希望备价转让，以留先人手泽。当时因曾索价甚巨，我一时拿不出来，没有谈妥。于是，建议影印出来，以广流传。曾省三后因于右任等的资助，以《黄克强先生上总理书》为题，将原信影印，并附有吴稚晖，张人杰等人的题跋。信中偶有脱漏，这次发表时已为注明，并加了标点符号。着重点是原来有的。

一九六三年元月十二日，黄一欧记于长沙。

黄先生信中所述广西当时的情形，事实是这样的：一九〇七年，广西督练公所帮办钮永建同志到日本考察军事时，我正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他同我谈到：他与广西督练公所总办庄蕴宽打算在广西编练一个陆军混成协，想聘请一批留日陆军学生到广西去，先办一所陆军干部学堂，训练一批干部，然后招募士兵

练成新军；嘱我毕业后到广西去，并代为聘请可靠的同志同去广西。因此，我于一九〇八年毕业后，约王孝缜等同志数人先到桂林。一九〇九年，又由广西巡抚张鸣岐委派王孝缜赴北京，邀约那时在北京应考的留日陆军同学和在保定军官学堂及速成学堂毕业的同志同赴广西。我们初到广西时，张鸣岐怕我们是革命党人，对我们是很有戒心的。我们推荐王孝缜赴北京邀约同学，因为他的祖父王庆云曾做过工部尚书，叔父王仁堪是光绪丁丑科状元，父亲王仁东是道台，张鸣岐认为这样大官僚家庭出身的人，一定不是革命党。那知王孝缜是一个革命意志极坚决的同志，到北京以后，又邀约了一批革命同志同回广西。计当时先后到广西的陆军同志，有直隶（河北）省的陈之骥、田遇东、刘洪基、周荫人、耿毅，湖南省的杨源濬、高兆奎、袁华选、齐琳、赵恒惕、刘建藩，安徽省的孙荣、孙方瑜、李乾瓚、丁绪余，四川省的尹昌衡，福建省的王孝缜、何遂、杨明远，江苏省的冷遁、赵正平，浙江省的吕公望，广东省的覃蔭钦，河南省的韩凤楼，湖北省的孔庚、雷寿荣、张华辅、全恕、李浚、黄恺元、李书城等。他们分别在广西督练公所、陆军干部学堂及陆军小学堂担任职务，预备在学生毕业后，编成一个陆军混成协，作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同时与广东、湖南的同志取得联系，以这三个省作为革命的根据地，再向全国扩展，最后夺取北京。我在桂林，是担任陆军干部学堂监督的职务；又有一个时期，兼任过陆军小学堂的监督。那时两个学堂学生中赞成革命的人不少，又都持有新式枪枝。一九〇九年冬季，有一批陆军小学堂学生毕业。陆小学生毕业，抚台照例是要到学堂主持毕业典礼的。我与几个同志秘密商议，趁张鸣岐到陆军小学堂的时候，先杀了他，随即宣布起义。那时，桂林只有少数巡防营，归臬司王芝祥统率。王与我们平时相处甚好，赞成

革新。我们估计发难后，巡防营不会与我们为敌，且它的力量亦弱；再得到广东、湖南方面的响应，成功是大有希望的。但同志中有的认为这样太冒险，不如俟新军建成后，力量充实，更有把握，暂时不必急躁。在计议尚未决定的时候，外面有了一些风声。因此，张鸣岐指摘庄蕴宽招来一些革命党人，要在广西作乱。庄蕴宽被迫辞职。我为缓和外面风声，有决计与庄同时辞职，离开桂林，以便同志们仍得继续留在广西。嗣后，钮永建仍继续担任督练公所帮办职务，陆军干部学堂监督改由陈之骥继任。以后又由蔡锷继任。其他同志都仍照常供职。

黄先生这封信，是在一九一〇年四月初五写给孙中山先生的。这时，我已离开广西，正在北京军谘府供职。到辛亥武昌起义后，黄先生赴武汉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时，我才从北京到武汉，作黄先生的参谋长。其他留在广西的同志，有些回到本省起义，响应革命；有的在广西起义，组织援军，随王芝祥赴武汉，随后，又转赴南京。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由陆军部就广西援军改编为中央直辖的陆军第八师，作为革命的基本队伍。以后，又从第八师将林虎的一团拨归江西，将陶德瑶的一团交由赵恒惕率领开回湖南，作为省军。在广西的陆军同志，虽未能照原计划在广西首先起义，但都在武昌起义以后，对革命各有贡献。

李书城补述 一九六三年元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补充和订正

关于第一次“围剿”史实的补充订正

李家白

湖南《文史资料》第三辑，刊载了谢慕韩和戴岳两先生的文章，它提供了蒋介石对江西红军第一次“围剿”的史实。当年，我任谭道源师参谋长，对于中央纵队的作战经过知之颇详，兹就个人所见，作出补充订正。

（一）谢先生说：“第五十师担任赣西北的绥靖。”按：第五十师入赣后，驻江西之抚州、吉安一带，旋即奉令率师援粤。是谭师在第一次“围剿”以前根本没有到过赣西北，直到一九三五年夏，谭道源才被任命为江西第五绥靖区（赣西北）司令官，驻在宜春。

（二）谢说：“蒋介石令鲁涤平抽调谭道源师全部及第十八师王捷俊旅由谭统率援粤，留赣正规军仅第十八师的戴岳、朱耀华两旅。”按：谭道源只率五十师岳森的一四九旅、罗寿颐的一五〇旅和王捷俊旅援粤，仍留成光耀的一四八旅驻防吉安、安福一带，

（三）谢慕韩先生说：“一九三〇年秋，蒋冯阎大战结束，军阀混战局面暂时告一段落，蒋乃集中力量，开始了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残酷的镇压——第一次‘围剿’。”我清楚地记得，蒋下郑州后，在柳河召见谭道源（我随谭晋见），说中原战事业已结束，要谭赶快率部回江西打红军，蒋介石认为江西红军纯属地方事件，

应由地方官负责，嘱谭帮助鲁涤平去把它肃清。从蒋介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不了解也不重视江西红军的力量。实际上，后来参加第一次“围剿”的主力，只有十八师和五十师；毛炳文和许克祥两师是朱绍良准备带往福建（朱将出任福建省主席，后因形势变化而未去）而暂为声援者，吉安之罗霖师也是驻防性质，至于第十九路军更是第一次“围剿”失败很久以后的布署了。

（四）谢说：“我们在南昌得悉张辉瓒龙岗败讯，即电令谭道源向左纵队靠拢，免再被各个击破。谭按指定地点进据源头后，因红军坚壁清野，无法采购粮食，也找不到一个向导，……因而在源头停顿未动。奉令后即于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源头移动，行抵牛头湾，后卫周翰团即被红军追及。接触之初，又错误地判断不是红军正规军，可以完成掩护任务，不料愈战愈激，不到两小时即被解决三分之二。本队因出发较早，是晚侥幸到达东韶。但红军追击部队亦尾随而至，次日拂晓即以雷霆万钧之力展开攻击。谭师饥疲之余，未取得瞬间喘息机会，立脚未稳，仓卒应战，真如秋叶被疾风扫荡一样，无力支持，阵地逐渐缩小，……”按：谭道源比较知道一些苏区情况，没有按照总部（九路军总指挥部）部署行进，而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午后一时达到源头。随接前卫报告，我尖兵进出源头南口时，发现少数步枪向我射击。我们认为是诱敌之计。即令停止构筑工事，严密警戒。二十七日由无线电知道十八师已到龙岗，且听到龙岗方面密集枪炮声，至晚枪声顿息，无线电也叫不通十八师了。我们逆料十八师业已失败。此时，我们汽油亦尽，与总部不通消息（不可能奉到什么电令），仅就地加强工事，严密警戒。谭道源和副师长兼一四九旅旅长岳森、一四八旅旅长成光耀（已缩编为两旅）和我日夜研究红军尔后行动和我师的对策。大家认为十八师被解决后，红

军决不会西攻吉安，北扑南昌，更不会舍我而攻毛、许，一定首先移师攻我。我们孤军深入，油粮均尽，退既不许，守更不能，进又自投罗网，乃商决马上东移向毛、许纵队靠拢。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深夜，各团由源头各取捷径向东韶方向移动。我们部队移动时，红军即向我后尾周翰团攻击。周团且战且走，不可能激战很久和解决三分之二，红军只是衔尾急追而已。一月二日午后一时，谭师到达东韶，即凭高构筑工事，严阵以待。三日拂晓，红军向我猛攻。鏖战至下午一时，阵地不是逐渐缩小，而是逐渐延伸。下午三时左右，红军有加无已，战斗更趋激烈，成光耀电告，说黄敬团长请率部出击。师长许之。黄杀入重围后再也没有消息。下午四时许，我正面纷纷溃退向东北移动，红军已绕至师部右后，并俘去参谋处长黄宜。师部少数人员只得护谭向东北方向撤退，沿途嘱各级官长收容到抚州（临川县）集合整理。

（五）谢说“谭师四日到宜黄，本拟从事收容。”按：谭师五日下午三时才到宜黄县东南之一个不小的圩镇（忘其名，距抚州一百二十里）宿营。一方面命部队继续向抚州集合待命，一方面专差于六日赶到抚州发电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我拟的微（五日代号）电说：职师于江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营长×××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不可数计，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员兵，或俘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七日正午，我们到抚州即接蒋介石复电。

（六）谢说谭师损失枪支在六千支以上。按：实际只损失步枪约二千支，该师全部枪械也不到八千支。

（七）选辑六十七页载李家白提供的资料中，所谓“一九二九

夏”和“时为一九二九年十月”，均为一九三〇年之误。特此更正并致歉。

(八)戴岳先生所写关于龙岗战役一文，多系亲历事实。唯戴先生转述张辉瓒所说的什么“谭师望援甚切”、“红军与谭师相隔很近，恐已接触”、“谭师迭电催援”等语，很可能是张不愿采纳戴意的托词。因为谭道源的所有军事电报无不由我草拟，从第一次北伐时期起，不论任何战役，谭师从未向张辉瓒求过援。何况谭师进据源头后和十八师被歼之前，谭师与红军并无大接触，没有向张求援的必要，更谈不上“迭电催援。”

樊锥不是蔡松坡的母舅

唐希拊

湖南《文史资料》第一辑载唐才质先生《追忆蔡松坡先生》一文，有“母舅樊锥，博学多能。……”等语。我家与樊、蔡两家是世交，并有亲戚关系（我的七叔昆生是樊先生的学生，七婢是樊先生的胞妹）。据我所了解，松坡先生的太夫人姓王，不是姓樊。松坡先生和樊纯系师生关系，并非甥舅。但他们师生感情深笃，有如父子。一九〇七年，广西巡抚张鸣岐知道樊先生博学，且通时务，曾见重于赵尔巽、魏光燾、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因而托松坡先生邀请樊往广西主办法政学堂。樊因筹办学堂，不胜繁剧，以致肺病复发，住在学堂后面的风洞山（桂林名胜之一）养病。那时，松坡先生在桂，身兼数职，非常忙碌，但每日必于百忙中

抽空到风洞山一二次，亲自照料樊的起居和医药，每每是深夜始离去，有时还邀同我叔唐鹹和雷颢协助护理。我叔间或要我同去作些杂事。我总是碰到松坡先生在那里殷勤侍奉。由于松坡先生自己并邀同朋友轮流侍奉，使得樊先生经常看到有亲人在其左右，不感寂寞。侍奉了好几个月，多方医治，迄无起色，松坡先生想送其赴日本医疗。樊自知病入膏肓，坚决要回邵阳。松坡先生不敢违命，遂请求亲自护送回籍。樊说：“你现在身兼这么多的职务，如何离得开，我想要毕春霖（也是樊的学生）护送。他很细心，你们可以放心，不要为了我的病，误了你们的公事。”樊到家只几天就去世了。松坡还深以未及亲视含殓为憾。

关于《回忆秋瑾》的订正和补充

王希孟

先君时泽先生写的《回忆秋瑾》（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和湖南《文史资料》第二辑）一文中，谈到秋瑾在日本青山实践女校师范班的同学有“……吴珊（湘潭人，胡迈之妻）”。按：湘潭胡迈（号彦远，曾任明德中学校长，解放后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已故）先生的夫人是吴双，清末湖南省派往日本的官费留学生，与秋瑾在青山实践女校同学。吴珊系吴双之妹，没有去过日本。（我曾问过龙璋之媳许佩琅先生，证实吴珊确系吴双之误）先君撰写回忆录时误记了，特为订正。

最近清检先君遗稿，发现秋瑾在绍兴就义后，先君追念亡友，

填有《贺新凉》（怀亡友秋瑾女士）词一阙：

倏忽蝉鸣歇，又满目苍葭白苇，霜华如雪。最苦沉沉长夜暗，几处寒蛩声咽，望不见山阴明月。击筑酣歌谁伴我，拂吴钩更令人悲切。思往事，愁难说。头颅几许萋宏血，欢胥涛淘愁泻恨，英雄将绝。射影含沙真鬼蜮，料汝心肝全别。动物类应同龟鳖，只有冤禽衔石恨，纵海枯石烂难磨灭。沉痛极，肝肠裂。

这首词收入先君留日旧作《击楫轩杂俎》中，系未刊稿。